



目 录

文化·社会

- 3 刘文飞 / 米尔斯基和他的《俄国文学史》
- 34 张 红 刘会宝 / 俄罗斯国家身份的探寻之旅——詹姆斯·比灵顿的俄国文化研究
- 65 张建华 / 以赛亚·伯林视野下的苏联知识分子和苏联文化
- 90 杨素梅 / 哥萨克的起源与社会属性分析：一种哥萨克学的研究视角

新经济政策

- 103 黄立第 / 新经济政策时期苏联社会组织管理体制的初创与确立
- 126 张 丹 / 苏联新经济政策时期城市住房管理体制转型初探

转型经济研究

- 144 余南平 李秋悦 / 后金融危机时代俄罗斯经济转型评估
- 174 徐坡岭 郑燕霞 / 分权体制下中俄地方官员激励机制及其经济行为选择比较——2000年以来的相似性和差异性

全国中文核心期刊

中国期刊方阵双效期刊

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

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来源期刊

主管单位：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主办单位：

华东师范大学

出版单位：

《俄罗斯研究》编辑部

主 编：冯绍雷

副 主 编：陈大维（常务）

杨 成

刘 军

封面设计：王 洪

编辑部地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

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

电话：021-62233816；62238113

Email: russiastudies@163.net

邮政编码：200062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

CN31—1843/D

国际标准连续出版物号：

ISSN 1009—721X

印刷：华东师范大学印刷厂

出版日期：2012年6月28日

俄羅斯研究

ИЗУЧЕНИЕ РОССИИ

2012 年第 3 期 (双月刊)

Оглавление

Лю Вэньфэй

Д. П. Святополк-Мирский и его «История рус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3)

Чжан Хун, Лю Хуэйбао

Поиск национального самосознания России--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культуры России Джеймсом Биллингтоном..... (34)

Чжан Цзяньхуа

Советская интеллигенция и культура СССР в видении Исайи Берлина..... (65)

Ян Сумэй

Анализ происхождения и социальных атрибутов казачества--С точки зрения казачеведения..... (90)

Хуан Лифу

Создание и установление системы управления советской социальной организацией в период новой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й политики (103)

Чжан Дань

Предварительный анализ трансформации системы управления городским жилищным фондом в Советском Союзе в период новой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й политики..... (126)

Юй Наньпин, Ли Цююе

Оценка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й трансформации в России в эпоху после финансового кризиса (144)

Сюй Полин, Чжэн Янься

Сравнение механизмов мотивации местных чиновников в Китае и России в условиях децентрализованной системы и выборов их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го поведения---сходства и различия с 2000 г..... (174)

俄羅斯研究

RUSSIAN STUDIES

2012 年第 3 期 (双月刊)

Contents

Liu Wenfei

D.S. Mirsky and His *History of Russian Literature* (3)

Zhanghong, Liu Huibao

In Search of Russian National Identity---On James Billington's Russian Cultural Studies (34)

Zhang Jianhua

Soviet Intellectuals and Culture---from a Perspective of Isaiah Berlin (65)

Yang Sumei

Analysis on Origins and Social Properties of Cossacks---A Perspective of Cossack Studies (90)

Huang Lifu

Creation and Establishment of Soviet Social Organization Management System during the New Economic Policy Period (103)

Zhang Dan

Analysis on Transition of Urban Housing Management System during the Era of the Soviet New Economic Policy (126)

Yu Nanping, Li Qiuyue

Assessment of Russian Economic Transition after the Financial Crisis (144)

Xu Poling, Zheng Yanxia

A Comparative Study of Motivation Mechanisms and Choices in Economic Behaviours of Chinese and Russian Local Officials under the Decentralized Institution---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since 2000 (174)

文化·社会

米爾斯基和他的《俄国文学史》

刘文飞*

【内容提要】“公爵同志”米爾斯基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欧美和苏联文学界、知识界的重要人物之一，他充满突转的生活经历和坚忍不拔的文学活动构成文坛的一段传奇，甚或那一代俄国知识分子之命运的缩影和象征。他用英文撰写的《俄国文学史》被纳博科夫称为“用包括俄语在内的所有语言写就的最好一部俄国文学史”，所谓“米爾斯基文学史”因其“折中主义”的文学史观、主客观统一的批评手法和极富个性的话语风格而独树一帜，被视为西方俄国文学研究的奠基之作，长期被欧美高校斯拉夫系用作俄国文学史教材，其影响历久不衰。

【关键词】米爾斯基 俄国文学 《俄国文学史》

【中图分类号】I317.09(511.2) **【文章标识】**A **【文章编号】**1009-721X(2012)03-0003-(31)

关于米爾斯基的《俄国文学史》，有这样两段脍炙人口的话：第一段话出自纳博科夫（Vladimir Nabokov）之口。20世纪40年代末，一位希望重印“米爾斯基文学史”的美国编辑致信纳博科夫，希望后者写一份建议再版此书的推荐信，纳博科夫并未同意，他在回信中这样写道：“是的，我十分欣赏米爾斯基的这部著作。实际上，我认为这是用包括俄语在内的所有语言写就的最好的一部俄国文学史。不幸的是，我必须放弃举荐此书的荣幸，因

* 刘文飞，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中国俄罗斯文学研究会会长。

为这位可怜的学者如今身在俄国，由我这样一个反苏作者所写的推荐意见定会给他造成相当大的麻烦。”^①第二段话来自牛津大学教授史密斯（G. S. Smith）的专著《米尔斯基：俄英生活（1890-1939）》。他在书中这样写道：“俄国境外所有的俄国文学爱好者和专业研究者均熟知米尔斯基，因为他那部从源头写至 1925 年的文学史仍被公认为最好的一部俄国文学史。这部杰作起初以两卷本面世，后以单卷缩略本再版。这部著作始终在英语世界保持其地位，逾 70 年不变，这或许创下了同类著作的一项纪录。”^②

纳博科夫所言之“用包括俄语在内的所有语言写就的最好的一部俄国文学史”（“the best history of Russian literature in any language including Russian”；«лучшая история рус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на любом языке, включая русский»），以及史密斯所称的“或许创下了同类著作的一项纪录”（“may well be a record for this kind of book”），无疑是令人印象深刻的。



德米特里·彼得罗维奇·斯维亚托波尔克-米尔斯基（Дмитрий Петрович Святополк-Мирский；Dimitry Petrovich Svzatopolk-Mirsky）^③是著名的文学史家、批评家和文艺学家，同时也是重要的俄国政论作家和社会活动家。他同时用俄英两种语言著书撰文，是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西欧和苏联文学界、知识界极为活跃的人物之一，其充满突转的生活经历和坚忍不拔的文学活动构成了当时文坛的一段传奇，甚或那一代俄国知识分子之命运的一个缩影和一种象征。

米尔斯基出身显赫，其先祖据说可追溯至公元 9 世纪应斯拉夫人之邀入

① Vladimir Nabokov, *Selected Letters. 1940-1977*, ed. Dimitri Nabokov and Matthew J. Bruccoli, London: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1990, p.91. 纳博科夫当时并不知道，在他写下这段话的时候，米尔斯基已死于苏联远东地区的集中营。

② G.S. Smith, *D.S. Mirsky, A Russian-English Life, 1890-1919*,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p.xi.

③ “斯维亚托波尔克-米尔斯基”是复姓，本书作者流亡西方后，或许为了简便易记，在发表英文文章时仅署名“米尔斯基”。在他后来返回苏联后发表俄文文章时，亦大多只用“米尔斯基”之单姓形式。

主罗斯的留里克王（Рюрик）。他的父亲彼得·德米特里耶维奇·斯维亚托波尔克—米尔斯基（Петр Дмитриевич Святополк-Мирский, 1857-1914）是沙皇麾下高官，曾任骑兵上将、侍从将官和省长，最后官至内务部长。著名的1905年革命就爆发于他父亲的任期内。据后人判断，“流血的星期日”之发生，与这位内政部长的疏忽、优柔甚至“善良”不无关系。德米特里·米尔斯基于1890年9月9日（旧历8月22日）生于乌克兰哈尔科夫省的贵族庄园吉约夫卡（Гиёвка）。童年和少年时期，他接受过良好的家庭教育，通过家庭教师熟练地掌握了英、法、德等欧洲主要语言，并多次游历欧洲，至少三次到过英国。

少年米尔斯基曾在莫斯科的贵族中学短暂求学，后转至彼得堡第一古典中学。正是在这所中学，他与后来均成为著名作家或学者的几位同学日尔蒙斯基（В.М.Жирмунский）、普姆比扬斯基（Л.В.Пумпянский）和苏霍金（А.М.Сухогин）一同创办文学刊物《环节》（*Звенья*）。这份刊物分别在1906年和1907年出版两期，米尔斯基在刊物上发表了翻译的济慈（John Keats）、魏尔兰（Paul Verlaine）等人的诗以及他自己的诗作。“这是米尔斯基作为批评家、诗人和翻译家的首次文学亮相”^①。与此同时，米尔斯基接近当时统领文坛的象征派，与勃洛克（А.А.Блок）、库兹明（М.А.Кузьмин）、古米廖夫（Н.С.Гумилев）等人均有来往，曾参与伊万诺夫（Вяч. Иванов）的“象牙塔”（*Башня*）沙龙的活动。1908年，米尔斯基考入彼得堡大学东方语言系，学习汉语和日语。他曾在给父亲的信中抱怨汉语难学：“日语相当简单，可汉语却十分奇特，其语法迥异于任何概念。”^②1911年，米尔斯基应征入伍，驻扎在彼得堡近郊的皇村。就在次年，他出版第一部诗集《1906-1910年诗选》（*Стихотворения 1906-1910*）。1913年，米尔斯基退伍返回大学，进入古典系学习。翌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米尔斯基再度应征入伍。1906年，他负伤住院，住院期间与一位名叫维拉·弗列里诺娃（Вера Флеринова）的女护士闪电成婚，两人一起生活数周后便决定分手。米尔斯基后来对此事闭口不谈，甚至“忘记向母亲提起这场婚姻”。此后，米尔斯基终身未娶。

① G.S.Smith, *D. S. Mirsky, A Russian-English Life, 1890-1919*, p.37.

② Перхин В.В. Одиннадцать писем (1920-1937) и автобиография (1936) Д. П. Святополк-Мирского// Русск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1996. №.1.С.259.

这段短暂的“战地爱情”，或可视为米尔斯基既浪漫冲动又神秘莫测的性格特征之典型体现。

1917年革命爆发后，米尔斯基加入邓尼金的白卫军部队与布尔什维克作战。令人难以置信的是，他在残酷的战斗之余并未放弃学术，竟于1918年秋在哈尔科夫大学获得史学学位。1920年，米尔斯基同许多战败的俄国贵族一样流亡国外，先波兰后希腊，最终落脚英国伦敦，其间经常往返伦敦和巴黎之间，探望他侨居法国的家人和朋友。自1920年10月起，当时身在雅典的米尔斯基便开始给《伦敦信使》(*London Mercury*)投稿，先后开设“俄国来信”(Russian Letters)和“国外新书”(Recent Foreign Books)等栏目，为该刊撰稿长达十余年。

在米尔斯基步入英国文化界和学术界的过程中，有三位英国人发挥了关键作用。第一位是著名的英国斯拉夫学者莫里斯·巴林(Maurice Baring, 1874-1945)。巴林早年在俄国从事外交和新闻工作，日俄战争期间曾在中国东北地区任战地记者，他后与米尔斯基一家成为朋友，曾造访米尔斯基家的庄园吉约夫卡。在米尔斯基一家流亡后，他伸出援手，正是他将米尔斯基推荐给了包括《伦敦信使》在内的多家英文报刊。在米尔斯基移居伦敦之后，他又将米尔斯基介绍给伦敦的多家学会和俱乐部。米尔斯基后来将其《俄国文学史》率先出版的下卷，即《当代俄国文学(1881-1925)》^①题词献给巴林。^②第二位是伯纳德·佩尔斯(Bernard Pares, 1867-1949)。佩尔斯是英国斯拉夫学的奠基者之一，他曾任英国驻俄外交官，著有《俄国与改革》(*Russia and Reform*, 1907)和《俄国史》(*History of Russia*, 1926)等书。他于1907年在利物浦大学创办俄语学院，后将该学院移至伦敦，更名为斯拉夫研究院(School of Slavic Studies)，该院实为伦敦大学国王学院的一个系，这里当时实际上是整个英国的俄国问题研究中心。1922年春，佩尔斯邀请米尔斯基担任该院俄语讲师和该院刊物《斯拉夫评论》(*Slavonic Review*)的编辑。米尔斯基在这里辛勤工作十余年，“老板”佩尔斯为米尔斯基提供了在西方

① D.S. Mirsky, *Contemporary Russian Literature (1881-1925)*, NY: Alfred A. Knopf, 1926.

② 关于米尔斯基和巴林的关系另参见 Nina Lavroukine, “Maurice Baring and D.S. Mirsky: A Literary Relationship”, *The Slavonic and East European Review*, Vol.62, No.1, Jan., 1984, pp.25-35.

研究和传播俄国文学的机会和条件。但两人后来由于政见不同和性格差异而渐行渐远，米尔斯基最终选择返回苏联，与佩尔斯后来的冷淡似不无关系。第三位是简·艾伦·哈里森（Jane Ellen Harrison, 1850-1928）。哈里森女士是剑桥大学古代考古学教授，1926年移居巴黎后继续其学术研究，是当时欧洲著名的古代宗教专家和古人类学家。她通过米尔斯基以及当时侨居巴黎的俄国作家列米佐夫（А.М.Ремизов）等了解到俄国古代文化，曾翻译阿瓦库姆（Авакум）的《生活纪》（Житие）。反过来，她也对米尔斯基的英文研究工作提供了很大帮助，米尔斯基将其《俄国文学史》的上卷，即《俄国文学史（自远古至陀思妥耶夫斯基去世〈1881〉）》^①题词献给哈里森，他还下卷的序言中向哈里森致谢，称“她以无尽的善意和耐心阅读此书的许多章节，并对我糟糕的英语作出许多无价的订正”。就这样，这三位英国文人学者分别从新闻和出版、学术和教职、文化和文字等三个方面向米尔斯基提供帮助，使他迅速融入英国乃至整个欧洲的知识界。

米尔斯基旺盛的工作激情和写作能量惊人。他仅活到49岁，这短暂的一生还充满求学和教书、革命和战争、流亡和囚禁、旅行和奔波，可他却笔耕不辍。据史密斯教授统计，自1920年底至1937年，米尔斯基发表各类文章或著作共400种，“平均每两周一种，这一惊人频率竟持续16年之久”^②。除大量文章和讲稿以及为《不列颠百科全书》撰写的相关词条外，米尔斯基先后用英文撰写或编纂了九部著作，即《俄国抒情诗选》（*The Russian Lyric*, 1924）、《现代俄国文学》（*Modern Russian Literature*, 1925）、《普希金》（*Pushkin*, 1926）、《当代俄国文学（1881-1925）》（1926）、《俄国文学史（自远古至陀思妥耶夫斯基去世〈1881〉）》（1927）、《俄国史》（*A History of Russia*, 1928）、《俄国社会史》（*Russia: A Social History*, 1931）和《列宁传》（*Lenin*, 1931）。随着这些著作的相继面世，米尔斯基迅速成为英语世界乃至整个西欧学界最负盛名的俄国问题和俄国文学专家。他在授课之余为西欧诸国的报刊撰稿，在英、法、德各地作关于俄国文学和文化的演讲，还曾于1928年游学美国，先后在哥伦比亚大学、康奈尔大学和芝加哥大学作学术报告。

① D.S. Mirsky, *A History of Russian Literature from the Earliest Times to the Death of Dostoyevsky (1881)*, NY: Alfred A. Knop, 1927.

② G.S. Smith, *D.S. Mirsky, A Russian-English Life, 1890-1919*, p.81.

身在西欧的米尔斯基，其关注点并不仅仅在俄国文学，他还是一位积极的政论作家和政治活动家。他在这一方面的主要表现，即他在欧亚主义运动（Евразийское движение）中的表现和影响。自 1922 年起，他便开始接近该运动及其四位创建者，即尼古拉·特鲁别茨科伊（Николай Трубецкой）、格奥尔基·弗洛罗夫斯基（Георгий Флоровский）、彼得·萨维茨基（Петр Савицкий）和彼得·苏福钦斯基（Петр Сувчинский）。欧亚主义运动以上述四人在保加利亚索菲亚联名出版文集《转向东方》（Исход к Востоку, 1922）为起点，它体现了部分俄国流亡知识分子在新的历史时期的特殊心态。该派认为，俄国是一个有机地融合着西方和东方不同元素的特殊国家，正是这种历史、种族和地理意义上的综合性，赋予俄罗斯民族独特的禀赋和特殊的使命。一度对十月革命后的布尔什维克政权持敌对态度的欧亚主义者，却突然在新兴的苏维埃国家雏形中隐约感觉到实现他们理想的可能性，因此转而采取某种亲苏立场。米尔斯基和艾弗隆（С.Я.Эфрон）等人后来返回苏联，在某种程度上也是这一心态的自然结果。欧亚主义者于 1928-1929 年间在巴黎创办周报《欧亚》（Евразия），米尔斯基与卡尔萨温（Л.П.Карсавин）、苏福钦斯基、艾弗隆等人共同编辑该报。20 年代末，欧亚主义运动发生分裂，米尔斯基和艾弗隆等构成该运动的左翼，他们的亲马克思主义立场日益鲜明，这最终导致该运动在 30 年代中期的分裂和消亡。

言及米尔斯基与欧亚主义运动的关系，人们常会提起他生活中的两段逸事：一是他与苏福钦斯基的妻子维拉·亚历山大罗夫娜·苏福钦斯卡娅（Вера Александровна Сувчинская, 1906-1987，她出嫁前姓古奇科娃〈Гучкова〉，后嫁给一位英国共产党人，随夫改姓特莱尔〈Traill〉）的罗曼史，这位女士后曾以维拉·米尔斯卡娅（Vera Mirsky）为笔名创作英文小说，或将俄语文学作品译成英文；二是米尔斯基与艾弗隆的妻子茨维塔耶娃（Марина Цветаева）的亲近。茨维塔耶娃曾在《诗人论批评家》（Поэт о критике, 1926）一文中对包括布宁（Иван Бунин）、吉比乌斯（Зинаида Гиппиус）在内的“境外批评家”表示不满，她随后却写道：“也有令人欣慰的明显的例外——即不从表面的政治特征出发去评判诗人（那样的文章还少吗？）——斯维娅德

鲍克—米尔斯基公爵的文章就是这样的。”^①1926年3月，米尔斯基邀请女诗人访问英国，他在两周时间内不离茨维塔耶娃左右，茨维塔耶娃在寄自巴黎的信中告诉友人，米尔斯基领她“吃遍了”伦敦的餐馆。后来，或许由于米尔斯基热情消退，或许由于茨维塔耶娃很快移情于里尔克（Rainer Maria Rilke）和帕斯捷尔纳克（Борис Пастернак）^②，两人关系趋于冷淡。但我们仍然注意到，米尔斯基1926—1928年间参与创办的欧亚主义杂志《里程碑》（Версты），其名称便取自茨维塔耶娃1922年出版的同名诗集。

20世纪20年代末，米尔斯基的政治态度逐渐发生变化，开始同情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1928年，他前往直意大利索伦托拜访高尔基（Максим Горький），与高尔基的长谈更促进了米尔斯基世界观的转变。他在回来后给高尔基的信中这样写道：“我感觉我不是置身索伦托，而是置身俄国，这次置身俄国奇怪地使我顺服了。”^③1931年，米尔斯基加入英国共产党。之后，米尔斯基的思想迅速“左倾”，1931年6月30日，他在英文报纸《工人日报》（Daily Worker）上发表《我为何成为一名马克思主义者？》（Why I Became a Marxist）一文，公开亮明其政治身份。可是他在归纳这一转变的原因时，却出人意料将苏维埃文学所取得的成就对他产生的震撼作用列于首位^④。此后，他直接求助高尔基，请后者出面帮他获得苏联国籍并安排他返回苏联。他在这一时期给高尔基的一封信中写道，他之所以写作《列宁传》一书，就是为了“不两手空空”返回苏联，他愿意献身于“列宁的事业”^⑤。1932年9月底，米尔斯基自法国乘船抵达列宁格勒，结束了长达十年的流亡生涯。

回到苏联后，原本希望在政治和社会领域大展一番宏图的米尔斯基，很快便意识到自己的另类身份，于是退回文学。“获得苏联国籍，外加渊博的学识和巨大的工作能力，以及高尔基的鼎力支持，这些因素使得德·米尔斯

① 汪剑钊编：《茨维塔耶娃文集·散文随笔》，北京：东方出版社，2003年，第340页，董晓译文，译文中的“斯维娅德鲍克”即“斯维娅托波尔克”。

② 参见里尔克、帕斯捷尔纳克、茨维塔耶娃：《抒情诗的呼吸（1926年书信）》，刘文飞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年。

③ Бирюков А. Князь и пролетарский писатель. История рус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с древнейших времен по 1925 год. пер. с англ. Р. Зерновой, Новосибирск: Изд-во «Свиный и сыновья», 2009. С.7.

④ Там же, С.13-14.

⑤ Там же, С.10.

基（这是他当时的笔名）迅速成为文学进程中一位享有充分权利的积极参与者。”^①他研究普希金（А.С.Пушкин），评论当代文学，同时译介英语文学，尤其是艾略特（T.S.Eliot）、乔伊斯（James Joyce）等人的作品。但是即使在文学界，他的阶级出身和海外经历也时常引起猜疑。当他撰文对法捷耶夫（А.А.Фадеев）的小说《最后一个乌兑格人》（Последний из удэге）提出批评时，便引起许多“无产阶级作家”的口诛笔伐，直到高尔基在《真理报》（Правда）上发文力挺米尔斯基，方替后者解围。1934年，米尔斯基加入苏联作家协会。与他的“英国时期”相比，米尔斯基的“苏联时期”的文字有了越来越多的“庸俗社会学”色彩，如他参加写作的歌功颂德之作《斯大林运河》（1934）^②。但是，米尔斯基仍体现出旺盛的写作能力。据史密斯教授统计，米尔斯基1932-1937年间写作并发表的文章和著作多达近百种^③，其中较有价值的是他的普希金研究文章以及他译介的英国文学作品，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他编纂的《英国新诗选》（1937）^④。这部厚达453页的诗选收入了勃朗宁（Browning）、哈代（Hardy）、叶芝（Yeats）、劳伦斯（Laurence）、艾略特、欧文（Owen）、奥登（Auden）等人的诗作，此书在米尔斯基被捕之后才出版，编者的姓氏也被虚拟为“古特涅尔”（М. Гутнер），可这部所谓的“古特涅尔选本”（гутнеровская антология）却流传甚广，至今仍为人所知所读。

在米尔斯基的“庇护人”高尔基于1936年去世后，在苏联肃反运动愈演愈烈的情势下，米尔斯基终于在劫难逃。1937年7月2-3日深夜，米尔斯基被秘密警察逮捕，后以间谍罪被判处八年劳改，被流放至苏联远东地区。1939年6月6日，米尔斯基死于马加丹市（Магадан）附近的“残疾人劳教所”（ОЛП «Инвалидный»）。他于次日被草草掩埋，据劳教所档案记载，他

① Бирюков А. Князь и пролетарский писатель. История рус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с древнейших времен по 1925 год. С.15.

② Под ред. М. Горького, Л. Авербаха и С. Фирина. Беломорско-Балтийский канал имени Сталина. История строительства. М.: ОГИЗ, 1934.

③ G.S. Smith, "D.S. Mirsky: An Annotated Bibliography of Writings Published in the USSR, 1932-1937", in ed. G.S. Smith, *D.S. Mirsky: Uncollected Writings on Russian Literature*, Berkeley Slavic Specialties, Berkeley, 1989, pp.368-385.

④ Гутнер М. Антология новой английской поэзии. Ленинград: ГИХЛ, 1937.

被埋在劳教所以东 800 米处，墓穴深 1.5 米，“脑袋朝西”^①。

米尔斯基的一生被截然划分成三个阶段，即沙皇时期、英国时期和苏联时期。他似乎善于顺风行船，如一位英国记者所调侃的那样，“米尔斯基居然能成为三种制度的食客，即沙皇制度下的公爵，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教授，共产主义制度下的文人”^②。然而，米尔斯基的一生仿佛又构成一个巨大的悖论：世袭的贵族和激进的自由派，文人和武士，白卫军官和共产党员，反苏流亡者和社会主义者，社会活动家和文学家，他往往会先后、甚至同时扮演这些截然不同的角色，他获得的“红色公爵”（Красный князь; Red Prince）或“公爵同志”（Товарищ князь; Comrade Prince）的绰号，似乎正是这种矛盾组合之概括；他在西欧与俄国、东方与西方、文化与政治、俄国文学与英语世界等不同领域间往来穿梭，形成一座沟通和交流的桥梁。

二

米尔斯基于 1924 年动笔写作《俄国文学史》，其动机既有在伦敦大学斯拉夫学院教授俄国文学课程^③以及履行与克诺普夫出版社（Knopf）^④所签合同的实际需要，也有向英语世界、乃至整个西欧推介俄国文学的强烈冲动。米尔斯基的《俄国文学史》并非英语世界中关于俄国文学最早的史著，在它之前早已有过多部同类著作，《俄国文学史》后所附长长的参考文献目录便是一个证明。米尔斯基写作这部文学史的“条件”似乎也并不理想。他身在异国，所能利用的研究资料和文学作品相对有限。他在下卷序言中就曾抱怨，他“最大的困难是难以读到 1914-1918 年间出版的图书”，因为“苏联当局禁止出口革命前出版的图书，这也造成巨大不便”。他甚至无法参阅《布罗

① G.S. Smith, *D.S. Mirsky, A Russian-English Life, 1890-1919*, p.318.

② Прашкевич Г. Еще раз об авторе этой книги. История рус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с древнейших времен по 1925 год. С.861.

③ 米尔斯基《俄国文学史》上、下两卷英文版扉页上均如此表明其作者身份：“伦敦国王学院俄国文学讲师”（Lecturer in Russian Literature at King's College, London）。

④ 该出版社由克诺普夫（Alfred Abraham Knopf, 1892-1984）1915 年创建于纽约，以出版高水准的文学作品和学术著作著称，社标是一只奔跑的俄国狼狗。该社于 1960 年并入兰登书屋，现为贝塔斯曼传媒集团名下的克诺普夫一道布尔戴出版社集团（Knopf Doubleday Publishing Group）。

克豪斯和艾弗隆新百科全书》(Энциклопедический словарь Брокгауза и Ефрона/ЭСБЕ)和温格罗夫(С.А.Венгров)的《19世纪俄国文学史》(История рус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XIX века)等不可或缺的工具书和参考资料。他承认他的写作遭受的“最大的影响即传记资料不足”。再者,米尔斯基是在用英语表述他对俄国文学的解读。他的英语水平再高,也不得不用另外一套话语来阐释他的感受和思想,至少要将大量的概念、标题和引文译成英语。但就在这种种不利条件下,他却在短短两年多的时间里便写出了厚厚两大卷的文学史著。

史密斯教授对这部史著推崇备至,在评价它时毫不吝惜最高级修饰语,称其为米尔斯基的“终身成就”(a lifetime's achievement)^①,米尔斯基的创作“巅峰”(the peak)^②和“最高荣光”(the crowning glory)^③。史密斯写道:“这两本书自面世后便成为标准之作,它们培育了一代又一代研究俄国文学的英语学者。”^④他还引用了英国诗人和学者多纳德·戴维(Donald Davie, 1922-1995)关于米尔斯基文学史所说的一段话:

这两部书是文学史写作之样板:它们犀利深刻,却又趣味宽容;首先是结构出色,清晰而又比例得当。尚无一部英国文学史,无论多卷本或单卷本,能如米尔斯基这部俄国文学史一般为英语增光添彩。^⑤

在戴维看来,米尔斯基的《俄国文学史》这部由一位俄国人用英语写作的俄国文学史,竟然能“为英语增光添彩”!米尔斯基的《俄国文学史》之所以能在英美斯拉夫学界“称雄”数十年,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一些客观因素使然,更是作者自身的天赋和素养之结果。

米尔斯基文学史的写作和出版,是在一个特殊的历史和社会语境中完成的。首先,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以及十月革命爆发之后,西欧列强出于地

① G.S. Smith, *D.S. Mirsky, A Russian-English Life, 1890-1919*, p.109.

② *Ibid.*, p.79.

③ G.S. Smith, “D.S. Mirsky, Literary Critic and Historian”, in ed. G.S. Smith, *D.S. Mirsky: Uncollected Writings on Russian Literature*, p.35.

④ *Idid.*

⑤ D. Davie, “Introduction”, in *Russian Literature and Modern English Fiction: A Collection of Critical Essays*, Chicago-London, 1965, pp.11-12. 转引自 G. S. Smith, “D.S. Mirsky, Literary Critic and Historian”, p.35. 出版此书时的戴维刚刚结束在英国剑桥大学的任教,转而前往美国任埃塞克斯大学副校长。

缘政治、外交等方面考虑，开始对俄国和俄国问题表现出空前关注。俄国作为一个欧洲后起的大国，其历史和文化对于许多西欧国家而言还是一个尚待开发的未知地域。以英国为例，无论是在历史文化还是政治经济方面，它与德、法等国的关系都远远超过它与俄国的关系。于是，对于包括俄国文学在内的俄国之一切认识和理解，便成了当时西欧列强所面临的迫切的现实任务。其次，在十月革命后流亡西欧的大量俄国侨民，尤其是其中为数甚多的俄国知识分子和文化人，在俄国境外构成了一个茨维塔耶娃所谓的“喀尔巴阡的罗斯”（Карпатская Русь），即一个俄国境外的俄国小社会。这进一步强化了西欧人对俄国的兴趣和关注，而这个以文化精英为主体的“小社会”所体现出的旺盛的文学、文化创造力和影响力，更让西欧人感到惊讶甚或震撼。最后，更为重要的是，在米尔斯基向西欧读者介绍俄国文学时，当时的整个欧洲已开始被 19 世纪下半期的俄国文学所“征服”，欧洲广大文学读者对俄国文学的兴趣迅速增长。他们大量阅读俄国文学作品，谈起果戈理（Н.В. Гоголь）、屠格涅夫（И.С.Тургенев）、陀思妥耶夫斯基（Ф.М.Достоевский）、托尔斯泰（Л.Н.Толстой）和契诃夫（А.П.Чехов）来津津乐道。许多作家、学者开始以俄国文学为题写书撰文，如法国外交家兼作家德·沃盖（Eugène-Melchior de Vogüé）的《俄国小说》（*Le roman russe*, 1886）、西班牙女作家艾米莉亚·巴赞（E. Pardo Bazan）的《俄国的革命和小说》（*La Revolución y la novela en Rusia*, 1887）、德国柏林大学教授勃鲁克纳（A. Brückner）的《俄国文学史》（*A Literary History of Russia*, 1908）以及前文言及的巴林和佩尔斯等人的相关著作，均对西欧的“俄国热”起过推波助澜的作用。新近有俄国学者“精确”地将俄国文学在西欧的“崛起”确定在 1881 年，即陀思妥耶夫斯基去世的一年（顺便提一句，这与米尔斯基文学史上、下两卷的分期完全一致！），并进而指出，俄国文学的崛起在促进西方俄国观之转变的过程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①。总之，在米尔斯基动笔写作《俄国文学史》时，整个西欧正处于欲了解俄国却又云里雾里、欲阅读俄国文学却又不甚了了的关键时期，米尔斯基的这部文学史实可谓生逢其时。

^① 巴格诺：“西方的俄国观”，刘文飞译，《外国文学评论》，2012 年第 1 期，第 144-161 页。

然而，米尔斯基这部文学史的脱颖而出，首先自然仰仗其作者自身所具有的某些特质和因素。米尔斯基出身世袭大贵族，像那一阶级的大多数人一样，他也对他的国家、民族和文化怀有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以俄国及其历史为骄傲；与此同时，他又自视为新近崛起的伟大的俄国文学之代表，因自己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托尔斯泰的同胞而感到无比自豪。因此，他虽为一名背井离乡的流亡者，伦敦一所大学里的“讲师”，可他却如赫尔岑（А.И. Герцен）等人一样，在面对所谓“市民化的”西欧时毫无自卑，却反而持有某种文化和精神上的优越感。米尔斯基在西欧学界游刃有余，当然还得益于他杰出的语言天赋和关于西欧文学与文化的渊博知识。米尔斯基精通德、法、英等主要欧洲国家的语言，其英语水平更是非同寻常。他在此书序言中向哈里森致谢时曾言及他“糟糕的英语”，这实为过谦之词。用史密斯教授的话来说，就对英语的精通而言，米尔斯基“在俄国作家中除纳博科夫外再无敌手”^①。无论是在文字里还是演讲中，他谈起西欧诸国的文学来头头是道，如数家珍，而相形之下，他的西欧同行们对俄国文学的了解却显得相当粗浅，这么一来，米尔斯基的自信和优越便不言而喻了。总之，俄国人固有的“弥赛亚”意识，俄国知识精英的文学优越感，以及由于深谙西欧语言和文化而获得的自信，这三者相互结合，便赋予《俄国文学史》作者一种指点江山的豪气和舍我其谁的霸气。

在这部文学史中，米尔斯基论及某位作家的风格时常常使用“调性”（intonation）一词。我们若反过来用这一概念归纳米尔斯基的文学史，便可将其特殊“调性”确定为自信和个性化。以赛亚·伯林（Isaiah Berlin）在言及米尔斯基的文学史时便注意到了这一特征：

米尔斯基的评判十分个性化，他提出的史实往往并不准确。对于那些不知为何令他欣喜或激动的作家，他毫不吝惜华丽的颂词；而那些偶然惹他厌恶或嫌弃的作者，无论影响大小，无论是一位天才还是一位被遗忘的庸才，均会遭到他劈头盖脸的猛烈抨击……他不是一位有条理的批评家，他的著作中有大量随心所欲的遗漏；但是，他对于自己的文学洞察力却无比自信，带着这份自信，他成功地发掘出一些不应被埋没的

^① Ed. G.S. Smith, *D.S. Mirsky: Uncollected Writings on Russian Literature*, p.20.

作家，将一些在俄国境外少为人知的人物介绍给西方读者，以一种出色的手法使西方读者注意到了这些俄国作家巨大而持久的价值。^①

以赛亚·伯林此处关于米尔斯基“不是一位有条理的批评家”、“他提出的史实往往并不准确”的说法值得商榷，史密斯教授对此便不以为然，他颇有些针锋相对地指出：“当下的专家，尤其是刚刚起步的专家，尤其需要富有条理和威信的基本引导，在这一方面，米尔斯基同样无与伦比。他给出的史实几乎完全无误，他的褒贬感觉十分精确，其读者无论是专家还是初学者，总能在他的那里获得某些思考和构建的契机。”^②他还有意挑明了米尔斯基对伯林本人的影响：“米尔斯基关于赫尔岑启蒙自由主义的分析无疑对以赛亚·伯林本人关于赫尔岑的阐释产生过影响，而伯林关于赫尔岑的阐释则是他对俄国思想所做阐释的基础”^③。不过，伯林尽管对米尔斯基评价不足，但他还是敏锐、公正地指出了这部文学史的两大突出特征，即“十分个性化”（recklessly personal）和“对于自己的文学洞察力”的“无比自信”（confidence in his own literary insight）。

种种主客观因素的结合，使米尔斯基成了在当时的社会和历史语境中向西方推介俄国文学的最合适人选。这位满怀自信而又富有个性的俄国文学布道者，在俄国文学登上世界文学之巅的时刻来到西欧，他以责无旁贷的气势激扬文字，为西方接受俄国文学定下了基调。“《文学史》使米尔斯基无可争辩地永久获得一种地位，即俄国文学和英语世界间的主要中介”^④。

三

若用一个概念来归纳米尔斯基的《俄国文学史》所体现出的文学史观，或许就是“折中主义”，即若干貌似相互对立的美学观和文学观之调和或曰融合。

首先，是社会学批评和美学批评的并立。俄国文学，至少是 19 世纪中

① Isaiah Berlin, “A View of Russian Literature”, *Partisan Review*, 17(6), 1950, pp.617-618.

② G.S. Smith, *D.S. Mirsky, A Russian-English Life, 1890-1919*, p.113.

③ Ibid.

④ Ibid, p.114.

期之后的俄国文学，常被视为一种社会政治色彩很浓的文学，对这一文学的解读自然也难以避免社会历史语境的描述以及相关的文化批评。米尔斯基在其《俄国文学史》上卷序言中便写道：“笔者诉诸的是一个其历史在境外鲜为人知的国家之文学，因此，笔者始终受到一种诱惑之左右，即扩展那些宽泛的历史和文化话题。”因此，他在论及每一文学时代时便会首先概括地交代那一时代的社会文化背景，他在书中提及“罗斯受洗”、俄国早期书刊出版业、19世纪中期的斯拉夫派和西方派对峙、19和20世纪之交的俄国宗教哲学、欧亚主义运动、“艺术世界派”的活动等，他甚至专门辟出两个“插入的章节”来介绍20世纪初爆发的两次俄国革命。但是，米尔斯基虽然注重探讨文化和思想因素在俄国文学史中的重要作用，可他却明确反对将文学史等同于思想史：“在知识分子间占统治地位的那些思想之历史已被多次描述，为知识分子修史的学者常试图将知识分子的思想史等同于俄国文学史，这是一种极大的歪曲。”（II-1-5）^①米尔斯基辟出相当大的篇幅来讨论恰达耶夫（П.Я.Чаадаев）、索洛维约夫（В.С.Соловьёв）、列昂季耶夫（К.Н.Леотьев）、舍斯托夫（Л.И.Шестов）等“思想家”，却拒绝为布尔加科夫（С.Н.Булгаков）和别尔嘉耶夫（Н.А.Бердяев）列专章，理由便是这两人的“思想史意义大于他们的文学史意义”，“他俩并非重要的文学家”（II-4-6）。也就是说，米尔斯基还是想写一部“纯粹的”文学史，“文学的”文学史。在这部文学史的字里行间，米尔斯基似乎始终在刻意排除各种“非文学”因素，他在下卷序言中这样申明其写作立场：

西方的俄国文学史家自一开始便惯于告诉其读者，俄国文学有别于世界上任何一种文学，它与政治和社会史的关联更为紧密。这绝对不是实情。俄国文学，尤其是1905年后的俄国文学，其非政治化几乎令人震惊，如若考虑到它所见证的那些巨大政治灾难。即便诉诸“政治”主题，当代俄国作家其实仍是非政治的；即便他们进行宣传，如马雅可夫斯基，这宣传在他们手中亦为手段而非目的。

^① 引文后括号中的数字，I表示米尔斯基所著《俄国文学史（自远古至陀思妥耶夫斯基去世（1881））》，简称“上卷”，II表示他的《当代俄国文学（1881-1925）》，简称“下卷”，第二个数字表示章，第三个数字表示节，下同。

… …

如若说更高意义上的文学很少受到政治之影响，那么，俄国的文学**观念**（这完全是另一问题）则始终处于政治偏见的巨大影响之下。1917年之后，这一影响自然日益增强。

… …

我并不试图掩饰自己的政治立场，对俄国现实有所了解的人能轻而易举地看出我的好恶。但我得申明，我将使我的**文学良心**远离政治倾向，以同等的批评公正面对所有作家，无论是保守作家列昂季耶夫、自由派索洛维约夫还是布尔什维克高尔基，无论是“白卫军”布宁还是共产党员巴别尔。我的评价和批评或许是“主观的”、个人的，但它们均系文学和“美学”偏见之结果，而非政治派别情感之产物。我还有一个有利条件：我相信我的趣味在一定程度上代表我这一代文学人的美学观，我的评价**就整体而言**不会让内行的俄国读者感觉悖论。

米尔斯基是在强调，俄国文学也有其“非政治”的时段和侧面，即便在诉诸高度政治化、社会化的俄国文学时，他倚重的仍是自己的“文学良心”和“美学偏见”。《俄国文学史》中有两个段落，较为典型地体现了米尔斯基在社会学批评和美学批评间维系平衡的良苦用心。

一是米尔斯基对于别林斯基（В.Г.Белинский）的评说。在上引一段文字中，米尔斯基以“我这一代人的美学观”之“代表”自谓，其用意在于突出他和他“这一代”批评家与别林斯基那一代人的对立。对于在俄国文学中长期占据统治地位的别林斯基式批评，米尔斯基似乎颇为反感。在他看来，“正是别林斯基最为突出地用思想表达之热望毒害了俄国文学……别林斯基（不是作为一位公民批评家，而是作为一位浪漫主义批评家）在很大程度上应对那种鄙视形式和手艺的态度负责，这种态度几乎在六、七十年代杀害了俄国文学”。与此同时，米尔斯基又公正地将别林斯基称为“知识分子的真正父亲”和“俄国激进派的守护神”，认为别林斯基“体现着两代以上俄国知识分子的一贯精神，即社会理想主义、改造世界的激情、对于一切传统的轻蔑，以及高昂无私的热忱，直到如今，他的名字几乎仍是唯一不受批评的名字”。说到这里，米尔斯基话锋一转，言及别林斯基之“过时”：“不过

最近，尤其因为文学标准之变换以及面对文学的公民态度之淡化，他的声誉也面临严峻挑战。”(I-5-14)在米尔斯基对别林斯基的这段评说中不难感觉到以下两点：米尔斯基反感别林斯基的社会学批评，却并不因此而低估别林斯基的文学史和思想史意义；“文学标准之变换”，使得以别林斯基为代表的批评时代终将为米尔斯基这一代的“新批评”所取代。

另一个例子是米尔斯基关于十月革命后的文学之评价。作为一名因十月革命而流离失所的流亡者，作为一名与布尔什维克政权为敌的白卫军官，他自然对苏维埃文学抱有敌意，至少有几分不屑。他对托洛茨基(Лев Троцкий)的文学批评予以嘲讽，认为后者的“风格是不修边幅的新闻体，因其大量布尔什维克行话而面目可憎，这是最为勉强意义上的俄语”(插入的章节之二^①，第二节)；他认为“贫乏的杰米扬”(即别德内依(Демьян Бедный))“完全不是一位诗人，而仅为多少有些技巧的诗匠”，像卢那察尔斯基(А.В.Луначарский)一样是“文学的门外汉”(II-6-11)。但是，在论及高尔基、勃洛克和马雅可夫斯基(В.В.Маяковский)等苏联文学大师时，他却体现出可贵的中肯，甚至激赏。关于高尔基在革命后的处境和作为，米尔斯基写道：“一方面依赖高尔基与布尔什维克领导人的个人关系，一方面仰仗他的国外声誉，高尔基的位置始终独一无二：1918-1921年间，他其实是整个苏维埃俄国除政府之外唯一独立的舆论力量。高尔基严谨超然和‘洗手不干’的态度或许并不值得同情，但他在那恐怖年代的活动却极其有益。他竭尽所能地扮演文化和文明捍卫者的命定角色，他为俄国文化立下大功。1918-1921年间，为使作家和其他高级知识分子免于饿死而采取的每一项措施，均归功于高尔基。”(II-3-2)米尔斯基认为勃洛克在《十二个》(Двенадцать)之后已江郎才尽，“在死去之前很久即已成为一个死人”，可他却认为包括《十二个》在内的勃洛克诗作“无疑是近80年间俄国诗人作品中的最伟大诗篇”(II-5-9)。他这是在暗示，勃洛克是继普希金之后最伟大的俄国诗人。总之，就对苏维埃文学的评价而言，米尔斯基是“超越街垒”(поверх барьеров, 帕斯捷尔纳克一部诗集的标题)的，而他作出取舍或褒贬的依据，即某位作

^① 在米尔斯基的《当代俄国文学》一书中，除以数字为序排列的章节外另有两个“插入的章节”。

家创作所具有的文学性和美学价值。如史密斯教授所言，“米尔斯基的文字并非、亦的确不可能是一张构建社会、道德或伦理世界观的蓝图”，“对于他而言，美学因素始终是首要的”。^①或者更确切地说，米尔斯基的文学观念虽然经历了一个逐渐“庸俗社会学化”的过程，但值得庆幸的是，在他写作这部文学史时，“意识形态因素”尚未在其美学观中占据“首要”位置。^②

其次，米尔斯基的文学史观是客观批评和主观批评的统一。在前引的下卷序言中，米尔斯基曾自称“我的评价和批评或许是‘主观的’、个人的”，而史密斯教授却发现，米尔斯基始终视自己为一个“客观的批评家”(objective critic)^③。的确，客观态度和主观立场，翔实的事实和武断的结论，严谨的推论分析和口无遮拦的嬉笑怒骂，这一切相互穿插，共同织就了米尔斯基《俄国文学史》颇为奇特的批评风格。

米尔斯基在下卷序言中写道：“向英语读者介绍当代俄国文学，我试图尽可能地诉诸事实，而特意回避概括。”他的这部《俄国文学史》的确注重文学史实，无论是重要的文学运动和文学事件，还是重要作家的身世和作品，他均一一作出可信的交代。在给出一条清晰的俄国文学发展脉络的同时，他还注重提供一些生动具体的文学史细节，甚至具有演义性质的“故事”。例如，米尔斯基这样叙述费特(A.A.Фет)一生的终结：“费特深受叔本华影响，成为一位坚定的无神论者和反基督教者。因此，在他72岁时，当哮喘病的折磨让他越来越难以忍受时，他很自然地试图用自杀来了结痛苦。他的家人自然竭尽全力阻止他这样做，寸步不离地守着他。但是，费特却始终没有放弃计划。一次，他抓住一个独处的机会，操起一把钝刀，但就在他举刀自尽之前，却因心力衰竭而亡(1892)。”(I-7-8)又例如，他如此介绍罗扎诺夫(B.B.Розанов)婚姻的幸福与不幸：“他无法与她成婚，原因是前妻的拒不合作，这在很大程度上可用来解释，他谈论离婚问题的所有文字为何均满含苦涩。他的第一次正式婚姻多么的不幸，这第二次‘非正式’婚姻便多么的幸福。”(II-4-4)米尔斯基在写到列斯科夫(H.C.Лесков)时说：“据称他在

① G.S. Smith, *D.S. Mirsky, A Russian-English Life, 1890-1919*, p.xvii.

② 参见 G.S. Smith, “D.S. Mirsky, Literary Critic and Historian”, p.25.

③ G.S. Smith, *D.S. Mirsky, A Russian-English Life, 1890-1919*, p.119. 另参见 G.S. Smith, “D.S. Mirsky, Literary Critic and Historian”, p.36.

去世之前曾说：‘如今，人们因为我作品的优美而阅读我，但 50 年后，这优美不再，人们只会因为我作品中包含的思想来阅读我的书。’”(II-1-3) 这类“据称”(be said, be reported, be declared)之类的字样在书中多次出现，可它们给人留下的印象却并非捕风捉影的“野史”，因为作者给出的这些鲜活事例或引文，反而能让读者更为贴切可感地触摸到俄国文学史的肌体。

米尔斯基之客观，还表现为他的有一说一，不为名人讳。比如，米尔斯基称费特为“我们诗歌中的瑰宝”，但他也毫不掩饰地写道：“在与沙皇一家的交往中，费特厚颜无耻，以势利和卑躬为原则。”(I-7-8) 米尔斯基承认涅克拉索夫(Н.А.Некрасов)是“一位天才的编辑”，却又直截了当地指出：“所有人都认为他既冷酷又贪婪。像当时所有出版家一样，他会利用其作者的大度，尽量少付报酬给他们。他的个人生活也超出激进派清教主义的标准。他经常豪赌，他将大把金钱撒在牌桌上和他的女人们身上。他始终自视高人一等，喜欢与那些社会上流人士交往。在许多同时代人看来，所有这一切与其诗歌的‘仁慈’、民主特征并不相符。不过，尤其让人反感他的，还是他在《现代人》(Современник)被查封前夜的懦弱行为。当时，为了保护他自己和他的杂志，他编出一首赞颂当权者穆拉维约夫伯爵的诗并当众朗诵，而那位伯爵却是一个最冷血、最坚定的反动分子。不过，尽管屠格涅夫、赫尔岑以及大多数同时代人都仇恨涅克拉索夫，那些不得不与他一起工作的激进派却欣赏他，毫无保留地爱戴他，宽恕了他不检点的私生活，乃至他的社会罪责。”(I-7-9) 能被写入文学史的作家无疑都是大家，一般的文学史家对其所评介的对象大多恭敬有加，米尔斯基却无所顾忌，在彰显个性的同时却又体现出尊重文学史实的可贵态度。

不过，米尔斯基也有表现得十分任性而又武断的时候，甚至有些随心所欲。米尔斯基是茨维塔耶娃诗歌最早的发现者之一，但在对女诗人的诗作大加赞赏之后，他却颇为突兀地写道：“玛丽娜·茨维塔耶娃还健在(人们甚至试图加上一句‘还很活跃’)，因此，‘为逝者讳’的法则便不适用于她。公正地说，她迄今为止的散文均做作邈邈，歇斯底里，是俄语中有史以来最为糟糕的散文。”(II-6-5) 这种不为逝者讳、不为尊者讳、不为所推崇对象讳的评说方式自然痛快过瘾，但他称茨维塔耶娃的散文为“俄语中有史以来

最为糟糕”，则显然是荒谬的。在其他几个地方，他的话说得更为随意，十分刻薄。他发现阿·托尔斯泰（А.Н.Толстой）“善于塑造傻瓜、怪人和白痴，他笔下的人物无一例外地带有愚蠢的印记”，可“这一特征似乎更为作者所具有，而非其人物”。阿·托尔斯泰写了一篇描写火星人的小说，“其写作目的似乎仅在于展示其作者之局限”。（II-7-2）米尔斯基在这部文学史中多次抨击卢那察尔斯基，认为“其表现却近乎一位三流的外省教师兼记者”，“他的散文水准低于得体的报刊文字，他的诗作即便放在纳德松时代亦显得十分平淡拙劣”，“莎士比亚的《暴风雨》与列昂尼德·安德烈耶夫最糟剧作之间的差距，亦小于安德烈耶夫最糟剧作与卢那察尔斯基剧作之间的差距”，“对于卢那察尔斯基国外名声而言颇为幸运的是，极端的平庸与绝对的完美一样难以传译”。（插入的章节之二，第二节）卢那察尔斯基或许的确并非一位出色的作家和批评家，但米尔斯基的此类言论却给人以私仇公报之嫌。道理很简单，“最糟的”作家原本就不应被写入文学史，“最糟的”作品或许根本不可能面世。米尔斯基作为一位文学史家所表现出的这些“不足”，或许盖源于他过于主观的判断和判决。

谈到米尔斯基文学史写作中的主观和客观两种因素的并存，我们还发现了这样一个有趣的现象，即被批评客体对作为写作者的主体之影响。比如，在写到以冷嘲热讽见长的果戈理时，米尔斯基的文字似乎也不由自主地冷嘲热讽起来。他称果戈理在普希金死后突然意识到，“他如今已是俄国文学之首领，天已降大任于他”，《死魂灵》（Мертвые души）“是果戈理文学事业之巅峰，实际上亦为其文学创作事业之终结”。他认为《死魂灵》第二部“显然在走下坡路”，果戈理的“成功之处仅在于，他失去了其力量感”，于是，“在一阵自我羞辱状态中，他销毁了包括《死魂灵》第二部在内的部分手稿。他后称这是一个错误，实为魔鬼与他开的一个玩笑。”（I-5-8）写到屠格涅夫的小说，米尔斯基的叙述仿佛顿时细腻、抒情起来；谈起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创作，他的阐释也变得深刻而又复杂了；而米尔斯基关于托尔斯泰的论述，则似乎具有某种宏大叙事的史诗感。米尔斯基的文风，似乎在随着被论述对象的变换而变换，呈现出某种起伏和飘忽。

最后，米尔斯基的文学观既传统又现代。史密斯教授将米尔斯基称为“批

评家中的贵族” (aristocrat of critics) ^①。就米尔斯基对文学现象和作家作品作出判断时所依据的标准来看，他的确是一位古典主义色彩很浓的批评家。比如，他挂在嘴边的几个褒义词即“节制” (restraint)、“分寸” (measure) 和“精致” (refinement)。他最乐意用这几个概念来评价他最为中意的作家和作品。试以“节制”为例：他认为普希金短哀歌“充满优美的节制和流畅的表达”，他断言，“在普希金那里可以学到的最好课程便是节制” (I-4-4)；他在雅济科夫 (Н.М.ЯЗЫКОВ) 的“语言洪流中仍可感觉到节制，感觉到一位大师的把握” (I-4-7)；他认为黄金世纪之后俄国诗歌的衰落，其表现即丧失了“从茹科夫斯基到维涅维季诺夫等伟大诗人所具有的和谐、高贵、节制和无瑕的技艺” (I-5-1)；而他在谈到布宁、罗扎诺夫等作家的美中不足时，往往点到的就是“缺乏节制”；在关于巴别尔 (И.Э.Бабель) 的一节中，米尔斯基更对“缺乏节制已成为普遍美德的当下”发出了抱怨 (II-7-7)。米尔斯基的文学“等级观”亦相当传统。在他的《俄国文学史》中，我们隐约能感觉到一部文学题材史和文学体裁史的存在。在题材方面，米尔斯基显然不将通俗文学放在眼里，而在体裁方面，他又不时流露出诗歌优于散文的“古典偏见”。他对激进派功利主义美学的不屑和反感，在很大程度上就源自他关于文学的传统认识。

与此同时，米尔斯基的《俄国文学史》又显然是一部写在当下的文学史，充满鲜明的现代感。书中不乏新鲜的材料，成为他论述对象的某些作品在他动笔写作这部文学史时才刚刚发表，如巴别尔的小说、曼德里施塔姆 (О.Э.Мандельштам) 的某些诗作，乃至新发表的托尔斯泰遗作《被污染的家庭》 (Зараженное семейство) 等。在该书率先发表的下卷中，米尔斯基更是前无古人地将许多新内容放入一部大型俄国文学史，如俄国宗教哲学、俄国侨民文化、欧亚主义学说、“艺术世界”团体、象征主义等现代诗歌运动和俄国形式主义理论等，从而赋予此书以强烈的新意和现实意义。他对其所处时代俄国境内外俄语文学的把握如此全面合理，似乎在白银时代尚未告一段落时便给出了一部俄国白银时代的文学断代史！

更让我们感到惊讶的是米尔斯基对于传统文学的现代阐释，例如他对涅

① G.S. Smith, *D.S. Mirsky, A Russian-English Life, 1890-1919*, p.318.

克拉索夫的解读。涅克拉索夫的“公民诗人”身份及其“公民诗歌”，原本是令米尔斯基敬而远之的。然而，在文学转型、美学复兴的大背景下，米尔斯基却发现了涅克拉索夫的“现代”意义，即他“伟大的独创性和创新性”：“他实际上是一个造反派，反对一切陈旧的诗歌趣味，反对‘诗意’诗歌贸易中的一切存货，他最为出色、最为独特的诗作之意义，恰在于他大胆创造出一种不受传统趣味标准之约束的新诗歌。……就其独创性和创造力而言，涅克拉索夫位居一流俄国诗人之列……涅克拉索夫诗歌的主题，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即‘人民的苦难’。但是其灵感，虽就其客体而言是公民的，然就其呈现而言却是主观的、个人的，而非社会的。”（I-7-9）如此一来，涅克拉索夫这位公认的俄国现实主义诗歌的泰斗便被米尔斯基解释成了俄国现代主义诗歌运动的先驱！

米尔斯基热衷并善于在其评论对象处发现某种“对立的统一”，或曰“双重人格”。在谈到丘赫里别凯尔（В.К.Кюхельбекер）时，米尔斯基写道：“他虽为德国后裔，却是最热烈的俄国爱国者；他虽实为一位最彻底的浪漫主义者，却坚持认为自己是极端的文学保守派，希什科夫元帅的支持者。”（I-4-8）米尔斯基认为波戈金（М.П.Погодин）“是现代俄国历史中最奇特、最复杂的人物之一”，因为他“集诸多截然相对的特性于一身：病态的吝啬与其对古代俄国的无私之爱；高度的文化修养与原封不动的外省商人心态；天生的胆小鬼与真正的公民勇气”。（I-5-12）米尔斯基发现屠格涅夫“留给外国人的印象与他留给俄国人的印象迥然不同”：“外国人总觉得他温文尔雅，为人真诚。面对俄国人他却傲慢自负，即便那些对他心怀英雄崇拜的俄国来访者，亦无法对这些令人不快的性格特征熟视无睹。他身材高大，举止彬彬有礼，可他的声音却既尖又细，与其狮子般的身躯很不相称，给人留下一种奇异印象。”（I-6-5）米尔斯基认为费特也是“一位典型的拥有双重生活的诗人”，具有某种“奇异的两面性”：“一面是其自然诗歌之非物质主义的独立特性，一面是散文般的贪得无厌；一面是其晚年那种严肃刻板、秩序井然的生活，一面是他后期抒情诗作的饱满激情，其基础是对被压抑的理想情感之充分、公正的诗歌剥削。”（I-7-8）在索洛维约夫的“极其复杂的个性”中，米尔斯基同样“目睹如此之多的变体和矛盾”，“这种奇特混成”：“这里既有高度

的宗教和道德虔诚，又有对荒诞幽默的热烈追求；既有极其强烈的东正教感受，又有对不可知论和无羁神秘主义的深刻癖好；既有同样强烈的社会正义感，又有其争论性文字的缺乏公正；既有对个人不朽的深刻信仰，又有其欢快的怀疑论虚无主义之流露；既有其早年的禁欲主义，也有后来获得病态发展的色情神秘主义。”（II-2-8）言及梅列日科夫斯基（Д.С.Мережковский）时，米尔斯基调侃梅列日科夫斯基具有一个“热衷对称的大脑”，称其著作是“对立双方的几何学跷跷板”，或“精心编织的诡辩之网”（II-4-4）。其实，米尔斯基自己的这部文学史或多或少也体现出这样的“双重人格”，政治与文学、社会学批评和美学批评、史实和己见、客观批评和主观批评、传统与先锋、经典标准和新潮理论，也在其中构成某种既饶有兴味、又发人深省的对峙，而米尔斯基似乎在巧妙而又小心地在这些对立的因素之间维系平衡，谋求融合。

四

从具体的写作风格和结构方式上看，米尔斯基的《俄国文学史》也很有特色，其突出之处至少有如下几点：

一，结构灵活，起承转合相当自如。这是一部俄国文学“通史”，从俄国文学的起源一直写到作者动笔写作此书的1925年，将长达千年的文学历史纳入一部两卷本著作，这显然需要结构上的巧妙设计。米尔斯基采用的方法是兼顾点线面，在理出一条清晰的文学史线索的同时，通过若干概论给出关于某个文学时代、某种文学环境、某一文学流派或体裁等的关键截面，再将60余位作家列为专论对象，对他们的生活和创作进行详略不等的论述和评价。米尔斯基在构筑结构时似乎并不追求表面上的工整：他的章节长短不一，每一章节所涵盖的时间跨度亦不相等，他将他心目中的“文学衰落期”一笔带过，而对“现实主义时代”和“象征主义”等则着墨甚多；他不像其他文学史家那样为最重要的作家辟专章，而“一视同仁”地将重要作家均置于某一专节。但他的作家专节之篇幅却差异悬殊，在英文原文中，短者不满一页，长的多达20余页（关于托尔斯泰有两个专节，加起来近50页！）。米

尔斯基似乎在有意利用这种结构上的“不匀称”来表明他对不同文学时代和不同作家作品的“厚此薄彼”。为了更为连贯地展现俄国文学的发展历程，他甚至不惜将叙述对象一分为二，如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两段文字，托尔斯泰更是被分别置于上下两卷；为了表现俄国文学史中不同体裁的此起彼伏，他也将普希金、莱蒙托夫(М.Ю.Лермонтов)、屠格涅夫等“两栖”作家的创作，按不同体裁分隔开来加以叙述。所有这些均表明，米尔斯基的文学史结构原则和依据，即某一时代、某一作家的文学价值，以及米尔斯基本人的文学取向和美学偏好。

二，文字生动形象，充满“文学感”。米尔斯基《俄国文学史》开篇的第一句话就是：“自11世纪初至17世纪末，俄国文学的存在与同一时期拉丁基督教世界的发展毫无关联。与俄国艺术一样，俄国文学亦为希腊树干上的一根侧枝。它的第一把种子于10世纪末自君士坦丁堡飘来，与东正教信仰一同落在俄国的土地上。”(I-1-1)在下卷谈及俄国象征派的开端时，作者写道：“空气中弥漫着诸多新思想，新思想的第一只春燕于1890年飞来，这便是明斯基的‘尼采式’著作《良心的烛照》。”(II-4-2)诸如此类的美文句式在书中俯拾皆是，与它们相映成趣的是作者那些形象的概括、机智的发现和幽默的调侃。他称俄国早期虚构的宗教教谕小说“犹如传统圣徒传记之树上长出的一个新枝，与此同时，其他类型的虚构作品也发芽抽枝，向四面八方伸展”(I-1-10)；他为我们描绘出这样一幅克雷洛夫(И.А.Крылов)的肖像：“他以慵懒、不修边幅、好胃口和机智刻薄的见解而著称。他肥胖迟缓的身影经常出现在彼得堡的客厅，他整晚整晚坐在那里，并不开口，一双小眼睛半眯着，或盯着空处看，有时则在椅子上打瞌睡，脸上挂着一丝厌恶和对周围一切的无动于衷。”(I-3-9)他在谈到柯里佐夫(А.В.Кольцов)的诗歌时说：“典型的俄国式忧伤，即对自由、奇遇和旷野的渴慕。”(I-5-2)他这样形容《安娜·卡列尼娜》(Анна Каренина)的结局：“随着故事向结局的不断推进，这种悲剧氛围越来越浓。……这部小说犹如沙漠旷野中一声恐惧的呼号，在渐渐地隐去。”(I-8-1)

米尔斯基还喜欢以某种形象的比喻、甚至色彩来概括诗人的风格。他说纳德松(С.Я.Надсон)的诗平滑柔软，是“水母般的诗歌”(II-2-7)；他认

为安德烈耶夫 (Л.Н.Андреев) 华丽做作的散文,“其色调为花哨的黑与红,无任何明暗过渡”(II-3-6);他说扎伊采夫 (Б.К.Зайцев) 那纤弱甜腻的小说“如牡蛎一般柔软”,“粉色和灰色是其中的主色调”(II-3-9),而巴里蒙特 (К.Д.Бальмонт)“最好的诗作绚丽灿烂,均为金色和紫色,其最糟的诗作则花哨俗丽”(II-5-2);他认为沃洛申 (М.А.Волошин) 的诗歌“颇具金属感,冷光闪烁,其光彩夺目一如珠宝,或似彩色玻璃”,“充满干薰衣草的芳香”(II-5-8)。阅读这样的文字,我们不时感觉,这部文学史仿佛出自一位作家之手,一位诗人之手。

三,充满洞见,提出许多精妙的结论和话题。作为一位文学史家,米尔斯基指点江山,或替作家“加冕”,或给他们定性。他称杰尔查文 (Г.Р.Державин) 是“野蛮的古典主义者”,说巴拉丁斯基 (Е.А.Баратынский) 是“一位思想诗人”;他视诺维科夫 (Н.И.Новиков) 为“俄国文学出版业之父”,因为“是他造就了俄国的阅读人口”(I-3-6);他称俄国著名军事家苏沃洛夫 (А.В.Суворов) 元帅“实为俄国第一个浪漫主义作家”,因为“其散文与经典散文的通行规范相去甚远,一如其战术之迥异于腓特烈或马尔波罗”(I-3-6);他将茹科夫斯基 (В.А.Жуковский) 翻译的格雷《哀歌》(Элегия) 1802 在《欧洲导报》(Вестник Европы) 上的发表称为“俄国诗歌的诞生之时”(I-4-2);他将“俄国历史之父”的桂冠戴在不甚有名的博尔京 (И.Н.Болтин) 头上 (I-3-6);他认为丘赫里别凯尔堪与基列耶夫斯基 (И.В.Киреевский) 比肩,“同为黄金世纪的首席批评家”(I-4-8);他将果戈理的作品确定为“主观的讽刺”,“对自我的讽刺”(I-5-8);他说赫尔岑作为“观念的发生器和思想的酵母”,占据了“别林斯基去世后一直空缺的激进知识分子的领袖位置”(I-7-4);他说果戈理和乔治桑 (George Sand) “是俄国现实主义的父亲和母亲”(I-6-1)。米尔斯基的一些归纳和总结,也具有很强的学术启迪意义。比如,他在冈察洛夫 (И.А.Гончаров) 的小说中窥见“俄国小说的一种倾向,即置一切情节可读性于不顾”。他借用哈里森的说法将这定义为“俄国小说的‘未完成体’倾向”(I-6-4);他认为以奥斯特罗夫斯基 (А.Н.Островский) 为代表的俄国现实主义戏剧,直至契诃夫颇具现代感的戏剧,其实质即“将戏剧非戏剧化”(I-7-13);他称托尔斯泰的《忏悔

录》(Исповедь)是“俄国文学中最伟大的雄辩杰作”，因为其中具有“逻辑的节奏，数学的节奏，思想的节奏”(II-1-2)；他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归为“思想小说”，并说陀思妥耶夫斯基“能感觉到思想”，“一如他人能感觉到冷热和疼痛”(I-8-2)；他发现，在19世纪60年代所谓虚无主义者中，神职人员之子人多势众：“这些新知识分子具有一个共同特征，即完全背叛一切父辈传统。他如若是神甫之子，则必定成为一位无神论者；他如若是地主之子，则必定成为一位农业社会主义者。反叛一切传统，是这一阶级的唯一口号。”(II-1-1)他称契诃夫的小说和戏剧创作为“纯氛围营造”(II-2-9)；他接受列昂季耶夫为“俄国的尼采”的说法，却发现列昂季耶夫“构成当今一个罕见现象(在中世纪倒十分常见)，即一个实际上没有宗教感的人却在有意识地、心悦诚服地遵从一种既教条又封闭的宗教之严规”(II-1-7)；他归纳出的舍斯托夫之实质，即“他技艺高超地运用逻辑和理性之武器来摧毁逻辑和理性”(II-4-5)；他认为别雷(Андрей Белый)“装饰散文”的实质即“以音乐的结构方式写作散文”(II-5-10)。如此等等，不一而足，在米爾斯基关于每一个作家、每一部作品的分析和评说中，我们几乎都可以读到这类高见和洞见。

米爾斯基对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托尔斯泰两人所作的“比较”，无疑也是其《俄国文学史》中的亮点之一。米爾斯基将两位大作家划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加以论述，无论在谈到陀思妥耶夫斯基还是托尔斯泰时，他均会不由自主地将二者相提并论。他自己也写道：“对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进行比较，这在许多年间始终是俄国和外国批评家们热衷的讨论话题。”(I-8-2)他在这一方面的做法显然受到斯特拉霍夫(Н.Н.Страхов)、梅列日科夫斯基等人的启发和影响。但是，除了一些传统的比对，如托氏的贵族出身和陀氏的平民意识、托氏撒旦般的高傲和陀氏基督徒般的恭顺、托氏的重自然与重肉体 and 陀氏的重精神与重灵魂等等之外，米爾斯基还使这种比较更为深刻、更加细化了，比如他提出：托氏是清教徒式的现实主义，而陀氏则为象征主义；托氏否定相对性，而陀氏则更多历史感；托氏的高贵典雅是法式贵族文化之体现，而陀氏的歇斯底里则是俄国平民文化的表现之一；托氏赋予其人物“肉体 and 血液”，而陀氏则赋予其人物“灵魂 and 精神”；托氏是在诉诸“欧

几里得的几何学”，而陀氏“所面对的则是流动价值之难以捉摸的微积分”；托氏的心理分析是“解剖”，陀氏的则是“重构”；托氏的问题永远是“为什么”，而陀氏则为“是什么”，等等。米尔斯基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五种解读方式”（社会解读、宗教解读、心理解读、娱乐解读和思想解读）的提法（I-8-2），也似乎是对陀思妥耶夫斯基接受史的一个简约概括。米尔斯基在谈到格林卡（Ф.Н.Глинка）的文学遗产时曾说：“他的巨大价值从未获得认可，在其晚年，他还成为年轻批评家们热衷嘲弄的靶子。他至今仍未被充分地再发现，而此类再发现便是俄国文学评判最终成熟的明证之一。”（I-4-8）正是此类奇妙的发现和“再发现”（rediscovery），构成了米尔斯基文学史的价值和魅力之所在。

四，将俄国文学与西欧文学相对照，具有开阔的比较视野。在关于罗蒙诺索夫（М.В.Ломоносов）的一段文字中米尔斯基曾提及，他的《俄国文学史》是“一部为非俄语读者而写的文学史”（I-3-2）。此书某些地方的行文方式也能让我们感觉出，其中许多内容或许就来自作者本人的讲稿。面对西欧的学生和读者，米尔斯基自然会引入西欧文学的相关内容。米尔斯基关于西欧文学的渊博知识，也使他在将俄国文学与西欧文学作比较时得心应手。不难看出，米尔斯基对于西欧当时的俄国文学研究水准颇不以为然。他在下卷序言中毫不客气地指出，“英美知识分子对俄国作家的评价大约滞后 20 年”，因此，“本书提供的某些新事实和新观点若能矫正盎格鲁—撒克逊人以及其他民族人对于我的国家所持的简单草率的结论，我便会深感欣慰”。为了让欧美读者更贴切地理解俄国文学，米尔斯基所采取的方式之一便是将俄国作家与西欧读者熟悉的作家进行比较。在谈到阿克萨科夫（С.Т.Аксаков）的“追忆似水年华”时，米尔斯基颇为自然地引入普鲁斯特（Marcel Proust）作比较：“普鲁斯特的话用在这里很贴切，因为阿克萨科夫的情感与那位法国小说家的奇特而又惊人地相似，区别仅在于，阿克萨科夫健康而正常，普鲁斯特却反常且病态，奥斯曼花园街上那间密不透风的住宅里沉闷死寂的氛围在阿克萨科夫书中则为广阔草原的清新空气所取代。”（I-6-3）米尔斯基认为托尔斯泰是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的“先驱”，“但艺术家托尔斯泰和科学家弗洛伊德之间的惊人差异却在于，这位艺术家显然比那位科学

家更少想象力，而更加实事求是，客观冷静。与托尔斯泰相比，弗洛伊德就是一位诗人，一位民间故事讲述者。^①人们津津乐道于托尔斯泰对潜意识的亲近，其实，这一亲近不过是一位征服者对所征服土地的亲近，是一位猎人对其猎物的亲近。”（I-8-1）在谈到帕斯捷尔纳克时，米尔斯基居然会将自己的这位同辈诗人与英国 17 世纪的玄学派诗人邓恩（John Donne）作一番对比：“与邓恩的诗一样，帕斯捷尔纳克的诗亦很长时间（虽然与邓恩相比时间较短）未能出版，亦仅为诗人们所知；与邓恩一样，他亦是‘诗人中的诗人’，他对其追随者的影响远大于他在读者中的名声；就较为深层的特征而言，帕斯捷尔纳克与邓恩的相近之处还在于，他们均善于将巨大的情感张力与高度发达的诗歌‘机智’地合为一体；与邓恩一样，帕斯捷尔纳克的一个主要创新之处，即引入技术性的、‘粗俗’的形象以取代标准的诗歌语汇；与邓恩的诗一样，帕斯捷尔纳克的诗亦刻意回避前一时期诗歌的轻松悦耳，试图摧毁诗歌语言中的‘意大利式’的甜腻。”（II-6-10）在谈到英国人不懂列斯科夫时，米尔斯基忍不住发出一通感慨：“盎格鲁—撒克逊读者对俄国作家早已形成固定期待，而列斯科夫却难以呼应这种期待。然而，那些真正想更多了解俄国的人迟早会意识到，俄国并不全都包含在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契诃夫的作品中，他们如若想了解什么，首先则必须摆脱偏见，避免各种匆忙概括。如此一来，他们或许方能更接近列斯科夫，这位被俄国人公认为俄国作家中最俄国化的一位，他对真实的俄国人民有着最为深刻、最为广泛的认识。”（II-1-3）这段感慨使我们意识到，米尔斯基不断地将俄国文学与西欧文学作比较，或许并不仅仅是为了让西方读者触类旁通，以贴近俄国文学，更不是为了向西欧读者炫耀其学识并以此镇住其受众，而是深藏着一种重塑西方人士的俄国文学史观的意愿和抱负。

^① 米尔斯基在这里还加了这样一个脚注：“在对于梦境的强烈兴趣方面，托尔斯泰也是弗洛伊德的前辈。”

五

米尔斯基《俄国文学史》的上、下两卷，起初是作为两部独立的著作来写作和出版的。作为下卷的《当代俄国文学（1881-1925）》率先于1926年面世，而作为上卷的《俄国文学史（自远古至陀思妥耶夫斯基去世〈1881〉）》则出版于1927年。这两本书后在英美多次再版。1949年，怀特菲尔德教授（Francis J. Whitefield）将两书缩编为一部，以《俄国文学史》（A History of Russian Literature）为题在伦敦出版^①，此书面世后很受欢迎，多次重印，后来英美两国的俄国文学研究者经常挂在嘴边的“米尔斯基文学史”大多即指这部“合集”。上世纪60年代中后期，此书的德、意、法文版相继面世^②。1992年，这部关于俄国文学的史著终于被译成俄语，由鲁菲·泽尔诺娃翻译的俄文版起初在英国和以色列面世^③，后又由一家新西伯利亚出版社在俄国推出^④。米尔斯基《俄国文学史》的中译本近期亦将面世，它或许将成为世界范围内“包括俄语在内”的第五种译本。

这部80多年前的旧作，这部英文版的俄国文学史，对于中国当下的俄国文学研究而言或许仍具有诸多现实意义。

首先，国际斯拉夫学界的俄国文学研究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始终存在较强的意识形态色彩，尤其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西方和苏联的俄国文学研究者各执一词，相互对垒，俄国文学研究一时似乎也成了东西方“冷战”的战场。我国的俄国文学研究者向来更多地借鉴、参照苏联学界的观点，对欧美同行观点和立场的了解相对较少。在苏联存在时期，我国的俄国文学研究

① D.S. Mirsky, *A History of Russian Literature*, ed. and abridged by Francis J. Whitefield, London, 1949.

② *Geschichte der russischen Literatur*, trans. by Georg Mayer, Munich, 1964; *Storia della letteratura russa*, trans. by Silvio Bernardini, Milan, 1965; *Histoire de la littérature russe*, trans. by Véronique Lossky, Paris, 1969.

③ Святополк-Мирский Д. История рус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с древнейших времен до 1925 года. trans. by Ruf Zernova, Overseas Publications Interchange Ltd, London, 1992. 此书俄译者鲁菲·亚历山大罗夫娜·泽尔诺娃（Руфь Александровна Зернова）原姓“泽维娜”（Зевина），她1919年生于敖德萨，毕业于列宁格勒大学语文系，苏联时期曾被关进劳改营，后移居以色列，著有《明与暗》（Свет и тени）等书，2004年去世。

④ Святополк-Мирский Д. История рус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с древнейших времен по 1925 год. пер. с англ. Р. Зерновой, Изд-во «Свиный и сыновья», Новосибирск, 2009.

就整体而言是处在苏维埃美学体系、批评方法和文学史观的强大影响之下；在苏联解体前后，我国学界曾出现过关于苏联文学、乃至整个俄国文学的“反思”，甚至出现过将整个俄苏文学完全翻转过来看的冲动和尝试。其实，这两种学术取向都不够科学，无疑均有偏颇。而米尔斯基的这部作为欧美俄国文学研究奠基之作的《俄国文学史》，却具有某种程度的非意识形态、或曰超意识形态色彩，因为：首先，它“恰巧”写于十月革命后、二次大战前，亦即“街垒”已经筑就、而意识形态激战尚未开始之时；其次，它的作者“恰巧”是一位往来于两大思想阵营之间的学者，其“双重人格”身份反而使他有可能持一种更为冷静客观的立场；最后，即前文提及的这部文学史作者对文学和文学性的注重。这部由一位身份特殊的学者在特殊历史时期写下的《俄国文学史》，或许能对我们如何更为超脱地面对俄国文学研究中的意识形态问题提供某种参照。

其次，这原本就是“一部为非俄语读者而写的文学史”。我们与米尔斯基写作此书时面对的“盎格鲁—撒克逊读者”一样，也是“第三者”，因此，较之那些专为俄国人而写的俄文版俄国文学史，此书或许反而更易于我们所接受和理解。我们以往所阅读、翻译的各种俄国文学史，绝大多数都是由俄国学者用俄语写给俄国读者看的著作，其作者在写作时大约很少考虑到外国读者的感受和理解力。我国学者自己也撰写过大量俄国文学史著作，但作为作者的我们无论水准高低，毕竟均不曾置身于俄国文坛，均为物理意义上的俄国文学的“局外人”。而由米尔斯基这样一位俄国文学生活的亲历者和参与者特为非俄语读者撰写的《俄国文学史》，就其独特的视角以及作者写作时心目中独特的接受对象而言，仿佛就是为我们量身定做的。

最后，在谋得“语言霸权”的英语已成为各学科国际学术语言的背景下，了解并掌握一些与俄国文学相关的英语表述或许不无必要。更何况，在史密斯教授看来，“这部《文学史》已为二次大战后英美第一代职业的俄国学家所透彻地吸收，构成了如今在这两国占据主流地位的一代学者的学识基础。……一代又一代本科生在考试中回答他们心怀感激的老师从‘米尔斯基文学史’中搜寻来的问题；一代又一代研究生将此书用作他们的第一份参

考资料。”^①通过阅读这样一部权威的英文版《俄国文学史》教科书，了解一些西方俄国文学研究者的基本观点和学术话语，我们至少可以获得与西方同行进行更多对话和沟通的可能性。

米尔斯基在写作他的《俄国文学史》时，大约不会想到他的著作会被译成曾令他感觉“十分奇特”的汉语。这位人称具有“东方相貌”的俄国人，在自东欧闯入西方之后却又倡导“朝向东方”。如今，他最终却凭借他的《俄国文学史》方才真正地置身于东方。于是，他在俄国文学和西方世界间搭建的那座桥梁，便也逐渐扩充为一座文化的立交桥。

【Abstract】 “Comrade Prince” D.S. Mirsky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figures in the literary and academic milieu of Europe and the Soviet Union during the 1920 and 1930s. His extraordinary life and the vigor of his writing allow us to regard him as an intellectual legend of his time and as a symbol of the fate of an entire generation of the Russian intelligentsia. Mirsky’s *History of Russian Literature*, which Vladimir Nabokov called “the best history of Russian literature in any language including Russian”, distinguished itself by its “eclectic” view of literary history, its effective blending of objective and subjective modes of criticism and its highly individual expression. Mirsky’s *History* laid the foundation for Russian literary scholarship in the West and proved so influential that it remains the standard introduction to the subject up to the present day.

【Key Words】 D.S. Mirsky, Russian literature, *A History of Russian Literature*

【Аннотация】 «Товарищ князь» Д. П. Святополк-Мирский является одним из самых важных фигур в литературной и академической среде Западной Европы и Советского Союза 20-30-х годов XX века. Его необыкновенная жизнь и энергичное творчество представляют собой

① G.S. Smith, *D.S. Mirsky, A Russian-English Life, 1890-1919*, p.xvii.

легенду в культурной жизни того времени, даже символ судьбы целого поколения русской интеллигенции. Его *История рус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которую В. Набоков считал «лучшей историей рус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на любом языке, включая русский», отличается своим «эkleктическим» подходом к истории литературы, синтезом объективной и субъективной критики и индивидуальным образом выражения. *История* Мирского положила основание изучению рус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на Западе и до сегодняшнего дня непрерывно оказывает свое сильное влияние на современных руссисов всего мира.

【Ключевые слова】 Д. П. Святополк-Мирский, Русск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История рус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责任编辑 陈大维)

俄罗斯国家身份的探寻之旅*

——詹姆斯·比灵顿的俄国文化研究

张红 刘会宝**

【内容提要】詹姆斯·比灵顿是当代西方俄罗斯文化研究的领军人物。通过对他的三部关于俄罗斯文化的经典作品的研究,可以透视他以及受到他影响的西方人眼中的俄罗斯文化。比灵顿坚持跨学科的研究方法,形成了对俄罗斯文化的独特认识:对大自然的特殊感情、东正教信仰及对来自外界新生事物的周期性激情,是塑造俄罗斯文化的三个核心因素;俄罗斯文化的每一种形式都经历着“模仿-创新-摧毁”三个阶段;俄罗斯文化发展与其政治进程具有同构性;白银时代需要高度重视,白银时代的文化成果与苏联时期的文化发展有着紧密的联系。

【关键词】詹姆斯·比灵顿 西方俄罗斯研究 俄罗斯文化

【中图分类号】I317.09(511.2) **【文章标识】**A **【文章编号】**1009-721X(2012)03-0034-(31)

论及俄罗斯文化,我们就不能不提到詹姆斯·H·比灵顿(James H. Billington)这位美国学人。他集学者、官员、媒体人士三种身份于一身,对俄罗斯历史有着细致的考察,而其多年间对俄罗斯的频繁访问以及与俄罗斯

* 本文是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冷战后俄罗斯政治精英的思想谱系”(项目批准号:11JJDGJW003)的阶段性成果。

** 张红,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俄罗斯研究中心,讲师;刘会宝,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硕士,成都七中教师。

不同地区和部门保持联系的丰富经历,使其对俄罗斯的理解体现出很高的权威性^①。

本文试图以比灵顿的创作为例,通过他的三部关于俄罗斯文化的经典之作,即《圣像与斧头》、《俄罗斯的面孔》以及《俄罗斯寻找自己》,来透视他以及受到他影响的西方人眼中的俄罗斯文化。

之所以选择这三本经典之作,是因为它们从不同角度揭示了俄罗斯文化的深刻性和复杂性:《圣像与斧头:俄罗斯文化史的诠释》是其1966年的成名之作,该书讲述俄罗斯文化作为一个整体所经历的发展过程,重点强调俄罗斯文化中与众不同的宗教和本土因素;《俄罗斯的面孔》是他1998年的巅峰之作,试图审视俄罗斯文化在引进西方五种艺术形式的过程中,从模仿转为创造的过程;而比灵顿2004年的封笔之作《俄罗斯寻找自己》,则聚焦于后苏联时代,通过研究人们思维和文化的表达方式,希图预测新生的俄罗斯联邦未来的发展前景。

一、比灵顿其人

詹姆斯·H·比灵顿是西方俄罗斯文化研究的领军人物,他的作品被翻译成多国文字出版^②。他以自己深厚的文化功底、史学修养,以及对史家笔法的重视,重现了俄罗斯文化的动态演变过程,注意到了俄罗斯文化发展轨迹与其社会历史发展的某种相似性,并尝试着透过文化史发展的历程来展望俄罗斯未来的政治走向。俄罗斯科学院世界经济与国际关系研究所(IMEMO)副主任弗拉基米尔·巴拉诺夫斯基(Vladimir Baranovsky)教授将其称为“研究俄罗斯文化、文明和历史方面的超级行家”^③。

在美俄关系方面,比灵顿是两国关系发展的重要推动者。他常常“提醒美国人要意识到:尽管美俄两国在政治和经济发展历史中有着十分显著的不同,但美俄两国文化在发达的审美观、独特的创造性以及深厚的宗教根源和

① James H. Billington, *Russia in Search of Itself*, Washington D.C.: Woodrow Wilson Center Press, 2004, Cover.

② http://en.wikipedia.org/wiki/James_H_Billington

③ <http://www.pbs.org/weta/faceofrussia/series/billington.html>

道义激情方面，则表现出令人惊讶的相似之处”。^①同时，他是“开放世界项目”（Open World Program）的创始人以及“开放世界领导人中心”（the Open World Leadership Center）董事会的主席。在开放世界项目（The Open World Program）^②的框架下，一万多名年轻的俄罗斯政治领导人访问美国的社区，加深了对美国社会的了解。比灵顿还是俄罗斯科学院的一名外籍成员。2008年，俄罗斯联邦总统梅德韦杰夫亲自授予他友谊勋章，这是外国公民在俄罗斯所能得到的最高荣誉。^③他作为一名学者、分析家和作家，促进了美国人和俄罗斯人之间的相互理解，对于增进美俄关系有着重要的作用^④。

作为美国决策领域的高参，比灵顿曾出任伍德罗·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Woodrow Wilson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Scholars）的主任，创办凯南俄国问题高级研究所（Kennan Institute for Advanced Russian Studies），并且负责威尔逊季刊等7个新项目。伍德罗·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是美国政府下属的著名的国际问题研究机构，它与世界上主要的从事苏联东欧问题研究的中心或学术机构有着广泛的联系。凯南俄罗斯高级研究所则是冷战时期美国为加强苏联问题研究、培养高级研究人员而成立的一个新生研究机构。通过这两个研究机构，比灵顿为美国的外交政策提供咨询和建议，对美国国家政策制定、措施出台有着重要的作用。此外，比灵顿本人也与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有着十分密切的私人关系。

身为美国最大、藏书最丰富、世界上最好的图书馆之一的美国国会图书馆的馆长，比灵顿享有使用资料最丰富的国会图书馆藏书以及美国政府其他部门所有的斯拉夫图书资料的特殊权利。他于2005年6月提出的关于建立世界数字图书馆的计划得到首肯^⑤。该计划旨在促进不同国家间、不同文化间的理解，扩展互联网上的非英语和非西方文化的内容并为学术研究服务。

① Librarian of Congress James H. Billington's, Remarks at the East West Institute's 2007 Awards Dinner, p1.& Librarian of Congress James H. Billington's, Remarks at the East West Institute's 2007 Awards Dinner, p.3.

② “开放世界项目”是根据美国国会中无党派人士的提议而开展的一个项目。

③ <http://www.openworld.gov/news/billington.php>

④ James H. Billington, Kathleen Parthé, *The Search for a New Russian National Identity: Russian Perspectives*, Issued by The Library of Congress Washington, D.C., February 2003, p.60.

⑤ <http://www.loc.gov/bicentennial/bios/preserve/billington.html>

他还曾参与到公共广播公司（PBS）的宣传活动中，主持制作了相当精美的介绍俄罗斯传统文化的音像制品，力图让更多的美国人了解俄罗斯文化。

二、《圣像与斧头——俄罗斯文化史的诠释》

首先值得介绍的是比灵顿的成名之作《圣像与斧头》。正如美国国会图书馆所评价的，“该著作追溯俄罗斯文化的根源并且力图从历史的角度对俄罗斯文化予以揭示，它是任何一位试图理解俄罗斯的学者不可不读的经典之作”^①。在该书中，比灵顿借鉴文化符号学的方法，按照编年史的框架，讨论并呈现了自基辅时期到后赫鲁晓夫时代整个俄罗斯文化及知识分子所经历的发展过程，并且力图对俄罗斯文化和宗教的影响以及这些影响是怎样将俄罗斯带入现代的过程逐一进行解读。

比灵顿之所以选择“圣像与斧头”作为书名，是因为这二者对于俄罗斯人而言具有十分特殊的意义。圣像是对东正教信仰无所不在的提醒，是俄罗斯的精神源泉；而斧头则是古代罗斯征服自然的基本工具，最能体现古代罗斯的物质力量。二者最能体现出俄罗斯文化中的直观、本土的特点。同时，在俄罗斯历史上，也经常出现这样的局面：圣像反被骗子和煽动者所利用，而斧头却为圣人和艺术家所采用。运用这两个具象作为书名也体现出比灵顿对于俄罗斯文化所固有的矛盾统一性的认识^②。此外，该标题还暗示着作者要对在俄罗斯的想象中扮演着独一无二角色的符号进行定位和追踪，而不是主要以西方的观念、制度、艺术形式来审视俄罗斯的现实。^③

具体而言，该书将俄罗斯文化的发展纳入五个阶段考察：第一阶段从公元8世纪至17世纪，比灵顿追溯了这一时期基辅罗斯对于东正教的皈依、蒙古入侵及早期莫斯科与西欧在复兴及改革方面的冲突^④。第二阶段回顾了以“大分裂”为特征的17世纪。在这一世纪，俄罗斯内部经历了大分裂，

① Library Journal. Illustrations, references, index.

② Michael Cherniavsky, Book Review,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Vol.82, No.1, March, 1967, pp.88-93.

③ James H. Billington, *The Icon and the Axe*,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66, p.viii.

④ Ibid, p.ix.

外部则出现了面朝西方的转向。第三个时期大致框定为 1755 年—1855 年，比灵顿对这个时期得到迅速发展的贵族文化进行了探索，同时还探讨了混乱的启蒙运动。第四个时期，比灵顿认为在德国的影响下，19 世纪下半期的俄罗斯“来到了新的彼岸”^①，开始寻求新的变化，寻找艺术和生活的新形式。第五个时期，比灵顿回顾了 20 世纪初期的白银时代及苏联时期，并频繁暗示一些文化现象与之后文化发展之间的联系。

（一）中世纪（公元 8 世纪—17 世纪）

关于这一时期，比灵顿首先追溯了基辅的起源，认为基辅占据的重要地理位置使它迅速成为反对南方平原上好战的游牧民族的主要基地；在经济上，成为活跃的贸易中心；在政治上，成为斯拉夫文明的中心。同时，比灵顿还将基辅纳入到与莫斯科和圣彼得堡这两座城市的比较中看待，认为俄罗斯的文化毋宁说是基辅、莫斯科和圣彼得堡的三城记^②。

比灵顿认为，在基辅时期（Kievan period），俄罗斯民族是一个“简单的、战争的民族”，生活在草原上，与那些住在条件恶劣、土壤贫瘠的东方平原上的其他民族一起担惊受怕^③。随着基辅国家的衰败，俄罗斯人向东北转移。13 世纪的蒙古入侵对于俄罗斯而言，最重要的直接后果就是北方的森林区域成为独立的东正教文化的主要中心，而地理中心的变化也随之带来了文化上的变化。同时，蒙古人的入侵也促使俄罗斯人更为紧密地团结起来。

在比灵顿眼里，在俄罗斯文明的早期，森林代表着能勾起人们无限想象的常绿的帘子，将俄罗斯与日益遥远的拜占庭和西方城市分隔开来。森林塑造着基辅罗斯的生活。一方面，俄罗斯人可以从森林中获得大量丰富的生活资料，俄罗斯人对土地的崇拜油然而生，有“一种与大地共生的感觉”^④；另一方面，森林中也有令人害怕之处，正是森林给俄罗斯人的早期生活投下了阴影，俄罗斯人有一种“流浪者”的不安感。

比灵顿认为俄罗斯文化的第二个决定因素是东正教传统。在基辅时期的

① James H. Billington, *The Icon and the Axe*, p.359.

② Ibid, p.3.

③ Ibid, pp.9-11.

④ Ibid, p.ix.

讨论中，比灵顿指出，宗教统一是唯一起作用的力量：“基辅罗斯的统一首先是宗教信仰的统一。信仰和崇拜几乎是这个结构松散的文明中唯一的统一性^①”。比灵顿显然不赞同别林斯基（Belinsky）和赫尔岑（Herzen）认为俄罗斯是世界上宗教色彩最为淡薄的国家的观点。相反，他将这种观点推到另一个极端，在他看来，正是东正教将俄罗斯从其黑暗时代中解放出来，为其分散的人民提供认同感、使命感和灵感^②。

与之相关联，比灵顿认为修道院在俄罗斯文明的发展中也扮演了关键的角色。修士的复兴帮助稳固了莫斯科在俄罗斯的特殊地位，鼓励着俄罗斯人，使他们拥有一种使命感、进取感和拓殖的热情，这些都是俄罗斯日后成功所依赖的因素。但是，与西方修道院不同，早期的罗斯修道院通常建在王公贵族的城池之中，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政治的影响。

比灵顿认为，东正教创造了有着鲜明特色的俄罗斯文化，并且为现代俄罗斯提供了艺术表达和信仰框架的基本形式。宗教在俄罗斯文化中扮演着关键的角色，作为隐藏于文化中的一种渗透力而存在^③。

此外，比灵顿还认为，在整个俄罗斯文化史中，俄罗斯与西欧的互动也是一个关键的因素。西方对俄罗斯的影响，既不是从帝国时期的沙龙开始，也不是从远古斯拉夫的迷雾开始，而是从15-17世纪早期的俄国开始的。有着严密宗教之网的传统俄罗斯与弥漫着世俗气息的西方之间戏剧性的面对，产生了紊乱和冲突。这种紊乱和冲突从伊凡时期到彼得大帝统治时期，都给俄罗斯文化留下了深刻的印记^④。俄罗斯人不断地试图建立与西方的联系，寻找可资借鉴同时又保持自身特点的形式。15世纪中期至16世纪中期，对于俄罗斯而言，“西方”意味着拉丁教会和文艺复兴全盛时期的帝国。这一时期，俄罗斯人对于拉丁文化表现出一种既喜欢又害怕的心态^⑤。

从16世纪中期至18世纪中期，比灵顿认为，俄罗斯较多地受到德国文化的影响。伊凡四世统治时期，莫斯科与西方的联系发生了决定性的改变，

① James H. Billington, *The Icon and the Axe*, p.13.

② Ibid, p.49.

③ Ibid, p.x.

④ Ibid, p.55.

⑤ Ibid, p.97.

从与天主教的“拉丁人”的间接、偶尔的关系转变为与信奉新教的德国人之间的直接的、持续的关系。正是伊凡开始了俄罗斯与北欧新教国家的大规模接触，这一时期深深地影响着俄罗斯^①。之后，俄罗斯进入混乱时期：1654-1667年及1701-1721年两次北方战争，俄罗斯正式转型为在东欧占据主导地位的大陆帝国^②。在比灵顿看来，整个17世纪，俄罗斯都努力地在欧洲世界中尴尬地、被动地寻找着自我认同。

（二）分裂的世纪（17世纪中期—18世纪中期）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17世纪的俄罗斯比日益世俗化的西方显得更加保有宗教信仰。在沙皇阿列克塞（Alexis）之子彼得大帝建立起来的新的、西方化的首都彼得堡，大分裂并没有缩小俄罗斯意识形态的裂痕，而只是让这些裂痕日益加深和复杂，宗教的异议继续困扰着俄罗斯^③。

同时，比灵顿注意到，“大分裂”其实是俄罗斯历史上持久的主题：17世纪，政府与人民分离；18世纪，贵族从农民中分离；19世纪早期，知识分子从非知识分子的贵族中分离；19世纪中期，“儿子”从沉湎于思考的、身为精英的“父亲”身份中分离。

1、内部的分裂

在比灵顿看来，17世纪俄罗斯的核心问题是，“在急剧变化的生活中如何保持宗教信仰？”对此，神权政治和原教旨主义分别给出了自己的答案。修士们比较支持神权政治的观点，他们要求加强教会的登记制度、中央控制，提高修士的教育水平和纪律水平。

17世纪俄罗斯宗教危机的决定性转折点是1667年的宗教会议（church council）将原教旨主义者整个地逐出教会。然而，原教旨主义者的被挫败并不意味着神权政治主义者的胜利。粗略地看，俄罗斯教堂的分裂，正如西方的大分裂，都是出于对于经济和政治变迁中宗教活力和相关性的关注。尼康（Nikon）与阿瓦库姆（Avvakum）这两个人物之间的相似性提醒人们：俄罗斯的分裂不是在接受和拒绝尼康（Nikonian）改革的人之间的正式分裂，

① James H. Billington, *The Icon and the Axe*, p.97.

② Ibid, p.102.

③ Ibid, p.120.

而是俄罗斯人理想中的尼康（Nikon）与阿瓦库姆（Avvakum）共同享有的宗教文明与 1667 年之后现实之间的分裂^①。

2、面朝西方的转向

比灵顿认为，原教旨主义者和神权主义者都反对的态度，意味着任何严肃的、努力保持完全不同于西方文明的尝试是行不通的，俄罗斯只能逐渐地流行起一种创新的、能与欧洲其他国家和谐相处的治理文化。在比灵顿看来，著名的彼得大帝改革为俄罗斯的未来指明了道路。但是，先于这些改革的宗教探索以及抵抗改革的行动都表明，现代化的胜利远非彻底^②。

在彼得大帝治下，主要是进行行政改革和军事运动，旨在稳固俄罗斯的欧洲大国地位。然而，这种激进的改革也招来了俄罗斯过激的反对行为，来自各行各业的人们开始捍卫他们传统方式的“荣耀与美丽”。这些抗议运动不断地影响着当时俄罗斯文化的发展。因此，18 世纪的文化史不仅要包括彼得大帝的改革，同时也要包括传统俄罗斯人（old Muscovy）的抵抗行动。其中，旧礼仪派商人（old believer merchants）、农民起义者（peasant insurrectionaries）及修道院的苦行僧（monastic ascetics）这三股力量最为反对。比灵顿认为，尽管这些反对派最终都以失败而告终，但他们的行为和思想却对紧随其后的俄罗斯文化发展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③。

此外，比灵顿注意到：在修道院中，修士们有了一个新的愿望，那就是要更直接地与各行各业的人士交流。新教的敬虔主义促使俄罗斯的修道院世俗化，而俄罗斯现代史上真正的社会运动——民粹运动在很多方面都体现出对于俄罗斯帝国西方化及世俗化的抗议。然而，在俄罗斯帝国晚期，人们的注意力开始转移到形成于伊丽莎白和叶卡捷琳娜二世时代的崭新的、特别的贵族文化^④。

（三）贵族文化的世纪（18 世纪中期—19 世纪中期）

比灵顿对 18 世纪中期至 19 世纪中期得到迅速发展的贵族文化进行了探

① James H. Billington, *The Icon and the Axe*, p.158.

② Ibid, p.163.

③ Ibid, p.192.

④ Ibid, pp.204-205.

索，认为伊丽莎白·彼得罗芙娜女皇（1741-1762年）时代开创了俄罗斯贵族阶级的黄金时期，比灵顿认为这一时期是从1755年到1855年。

1755年俄罗斯出现了自己建造的剧院及大学。一个世纪以后，即亚历山大二世统治时期，解放农奴、开放俄罗斯、接受加速的工业化，从而永远地结束了俄罗斯贵族的特权地位。在比灵顿看来，1756年的俄法结盟标志着“外交革命”。1856年克里米亚战争结束，法语成为贵族阶级的语言并将俄罗斯的贵族阶级带入俄罗斯文化的主流中，同时也使贵族阶级比以往任何时候都与本国国民更加隔膜。

比灵顿认为，在这一时期，贵族精英创造了不仅属于俄罗斯而且属于欧洲的文化，缔造了一个英雄主义的时代。但不可否认的是，贵族阶级在一定程度上也造成了混乱。在不切实际的努力中，他们往往迷失了自己。由于它们对于实际的政治和社会改革感到失望，他们思考着并迅速投身于艺术创造，深刻的现实主义文学最终出现，并带来了现代最深刻的革命政治动荡^①。

（四）驶向新的彼岸（19世纪下半期）

19世纪下半期，社会混乱，工业发展，城市化出现，俄罗斯开始寻找新的艺术和生活形式。在这一阶段，比灵顿将俄罗斯比喻为努力寻找彼岸的一叶小舟。在尼古拉一世统治后期，俄罗斯更多地受到法国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在西方1848年革命失败以后，铁路作为改变和大毁灭的象征出现在农村^②。在相对自由的亚历山大二世统治时期（1855-1881年），革命的激进主义出现了具有讽刺意味的成长。在年轻一代中，批评传统信仰的唯物主义出现了。19世纪70年代开始转向极端主义：在莫斯科出现了建立在达尔文进化论基础上的泛斯拉夫主义；在圣彼得堡则出现了蒲鲁东理想化的“人民”概念和实证主义观念。

亚历山大二世统治时期，60年代出现了对官方意识形态最为强烈的拒绝和排斥，而70年代在分裂的知识分子中却出现了对于政权系统的积极的肯定。比灵顿举例道：比如俄罗斯国家学派的音乐、尤其是穆索尔斯基的音

① James H. Billington, *The Icon and the Axe*, p.210.

② *Ibid*, p.384.

乐以及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心理小说。

随着尼古拉一世的去世、克里米亚战争的失败，以及为农奴解放所做的准备，早在 19 世纪 50 年代，俄罗斯已经开始发生深刻、巨大的变化。在克里米亚战争中，英、法的坚船利炮对俄罗斯文化的破坏还不及它们的新技术和新观念所产生的静悄悄的影响来得大：这种社会思想在贵族俄罗斯与无产阶级的俄罗斯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由形而上走向形而下^①。此外，比灵顿认为，1871 年巴黎公社的失败促使俄罗斯所寄予的希望从西方转向东方。

亚历山大二世统治时期，俄罗斯对内推进现代化，对外进行谨慎的接触，将俄罗斯永远地与它的农耕传统分隔开来。曾长期保持沉默的农民开始慢慢地、被动地进入城市，并且逐渐受到现代文化的改变。在贵族探索精神的影响下，俄罗斯人开始思考一个全新的问题：俄罗斯人怎样才能更多地关注自身的精神生活？

（五）不确定的巨人

对于从 19 世纪 90 年代到斯大林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比灵顿采用“不确定的巨人”来暗喻俄罗斯。这一时期，俄罗斯文化继续通过所谓的“电气时代（Electric Age）”发展着自己。在深刻的文化动荡中，1917 年革命爆发。正如电力在这一时期进入俄罗斯一样，文化的新电流也为俄罗斯人的日常生活带来了新的活力和启发。共产主义被认为是“苏维埃政权加电气化”，而苏维埃政权则被认为是“光电、能量及智力的组合”。俄罗斯人开始学习用新的方法来激发传统的潜在能量。因此，电气时代的文化在很多方面比以往贵族时代的文化更深地植根于俄罗斯的传统，比如在诗歌领域，新的象征主义很快让位于未来主义和想象主义。在比灵顿看来，俄罗斯过去是而且现在仍然是一个“希望成为但却尚未成为的”西方国家。

在斯大林极权主义时代之前的自由的、最显著的短暂插曲主要有三个：普罗米修斯主义、感觉论和启示论。前两者可以被认为是俄罗斯文化中总的欧洲化趋势中的东方特色的强化。这三个插曲在一定程度上也许可以解释缘何俄罗斯会进入斯大林新的“铁器时代”，缘何斯大林时代会空前绝后。比

^① James H. Billington, *The Icon and the Axe*, p.377.

比灵顿总结道：20 世纪前三十年中的文化动荡中，这三种主义帮助俄罗斯远离了传统的牵绊。^①

这一时期，无论是社会、经济变迁抑或文化转型，它们表面上均与之前俄罗斯的历史关联较少，而无产阶级思想以及马克思主义信仰其实也变得无足轻重。事实上，曾经在阐释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和建设新苏联国家方面发挥关键作用的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成了 30 年代大清洗的主要受害者。比灵顿认为，之所以斯大林时代极权牢牢地控制了整个俄罗斯社会，其根源可以追溯到列宁时期。此外，比灵顿还提醒道：人们必须意识到，无论是列宁还是斯大林，他们都与俄罗斯复杂的文化传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②。

在斯大林统治晚期，很多主题再现：战争、改革、莫斯科与列宁格勒之间古老的紧张关系（1948-1949 年列宁格勒事件）、50 年代晚期和 60 年代早期两代人之间的冲突等等。斯大林去世以后，宗教思想为大量的年轻人开启了新的想象空间，当时的文学大量借鉴东正教中的主题和形象^③。

另一方面，比灵顿认为，俄罗斯文明对其他文明的囫圇吞枣导致了斯大林时期的苦果。^④比灵顿通过回顾俄罗斯的整体历史，观察到俄罗斯不断试图获得其他文明的最终产品，却忽略了对他国文明的内在理解：俄罗斯整块地借取拜占庭遗产，却未吸收其传统秩序的哲学话语；俄罗斯贵族采用法国文化的语言和风格，却未汲取法国文化中的批判精神。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高度斯大林主义（High Stalinism）所带来的苦果却又为俄罗斯人反思其历史提供了一面明镜。

比灵顿再次提出采用辩证的视角，并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大清洗在客观上为无辜的、受苦受难的人们的创造提供了可能性；在一定意义上提醒俄罗斯思想家不要对抽象的乌托邦太充满激情。后斯大林一代对具体事务的关心却有助于俄罗斯出现一种不太壮观但却更加牢固的文化，在政治制度和艺术表达方面亦是如此。但是，创造的源泉却深深地植根于俄罗斯大地。比灵顿还展望了俄罗斯文化的未来，认为无论今后的文化成果如何，它们肯定会比

① James H. Billington, *The Icon and the Axe*, pp.513-514.

② Ibid, pp.519-523.

③ Ibid, pp.550-554.

④ Ibid, pp.590-597.

以往任何时代移植过来的文化更为持久。

简而言之，本书中，比灵顿尝试着继资产阶级自由派历史学家米留可夫（Paul Miliukov）之后再一次对俄罗斯文化史作一个总结。他将文化看作是一个自成一体的现象，文化史是传递思想风格、尤其是传递符号的一个过程。遵循这一思路，比灵顿采用丰富的材料并频繁地使用符号来概括各个时代的特点，体现出这本著作浓重的印象主义特质。此外，比灵顿的立场较为客观，总的立场也许可以与俄罗斯知识分子在大革命前几年中的复兴相联系：强调宗教、文化的自治和复杂性、历史上周期性出现的主题和模式。

二、《俄罗斯的面孔——俄罗斯文化中的痛苦、抱负和成就》

为了让美国大众更深入地理解俄罗斯文化，比灵顿与美国公共广播公司（PBS）合作，推出了系列音像制品“俄罗斯的面孔”。与之同名的著作《俄罗斯的面孔》，力求深入研究而不仅仅是简单列举俄罗斯文化发展的各种艺术形式，从而为读者勾勒出俄罗斯人作为一个整体在 1000 余年历史变迁中所呈现出来的面孔的变化。前美国驻苏联大使乔治·凯南评价说“比灵顿为读者提供了俄罗斯丰富的、有震撼力的文化历史的三棱镜：从中世纪的圣像到后面几个世纪的艺术、音乐、戏剧和文学等，为缩小美国本土的专业学者、普通大众与拥有伟大精神力量和美学特质的俄罗斯人民的鸿沟做出了重要的贡献。”^①

这本著作将俄罗斯的文化划分为中世纪（公元 9 世纪—公元 17 世纪中期）、近代（公元 18 世纪初—19 世纪中期）和现代（19 世纪中期—1998 年）这样三个大的时间段。在中世纪，作者认为“罗斯受洗”、蒙古入侵以及“混乱时期”是对该时期俄罗斯文化发展影响最为深远的事件，以“拜占庭风格”的宗教绘画为代表的古代罗斯文化经历了一个时起时伏、忽明忽暗的阶段。比灵顿认为，这一时期的艺术创造主体为修士，并选取了油画创作的代表人物安德烈·鲁勃廖夫（Andrei Rublev）及其代表作。而在他看来，

^① James H. Billington, *The Face of Russia: Anguish, Aspiration, and Achievement in Russian Culture*, New York: Resource Publications, 1998, back cover.

近代俄罗斯文化的总体特征则是文化民主化的发展和理性主义的体现。在这一阶段，俄罗斯开始作为一个军事巨人和文化巨人屹立在欧亚大陆。贵族作为这一时期的文化创造主体，以近代早期的建筑和近代晚期的文学表达着俄罗斯民族的渴望，代表人物分别为建筑大师巴托洛梅奥·拉斯特雷利（Bartolomeo Rastrelli）和现实主义作家果戈理，代表作品为教堂建筑和文学著作。比灵顿指出，现代的俄罗斯文化则是俄罗斯文化史上最为辉煌的篇章，涌现了一大批天才人物，为世界文化宝库奉献了大量杰出的思想巨著和文艺精品。这一时期的文化创造主体为人民，比灵顿选取了音乐和电影这两种有声的艺术表达形式，代表人物则分别选取了 19 世纪晚期的作曲家穆索尔斯基和 20 世纪的电影制作人爱森斯坦（Sergei Eisenstein）。

（一）中世纪（公元 9 世纪—公元 17 世纪中期）

这一时期是俄罗斯文化史上持续时间最长的一个阶段。比灵顿认为，正如美国文化的形成一样，俄罗斯文化也是由苦难和宗教形成的：恶劣的自然环境促使俄罗斯人寻找人际间的温暖，而无际的大草原则促使俄罗斯人寻找与上帝之间的联系。公元 988 年罗斯受洗，正式将希腊正教奉为国教，俄罗斯民族正式加入基督教世界，并且第一次获得了清晰的文化和政治认同。

比灵顿将欧亚中心地带的民族进行了比较，认为游牧民族通常会入侵更加安定和文明的民族，比如：公元前 8 世纪斯基泰人的占领、公元前 3 世纪萨尔马提亚人的进攻等。这些都促使俄罗斯人思考并得出结论：俄罗斯是一个独一无二的、既不属于欧洲也不属于亚洲的欧亚民族。

比灵顿认为这一时期俄罗斯文化体现出两个特点：一个是建立起强势的中央政府统治的强烈愿望，另一个则是精神力量要和艺术紧密结合在一起。由于内部的分离和外部的入侵，这两个特点成为俄罗斯文化自始至终的一个印记。同时，在这一阶段，俄罗斯文化中更多地表现出一种民族的精神力量。对拜占庭东正教的皈依，使俄罗斯从一个没有宗教信仰的民族转变为一个虔诚信仰东正教的国家。比如：“神圣（Holy）”总是与“罗斯（Rus）”这个单词联系在一起，用于描述这个新出现的文明。权力的中心从北部的平原转移到东部的森林，从基辅转移到莫斯科，罗斯成为大罗斯。到公元 17 世

纪末期，俄罗斯将它的帝国范围延伸到北至北极圈、东抵太平洋的广袤土地。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俄罗斯的东正教堂遭到破坏，农民被残忍地奴役，社会结构被内部的暴力叛乱不断破坏。而且，伴随着火灾、饥荒、瘟疫，这些破坏被不断扩大。苦难增强了俄罗斯人的精神力量，与自然的紧密联系则增进了俄罗斯人的人际关系。也是在这一长时段中，拜占庭帝国的作品和艺术被引入到俄罗斯文明之中。

这一时期，俄罗斯人与西方的联系不仅表现为战争，而且表现为向西方学习的过程。俄罗斯人在与对手瑞典、法国、德国作战的过程中，还同时向他们学习，比如向瑞典学习先进的政府制度，向法国学习贵族的语言等等。鉴于俄罗斯过去是而且现在依然是一个内部分离的社会，向西方学习已经成为俄罗斯文化发展背后的三个基本推动力之一，并且在现代发挥了日益重要的作用。

这一时期，修士创造了原始的俄罗斯文化，而这些文化一直到 17 世纪中期都没有呈现出显著的变化。修士们力图将中世纪的世界眼光带入到现代俄罗斯，这一点比在任何其他欧洲国家都表现得更为明显。修士们认为：艺术是为了达到宗教救赎的目的，而不是单纯为艺术而艺术；艺术是为了帮助人们为接受最后的审判做好充分的准备，而不是单纯为了感官享受。

比灵顿指出：如果说基辅罗斯早期的修士将拜占庭全盛时期的东正教一股脑儿地学习过来，那么身处莫斯科郊区的晚期修士们则创造出了一种富有创新力的、更加人性化的文化。这种文化强调人的内在精神力量，强调与自然界和当地社群的紧密联系。最终，修士们将古代罗斯分化为两个阵营。在 17 世纪下半期，这两个阵营将教堂和俄罗斯社会分离开来。随着历史的演进，修士文化经历了一个“借鉴—创新—破坏”的文化周期，而这样的周期在后来俄罗斯文化的其他样式中也一直贯穿始终。

在比灵顿看来，在 18 世纪和 20 世纪，尽管修士文化走向衰败乃至几近消失，但却仍然有着一定的影响力：威慑掌权者、吸引叛乱者。事实上，在俄罗斯这个独特文明的背后始终存在着权力与真理、向外扩张的驱动力和向内探寻的精神力之间持续不断的张力。也许，俄罗斯之所以能够克服所有的苦难，排除外扰——甚至是国外的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入主，正

是得益于不言自明的俄罗斯内部的精神力量。

比灵顿认为，也许我们永远不能完全渗入到俄罗斯修士文化的内核，但修士们为我们留下的物质遗产却能让我们对这种文化有一定程度的了解。在这种驱动力的影响下，比灵顿选择该时期以宗教画为主要题材的绘画作为切入点，透过这种外在的表达方式来洞悉该时期俄罗斯文化中优美的内在精神。公元 11 世纪，俄罗斯人毫无批判地采用了拜占庭的基督教绘画方式，并在 15 世纪初期创造出具有自身特色的作品。正是这些圣像而不是人类学意义的特点，第一次赋予俄罗斯人以自己独特的身份。鲁勃廖夫是该时期最伟大的圣像油画家，他尝试着在圣像绘画中增加其个人的特殊理解，为画作增加灵性和人性的温暖，其作品是修士思想的集中表达，体现出要把分裂文明中的俄罗斯人统一起来的强烈愿望。

（二）近代（公元 18 世纪初—19 世纪中期）

比灵顿认为，俄罗斯近代的大幕是由彼得一世改革开启的：彼得大帝为振兴俄国而决意全盘“欧化”，其中也包括文化的“欧化”。他限制教会的权力，为文化的世俗化创造条件；他大力发展教育和科学，增强全社会的文化意识和理性精神；他造船、建都、征战、办厂，为俄罗斯奠定了较为丰厚的物质基础。席卷全国的现代化改革促生了新的文化精英——俄罗斯的贵族，以及一个新的、“面向西方的窗户”的首都——圣彼得堡。在彼得大帝的号召之下，俄罗斯贵族开始穿短褂，蓄短发，他们成为国家的公仆而不是教堂的子民，他们这个整体被称为“朝廷中人”，他们在城市和宫殿中而不是在修道院和教堂中寻找合法性。这样，贵族与国家的联系强化，而与教会的联系则被削弱了。

在比灵顿看来，新的文化中心圣彼得堡与之前的首都基辅、弗拉基米尔和莫斯科都不一样。之前的每一个首都均坐落于欧亚内陆，与之相反，文化中心圣彼得堡则是一座完全新建的城市。正是在这里，俄罗斯人达到了他们两个原创艺术成就的最高峰：18 世纪的建筑和 19 世纪的文学。同样的，这两种艺术形式也经历了一个与中世纪绘画相同的过程：模仿—创新—破坏。正如中世纪的文化是从莫斯科和其周边的修道院辐射出来的那样，整个近代

早期的俄罗斯文化的影响力则是从圣彼得堡和它周边的宫殿辐射出来的。

比灵顿将中世纪的修士文化与近代的贵族文化作了比较：中世纪，俄罗斯的修道院数量众多并在宗教节日向所有的香客开放；而俄罗斯新的宫殿则是在 1721 年北方战争之后的和平时期建造的，它们只对贵族开放。

俄罗斯将欧洲从拿破仑的革命专制中解放出来，同时也在西方的启蒙中获得启发。俄罗斯的贵族试图建立起一种与俄罗斯的农民和手工业者不同的文化身份。拿破仑 1812 年的入侵使俄罗斯感到欧洲的翻脸无情，俄罗斯人民奋起反击，民族主义情绪空前高涨，甚至试图在精神上建立起对欧洲的领导。俄罗斯人相信耶稣拯救他们的事实，但他们不再认为耶稣是一个简单的如鲁勃廖夫在他的圣像上所描绘的人类先知的形象，他们认为耶稣必须在另一种伟大的艺术形式中得到体现，那就是建筑。这一时期，俄罗斯贵族建造了其历史上最雄伟的教堂——基督救世主大教堂（the Church of Christ the Saviour）。

为了能与罗马相媲美，俄罗斯帝国的建筑是由俄罗斯化的意大利建筑师拉斯特雷利建造的。比灵顿介绍了拉斯特雷利所处的时代背景以及他的代表作品比如冬宫、皇村等。拉斯特雷利努力创造一种与众不同的俄罗斯建筑，目的在于使帝国权力合法化，暗示帝国的权力既能载入史册也能征服自然。

为了将贵族与一般的民众重新联系在一起，俄罗斯的文学出现了，其引领人物为果戈理。他讲述俄罗斯普通人的故事，开创了俄罗斯小说的先河。他的作品中有较多的农村素材，力图描绘权力背后、遭受苦难的俄罗斯人的面孔。他为圣彼得堡这个露天剧院谱写了一个戏剧性的人物，即“在俄罗斯土地上彷徨的流浪者”，这正是俄罗斯的象征。

新的贵族文化导致俄罗斯的面孔发生变化：这一时期的绘画不再是平面的、揭示上帝向人们所展示的天堂形象，而是雕刻立体的建筑和雕塑来使他们对普通民众的统治合法化。一些贵族开始转向写作以便表达隐藏在权力背后的人的痛苦和渴望。伊凡雷帝及他的继任者的妄自尊大创造出了一个真正的、博物馆式的城市圣彼得堡，同时，也在无意中帮助摧毁了他们原本努力促进的修士文化。同样的，新彼得堡的贵族文化创造出了言语上的便利和空闲的时间，这给予人们无限的想象，不知不觉地促进了乌托邦式的革命，这

个革命反过来又摧毁了贵族文化。

因此，从俄罗斯历史的长河来看，可以将彼得堡看作是俄罗斯现代文化从宗教到革命的演进的最重要的见证者。不管这个转变是被视为英雄的史诗抑或是可怕的悲剧，都是值得思考的。这不仅仅是因为 20 世纪的戏剧性大结局，而且也因为 18 世纪壮观的场景和 19 世纪动人的剧本。

比灵顿对这些杰作的发现和再发现加深了他对俄罗斯文化的印象：俄罗斯民族是一个“敢想敢为”（think big）的民族。事实上，他们没有完成的作品有时却是最完整的。许多俄罗斯艺术家破碎的生活让人们意识到他们对自己的成就是不满意的。新的纯世俗化的后圣彼得建筑和文学，似乎在一些方面反映甚至放大了早期修士们的信仰，那就是：艺术是为了拯救而非娱乐，艺术家应该在改善人类生活状况之外转变人类的生活状况^①。

（三）现代（19 世纪中期—1998 年）

俄罗斯在 1853-1856 年克里米亚战争以及 1848-1849 年欧洲革命中的失败，结束了其农村的沉寂。沙皇亚历山大二世主张学习西方的民主思想，力图让俄罗斯接受建立在西方观念基础上的激进的变化。这一时期，贵族失去了在乡村的传统权力，相反，地方的非贵族开始扮演重要的角色。1904-1905 年俄日战争以及 1914-1918 年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俄罗斯的失败，更是促使了整个转变的发生。这一时期，诗歌文学突飞猛进：特有的角色，比如“多余的人”和“忏悔的贵族”，戏剧性地表现出没落贵族们对他们生于斯长于斯的乡村生活日益无关轻重的感觉。俄罗斯作家们不再塑造任何贵族英雄人物，而是开始关注具有转变俄罗斯的集体力量的“人民”，在人民中寻找道德而不是在宗教中寻求道义。

没落的贵族们发现，不断崛起的人民是没有自己的“面孔”的，甚至没有自己的姓名。人民仅仅是国家的一个部分而不仅仅作为人口这样一个事实而存在。对于这样一个群体，甚至没有广为认可的称呼。人民的日常生活金属和机器的影响下发生了变化。在亚历山大二世统治时期，俄罗斯的木质

^① James H. Billington, *The Face of Russia: Anguish, Aspiration, and Achievement in Russian Culture*, p.78.

结构及贵族彼得堡的石泥结构受到了新兴工业文化中金属力量的挑战。蒸汽机的声音开始代替果戈理三驾马车的铃声，而噪音往往被人民认为是危险的、甚至是邪恶的外国入侵。最终产生了俄罗斯革命运动的政治机器，从一开始就打上了金属的烙印。列宁所组织的第一个革命组织是在圣彼得堡帝国技术研究所（Petersburg Imperial Technological Institute）内进行的。继列宁之后的苏联统治者斯大林，也将工业化强加给苏联人民。

二战中，由金属做成的俄罗斯式坦克和火箭帮助苏联人打败了纳粹德国，这个胜利在一定程度上重新将 20 世纪 30 年代实行大清洗的、失去道德权威的政体合法化。金属质地的宇航飞船的升空增强了苏联人的信心和力量，这使苏联帝国获得了更为持久的生命力。

比灵顿将沙皇及共产党的统治进行比较，认为：如果说沙皇统治下俄罗斯人民的生活是残酷的，那么，斯大林时期俄罗斯人的生活则犹如噩梦一般。尽管国内状况糟糕，俄罗斯人民遭遇苦难，但他们还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奋起反抗希特勒。面对外患，俄罗斯的民族主义情绪远远超过了对内忧，这次胜利得以将苏联政体合法化，并使它在接下来的 40 年中继续存在。

如果说苏联时期的极权是史无前例的，那么，1991 年 8 月它在莫斯科的倒台也是闻所未闻的。在比灵顿看来，共产主义之所以被拒绝，不仅仅是因为俄罗斯人发现了新的人际交流形式和自由的若干可能性，而且是因为他们发现了自身对于道德和宗教责任的更深的传统，俄罗斯在发现自我。

面对共产党的最后一搏，俄罗斯以一种非暴力的、决定性的方式颠覆了苏联，体现出民族主义与共产主义之间的较量。但是，在政变之后，俄罗斯人又一次遭遇了新的苦难和混乱。当俄罗斯摸索着要创造出一个新的、参与性的政府和一个更加开放的社会时，他们尝试着再一次向他们的西方对手——美国学习；当他们挣扎着要建设一个新的后冷战时期的自由文化时，他们表现出不仅要学习西方、更要复兴传统的劲头。^①

在这一长时段，比灵顿选取了俄罗斯的音乐和电影，代表人物为穆索尔斯基和爱森斯坦。亚历山大二世解放农奴，贵族建筑被融入到音乐中以便人

^① James H. Billington, *The Face of Russia: Anguish, Aspiration, and Achievement in Russian Culture*, p.27.

民接受，这就为人们广泛地参与到高度精英化的文化中创造了可能性。穆索尔斯基主张将鲜活的思想通过有着鲜明本土特色的音乐传达给人民，同时与人民进行直接的对话，以便将俄罗斯唤醒，使其意识到自己的独一无二性和正在遭遇的奴役。

1918-1920年内战期间，电影被认为是苏联时代占据中心地位的艺术形式，是“即使文盲也可以读懂的、唯一的书”。爱森斯坦通过电影创造了将共产主义权力合法化的神话，同时也影响了那些瓦解共产主义并在20世纪末期给予俄罗斯自由的人们。戈尔巴乔夫时代以及20世纪80年代，电影再次获得重要的地位。赫鲁晓夫统治下简短的文学解冻通过“士兵之歌”(Ballad of a Soldier, 1959)、“雁南飞”(The Cranes Are Flying, 1957)以及“伊凡的童年”(My Name is Ivan, 1962)这三部影片为我们提供了先锋的理解。在这三部影片中，摄影机不断地关注人的面部表情而非战争的场景。在勃列日涅夫、安德罗波夫和契尔年科统治时期，经济状况依旧恶劣。所幸的是，俄国历史上不断出现的三股力量再次出现：重新发现西方、重新发现东正教、更新与自然的联系。

因此，重新发现西方成为1991年政变之后的决定性因素。在俄罗斯人面向未来进行展望之时，他们思考的关于文化模式的关键问题是：后苏联时代的俄罗斯在最初完全模仿西方的模式之后，它是否会进入到模仿后的创新阶段，能否进入一个未来可持续发展的、开放的、负责任的社会？如果整个努力失败，那么俄罗斯是否会回归到类似以往的、专制的、封闭的社会？就文化的承载者而言，究竟是哪个社会群体、什么表达形式将在最大程度上影响俄罗斯的未来？比灵顿认为，新的电子媒体比如互联网，似乎有可能在俄罗斯的未来担当重任，而采用新媒体则可能意味着完全的西方化和商业化。

比灵顿认为，回归东正教将永远不只是俄罗斯转瞬即逝的潮流，深厚的文化势必战胜肤浅的消费主义，民主制度也终将战胜专制主义。比灵顿注意到，当今的俄罗斯人有很多面孔，面具却减少了。^①俄罗斯人回顾圣像上的面孔，同时也期待着面对一个不同的未来。在不确定的现在，正如一个俄罗

^① 对19世纪独裁统治最了不起的观察家古斯丁(Marquis de Custine)，注意到沙皇“有很多面具但却没有面孔”。

斯的年轻人跟比灵顿说的，“现在，我们终于可以在镜子里看自己了”。

比灵顿以其简单优雅的语言，通过对俄罗斯艺术总体的素描，为我们呈现了俄罗斯面孔的变迁。在比灵顿看来，俄罗斯文化是一种有爆发力的、革命性的文化，而不是一种渐进式的文化；在不同的、特殊的时代，不同的艺术媒介相继表现出特殊的重要性。比灵顿注意到俄罗斯文化的每一种形式都经历着一个三部曲，即：开始是完全的模仿，之后是通过激进的创新达到鼎盛，最后则由于从上而下的、抽象的压力或者从下而上的社会不安定而被粉碎。^①在比灵顿看来，俄罗斯文化中的某种思维定势对于俄罗斯的政治走向也有着一定的影响^②。

三、《俄罗斯寻找自己》

苏联解体带来的文化上的一个直接后果，便是社会主义苏联构建的民族认同顷刻崩溃。新俄罗斯在民族复兴的道路上再次面临身份认同的困惑，这在俄罗斯乃至国际学术界引起了广泛而热烈的讨论。已故俄罗斯前总统叶利钦曾于 1997 年 6 月在俄罗斯公共电视台公开动员政治家和知识分子寻找、创建、构想能团结民众的新俄罗斯，作为民族国家的指导思想。^③与此同时，西方不少学者也试图从不同角度理解这个特殊国家的文化身份。比灵顿的专著《俄罗斯寻找自己》，最为精辟和独到地论述了他对于俄罗斯人追寻民族身份的漫长进程的理解，并给予世人极为有益的思想启迪。

比灵顿从事这项研究始于 1987 年。彼时，他刚刚担任美国国会图书馆馆长。在担任馆长的几十年里，他对俄罗斯进行了频繁的访问，与来自俄罗斯不同领域、不同社会阶层的人们保持了长期、持久的联系，这为他提供了观察当代俄罗斯的得天独厚的条件。据此，他将自己长期以来所获得的关于俄罗斯的广博知识运用其中，同时也穿插进了他于 20 世纪 90 年代在依斯塔

① James H. Billington, Kathleen Pathé, *The Search for A New Russian National Identity: Russian Perspectives*, issued by the Library of Congress Washington, D.C., Feb. 2003, p.26.

② “Recent Books”, *Foreign Affairs*, May/June 1999, p.147.

③ 冯绍雷、相蓝欣主编：《转型中的俄罗斯社会与文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年，第 319 页。

(Ista)、托木斯克 (Tomsk) 和莫斯科所做的访谈。在 1999-2003 年, 他还亲自筹划了由美国国会资助的“开放世界 (俄罗斯) 项目”。在这一项目中, 他得以和来自俄罗斯的知识分子和年轻政治领袖进行了多次的互动, 这些都为他的这本著作提供了丰富的观点和新颖的视角。

比灵顿的这本著作不同于俄罗斯本国诸多学者对本国文化身份所进行的带有个人和民族主义倾向的探讨, 如 20 世纪俄罗斯文化大师德米特里·利哈乔夫院士 (Дмитрий Сергеевич Лихачёв) 强调俄罗斯文化的欧洲根源, 竭力摒弃俄罗斯的欧亚主义, 显示了其欧洲中心主义和欧洲文化优越论的传统观念; 也不同于美国著名斯拉夫语言学家汤普逊的文化理论研究范式, 其《理解俄国: 俄国文化中的圣愚》一书试图通过对俄国社会和文化中出现的圣愚现象的分析, 诠释俄国的宗教样态、社会行为模式、俄国人的民族性人格类型、政治心态、乃至现代知识分子的特征和俄国文学的特质, 这是一种扩散性的诠释路径。比灵顿教授的《俄罗斯寻找自己》一书, 作为一本文化史著作, 其内涵极为丰富, 几乎涵盖了俄罗斯的文学、历史、美术、宗教、地缘政治甚至建筑学等诸多领域的内容。比灵顿似乎在用一枚多棱镜片, 在可能涉及各个角度, 透视和观察俄罗斯的文化与社会。如此广博的角度, 比灵顿的焦点却只有一个, 即对俄罗斯身份的追问及对其进程的探寻。他不只是研究俄罗斯的文化历史, 更为重要的, 是要通过探问俄罗斯庞杂的历史来解构俄罗斯国家身份的“套娃”。^①诚如比灵顿自己所言, “本书是要试图记述这一伟大传统的继承者们如何在新的条件下, 即获得自由之后, 努力解决‘俄罗斯身份是什么’这一典型问题的过程”。^②

在全书的结构安排上, 比灵顿总体遵循了年表排列的传统史学方法, 但又并不排斥对典型事例的分析。他把俄罗斯民族身份的探寻进程划分为三个时间段。第一个阶段: 通过典型的战争、建筑、文学、思想学说等, 研究了 19 世纪俄罗斯身份发现的缘起; 第二阶段: 探究了 20 世纪苏维埃社会主义

① 套娃是俄罗斯特产木制玩具, 一般由多个一样图案的空心木娃娃一个套一个组成, 最多可达十多个, 通常为圆柱形, 底部平坦可以直立。最普通的图案是一个穿着俄罗斯民族服装的姑娘, 俄语叫做“玛特廖什卡” (матрёшка)。比灵顿借套娃来比喻俄罗斯精神中信念的不同层次。

② James H. Billington, *Russia in Search of Itself*, p.ix.

政权是在怎样的思想背景下，以及利用怎样的意识形态工具获得了政治合法性，并透视了在这一合法化的进程中，俄罗斯民族意识和国家身份是如何进一步得到强化的；第三阶段：试图在纷繁复杂的典型历史事件和典型人物的思想中，领悟后苏联时代俄罗斯如何确立其民族国家的身份，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获得政治的合法性。比灵顿在这本著作中淡化了传统史学家对国家政治史和经济史过度关注的做法，而是类似于年鉴学派的研究路径，即总体史学的方法，实际上是把更多的目光投向文化史的研究。如他所言：“我对俄罗斯所作的诠释，相比美国学者所作的其他诠释，更侧重其文化中的道德热情和宗教层面，这些因素在我看来具有很高的历史意义。我认为那些研究俄罗斯文化的学者，与那些埋头于俄罗斯政治和经济的学者相比，通常能更清晰地预见苏维埃制度的非持久性”。^①

比灵顿首先探究了 19 世纪俄罗斯人发现民族身份的路径。在比灵顿看来，1812 年战胜拿破仑，激发了俄罗斯社会各阶层共同的民族情感，而纪念性建筑则是通过对战争的文化追忆，寻找民族的身份认同。在考察俄罗斯民族认同的根源及其动力问题时，比灵顿首先考察了 18 世纪莫斯科的建筑艺术，藉此分析这些艺术形式所表达的俄罗斯人对民族性产生的强烈情感共鸣，或是他所说的“对于民族的公众感情”。而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尼古拉·卡拉姆津（Nikolai Mikhailovich Karamzin）的《俄罗斯国家史》（*History of the Russian State*）、普希金的诗歌，还有大量的民间传说、史料记载等艺术形式的功能，是向子孙后代传达一种信息，即这个团结起来打败了历史上最强大军队的民族是一个怎样的民族。他还借用注释充分探讨了电影等艺术形式对俄罗斯国家观念的塑造作用，尤其强调俄罗斯充满道德与预言内容的通俗文学，增强了俄罗斯文化独特性的意识，并激发了民族自豪感。

此外，比灵顿在研究中，对思想和观念的因素也倾注了极大的热情。他试图通过解构俄罗斯民族身份认同的进程，洞悉俄罗斯人民族国家观念的衍生与变迁。他在该书的开篇序言里就明确指出：“信仰和信念是决定主要历史变革的重要因素，特别是对俄罗斯而言，有时他们还会起着决定性的作

^① James H. Billington, *Russia in Search of Itself*, p.xiv.

用”。^①在试图发现俄罗斯自我意识觉醒的研究中，比灵顿没有对大多数学者极为热衷的法国大革命和英国的工业革命给予多少关注，而是把目光转向19世纪初期在德国兴起的思想革命对俄罗斯所产生的影响。他指出“对俄罗斯自我意识的形成来说，这次革命的影响远远超过了法国政治上的大革命以及英国的工业革命”，^②而黑格尔的辩证法则在俄国青年知识分子中强化了民族国家的观念。在论证俄罗斯世俗化民族主义崛起时，他同样强调了“俄罗斯人对于东正教的虔诚信仰和对农民文化的自然亲近”^③等观念因素。

比灵顿在写作中巧妙地运用了自己所掌握的一系列可靠的典型历史事件和典型人物的思想，以论证其观点。在论证世俗化的俄罗斯民族主义泛起时，他分析了从沙皇亚历山大二世被刺到克里米亚战争、从巴尔干战争到柏林和平会议、从德俄关于建立太平洋地区霸权的设想到日俄战争等一系列历史事件的影响。俄罗斯在对外交往中逐渐孕育了“民族自我意识”，随之逐渐推动了基于文化与种族的民族主义的兴起，再到泛斯拉夫主义的兴起，最终发展到共产主义制度的建立。他似乎想说明俄罗斯在自我身份探寻过程中的逻辑演化过程。

比灵顿指出，19世纪后期，俄罗斯的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展开了激烈的交锋，并逐渐主导了20世纪俄罗斯人的思维方式和政治观念。对此，也有人认为是自由主义占了上风，因为就连沙皇亚历山大二世都主张推行温和的自由主义。实际上，在那个动荡的年代，也是思想交锋最为激烈的年代，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的争论本身就十分复杂。但是不管怎样，事实上，“无论是日薄西山的专制王权，还是软弱的自由主义政治派别，都没有找到出路，于是，就只有等候着即将来临的社会革命最终解决谁胜谁负的问题了”。^④

对于整个20世纪的俄罗斯思想和意识形态，比灵顿以娴熟的笔触向读者展示了俄罗斯在这百年里发生的思想变迁，以及在经历了苏联时代的极权统治之后，俄罗斯转而复归传统民族观念的路径。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的30年，被称为俄罗斯文化史上的“白银时代”，别尔嘉耶夫称这个时代为

① James H. Billington, *Russia in Search of Itself*, pp.xiv-xv.

② Ibid, p.10.

③ Ibid, p.19.

④ 冯绍雷：《20世纪的俄罗斯》，北京：三联书店，2007年，第26页。

俄罗斯的“文艺复兴”。与此同时，俄罗斯所处的社会环境极为动荡，经历了从国内沙皇改革到世界大战、又到国内革命的年代。此时的俄罗斯知识分子也卷入了对国家走向的大讨论。比灵顿总结了 20 世纪关于俄罗斯民族特征的三种定义：第一种是文化和宗教的观点，这种观点试图超越世俗繁复的政治；第二种是社会学和反宗教的观点，这种观点试图完全容纳世俗政治，排斥宗教，并且成为苏联社会主义政治合法化的意识形态工具；第三种是“种族—地理”观点，这种观点描述的对象是后共产党时期的非帝国性质的俄罗斯，试图协调前两种观点的冲突，意图获得支持和占有优势。^①

对于 20 世纪初期俄罗斯思想界的变化，比灵顿结合社会环境的变迁叙述了别尔嘉耶夫的思想变化，试图说明俄罗斯思想界变化的复杂动向。俄罗斯经历了苏联列宁时代乌托邦意识形态对民族身份的强化，斯大林时代工业化和科技等成就再次激发了他们的民族自豪感。在后斯大林时代，在比灵顿看来，苏联领导人对外扩张势力的兴趣磨灭了“民族主义—权威主义”的身份认同，并复归至淳朴的斯拉夫传统中来。他最后指出：“对外了解世界、对内恢复自身传统，已成大势所趋，这就向既缺乏政治自由也缺乏政治责任感的苏联体制提出了挑战”。^②

20 世纪末期，苏联解体给俄罗斯人带来了新的身份认同困惑。比灵顿在这一部分的连续发问，把对俄罗斯民族身份的探问推向了一个新的高潮。“苏联统治的合法性是如何丧失的？新的合法性又是如何得以建立和得到保证的？”他随后给出了答案：对苏维埃政权的恐惧、个人的道德责任感、俄罗斯文化的内部力量，冲破了苏维埃政权意识形态包裹的外壳。那么是否存在一个将俄罗斯人民联系在一起的更深层次现实以及俄罗斯未来走向的一些线索呢？他同样给出了清晰的答案：神圣的领袖、精神的复苏与和谐的文化。俄罗斯思想传统中这三个十分不同的方面，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复活了。在比灵顿看来，这三个传统观念将为未来的俄罗斯发展指引方向。

冷战结束，一种关于俄罗斯身份的新的论调逐渐兴盛，即欧亚主义的兴起。比灵顿对欧亚主义的理解可以概括为这样几句话：第一，欧亚主义本质

① James H. Billington, *Russia in Search of Itself*, pp.23-24.

② *Ibid*, p.40.

上是一种对于俄罗斯身份的地理构想；第二，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它基本上是一种专制的民族主义，并且扎根于民族，而非宗教，扎根于地理环境而非语言和文化；第三，鉴于俄罗斯人对于历史的痛苦记忆和对当下现实的不满（北约东扩，西方庸俗消费主义的侵蚀），它是对“大西洋主义”的回应，也是对经济全球化的一种回应；第四，对于普通民众而言，欧亚主义仅仅是一种宣泄情感的工具。在比灵顿看来，欧亚主义是一种典型的负面民族主义，他认为，那可能是衰竭的俄罗斯知识阶层的最后喘息。他尖锐地指出，“在当今的俄罗斯，欧亚主义反映了与非西方强国加强联系的愿望，但是这些国家本身可能正在寻求更大的自由化和与西方国家一体化”，果真如此，实际结果“可能不是以俄罗斯为中心的‘新欧亚帝国’的建立，而是俄罗斯独立性和稳定的丧失”。^①

作为一名美国学者，比灵顿对俄罗斯与美国之间的文化差异的历史背景有着深刻的体察。在上个世纪 90 年代苏联社会主义大厦轰然倒塌之后，俄罗斯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扑向西方的怀抱。饶有兴趣的是，比灵顿却对俄罗斯国家发展的未来取向突然忧虑起来。他说道：“一个国家的理想被另一个国家所接纳采用，但是这些理想——自由、民主和市场经济——被植于这样一个民族中：它的历史与美国很不相同，并且它现在面临着很多令人困惑的问题”。^②对于这种困惑的解析，比灵顿在文章的最后一部分采用了他惯用的“套娃”式语言的表述：“一张民主自由的面庞下紧裹着一副专制独裁的嘴脸。再往里去，就是一个对任何思想，尤其是政治，不是心怀敌意，就是毫不关心的玩具娃娃”。^③但是，对于俄罗斯这个独特的民族探寻本民族身份的进程本身，比灵顿有着自己的理解。他认为，“他们正在进行的探寻能够提供一个至关重要的检验结果——现代的自由民主是否可以在具有专制历史的国家里生根”。^④对于叶利钦的民主化改革对俄罗斯民族身份的影响，比灵顿在言语中似乎表达了这样的意思：俄罗斯追求国家理念的激情，在叶

① James H. Billington, *Russia in Search of Itself*, p.90.

② Ibid, p.xii.

③ Ibid, p.98.

④ 詹姆斯·比灵顿教授在其中文版的“致中国读者”一文中提及该观点。参见[美]詹姆斯·比灵顿：《俄罗斯寻找自己》，杨恕译，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2007年。

利钦的急风骤雨的西化改革中被人们淡忘，甚至是被那种追求物质财富的欲望所淹没了。他用优美的文学语言批判了叶利钦的私有化改革：“在后苏联那代人的后现代观念中，俄罗斯不再是果戈理笔下那为了精神追求，在无际的草原上驰骋纵横，撒下铃声阵阵的三驾马车，而是更接近佩列文形容的密闭的火车，它正载着浑然无觉的乘客驶向坍塌的桥梁”。^①尽管如此，比灵顿对后苏联时代的人们寻找国家身份与信仰仍表达了乐观的态度。作为一名学者，他针对这一千年困惑提出了自己的建议：第一，以本土化的方式复兴自身文化中的宗教和道德；第二，将西方的政治经济体制与本土化的复兴完美地结合在一起。作为一位酷爱俄罗斯文化与历史的长者，他在文章的结尾留下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一个在自由中向前进但却回过头去寻找信仰的俄罗斯。这既是比灵顿的一种期许，也是一种诠释。

无论是对 19 世纪初俄罗斯发现自己国家身份的描述，以及对 19 世纪到 20 世纪之交的“白银时代”和之后一个世纪俄罗斯思想界发生的变化分析，还是对新俄罗斯复兴伊始俄罗斯再次陷入国家身份困惑的追问，以及叶利钦西化改革对于俄罗斯文化身份的冲击，比灵顿始终遵循着一条主线，即发现俄罗斯民族心灵深处的思想传统。这种结构史学长时段的视角贯穿全书的始终，使整部作品主线清晰，逻辑结构严谨。而其语言的流畅也为本书增色颇多。与此同时，他把包括诗歌、小说、绘画、电影在内的诸多文学艺术形式巧妙地纳入自己的分析框架内加以考察，视角独到，让人耳目一新，读来不禁有酣畅淋漓之美感。

在比灵顿这本书英文版的封面上，选用了俄罗斯杰出的风景画大师列维坦的伟大画作《在永恒的安宁之上》（Above Eternal Peace）^②。该作品中天空布满阴云，一条无波的大河顺流延伸，河边是暗绿色的草地，零星可见几块墓碑、一间小木屋，同样笼罩在灰色中，那一望无际的河面上涌动着无限的生机，表达了对大自然无尽的追求，带给人们久违了的返乡之感。作为生活在俄罗斯艺术十分活跃的“白银时代”的伟大画家，列维坦同时又处在亚历山大二世所掀起的资产阶级改革的大潮之下，他的诸多画作都表现了画家

① James H. Billington, *Russia in Search of Itself*, p.103.

② 此画作名称又译《墓地上空》。——编者注

对多灾多难的俄罗斯的同情和对未来俄罗斯何去何从的忧虑。比灵顿选择这一作品，恰当地诠释了俄罗斯在其漫长的历史中，对国家身份的长久困惑。这一画作是对全书思想内容的一种最具艺术的表征，可谓是独具匠心。

四、结论

俄罗斯文化是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比灵顿擅长于将其丰富的感性认识、深入的理性分析以及优美的文学化的表达结合在一起，或以特定符号、或以不同时代的艺术形式、或以学界对于俄罗斯身份的探讨为描述重点，为读者呈现出一千年来俄罗斯文化的变迁，同时还试图揭示出俄罗斯文化发展与其政治进程的同构性。《圣像与斧头》一书采用圣像和斧头这两个对于俄罗斯人来说意味隽永的符号，认为俄罗斯文化史是传递思想风格、尤其是传递符号的一个过程。在这里，比灵顿特意摒弃了西方式的话语体系而尽量采用有着鲜明俄罗斯特色的符号。在《俄罗斯的面孔》一书中，比灵顿选择了五种非常不同的艺术表达形式——绘画、建筑、文学、音乐和电影，同时关注俄罗斯人在这些领域取得巨大成就背后的痛苦和愿望，试图通过审视俄罗斯伟大的艺术来理解俄罗斯人，同时也尝试着以文化为参照来审视俄罗斯走向民主的过程。《俄罗斯寻找自己》则未停留在单纯强调俄罗斯文化中道德和宗教向度的层面，而是将历史在俄罗斯文化中的重要性凸显出来，探究在苏联体制崩溃之后，俄罗斯对自身民族特征的新探寻。

同时，比灵顿在强调俄罗斯文化中的宗教基础方面，聚焦于其历史上东正教的传统，他还特意选择了有着鲜明俄罗斯特色的而非西方主流的文化代表人物和形式。这体现出比灵顿强烈的还原本土意识，要运用俄罗斯元素来理解俄罗斯文化。比灵顿这种去西方化的、由表及里的研究方法，体现出他尽量要撇开意识形态羁绊的尝试和努力，试图通过本身来解释本身的方法，表现出其力求客观的研究理念。一方面，比灵顿作为美国人可以以旁观者的立场来看待俄罗斯文化，这使他有比较清醒的视野；另一方面，比灵顿又尝试着换位思考，充分意识到俄罗斯文化中的本土元素，并力求以本土元素来解释本土现象。这种努力和尝试，对于我国的学术研究也有着重要的启示

意义：不盲目迷信西方的东西，而是用自己的符号来理解自身的文化。

此外，作为一位西方学者，比灵顿的立场还是比较客观的。尽管他与美国政界有着密切关联，但他仍然撇去了意识形态因素的影响，在注意到俄罗斯文化的独特性之外，还认识到了俄罗斯文化与西方文化之间的共同性。比如，在《俄罗斯的面孔》一书中，比灵顿认为所有这些俄罗斯文化研究中的关键人物，在其他文化中均能找到其根源，比如：鲁勃廖夫（Rublev）曾与希腊人和南部斯拉夫人一起密切工作，拉斯特雷利（Rastrelli）是意大利人，果戈理是乌克兰人，穆索尔斯基拥有鞑靼人的血统等等。不难发现，俄罗斯文化与其他文化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受到其他文化的影响。

这三本著作也体现出比灵顿富有对俄罗斯文化的独特认识。首先，比灵顿认为塑造俄罗斯文化的三个核心因素分别是：对大自然的特殊感情、东正教以及对来自外界的新生事物的周期性激情。在比灵顿三部从不同角度对俄罗斯文化进行解读和剖析的著作中，这三个决定性的核心因素始终贯穿始终，并且体现出一个此消彼长的过程，比如：在《圣像与斧头》一书中，比灵顿认为在公元 17 世纪以前，自然环境这个因素对俄罗斯文化的形成起着较大的作用，而后面较多的篇幅则提到了东正教，以及对来自外界新生事物的周期性激情这两个因素。比灵顿得出结论，认为从很多方面来看，俄罗斯人目前对身份的探寻，是俄国白银时代后所中断的创造激情的复兴^①。这三个核心因素不仅为我们提供了理解俄罗斯辉煌艺术成就的框架，而且也为我们提供了审视俄罗斯建立宪政法治和民主参与努力的方式。所以比灵顿认为，理解这三个因素，对于理解俄罗斯文化及其政治都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②其次，比灵顿通过对俄罗斯历史长时段的考察总结出，无论是俄罗斯绘画、建筑、文学、音乐还是电影，均要经历“模仿—创新—摧毁”这样的三个阶段，并且这一三部曲贯穿于整个俄罗斯的历史进程之中，并塑造着后苏联时期的俄罗斯。展望未来，比灵顿作出大胆预测：俄罗斯的宪政民主也许会与其文化发展轨迹具有同构性。这一观点对于我们理解俄罗斯的文化 and 政治有着重要的启发意义。再次，比灵顿十分注重白银时代，认为白银时代的文化

① James H. Billington, *The Icon and the Axe*, p.148.

② <http://www.pbs.org/weta/faceofrussia/series/billington.html>

成果与苏联时期的文化发展有着紧密的联系。在《圣像与斧头》一书中，关于 20 世纪，比灵顿就花了大约一半的篇幅写白银时代，另一半则写苏联时期。他对这两个时期给予同等的重视，还频繁暗示其中所遵循的共同的规律，尝试着将白银时代一些文化现象与苏联时期的文化发展相关联。

然而，与比灵顿印象主义写作手法所并行的，是其对一些问题的进一步深入分析和论证尚嫌不足。例如，他在《俄罗斯寻找自己》一书中提到，人文研究往往比计算性的社会科学更为重要、更具预见性^①，但缺乏逻辑严密的求证；在《圣像与斧头》一书中，关于俄罗斯人对于自然的恐惧是作为结论出现的，缺乏诸如法国俄罗斯文化学家贝桑龚（A. Besançon）在其论文“上帝与东正教俄罗斯的关系（La relation à Dieu dans le Christianisme Russe）”^②中运用弗洛伊德心理学观点予以解释的论证环节。同时，对于一些历史学家认为对俄罗斯文化发展起着关键作用的某些事件，比灵顿也关注不够或索性绕开不谈，例如瓦良格人^③对基辅罗斯文化形成的影响，蒙古人对俄罗斯的征服和统治等。此外，尽管比灵顿力求用去西方化的方式来透视俄罗斯文化的发展，但在东西方相互关照的背景下进行研究和比较方法的缺失，也使得其作品略显苍白，例如在《俄罗斯的面孔》一书中，比灵顿十分强调圣像在俄罗斯文化中的作用，并认为在圣像膜拜与苏联时期对于斯大林画像的极端崇拜之间存在着某种联系。但是，如若真是这样，缘何同样信奉东正教的希腊却没有出现对领袖的狂热崇拜？又为何信奉伊斯兰教的某些国家却处处可见领导人的画像？^④

总之，比灵顿将艺术的、历史的、文化的跨学科的研究方法运用于俄罗斯问题研究，这相较于西方其他倾向于从政治和经济角度来研究国家及国际问题的方法，更具有深厚的人文积淀、历史感和艺术体验，使其在描述俄罗斯现实问题时举重若轻。正如俄罗斯科学院世界经济和国际关系研究所（IMEMO）副所长弗拉基米尔·巴拉诺夫斯基（Vladimir Baranovsky）教授

① James H. Billington, *Russia in Search of Itself*, p.xiv.

② “La relation à Dieu dans le Christianisme Russe”, *Cahiers du Monde Russe et Soviétique*, VII, 1966, pp.189-220.

③ 系指北方斯堪的纳维亚来的海上强人。

④ 在伊斯兰教的语境中，对偶像的顶礼膜拜是被禁止的。

所言：“国家的认同对于那些研究俄罗斯是怎样调整并改变的人们，对于研究这些改变怎样通过俄罗斯与外部世界的关系得到反映的人们来说，是一个基础性的问题。”^①

【Abstract】 James Billington is one of the world’s leading experts on Russia and has been a policy advisor to Presidents and Congressmen as well as leaders in the academic, ecclesiastical and private sectors. This article attempts to interpret his Russian cultural studies and of those influenced by him through his three classic works on Russian culture, namely, the “the Icon and the Axe” (1966), “the Face of Russia” (1998) and “Russia in Search of Itself” (2004). Billington forms a unique understanding of Russian culture through interdisciplinary research methodology: three core elements of Russian culture including special feelings towards nature, Eastern Christendom and impact of the West; each form of Russian culture experienced three stages of “imitation - innovation - to destroy”; the development of Russian culture and its political process shares the similar structure; attaches great importance to the Silver Age, holding its cultural achievements are closely linked with those of the Soviet era.

【Key Words】 James Billington, Western Russian Studies, Russian Culture

【Аннотация】 Джеймс Биллингтон является ведущим специалистом современного изучения России на Западе. Проведя анализ трёх его классических исследований русской культуры, можно увидеть, какова русская культура в его глазах и глазах других западных учёных, находящихся под влиянием его взглядов. Биллингтон придерживается междисциплинарных методов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образуя уникальное понимание русской культуры: особые чувства к природе, православная вера и циклический характер страсти относительно новых предметов внешнего

^① James H. Billington, Kathleen Pathé, *The Search for A New Russian National Identity: Russian Perspectives*, p.60.

мира формируют три основных элемента русской культуры; каждая из форм культуры России переживает три этапа «имитация — инновации — уничтожение»; развитие русской культуры обладает структурным сходством с политическим процессом России; придаётся большое значение Серебряному веку, считается, что культурные достижения Серебряного века тесно связаны с культурным развитием советского периода.

【Ключевые слова】 Джеймс Биллингтон, изучение России на Западе, культура России

(责任编辑 封 帅)

以赛亚·伯林视野下的 苏联知识分子和苏联文化*

张建华**

【内容提要】以赛亚·伯林先后于1945、1956、1988年访问苏联。三次访问都时值苏联历史发展的关键时刻。伯林所到之处，刻意留心考察苏联文化艺术、知识分子生存和创作状况、知识分子与政府的关系，并且以其自由主义理念加以深刻的分析和批判。

【关键词】以赛亚·伯林 苏联文化 知识分子 苏维埃思想

【中图分类号】I317-065(511.2) **【文章标识】**A **【文章编号】**1009-721X(2012)03-0065-(25)

导 言

以赛亚·伯林(Isaiah Berlin)是20世纪英国著名学者，在欧美哲学和政治学领域享有“思想大师”的盛誉。^①然而，他的研究者和崇拜者较多地关注他的犹太人民族身份，而经常忽视他曾经的俄国侨民身份。人们往往从

* 本文为2010年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项目“苏联早期‘文化革命’与知识分子的政治认同”(项目批准号:10YJA770068)的阶段成果。

** 张建华，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世界史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

① 伯林及其自由主义思想是国内外学界研究的热点。欧美学界最近的研究著作如，Joseph Mali, Robert Wokler (ed.), *Isaiah Berlin's counter-Enlightenment*, 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 2003; George Crowder, *Isaiah Berlin: liberty and pluralism*, Cambridge: Polity Press, 2004; Claude J. Galipeau, *Isaiah Berlin's liberalism*, Toronto: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国内学界研究成果，如胡传胜的《观念的力量：与伯林对话》，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2年。比较而言，国内学界译介篇什多于研究著作。

他的《俄国思想家》中、从他论及俄国知识分子的字里行间，感受到他对于俄国和苏联的特殊情感，才由此思考他的特殊身份。^①自 1921 年伯林随全家移居英国后，他一直接受英语教育和西方文化影响，并成长为西方文化和犹太文化培育下的文化精英。然而，命运和使命感依然不能将伯林与他曾经的祖国——俄国分隔，他不仅始终密切地关注着苏联的发展^②，而且还在 1940 年代中期至 1980 年代末，先后三次访问苏联。^③

“少小离家老大归”的心情使伯林的第一次访苏持续了近 7 个月，伯林称这是其人生中最重要时刻。伯林原本应该按照英国外交部的要求提供一份苏联观察报告，然而他却花了一个月的时间整理自己对苏联知识界和苏联文化的思考。伯林在英国驻美国使馆最后完成了《关于 1945 年最后几个月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文艺状况的笔记》(A Note on Literature and the Arts in the Russian Soviet Federated Socialist Republic in the Closing Months of 1945)，并且于 1946 年 3 月 23 日将这份备忘录的副本送给了美国驻苏联大使阿维瑞尔·哈里曼 (Aviriel Harriman)。他在信中说：“我遵照英国驻俄国大使弗兰克·罗伯茨 (Frank Roberts) 的指示，把我写的又臭又长的报告呈交给您。这是关于俄罗斯文学的报告。我怀疑里面有什么新意或引人

① 伯林于 1909 年 6 月出生于拉脱维亚首府里加一个富裕的犹太人家庭，他的祖父母是本份的哈西德 (Hasidic) 信徒。伯林 7 岁时随父母移居彼得格勒，亲眼目睹了俄国的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这两场革命让他深感恐惧，但同时也促成了他对于思想史研究的兴趣。伯林曾正面承认：“首先，我不可避免地受苏联存在的影响……尽管我父母没有受过苏维埃政权的迫害，来英国也不是被驱逐的。但是我毕竟有着关于苏维埃政权的不愉快的记忆。”(参见[伊朗]拉明·贾汉贝格鲁：《伯林谈话录》，杨祯钦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2 年，第 8 页。)

② 1923 年，13 岁的伯林甚至杜撰了一个关于彼得格勒肃反委员会主席乌里茨基 (М.С.Улицкий) 被暗杀的故事，以表达对苏联政权的憎恶。亨利·哈代 (Henry Hardy) 将此文以《目的证明手段合理》为题收录到了《自由论》中，并加上编者按语：“这篇故事是他思想旅途第一步的记录，而这一思想旅途在 74 年后的《我的思想之路》中得到了概括……这个故事当然生动地反映出他早年经验的力量，也显示出他成熟的自由主义的一个最深刻的根源。”(参见伯林：《自由论》，胡传胜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1 年，第 22 页。)

③ 1945 年 9 月至 1946 年 4 月，伯林以英国外交官身份访问苏联。1956 年 5 月，伯林携新婚妻子爱琳·赫本 (Aline Halban) 应英国驻苏联大使威廉姆·哈特 (William Harte) 的私人邀请访问苏联。1988 年 10 月，年近 80 岁高龄的伯林故地重游，访问了列宁格勒和莫斯科等城市。

注目的东西。在美国只有英国驻美大使杰克·贝尔福(Jack. Balfour)读过。在英国外交部我怀疑谁会读它。之所以保密是因为怕给提供信息的人带来麻烦……”。^①这里所提及的提供信息的人，是指苏联诗人帕斯捷尔纳克(Б.Л. Пастернак)和阿赫玛托娃(А.А.Ахматова)。亨利·哈代在把这篇文章收入到《苏联的心灵：共产主义时代的俄国文化》(*The Soviet Mind: Russian Culture under Communism*)时，题目改为“斯大林统治下的俄罗斯艺术”(The Arts in Russia under Stalin)。对于这篇文章，伯林的传记作家伊格纳季耶夫这样认为：“这篇文章谦虚的题目与它宏大的目标并不相符：它相当于一部20世纪上半叶的俄国文化史，为注定不幸的阿赫玛托娃那一代人而作的编年史。它很可能是西方对斯大林发起的针对俄罗斯文化的那场战争的首次记载。在每一页上都有她以及茹科夫斯基和帕斯捷尔纳克向他讲述的他们在身受迫害的年代里亲身体验的痕迹。”^②1946年，伯林返回牛津以后，英国广播公司BBC以及许多大学都邀请他作演讲。在6月27日，伯林应位于查塔姆大厦(Chatham House)的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之邀，作了题为《为什么苏联选择隔离自己》(Why the Soviet Union Choose to Insulate Itself)的报告^③。这篇演讲稿经亨利·哈代整理后，收录在《苏联的心灵：共产主义时代的俄国文化》中。

1956年访苏结束后，伯林完成了《俄国文化的沉默》(The Silence in Russian Culture)和《苏联知识分子》(The Soviet Intelligentsia)的撰写，亨利·哈代将《俄国文化的沉默》[易名《在苏联的四个星期》(our Weeks in the Soviet Union)]，连同《苏联知识分子》[易名《苏俄文化》(Soviet Russian Culture)]收录在《苏联的心灵：共产主义时代的俄国文化》中。1958年9月，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在英国出版，并于当年12月获得诺贝尔文学奖。1958年12月21日，伯林在《星期日泰晤士报》(Sunday Times)上正式发表了对《日瓦戈医生》一书的评价，即亨利·哈代收录到《苏联的心灵：共产主义时代的俄国文化》中的《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Boris

① Isaiah Berlin, *The Soviet Mind: Russian Culture under Communism*, edited by Henry Hardy, Washington, D.C.: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2003, p.xxi.

② 伊格纳季耶夫：《伯林传》，罗妍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3年，第216页。

③ 同上，第230页。

Pasternak)一文。1965年秋天,伯林应邀为苏联诗人奥西普·曼德尔施塔姆(О.Э. Мандельштам)^①的诗歌文集的英译本写一篇书评,发表在1965年12月23日出版的《纽约书评》(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上。亨利·哈代以《一位伟大的俄罗斯作家》(A Great Russian Writer)为题收录在了《苏联的心灵:共产主义时代的俄国文化》中。

伯林的最后一次访苏(1988年)逗留时间最短,而且未留下直接的作品。1990年所写《不死的俄国知识阶层》(The Survival of the Intelligentsia)是他最后一篇关于俄国知识分子的文章,也可以看成是关于苏联知识分子的最后思考和论述。亨利·哈代把上述伯林关于苏联文化的文章整理成集,苏联解体之后,亨利·哈代就曾想将其出版,但是遭到伯林的反对,主要理由是不合时宜。^②伯林去世后,2003年,该文集以《苏联的心灵:共产主义时代的俄国文化》^③为书名出版。

本文试图将伯林三次访苏看作是苏联历史上的文化事件,从伯林的观察视角出发,理解和分析伯林的文本及其思想。^④

一、伯林视野:苏联文学与苏联政治的变迁

由于卫国战争期间和战争结束后的最初一段时间里,苏联政府对文学艺术和知识分子采取了比较宽松的政策,使伯林在第一次访苏期间,得以会见了一些著名的作家和诗人,其中与帕斯捷尔纳克(Б.Л.Пастернак)、阿赫玛托娃(А.А.Ахматова)的会谈给他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伊格纳季耶夫(Michael Ignatieff)认为:“他始终坚信对阿赫玛托娃的访问是他一生中

① 曼德尔施塔姆生于1891年,是俄国和苏联著名的诗人。他比较有名的著作有《阿里奥斯托》、《黄蜂的视力》、《希望反对希望》等,1938年病死于苏联集中营。

② Isaiah Berlin, *The Soviet Mind: Russian Culture under Communism*, pp.xix-xx.

③ 国内现有潘永强、刘北成的中译本,书名为《苏联的心灵:共产主义时代的俄国文化》(南京:译林出版社,2010年)。本文所涉及引文均出自英文版。

④ 关于伯林三次苏联之行,欧美学界基本没有专门研究,多是在关于伯林的传记中有所提及,并且语焉不详。如伊格纳季耶夫的《伯林传》(罗妍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3年)。中国学者潘小松在“伯林笔下的斯大林时期俄罗斯文艺”(《博览群书》,2001年第3期)中对此事作了简单的介绍。

最重要的一件事情。他在离开俄国的时候，心中满怀对苏联专制的憎恶之情，这种憎恶几乎在他后来为捍卫西方自由主义和政治自由而写的每一篇文章的字里行间都可以看到”。^①

伯林将苏联文学艺术的发展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1917-1936年，是苏联文学艺术缓慢发展的时期。第二阶段：1936-1945年，是苏联文学艺术艰难前行的时期。第三阶段：1956年开始的苏联文学艺术“解冻”的时期。^②

伯林认为，十月革命对俄罗斯文艺产生了强烈的影响，但是并没有抑制俄罗斯文艺的持续发展。十月革命给俄罗斯文艺的发展产生了很大的负面作用。但是，他并不是把这种负面作用归因于“左”的文化思潮，而是归因于国家层面的政府压制，或者说，他认为“左”的文化思潮是一种国家政府行为，是国家政权压制的结果。他认为，“严格的检查制度排斥了所有的作家和观念，除了那些经过仔细挑选出来的，并且禁止或者不鼓励与政治无关的艺术形式（特别是一些价值不大的艺术形式，如关于恋爱、神话和侦探故事，还有各种各样的小说和拙劣的文学作品），机械地把大众阅读的注意力集中到新的、实验性的作品上。”^③

实际上，20年代初的苏维埃政权一直在同“左”的文化思潮做斗争，强调美学的自由争论。列宁针对以波格丹诺夫（А.А.Богданов）为代表的“无产阶级文化派”（Пролеткульт）和以阿维尔巴赫（Л.Л.Авербах）为代表的“拉普派”（Рапповцы）的极左文艺路线，批评了他们的“把托尔斯泰（Л.Толстой）、普希金（А.Пушкин）丢到九霄云外”和建立“纯而又纯的”无产阶级文化的口号。“马克思主义这一革命无产阶级的思想体系赢得了世界历史性的意义，是因为它并没有抛弃资产阶级时代最宝贵的成就，相反却吸收和改造了两千多年来人类思想和文化发展中一切有价值的东西。只有在这

① 伊格纳季耶夫：《伯林传》，第226页。

② 俄侨文学史家司徒卢威（Г.П.Струве）将苏联文学史分为7个时期：1917-1921年是转变时期，1921-1924年是革命浪漫主义时期，1924-1929年是新文学出现的时期，1929-1932年是文学“穿上制服”的时期，1932-1941年是文学消沉时期，1941-1946年是文学为战争服务时期，1946-1953年是文学执行党的路线时期。参见 Struve G, *Russian Literature under Lenin and Stalin, 1917-1953*, 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 1971, pp.12-31.

③ Isaiah Berlin, *The Soviet Mind: Russian Culture under Communism*, p.2.

个基础上，按照这个方向，在无产阶级专政（这是无产阶级反对一切剥削的最后的斗争）的实际经验的鼓舞下继续进行工作，才能认为是发展真正的无产阶级文化。”^①教育人民委员卢那察尔斯基（А.В.Луначарский）在《苏维埃国家的艺术政策》中指出：“既不能称现实主义流派、也不能称未来主义流派为国家的流派。不能不顾暂时还没有强大到能发表其意见的无产阶级本身的意愿，宣称任何一个流派是真正无产阶级的，无论是包装一新但仍然混乱的结构主义，还是虽说是民粹派的、但同样需要极力照看的现实主义。这是一个最崇高的中立……”^②

但是伯林并没有认识到这一点，他把俄罗斯文艺得以继续发展的原因归结为，革命刚刚胜利，国家对政权的控制还较为宽松，各种派别的活跃促进了文艺的持续发展。伯林是一个自由主义者，崇尚的是多元主义价值观。他认为马克思主义是一元论的世界观，而以此为指导思想建立的苏联社会主义国家是一个极为专制的国家，必然要求一切文艺都要服从于政治、经济基础，成为国家的一种宣传工具。

伯林认为十月革命以后，在苏联文艺界产生了两大派别，一派是纯粹的艺术派，他们目睹了革命，并且认识到革命在反资产阶级中表现出来的粗暴的态度，因而主张文艺不受政治的限制，走纯艺术的路线；一派是政治派，他们主张所有的艺术家和知识分子都要服从十月革命所成就的社会和经济成果（亦即社会主义国家政权），文艺必须为政治服务。伯林称这一时期的文艺之争，“是在自由主义者或者某种意义上的无政府主义者与狂热的布尔什维克主义者之间展开的。”^③在两大文艺派的基础上出现了众多的文艺派别，它们之间相对自由的争论促进了20年代苏联文艺的繁荣。

伯林把1928年至1937年这一阶段苏联文艺的发展看作是逐步停滞、僵化的过程。他把斯大林对托洛茨基的清算作为苏联新的正统思想建立的标志，从这一刻起，国家开始控制了政治、经济及文化等所有领域。在文化领域，行政命令体制不断加强，使得苏联文艺遭到了严重的破坏，从而结束了

① 《列宁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99页。

② Луначарский А.В. Искусственная политика советского государства// Искусственная жизнь. М., 1924. № 10.

③ Isaiah Berlin, *The Soviet Mind: Russian Culture under Communism*, p.2.

20年代的繁荣景象。但伯林同时认为，苏联的文艺仍在缓慢地发展，一些优秀的作家仍在不停地创作，表达着一种自由的气息，虽然这种气息是非常微弱的。“有时，非正统的观念——它并非直接反对苏联官方的意识形态——传达了一种自由的气息，这在极度紧张的时期，为苏联日常单调的‘伙食’中添加了一些受欢迎的‘调味剂’。当然不能允许它走得太远，或者发生得太频繁，但是这种可能性的确经常出现，而且天才的作家们在一定程度上尽可能地发挥了他们的独创性，在不打破正统观念的框架或者不至于招致处罚和判刑的条件下，传达非正统的观念”。^①伯林显然注意到了在这一时期出现了一些较为著名的文学作品，如肖洛霍夫（М.А.Шолохов）的《被开垦的处女地》第一部（1932）、奥斯特洛夫斯基（Н.Островский）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1932-1934年）、阿·托尔斯泰（А.Толстой）的《彼得大帝》第二部（1934年）等。在马克思主义哲学领域，内部的争论仍是允许的，如哲学唯物主义者派别间的争论等。^②

1937-1938年是大清洗的高峰阶段，它彻底改变了苏联文学和艺术景象。国家政治对文学和艺术的干预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领导人的好恶成了对文学艺术作品的评价标准。伯林认为，大清洗是一场巨大的灾难，“这对于每一位苏联的作家和艺术家就像圣巴托罗缪的前夜一样——这是他们中的任何人都无法全部忘却的。”^③

1941年卫国战争爆发，再次改变了文学艺术领域的局面。所有的一切，包括文学艺术都服务于卫国战争。著名诗人阿赫玛托娃自十月革命后就被视为“垂死世界”的情绪的代言人，长期受到压制和打击，自30年代后，几乎从未公开发表诗作。但在卫国战争期间，阿赫玛托娃也参加了“苏维埃爱国主义”宣传活动，创作诗篇《起誓》（1941）、《勇敢》（1942）和《胜利》

① Isaiah Berlin, *The Soviet Mind: Russian Culture under Communism*, p.5.

② 在哲学界，主要体现在德波林学派（Школа А.М.Деборина）与其他学派之间的论争。在20年代中后期，该学派同“机械论者”进行了论争，并逐渐成长壮大起来，于1929年论战结束时达到了全盛时期。在30年代初，年轻哲学家米丁（М.Б.Митин）和尤金（П.Ф.Юдин）按照斯大林的口径，向德波林及其学派发出责难，指责以德波林为首的“哲学界领导”理论脱离实际，背离哲学的党性原则，应对哲学战线理论“落后实际的状况”承担领导责任。对于米丁等人的批判，德波林学派给予了有组织的反击。

③ Isaiah Berlin, *The Soviet Mind: Russian Culture under Communism*, p.6.

(1942-1945年)。阿赫玛托娃在自传中谈到她在这个特殊时期的感受：“1944年5月之前我生活在塔什干，我急切地搜罗着所有与列宁格勒、前线相关的消息。如同其他的诗人，我也常常到军队医院去慰问演出，为受伤的战士们朗读诗歌。在塔什干我第一次知道了，什么是酷热、树荫和水声。而且我还懂得了，什么是人类的善良”。^①阿赫玛托娃告诉伯林，她在1944年被批准离开塔什干回家途中，在莫斯科工艺博物馆举行了一次朗诵会。朗诵结束时，观众像对待民族英雄一样全体起立，对她报以热烈的掌声。她本人被这种敬意吓坏了，因为事后帕斯捷尔纳克告诉她，斯大林曾猜疑地问主管苏共中央意识形态工作的书记日丹诺夫（А.А. Жданов）：“是谁组织了这次鼓掌？”^②战后，阿赫玛托娃以前创作的诗集得以再版。1946年在莫斯科举办了阿赫玛托娃的诗歌朗诵晚会。根据这次晚会的参加者、著名作家西蒙诺夫（К.М.Симонов）的说法，阿赫玛托娃的诗歌取得了“令人目眩神移的、示威性的辉煌胜利”。^③著名讽刺作家左琴科（М.М. Зощенко）在1946年发表了《猴子奇遇记》，成为最受欢迎的作家。报章杂志争先恐后刊载他的作品，广播和舞台上纷纷演出他的节目，剧院抢着上演他的剧本。

在战争年代，他们创作了大量既具有艺术性同时又具有鼓舞性的作品，受到了人们和士兵的喜爱，他们的名字和作品也因此而广泛流传。战争结束以后，他们头上的光环还没有消退，仍然是人们追捧的对象。战后，帕斯捷尔纳克为自己的作品举行的朗诵次数比任何时候都要多得多，他告诉伯林，“当他在公共场所朗诵他的诗歌的时候，有时偶尔在某个词上有所停顿时，就会至少有几十个在场的听众立刻提醒他，准确地继续下去。”^④但是政府对他们的控制正在加紧，他们也感受到了这种气息。对于大众的追捧，他们没有表现出任何的喜悦，相反有一种恐惧。

伯林认为这些诗人的创作是不同于那些专为宣传而写作的官方作家的，他们的作品具有更多的艺术价值。“最好的战争诗人阿赫玛托娃和帕斯捷尔纳克，他们创作的源泉来自丰富的爱国情绪，但是这些艺术作品太具有艺术

① Ахматова А. Собр. соч. М., 1998. Т.3. С.26.

② 伊格纳季耶夫：《伯林传》，第205页。

③ Извести. М., 20.Мая. 1988.

④ Isaiah Berlin, *The Soviet Mind: Russian Culture under Communism*, p.13.

性而不能被认为是作为具有直接宣传价值的作品，而且他们的作品还因其宣传力度不够而受到党内官方作家的轻度反对。”^①阿赫玛托娃和帕斯捷尔纳克的诗歌创作是一种自由的创作，而没有完全受国家政策的导向，成为国家宣传的工具。这一点正是伯林所认可与称赞的。在伯林看来，文艺的创作必须是自由的，只有自由的创作才能产生好的艺术作品。

然而，1946年8月9日，斯大林在联共（布）中央组织局会议上就《星》和《列宁格勒》两杂志问题发表讲话，激烈批评了这两份杂志及其发表的具有“资产阶级”和“反苏维埃”性质的文章。8月14日，联共（布）中央通过《联共（布）关于〈星〉和〈列宁格勒〉杂志》的决议，在决议中明确宣布：“阿赫玛托娃是与我国人民背道而驰的、内容空洞、缺乏思想性的典型代表。她的诗歌充满悲观情绪和颓废心理，表现出过时的沙龙诗歌的风格，停留在资产阶级——贵族阶级唯美主义和颓废主义以及‘为艺术而艺术’这一理论的立场上，不愿与本国人民步调一致，对我国的青年教育事业造成危害，因而不能为苏联文学界所容忍”；“左琴科一直专门写那些空洞无物、庸俗无聊的东西，鼓吹腐朽的、无思想内容的、低级趣味的、不问政治的东西，妄图使我们的青年迷失方向，毒害他们的思想。左琴科最近出版的《猴子奇遇记》是对苏联生活方式及苏联公众的下流诽谤。左琴科丑化苏联制度和苏联人，把苏联人说成是野蛮落后、文化低下和愚蠢之极的人。”^②

同年8月15日，日丹诺夫在列宁格勒市党的积极分子会议上以极其苛刻但不文明的语言，称有“俄罗斯诗歌月亮”之称的阿赫玛托娃是“不知是修女还是荡妇，更确切地说，是集淫荡与祷告于一身的荡妇兼修女”（Не то монахиня, не то блудница, а вернее блудница и монахиня, у которой блуд смешан с молитвой）。^③中央宣传鼓动部为首的宣传机关立即开足马力，动用一切工具和手段来批判二人。阿赫玛托娃与作家左琴科立即被苏联作家协会开除。

伯林自然关注这一悲剧的过程，并且认为阿赫玛托娃的不幸遭遇与几个

① Isaiah Berlin, *The Soviet Mind: Russian Culture under Communism*, p.9.

② Яковлева А.Н. Документы ЦК РКП(б)---ВКП (б), ВЧК---ОГПУ---НКВД о культурной политике. 1917-1953. М., 1999. С.589.

③ Реквием / В 5 кн. / Вступ. ст. Р.Д. Тименчика.М., 1989. С.236-238.

月前与自己的会面有关。在伯林离开后不久，内务部人员非法进入阿赫玛托娃在列宁格勒的家，在她家的天花板上安装了窃听器，明目张胆到连掉到地板上的一小堆灰泥屑也懒得清理一下。在列宁格勒的安全机构总部，有三卷文件，一共 900 页，全是告发文件、电话窃听报告、从作品中引用的词语以及那些和她关系密切的人的口供。这些档案从 1939 年就有了，名为“隐藏的托洛茨基主义和反苏联姿态”。^①1946 年夏天，阿赫玛托娃感觉每次出门散步的时候，身后都有些模糊的影子紧跟着她。

伯林发现苏联政府对文学的检查制度越来越严厉，一切文艺活动必须遵循党的路线。伯林指出：“当书刊、戏剧或者其他‘文化现象’的评论家偶尔犯了错误，也就是说在某些特殊的地方偏离了党的路线时，对这一错误的纠正不仅仅是把错误的后果告知评论家，在内部解决，而且还要发表一篇相关的文章来回应这篇错误的评论，指出错误之处，并表明党的路线对此错误的态度。”^②伯林认为，在这种制度之下，苏联文学艺术陷入了完全沉寂。“纵观整个文学艺术，这儿弥漫着一股奇怪的气氛，所有的一切陷入了静止状态，甚至没有一丝风能够搅动这平静的水面。这也可能是下一次大浪潮来临前的寂静，然而在这儿看不到任何在苏联孕育出新的、原创性东西的信号。”^③

伯林认为，随着战争的结束，国家对知识分子的控制也越来越严格，这使得作家和艺术家做出了不同的选择，“有些人公开宣称忠实于国家机构，并伴有不同程度的认罪，声称他们这种绝对的忠诚不是因为他们必须这么做，而是因为他们才是真正的信徒（就像阿列克谢·托尔斯泰（Алексей Толстой）对他早期著名的小说《苦难的历程》的改写，因为这部小说最初有一个英国的英雄。还有他的舞台剧《伊凡雷帝》，事实上是为大清洗的辩护。）一部分人计算他们在多大程度上可以放弃，以承担国家宣传的要求，同时又有多少可以保留以维持个人独立的人格；还有一部份人试图保持对国家的一种中立的态度，既自己不节外生枝，也不希望自己遭到国家的压制，小心翼翼地不做任何‘犯罪’的事情，满足于自己没有报酬和不被承认的生

① 伊格纳季耶夫：《伯林传》，第 221 页。

② Isaiah Berlin, *The Soviet Mind: Russian Culture under Communism*, p.11.

③ Ibid, pp.15-16.

活与创作。”^① “在经历了百般的小心、每一步都要避开政府的非难之后，老一辈作家中最突出者仍然发现他们自己处于一种奇怪的状态之中，一方面他们成为读者崇拜的对象，另一方面在官方的眼中，他们是一半受尊重、一半受怀疑的对象；对年轻一代的作家而言，他们是被崇拜的对象，但是同时他们又没有被这些年轻一代的作家所正确理解。”^②

1956年的访苏之行，似乎从一开始就给伯林带来新的感受和期待。对于苏联50年代中后期的“解冻”，伯林有着他自己的理解和看法。他首先承认“解冻”思潮的确使苏联社会政治生活发生了一些变化，给苏联的文艺发展带来了一丝新的生机。但是，在伯林看来，这种变化并非本质上的，而只是表面上的变化而已，是政治统治方式上的一种暂时性的策略。^③他在1956年访苏联期间，在与一些作家和艺术家的谈话中感受到了这一点。伯林访问了苏联科学院“普希金之家”所长阿列克谢耶夫（А.Алексеев）。“阿列克谢耶夫教授说，一切要比斯大林时期好多了，他希望斯大林时代永远地结束了。然而，文学研究仍然受到压制，因为政府很明显偏好于自然科学，特别是物理，但这同1940-1953年相比较，已经是天堂了。……我问道，他是否认为诗人帕斯捷尔纳克和阿赫玛托娃的名誉可以得到恢复；他凝视了一会，看着另外一张桌子，说他不知道。气氛变得有点冷，不久我就离开了。”^④

伯林认为斯大林利用了马克思和黑格尔的辩证法，并把“权力”加入其中，形成了一种有利于自身统治的理论，他称之为“人工辩证”（the artificial dialectic）^⑤。伯林认为赫鲁晓夫的改革，正是这一路线的体现，是在斯大林高压政策之后的一个缓冲期。

伯林指出，从事不同文艺的知识分子所面临的境遇也是有所区别的。苏联政府针对不同的文艺家区别对待：“作家一般被认为是需要严加看管的人，因为他们从事的是思想这种危险的东西，他们也因此被禁止私下里与外国人进行个人接触。而较少具有思想的艺术家的，如演员、舞蹈家和音乐家们，他

① Isaiah Berlin, *The Soviet Mind: Russian Culture under Communism*, p.10.

② Ibid, p.13.

③ 伊格纳季耶夫：《伯林传》，第296页。

④ Isaiah Berlin, *The Soviet Mind: Russian Culture under Communism*, p.120.

⑤ Ibid, p.145.

们被认为较少受到观念力量的感染，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不受外国的影响。”^①这种区别对待对不同文艺的发展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国家对作家的严密控制，使得从事作家行业的年轻一代数量减少，其自由创作的能力也在减退。而从事芭蕾舞等艺术的年轻一代受到的影响相对较小。伯林认为，在列宁格勒的各大剧场，芭蕾舞的演出是生机勃勃、令人激动的，出现了一些有天赋的芭蕾舞演员。

伯林在 1956 年访苏时曾与帕斯捷尔纳克见过几次面。帕斯捷尔纳克将刚刚完成的《日瓦戈医生》交给伯林阅读，并告知他已经把这本书交给了一家意大利的出版社。帕斯捷尔纳克的妻子恳请伯林劝诫帕斯捷尔纳克不要在外国出版此书。帕斯捷尔纳克告诉伯林说，他完全理解伯林的劝说和家人的担忧，但是他清楚自己在做什么。随后，随着《日瓦戈医生》在国外出版，帕斯捷尔纳克也于 1958 年 10 月被开除出苏联作家协会。

二、伯林论苏联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关系

作为享誉国际学界的《俄国思想家》的作者伯林，对俄罗斯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关系问题当然非常熟悉。他认为俄罗斯文化的发展，与西方文化间的联系是分不开的。他非常清楚西方文化，特别是德国和法国文化，给俄罗斯文化带来的影响。

在伯林看来，在十月革命前后的一段时间里，俄罗斯文化仍然同西方保持着紧密的联系。他指出，“20 世纪前 25 年，是一个战争革命风暴的年代，在这一时期，俄罗斯文化——特别是诗歌（还有戏剧和芭蕾），主要受法国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还有德国的影响。”^②然而，伯林也注意到，随着苏联“文化革命”的逐步推进，随着 1926 年开始的政治和经济上的“大转变”，随着 1930 年代苏联党内政治和权力斗争以及随后开始的大清洗，俄罗斯文化最终被苏维埃文化所取代，俄罗斯知识分子最终被苏维埃知识分子所取代。斯大林和苏共不仅牢牢掌握了国家政治、经济、军事和社会管理权力，

① Isaiah Berlin, *The Soviet Mind: Russian Culture under Communism*, p.11.

② Ibid, p.1.

而且也建立了文化专制主义。

伯林在 1945 年和 1956 年的苏联之行中，深深地感受到了苏联文化同西方文化间的断裂。这种断裂首先反映在对西方观念的批判与排斥上。“西方的‘价值观念’——除非公开的反对苏联或者被认为是反动的，在过去一般不认为是很坏的，而且是任其发展的，主要掩饰在沉默中——而现在再次处于被攻击之下。”^①在哲学领域发起了对黑格尔哲学的批判与否定，并试图否认黑格尔哲学对俄罗斯思想的影响。“黑格尔——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包括列宁，都是把他作为先驱怀着虔诚的态度来对待的——现在和其他的浪漫主义时代（Romantic period）的德国思想家和历史学家，被指责为暴力的化身，法西斯主义的胚胎和泛德意志主义，从他们的身上，俄罗斯没有学到任何东西，而且他们对俄罗斯的影响——这一点是不可能完全被埋灭的——已经太多了而且是有害的。”^②

伯林认为苏联文化同西方文化的断裂最明显地体现在文学艺术领域。在伯林同苏联作家的谈话中，都会谈及西方的作家、侨居国外的俄国作家以及西方文艺的状况，而伯林无不为他们对西方文学的无知而感慨。伯林发现，在苏联很少有西方的文学著作出版，“所有同我交谈过的作家都央求我提供英文书籍，他们说这种书籍通过苏联对外文化关系协会是很难得到的。”^③在伯林 1945 年到达苏联后的第一次宴会上，他遇见了苏联儿童文学家茹科夫斯基（К.Жуковский）。茹科夫斯基向伯林表达了他对西方文学的喜爱，并对伯林坦白说，“自己渴望能拥有特罗洛普（Anthony Trollope）的自传。他的朋友、前外交部长的妻子利特维诺娃（Литвинова）也同样喜爱特罗洛普，但是她觉得写信到英国去要他的书太冒险了，因为所有与外国的联系都会遭到强烈的怀疑。”^④西方文学在苏联鲜有出版与人们对西方文学的渴求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苏联作家告诉伯林，他们对英语文学的了解主要是依靠那些可以翻译的

① Isaiah Berlin, *The Soviet Mind: Russian Culture under Communism*, p.12.

② Ibid, p.13.

③ Ibid, p.35.

④ Isaiah Berlin, *Personal Impressions*, edited by Henry Hardy, London 1980, edited by Henry Hardy, Washington, D.C.,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2003, p.167.

著作以及苏联对外文化关系协会（БОКС）允许可以提供给个人的著作。哪些著作可以翻译以及哪些书籍可以提供给个人，这都是由国家文化部门确定的，而国家在进行选择时，首先考虑的是这些书籍是否同他们的意识形态和政策一致，或者说是否无害于他们的思想体系。因此，进入苏联的西方文学以及为苏联人所了解的西方作家都是经过苏联政府精挑细选的，可以说都是苏联政府的“友人”。这样的结果是明显的。“就拿在列宁格勒来说，弗吉尼亚·伍尔夫（Virginia Woolf）和爱德华·福斯特（Edward Forster）还尚未为人所知，但人们都已经听说了沃尔特·格林伍德（Walter Greenwood）。外国书籍的来源在莫斯科，但他们即使在那儿也很难得到。”^①正如伯林所说，“一些国外的经典作家，像杰克·伦敦（Jack London）、厄普顿·辛克莱（Upton Sinclair）和普里斯特利（J.B. Priestley），进入了苏联的殿堂，是由于政治上的原因而非因为文学上的卓越。”^②

苏联政府对西方访客的态度使得苏联作家尽量避免与外国人接触，因为这有可能给他们带来很多的麻烦。当然，“与外国人公开的接触一般不会招致怀疑或者迫害（虽然这经常遭致内务部的审问），但是这种情况更加使作家感到畏怯，特别是那些自己的地位还不够安全、还没有成为党的路线的代言人的作家，他们尽量避免可能发现的其个人与外国人的会谈，即使是由苏联主办方邀请的参观者——共产主义者和志同道合者——这些来苏联的参观者被确认是可靠的。”^③在莫斯科，伯林参加了许多官方组织的聚会，与会的作家和艺术家在谈话中都是很小心仔细的，生怕说错话而招致迫害。伯林应邀前去与官方的一位诗人谢尔文斯基（И.Шервинский）见面，谢尔文斯基刚刚因为天真地建议应当以社会主义的浪漫主义来补充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而受到了官方的斥责。伯林在回答谢尔文斯基的提问时没有提及沃尔特·格林伍德的《靠施舍的爱情》以及其他一些欧美的工人阶级文学作家，而是称伍尔夫的作品具有永恒意义时，伯林感觉到一阵寒意充满了房间。谢尔文斯基立即用激烈的语气大声解释：苏联作家之所以总是规规矩矩地遵照党的指示行事，“是因为我们发现每当我们偏离了党的指导的时候，结果总

① Isaiah Berlin, *The Soviet Mind: Russian Culture under Communism*, p.38.

② Ibid, p.12.

③ Ibid, pp.11-12.

是党是对的，而我们是错了。”伯林意识到，谢尔文斯基的话是说给麦克风听的。^①

而在列宁格勒，情况要好一些，伯林得以同苏联作家近距离接触。他写道：“列宁格勒的人们看起来要比莫斯科的人贫困，我所看到的作家们远没有他们在莫斯科的同伴那么富裕，他们的外表和语气也显得更加悲伤和疲惫。然而另一方面，他们在政治上的生活则要轻松得多。我在列宁格勒并没有遭到任何人的跟踪，并且与苏联人民的接触要比在莫斯科容易得多。长达三个夜晚，我都和作家们呆在一起，其中一个最胆小的作家告诉我，他在莫斯科很小心地避免同外国人接触，而在列宁格勒则不需要这么小心。”^②在那儿，伯林认识了当时一些有名的文学家，其中收获最大的就是同著名诗人阿赫玛托娃的几次会面。对于莫斯科和列宁格勒的这种区别，伯林归结其原因为：“目前这种自由的交往，可能是因为没有任何国外的机构设在这儿，从而使得监视工作（监视那些从阿斯托里亚饭店^③的封闭的大门出来的人）变得相对简单了，这就使得官方放松了警惕。”^④然而伯林与阿赫玛托娃的会面最终被政府知道了，阿赫玛托娃的命运因伯林的拜访而再次受到打击。1949年，继1946年被开除出苏联作家协会之后，阿赫玛托娃的儿子古米廖夫（Л.Н.Гумилев）也被捕了。

三、伯林论旧（俄国知识分子）与新（苏维埃知识分子）^⑤

伯林是对知识分子概念和俄国知识分子思想有绝对发言权的学者。伯林

① Isaiah Berlin, *Personal Impression*, p.168.

② Isaiah Berlin, *The Soviet Mind: Russian Culture under Communism*, p.31.

③ 阿斯托里亚饭店（Astoria Hotel/Отель «Англетер»）曾经是列宁格勒最有名的宾馆，在苏联时期专门对外国人开放。

④ Isaiah Berlin, *The Soviet Mind: Russian Culture under Communism*, p.40.

⑤ 在国内学术著述中，“苏联知识分子”与“苏维埃知识分子”概念常常被混用，其实两者间存在相当大的区别。“苏联的”（СССР/USSR）通常指代政体，体现的是国家概念；“苏维埃的”（Советский/Soviet）通常指代国体，包括强烈政治含义。因此，准确地讲，“苏联知识分子”的概念宽泛，包含了苏联境内各种职业和政治倾向的知识分子，乃至苏联政府的持不同政见者；“苏维埃知识分子”概念内涵较窄，专指拥护苏联共产党和苏联政府领导、坚持社会主义信念的知识分子。

对于 19 世纪的俄国知识分子有很高的评价：“就其善于言论的知识阶层视之，他们是世人夸张而失实的十九世纪西方人；他们远非动辄流于不理性、远非以神经质的自我专注为能事之流；相反，他们拥有极端发达的推理能力、拥有极端的逻辑与清明——非但有之，而且可谓过分。”^①除此之外，这些知识分子对政治和道德问题的关注尤其令伯林感到敬佩。因此，他特别强调：“‘知识阶层’（Intelligentsia/Интеллигенция）为杜撰于十九世纪的俄国字，如今已有通行世界的意义。我想，这现象本身，连同其历史后果，以及其名副其实的革命后果，是俄国对世界上的社会变化的最大一项贡献。”^②而俄国“知识阶层在历史上是指围绕某些社会观念而联合起来的人。他们追求进步，追求理智，反对墨守传统，相信科学方法，相信自由批判，相信个人自由，简单地说，他们反对反动，反动蒙昧主义，反对基督教会和独裁主义的政权，他们视彼此是为共同事业（首先是为人权和正当的社会秩序）而奋斗的战友。”^③

在这样的视野下，伯林将旧（俄国知识分子）与新（苏联知识分子）作比较。他认为，在苏联没有知识分子，“因为他们不是真正的知识分子。他们只是有文化修养的人，并无特定的道德或政治色彩。然而尽管有着重重阻挠，知识分子还是在俄罗斯和其他共和国中残留下来了。这真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他们是旧的开化而仁慈的知识分子的真正传人。萨哈罗夫（А.Сахаров）是知识分子的典型代表，他的声音就是赫尔岑（А.Герцен）及其伙伴们的声音，经历了那些可怕的年月而奇迹般地保留了下来。”^④

在伯林看来，在苏联时期，国家对知识分子，特别是从事文艺、思想性创作的分子，持一种不欢迎的、甚至是厌恶和仇恨的态度。伯林认为，“斯大林对待观念、知识分子以及知识分子的自由，表现出了一种复杂的心理，它混合了恐惧、冷嘲蔑视和残忍的脾性。这种奇怪的、令人感到羞辱的姿态使得苏联公民以及国外公民感到自身卑下，不自觉地成了畏缩的一群

① 伯林：《俄国思想家》，彭淮栋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1年，第154页。

② 同上，第144页。

③ 贾汉贝格鲁：《伯林谈话录》，第166页。

④ 同上，第168页。

人。”^①他并且认为斯大林的这种态度被后来的赫鲁晓夫所继承，并为之辩护，依据是当一个旧的政权被打破、而一个新的政权刚刚成立时，是没有时间去考虑艺术、文学和观念这类事情的。苏联政府对知识分子的压制，促使了知识分子的分化，大部分的知识分子屈从于国家政权，成了国家的宣传工具。这也就是伯林所说的知识分子在苏联消亡的原因。

伯林认为帕斯捷尔纳克、阿赫玛托娃是苏联知识分子中的异类，因为在他们身上保留着俄国知识分子的部分品德和美德——关注于社会现实和道德问题，注重艺术创作的独立性和独创性，在高压的苏联政治生活中坚守自己的个人自由和信念。但是这样的知识分子在苏联知识分子中仅为极少数，伯林对他们是认同的，因为这些人身上所具有的自由气息同他自己的自由主义思想是相通的。而伯林对于在新政权下诞生的新一代知识分子（或者说是具有文化修养的人，因为按照伯林对于知识分子的定义，他们中的很多人并不能归于“知识分子”这一概念），总体上是持一种否定和悲观的态度。因为，这些知识分子身上带有的浓烈的对国家政权的服从乃至谄媚的气味让他深恶痛绝。伯林认为，在新一代知识分子中，也出现了一些不畏国家政权、敢于批评时政、秉承传统知识分子美德的知识分子，如萨哈罗夫、索尔仁尼琴（А.Солженицын）等人。伯林对这些人赞赏的，称他们为传统知识分子的继承人。这说明，伯林对新、老知识分子的区分并不是绝对的，并不是根据他们的年龄，而主要是根据他们的思想和观念的不同。

伯林认为，苏维埃政权建立之初，新政权与旧知识分子之间形成了一种十分微妙的关系：由于苏联刚刚成立，新的知识分子还没有培育出来，不得利用旧社会遗留下来的知识分子。但同时，正是由于这些知识分子是旧社会的产物，其观念和思想同社会主义的观念存在着差异，政府害怕这些人对新生的政权产生危害，因而政府对这一批人是不信任的；而其中的一部分作家和艺术家也对革命和社会主义存在种种顾虑。针对这种情况，苏联政府在当时采取了积极的措施，尽量把这些人争取到社会主义阵营中，并为其服务。其中当然经历了许多波折，从开始错误地对待，到1925年联共（布）中央制定《关于党在文学方面的政策》，提出正确地对待“同路人”，作家和艺术

^① Isaiah Berlin, *The Soviet Mind: Russian Culture under Communism*, p.144.

家则努力地适应和接受苏联社会主义，但与此同时，他们仍对其保持着警惕和距离。随着新生知识分子数量的增加和质量提高，国家依靠的中心转移到了新知识分子身上。同时，旧知识分子基本上也都承认了社会主义政权。

伯林认为，在行政命令体制的严密控制之下，老一辈作家的创作自然而然地受到政治不确定性和他们所生存环境的影响。在这种环境之下，老一辈作家的创作陷入了被动与低潮，“一些人偶尔会打破完全的静寂，写一篇抒情诗或者一篇批评性的文章，其他的则拿着退休金，胆怯地生活在沉默之中，住在政府提供他们在城镇或农村的房子里。一些人已经从事对政府来说无破坏性的创作，如儿童诗歌和打油诗；像茹科夫斯基的儿童诗就具有很高的才能，可以与爱德华·利尔(Edward Lear)相比较。普里什文(М.М.Пришвин)继续从事着——在我看来是——优秀的动画故事。另一条逃亡之路是对艺术作品的翻译，在这一领域目前出现了很多俄罗斯天才。”^①在伯林看来，这些老一辈作家创作的没有政治色彩的作品同样是非常出色的，具有非常高的艺术价值。

伯林认为，苏联的文艺创作受到了政治上的影响，文艺的创作路线必须要同国家的政治路线相一致。老一辈作家对当时的政治高压是很不满的，他们继承了传统知识分子的美德，对现实保持着清醒的头脑，具有独立的思想和社会道德素质，因而他们的创作必然是对现实的思考与批评，而这无疑是同国家的路线唱反调的。在国家政权强有力的压制之下，他们无力对抗，但是他们并没有与现政权妥协，他们的文学创作没有跟着党的政治走，而是选择了沉默，转向了无政治色彩的文艺作品的创作。相反，那些在苏联社会主义政权下诞生的新知识分子，他们对社会主义政权和政治路线更多的是一种认同感。在文艺创作方面，他们基本上是紧跟国家路线的，但就文艺作品的艺术性来说，他们就远远逊色于老一辈作家和艺术家了。

对新一代苏联作家的创作水平，伯林持否定的态度。他认为，新一代作家所进行的文艺创作缺乏独立的思想，在文艺的创作上，紧跟国家的政治路线，失去了文艺创作的多样性和现实批判性，导致大多数的作品千篇一律，内容空洞。这些作品的区别仅仅只是体现在不同的写作技巧和技艺上而已。

① Isaiah Berlin, *The Soviet Mind: Russian Culture under Communism*, p.14.

伯林谈到了在战后出现的一批作家的创作情况。他说，“战争为文学创作提供了新的素材。战后涌现出了一大批温顺的、天真的、多产的作家，他们把那种粗俗的、僵硬的官方思想融入到一种可行的写作技巧中，即比较灵活、生动，一种生动、活泼的报告文学。这种方法可以运用到诗歌、散文、小说和戏剧等创作之中。”^①伯林列举了一些运用这种写作方法取得成功的实例，“在这一类型中最为成功的、最具有代表性的人物是记者、剧作家兼诗人西蒙诺夫（К.М.Симонов），他创作了大量劣质的但是在政治思想上没有任何错误的作品，歌颂正面的苏联英雄：勇敢、纯洁、直率、高贵、无私，把所有的一切奉献给他的祖国。在西蒙诺夫的背后，还有其他相同类型的作家，在集体农庄、工厂和政治前沿进行着探索和创作的小说家、从事爱国主义打油诗和戏剧的作家——他们的作品嘲弄资本主义世界和俄罗斯本身具有的古老的、不足信的自由主义文化，相反歌颂如今这种单一的、标准化的文化，歌颂代表粗暴的、热心的、绝对的、唯一的年轻的工程师或者政治代表（人类心灵的工程师）或者军事领袖的典型，所有的一切都被强烈的爱国情绪所包围，还有对无畏的、纯洁的、勇敢的年轻妇女的赞美，因为所有五年计划的成功是与她们分不开的。”^②伯林认为这些年轻一代的作家或者说无产阶级作家的的工作就是歌颂社会主义，粉饰美好的现实生活，对苏联政治的缺陷和苏联社会的矛盾缺少正确的认识，或者说不敢对真正的现实生活作出反映。

对于新、老一辈作家之间的差异，伯林断言：“没有一个国外的关于俄罗斯文艺现象的观察者不为老一辈作家和新一代作家间的沟壑所震惊。老一辈的作家是忠诚的但忧郁的，对于稳固的政权没有丝毫的危险；新一代的作家的创作要比思想本身更迅速，不知疲倦地练习相同的模式和格式，这些是用不着思考的，他们从来也不会受到任何的怀疑，不管是作为艺术家还是作为一名公民。”^③

伯林在与老一辈作家交谈时，老一辈的作家并没有掩饰他们对现代文学的批评与看法，“这些尽责但平庸的现代文学呈现一种批量生产的趋势，文学如同海报一样多，这对艺术而言是很严重的。这种发展并没有受到批评，

① Isaiah Berlin, *The Soviet Mind: Russian Culture under Communism*, p.16.

② Ibid.

③ Ibid.

反而由于国家的要求,这种趋势还会像蘑菇丛生般地继续发展下去。”^①当然,老一辈的作家也并非全然否定新一代作家,他们也承认,在年轻人(45岁以下)中也发现了一些有造诣的、具有创造性的作品。

老一辈的作家对现代文学的批评主要是从两个方面进行的。第一,从文学的艺术性上。这种评论和批评是被允许的、可以公开发表的。老一辈作家认为,现代文学,特别是战争文学,在艺术的表达上过于粗糙,“战争英雄们应当得到更加敏感、更加新颖的分析和描述;战争的经历是一个丰富的国家经历,这种经历只有用更加热情的、更加敏感的和细心的艺术表达方式才能得以抒发,然而目前出版的关于战争的小说,大多是粗糙的仿制品和关于对战士和市民骇人听闻的伤害的描述。”^②第二,从政治根源上对这种现象的一种解释。这种评论是不允许公开发表的,只能是私底下的交谈。老一辈作家认为,造成目前文学现象的原因在于官方意识形态的压制,对文艺的创作规定了僵硬的路线。就拿对英雄的歌颂来讲,官方对英雄的概念简单化,把这些英雄定性为没有任何个人感情,所做的一切都是奉献与牺牲,“从这种简单的、标准化的对英雄进行歌颂的正统思想中,是无法创作出任何优秀的作品的。”^③

伯林注意到,在苏联高度集中的文化体制之下,新、旧知识分子对国家的态度、对文艺创作理念的不同,也导致了他们自身命运的千差万别。新一代的知识分子总体上是倍受国家器重和保护的群体,特别是其中从事科学和技术工作的知识分子,他们的经济和政治生活也是相对富足和稳定的。伯林指出,“年轻的作家在经济上得到了丰厚的回报,在政治上没有受到任何批评的责难。而且,他们还收获了各种荣誉,在西方国家,他们被认为是苏联的畅销书作家。”^④而老一辈知识分子的命运要悲惨得多。他们在政治上遭到政府的怀疑和监视,在经济上陷入困顿。伯林在与阿赫玛托娃的对话中深刻地体会到了这一点。在伯林与阿赫玛托娃那一次深夜的交谈中,阿赫玛托娃向伯林描绘了她的儿子和丈夫,她用一种平淡的声音讲到自己在监狱门口

① Isaiah Berlin, *The Soviet Mind: Russian Culture under Communism*, p.17.

② Ibid.

③ Ibid.

④ Ibid, p.18.

的守夜，讲到丈夫和儿子在政府刑讯人员那里所受的折磨。她对伯林说道：“没用。你是从人的社会里来的，我们在这儿却被人之间的高墙所隔绝，而且……”^①当交谈进行到凌晨三点时，阿赫玛托娃的儿子古米廖夫回到了家，他走进小厨房，在一个盘子里找到了一点煮土豆。这让阿赫玛托娃感到很尴尬，因为她没有什么其他的東西可以招待客人。^②这个插曲给伯林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

四、简短结语

苏联作为一个政治制度与意识形态迥异于欧美资本主义国家的存在，始终被上述国家视为“恐怖的”的异类。但是苏联鲜明的革命经验和政治理念也使其自立国之初就被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被压迫和被奴役的国家和民族视为“希望的”的圣地。因此，自20世纪20年代中期起，来自东方与西方国家的各类访苏者即呈络绎不绝之势，甚至出现了引人注目的“访苏现象”。

20年代中期至50年代初，是世界性“访苏现象”的第一个高峰期。各国人士纷纷来到这个曾经被视为“洪水猛兽”的异己国度，试图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残垣断壁的背景下，或者在1929-1933年世界经济大危机的背景下，或者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硝烟甫息的背景下，去寻找“一块让人类再次得救的新大陆”^③，寻找“一种新的精神境界”，寻找“人类精神的新方向”^④。其中以各国知识界人士居多，而且留下了许多访苏的观感。这里有瞿秋白（1922-1923年访苏，著有《饿乡纪程》和《赤都心史》）、胡愈之（1931年访苏，著有《莫斯科印象记》）、曹谷冰（1931年3-6月访苏，著有《苏俄视察记》）、茅盾（1946年12月至1947年4月访苏，著有《游苏日记》、《苏联见闻录》和《杂谈苏联》）；本雅明[（Walter Benjamin），1926年访苏，著有《莫斯科

① 伊格纳季耶夫：《伯林传》，第211页。

② 同上，第212页。

③ 埃德加·莫兰：《反思欧洲》，康征、齐小曼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第27页。

④ 皮埃尔·勒巴普：《纪德传》，苏文平等译，上海：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01年，第368页。

日记》]、泰戈尔[(Rabindranath Tagore, 1930年9月访苏联, 著有《俄罗斯书简》]、罗曼·罗兰[(Romain Rolland), 1935年6月访苏, 著有《莫斯科日记》]、安德烈·纪德[(André Paul Guillaume Gide), 1936年5月访苏, 著有《从苏联归来》]、埃德加·斯诺[(Edgar Snow), 1942年访苏, 著有《战时苏联游记》]、沃尔特·格雷布纳[(Graebner Walte), 1942年5-6月访苏, 著有《从俄国旅行归来》]等等。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 苏联作为支撑反法西斯战线“半壁江山”的同盟国的重要一员, 其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升至顶端, 而斯大林的政治地位和个人魅力也如日中天。苏联成为战后一片残垣断壁中巍然矗立的大厦, 再次成为各国各类人们竞相朝拜的“圣地”或疑惑不解的“中心”。苏联作家爱伦堡于1946年应邀访问美国, 在大学、群众集会和官方场合发表演讲, 所到之处受到美国普通老百姓的热情欢迎。而且爱伦堡从苏联驻美国大使馆领事处得知, 已经收到十万余份美国公民赴苏旅游和移民苏联的申请。^①伯林也正是在这一背景下, 开始了他的第一次访苏, 然后在浓厚的俄国情结和关注苏联的情绪影响下, 继续进行了第二次和第三次访问。

值得注意的是, 伯林三次苏联之行恰好“选择”或“巧遇”了苏联历史发展的关键时刻。即, 1945年: 卫国战争胜利甫至, 苏联急需全面重建, 苏联美国之间尚存盟友情谊; 1956年: 苏联批评斯大林的浪潮刚起, 政治、社会和思想领域的“解冻”初兴; 1988年: 戈尔巴乔夫改革进入举步维艰的第三个年头, 政治危机、经济危机、民族危机和信任危机全面显现。伯林的三次苏联之行, 留下了大量关于苏联知识分子和苏联文化的论述, 尽管并不系统和散见于各类演讲、随笔和文集之中, 但是极具价值。因为它是对俄国知识分子问题素有学养、与苏联知识界代表人士关系密切、并且熟练掌握俄语的伯林所作, 从一个较长的时段对苏联知识分子和苏联文化进行了观察和研究。

作为一个西方自由主义学者, 伯林用自由主义的眼光来分析苏联文学和艺术, 从而形成了独特的理解和认识。他对苏联的文学和艺术状况总体上持

^① 爱伦堡:《人·岁月·生活——爱伦堡回忆录》, 冯南江等译, 下卷, 海口: 海南出版社, 2008年, 第415页。

否定的态度，不仅仅是因为苏联文学和艺术的发展在政府的压制下，在意识形态的禁锢下，陷入了低潮，还因为苏联文艺在种种的限制与压制之下，艺术的目的发生了变化。伯林的自由主义艺术观在他对苏联文学和艺术的认识过程中起了很大的作用。从自由主义的立场来看，伯林认为，“消极自由”才是真正的自由，即人拥有不受他人干涉而行动领域，是“免于……的自由”。这种自由是个人对个人以外的干涉力量（主要是国家，但道德、社会舆论的干涉也很重要）持否定态度，在个人与国家、社会之间厘清界限（这个界限随着历史的变迁是有伸缩性的），为个人保留一个国家或社会力量绝对不允许干涉的“私人领地”。这一观点在艺术活动中的具体表现，就是艺术创作也需要一个属于自己的空间，而不受外界干涉。如果艺术活动受到外界的干扰，或者说为艺术本身之外的东西所支配，那么这种艺术活动就是非自由的，其本质就会异化。

然而，伯林并非简单地赞成“为艺术而艺术”的观点。他并不反对艺术具有责任。他认为“艺术不是新闻，艺术不是道德说教。但并不是说因为它是艺术，它或者艺术家就可以不负责任。”^①伯林在研究俄国知识分子时，“最关心该知识阶层所提出的社会与道德问题、他们所寻求解决的困境。”^②然而，伯林强调指出，文艺可以、而且应该关注道德和社会问题，但是并不能因此而失去艺术本身的性质。他认为，19世纪的俄国知识分子很好地解决了这一问题，使得艺术在关注社会和道德的同时，没有失去自身，沦为功利主义的艺术。批评家别林斯基（В.Г.Белинский）把一切严肃的问题最终都归结于道德问题，在他的著作中充满了对道德和社会问题的关注。但伯林认为，别林斯基并没有把道德问题同艺术相混淆，“无论别林斯基偶尔多么接近于要求艺术放弃其固有目的为其他需要服务，他也从未将艺术和任何种类的道德更不用说舆论宣传相混淆。在这一方面，车尔尼雪夫斯基（Н.Г.Чернышевский）和杜勃罗留波夫（Н.А.Добролюбов）、普列汉诺夫（Г.В.Плеханов）及苏联评论家们只是从他那里取他们之所需，事实上歪曲了他的形象。”^③

① 以赛亚·伯林：《现实感》，潘荣荣、林茂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4年，第245页。

② 以赛亚·伯林：《俄国思想家》，第2页。

③ 以赛亚·伯林：《现实感》，第250页。

俄国的知识分子极为关注道德问题，伯林认为，这些俄国人的态度，“是一种特别属于道德的态度；他们的人生态度与他们的艺术态度相同，而诘其底蕴，这态度是一种道德态度。这态度，我们切勿与功利的艺术概念混淆。”^①伯林认为，在苏联的政治制度之下，文学艺术成了一种实现最终目标的手段，而失去了其本身的特性。

伯林三次苏联之行及其对苏联知识分子和苏联文化的认识，完全体现了他作为一个西方自由主义者的性格，并从中可以领悟到他的自由主义观。伯林从其自由主义观出发，认为苏联时期的文化形成了一种僵化的模式，知识分子处于一种被压制、乃至被迫害的状态。而这反过来又促使他更加坚定了他的多元论和自由主义观念。如果说伯林的政治哲学论著从理论上阐述了他的自由主义观，那么伯林对苏联文化的认识可谓是对他的自由主义观的一个很好的诠释。

当然，伯林自童年所形成的对俄国（苏联）的痛苦记忆和西方文化与精神体验的积累，使他自然而然地以批判的眼光看待苏联政治和苏联文化，乃至他的观察和分析在某些方面存在着误解与误读。再加上他一生信奉的“消极自由”（Negative Liberty）的自由主义立场的影响，使他对于一切政府和权威都持不妥协的态度。正因为如此，伯林的思想方显出异于常人的宏大价值。在苏联解体二十年后的今天，在思考苏联社会主义失败这个宏大的问题时，伯林的思想与思路或许可以给我们提供一些有价值的借鉴。

【Abstract】Isaiah Berlin visited Soviet by 1945,1956 and 1988, the history of Soviet has made a big change at that time. When Berlin went to Soviet, he concentrated on culture and art, survival of intellectuals, the condition of their academic productivity and relationship between government and intellectuals, and then analyzed and criticized them in depth with conception of liberalism

【Key Words】 Isaiah Berlin, Soviet culture, intellectual, Soviet Idea

【Аннотация】Исайя Берлин посещал СССР в 1945, 1956 и 1988 годах, как раз во времена наиболее важных моментов исторического развития

① 以赛亚·伯林：《俄国思想家》，第160页。

СССР. Где бы Берлин ни был, он везде старательно изучал культуру и искусство СССР, ситуацию существования и творчества интеллигенции, отношения интеллигенции и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а, а также на основе теории «либерализма» ещё глубже проводил анализ и критику своих исследований.

【Ключевые слова】Исайя Берлин, советская культура, интеллигенция, советское мышление

(责任编辑 韩冬涛)

哥萨克的起源与社会属性分析

一种哥萨克学的研究视角*

杨素梅**

【内容提要】20世纪末,随着苏联的解体,哥萨克问题成为俄罗斯社会焦点之一,哥萨克研究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并形成一门新的学科:哥萨克学。由于诸多因素,目前国内哥萨克学的研究尚不充分,对哥萨克的认识比较粗略和模糊,特别是关于哥萨克的起源和社会属性问题。这种状况制约了对哥萨克历史、文化、文学等方面的研究。哥萨克的起源和社会属性问题是哥萨克学研究首要解决的问题,也是学者争议比较大的问题。系统地研究这两个问题,可以为进一步研究哥萨克学提供基础性学术资料。哥萨克学也可以为俄罗斯研究提供一个新的视角。

【关键词】俄罗斯哥萨克 哥萨克学 起源 社会属性

【中图分类号】K512.5**【文章标识】**A**【文章编号】**1009-721X(2012) 03-0090-(13)

在俄罗斯历史中,哥萨克(казак/казачество)^①是一个独特的社会角色。时至今日,具有自己的历史和文化特征的哥萨克已经成为俄罗斯一个典型的

* 本文是2012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16至20世纪20年代俄罗斯哥萨克历史研究”(项目批准号:12BSS026)、2012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俄罗斯哥萨克历史与文化研究”(项目批准号:12YJA850024)的阶段性成果。

** 杨素梅,河南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河南大学世界历史研究所兼职研究员,历史学博士。

① 在俄语中,“казак”与“казачество”均译为汉语“哥萨克”。前者指作为单个的哥萨克人,后者指作为集体的哥萨克社会群体,哥萨克亚民族。

亚民族^①。历史上，哥萨克主要生活在东欧、中亚、俄罗斯南部欧亚草原、高加索、西伯利亚等地区，其中以俄罗斯哥萨克最具代表性，数量最多。对于中国学者来说，在没有特别指出的情况下，所谈论的哥萨克，一般指俄罗斯哥萨克。在俄罗斯历史中，哥萨克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受到俄罗斯各界人士的高度评价。俄罗斯文学大师列夫·托尔斯泰指出，“哥萨克创造了俄罗斯”，^② 俄罗斯总统普京也认为，“无论古代的俄罗斯，或是现代的俄罗斯，如果没有哥萨克是无法想象的。”^③在俄罗斯、欧美等国，关于哥萨克的研究已取得丰硕的成果。而在中国，虽然大家都十分熟悉哥萨克这个名字，但对哥萨克的研究，特别在哥萨克历史和文化方面，尚十分不足，导致对哥萨克的认识比较粗略和模糊，甚至造成错误的判断。譬如，哥萨克起源于16世纪俄国逃役农奴？哥萨克是一个民族？针对国内这种研究现状，本文拟对哥萨克学的兴起，以及在哥萨克学研究中比较引起学者争议和模糊的两个基本问题，即哥萨克的起源与哥萨克的社会属性问题，加以分析和探讨，为国内学者进一步研究哥萨克学提供基础性的学术资料。

一、哥萨克学的兴起

1570年自由顿河哥萨克作为一个军事团体被俄国政府承认，至今俄罗斯哥萨克经历了四百多年的历史发展。作为一个社会群体，哥萨克生活于特定的历史时期和特定的地域。自16世纪，随着莫斯科公国的壮大及其不断地向南、向西、向东殖民扩张，哥萨克就成为莫斯科公国的雇佣军，俄罗斯帝国侵略扩张的工具、马前卒。哥萨克为俄罗斯帝国的建立立下汗马功劳。

① 亚民族，即“民族的地域文化分支通常称为民族分支，或称亚民族。民族分布可能同方言分布地区相一致，但有例外。在每个民族群体内，有可分为若干规模较小并具有各自文化生活特点的民族分支。这种第二层的民族分支有：白海沿岸地区以捕鱼和航海为业的波莫尔人或顿河、库班河、捷列克河、乌拉尔河、谢米列契地区、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各个哥萨克人群体。”参见 [苏]尼·切博克萨罗夫，伊·切博克萨罗娃：《民族·种族·文化》，赵俊智、金天明译，北京：东方出版社，1989年，第32页。

② Толстой Л. Н. ПСС. в 90 томах (1928-1958). Т.48. Москва: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е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1952. С.123.

③ 转引自：Агафонов О.В. Казачьи войска России во втором тысячелении. Москва: Кировская областная типография, 2002. С.3.

但同时，哥萨克因不满俄国的压迫，为了捍卫自己的自由和权利而不断起来反抗，其中影响最深的是 17、18 世纪由哥萨克领导的几次规模比较大的农民起义。自 18 世纪，无论在俄国历史学中，或是其他学科研究中，哥萨克都是一个重要的研究对象。18 世纪俄国军官里格尔曼（А.И.Ригельман）（1720–1789）较早研究了哥萨克历史，他的《顿河哥萨克历史》^①于 1778 年在莫斯科出版，1846 年再版，1992 年顿河罗斯托夫第三版。之后，俄罗斯学者关于哥萨克的研究不断加强和深入。

自 20 世纪 80 年代，随着俄罗斯哥萨克复兴运动的崛起，哥萨克问题成为俄罗斯社会问题的焦点之一，关于哥萨克的研究进入一个新的时期。俄罗斯、欧美、中国学者从史学、人类学、民族学、政治学等角度对哥萨克给予关注，从不同的层面对哥萨克的历史、政治、经济、文化、语言、文学及其社会属性、军役制度、土地管理、地方自治等问题进行多方位的研究，形成一门新的学科：“哥萨克学”（казаковедение）。哥萨克学的奠基者主要有俄罗斯著名学者科罗连科（П.П.Короленко）、波普科（И.Д.Попко）、波托（В.А.Погго）、萨韦利耶夫（Е.П.Савельев）、费利钦（Е.Д.Фелицин）、谢尔比纳（Ф.А.Щербина）、维诺格拉多夫（В.Б.Виноградов）、文科夫（А.В.Венков）、拉图什尼克（В.Н.Ратушняк）、塔博林娜（Т.В.Таболлина）、塔吉哲扬（Р.Г.Такиджьян）、特卢特（А.П.Трут）等。

20 世纪末兴起的哥萨克学具有其时代性和历史因素。通过分析和研究哥萨克的历史文化、哥萨克在俄罗斯（包括罗斯、莫斯科公国、俄罗斯帝国时期）社会地位和权利嬗变的特点，哥萨克学的兴起主要基于以下几点因素：

首先，哥萨克在俄罗斯历史上具有特殊的社会地位，在历史发展中形成了自己的传统文化、物质生活方式、宗教信仰、土地分配原则、村社自治。

其次，1919 年苏维埃政府颁布解散哥萨克的法令，对哥萨克采取“大分化”、“大棒政策”、“大移民”。^②哥萨克在苏联时期逐渐淡出人们的视线，而作为一个学术研究课题也很少被学者研究。随着苏联解体，在俄罗斯恢复少数民族权利和地位的浪潮中，哥萨克也竭力复兴自己的权利和文化。

① Ригельман А.И. История о донских казаках. Ростов н/д: Кн. изд-во, 1992.

② Щегнев Е.В. Рассказывание как социально-историческая проблема Голос минувшего // Кубанский исторический журнал. 1997. №.1. С.18.

第三,在现代俄罗斯社会中,哥萨克社会、政治地位的多元化性及其特殊性引起学者的关注和兴趣。譬如,哥萨克复兴运动的目的、法律基础、前景,及其在国家的地位和权利等问题备受学者的探讨和研究。

近年来,俄罗斯、欧美、中国学者在哥萨克学研究中取得丰硕的成果,一系列关于哥萨克的文献和研究著作不断问世。如《哥萨克百科大辞典》^①、俄罗斯学者雷布罗娃(М.А.Рыблова)的《顿河兄弟盟军:16-19世纪早期顿河哥萨克》^②和《顿河哥萨克传统的居住地及其住房》^③、库茨(О.Ю.Куц)的《顿河哥萨克:从夺取亚速夫到拉辛起义(1637-1667)》^④、卡拉乌洛夫(М.А.Караулов)的《捷列克哥萨克》^⑤、谢尔比纳(Ф.А.Щербина)和费利岑(Е.Д.Фелицын)的《库班哥萨克及其阿塔曼》^⑥等,美国学者劳伦斯(S. Lawrence)的《1799-1815年的哥萨克》^⑦、阿伯丁大学历史系教授W·克里斯托夫(W. Christophe)的《哥萨克和俄罗斯帝国(1598-1725)》^⑧,台湾辅仁大学周雪舫教授的《在夹缝中生存的乌克兰哥萨克人:从自治到归并于俄罗斯》^⑨等。据统计,仅1987年至2000年关于哥萨克学研究的博士论文有70多篇。这些丰硕的研究成果也成为进一步深入研究哥萨克学的基础性学术文献。^⑩

在我国,哥萨克学的研究还处于起始阶段。中国学者关于哥萨克的研究

① Энциклопедия казачества.сост. Г.В.Губарев. Москва: Вече, 2008.

② Рыблова М.А. Донское братство: казачьи сообщества на Дону в 16-в первой трети 19века.Волгограда:изд.во Волгу, 2006.

③ Рыблова М.А. Традиционные поселения и жилище донских казаков. Волгограда: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Волгоградского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го университета, 2002.

④ Куц О.Ю. Донское казачество, в период от взятия Азова до выступления С.Разина (1637-1667). СПб.: Дмитрий Буланин, 2009.

⑤ Караулов М.А. Терское казачество. М.: Вече, 2008.

⑥ Щербина Ф.А. , Фелицын Е.Д. Кубанское кузачество и его атаманы. М.: Вече, 2008.

⑦ S. Lawrence, *The Cossacks 1799-1815 (Warrior)*, Osprey Publishing, 2003.

⑧ W. Christophe, *Cossacks and the Russian Empire, 1598-1725: Manipulation, Rebellion and Expansion into Siberia* (Routledge Studies in the History of Russia and Eastern Europe), Routledge, 2007.

⑨ 周雪舫:《在夹缝中生存的乌克兰哥萨克人:从自治到归并于俄罗斯》,新北市:辅仁大学出版社,民国九十五年(2006年)。

⑩ Казачество России: Информационно-спраыочный материал. Ростов-н\Д., 2001. Масалов А.Г. Возрождение казачества на Северном Кавказ в конце хх-ххi века. Ставро-поль: изд-во СГУ, 2002. С.7.

是从 20 世纪初开始，早期以著作翻译为主，如译自日文的《可（哥）萨克东方侵略史》^①、《哥萨克在黑龙江上》^②、《外贝加尔哥萨克》（三卷本）^③等。而真正意义上学术性研究是从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④。中国学者关于哥萨克研究的第一篇论文是王少平的“俄国的‘争取哥萨克身份’运动”^⑤。虽然该文仅几百字，但开启了哥萨克史学研究的先河。通过分析中国学者在关于哥萨克的研究成果，可以归纳如下几点：第一，关于哥萨克的研究从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在内容上主要强调哥萨克的军事功能；第二，这些学术论文一般篇幅有限，且尚未采纳俄罗斯学者关于哥萨克研究的最新成果。在参考文献方面，一些论文缺乏翔实的文献说明，而且多以英文为主；第三，多数学者没有将历史、文化特征不尽相同的哥萨克加以地区上区分研究等。总之，中国学者关于哥萨克的研究起步较晚，且不系统、不全面。关于哥萨克的史学、文化、侨民，包括在中国的哥萨克侨民等方面，都有待中国学者全面、系统、深入地加以研究。因此，哥萨克学有待更多学者关注和研究。

二、哥萨克的起源问题

哥萨克的起源是哥萨克学研究中首先要解决的问题之一。但是，由于时间和历史原因，这个问题至今仍没有十分准确的答案，也正因为如此，它历来是研究者争论的问题之一。18 世纪初，哥萨克形成的时间及其祖先问题

② [俄]《可（哥）萨克东方侵略史》，上海：上海作新社译刊，1902 年。

③ [俄]谢·弗·巴赫鲁申：《哥萨克在黑龙江上》，郝建恒、高文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5 年。

④ [俄]阿·瓦西里耶夫：《外贝加尔哥萨克》（三卷本），徐滨、许淑明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 年。

④ 主要论文包括：王方宪：“哥萨克与俄国农民战争”，《历史教学问题》，1987 年第 2 期；王少平：“俄国的争取哥萨克身分的运动”，《史学集刊》，1985 年第 2 期；黄秋迪：“哥萨克与俄国农民战争”，《西伯利亚研究》，1999 年第 5 期；邸永君：“哥萨克是一个民族吗？”，《百科知识》，2002 年第 8 期；金学耕：“顿河畔上的哥萨克”，《中外文化交流》，2004 年第 3 期；张春芳：“顿河上的哥萨克婚礼”，《世界文化》，2004 年第 3 期；子河：“寻找顿河哥萨克”，《俄罗斯文艺》，2004 年第 1 期；宁士杰：“哥萨克民族溯源”，《中学俄语》，2004 年第 9 期；许芳：“试论沙皇政府对哥萨克政策的演变”，《西伯利亚研究》，2008 年第 3 期。

⑤ 王少平：“俄国的‘争取哥萨克身分’运动”，《史学集刊》，1985 年第 2 期。

就被俄国学者提出，但至今仍争论不休。而且，由于研究者意识形态和政治立场不同，以及其世界观和研究态度不同，关于哥萨克的起源，在地方学者和官方学者之间、在不同国别学者之间产生很大的分歧。综合分析俄罗斯学者的观点，关于哥萨克的起源可以归纳为两种理论，即“土著理论”和“移民理论”，与此相应的是哥萨克“出身高贵”和“出身贫贱”之说。“官方”学者把哥萨克看作反国家的叛乱力量来研究，而“地方”学者则认为，哥萨克是国家忠实的服役人员，爱国主义者。这样，就形成历史研究中哥萨克的二重形象：“社会的反抗者”、“异教徒”、“社会的暴动者”、“国家的罪人”；“为正义而战的战士”、“民族英雄”。

关于哥萨克的起源，18世纪俄国著名的史学家和文学家卡拉姆津（Н.М.Карамзин）认为，哥萨克的历史早于拔都时期，早在9世纪哥萨克就开始生活在基辅罗斯。他在《俄国国家史》（12卷）第五卷第四章中指出：“在失明大公瓦西里（Василий II Васильевич Тёмный）时期，1444年编年史就已经提到梁赞哥萨克，他们帮助莫斯科军队进攻鞑靼军。哥萨克1517年就非常出名。他们的祖先从9世纪起就居住在第聂伯河岸和基辅地区，小俄罗斯哥萨克^①是这里最早的居民。他们不屈服于蒙古、立陶宛的压迫和统治，逃到这些地区成为自由人。他们居住在第聂伯河水域的小岛上、悬崖峭壁上，以及荒无人烟的地方。”^②“哥萨克起源于托尔克人和佩列金人。托尔克人和佩列金人也被称为切尔卡斯人。我们可以想起居住在黑海和里海地区的卡索科人，和在这个地方由拜占庭皇帝康斯坦丁·巴格良诺罗德内（Константин Багрянородный）建立的哥萨克王国（казахия）。另外，奥赛提人称呼切尔卡斯人为哥萨克。托尔克人和佩列金人被称为切尔卡斯人，也就是哥萨克。他们中有许多是从俄国逃来的被压迫者，这些俄国人称自己为科姆克（哥萨克），这样称呼自己，使他们更易于生存。”^③但卡拉姆津认为：“哥萨克的出身并非高贵。哥萨克的祖先是亚速夫哥萨克和俄国逃役人员。

① 小俄罗斯哥萨克，即乌克兰哥萨克。

② Карамзин Н.М. История государства Российского. книга 3, Т.5. Москва: Моск. Рабочий. 1993. С.205.

③ Там же, С.205-206.

他们为了自由和战利品，曾为金帐汗国拔都服役。”^①

纵观哥萨克历史，在俄国历史上，哥萨克是一个两面性的角色。一方面，哥萨克为俄国的殖民扩张立下汗马功劳；另一方面，17、18 世纪由哥萨克领导的农民起义和暴乱动摇了俄国沙皇的统治。基于此，19 世纪一些俄国学者提出俄国哥萨克起源于金帐汗国的假说，即哥萨克出身于鞑靼人。这些学者提出这种观点的目的，是把哥萨克看成是一个特殊的群体，而不是“高贵”的俄罗斯人，或斯拉夫人。他们以此来说明，哥萨克在本质上具有反社会、反国家的基因，进而证明哥萨克是犯罪、恶棍、卑微的人。^②由此可见，虽然卡拉姆津承认哥萨克早于 9 世纪就存在，但他没有在原始文献研究的基础上分析哥萨克的起源，而断定哥萨克起源于逃民。他的观点具有俄国官方观点的代表性，完全是为了迎合俄国沙皇建立统一帝国的需要，有利于俄国政府全面地制服和控制哥萨克，使其忠心地为沙皇服务。

相对以上观点，一些研究者极力否定俄国哥萨克形成于低微卑鄙的土匪、强盗、罪犯的观点。他们在研究关于哥萨克的民间传说基础上，提出自己的观点和假说。一些学者认为，哥萨克出身高贵，他们是传说中英雄的民族。哥萨克的祖先是西徐亚人、匈奴人、哈扎尔人、萨基人、瓦良格人、帕提亚人，或是传说中亚马孙女人。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俄国著名史学家萨韦利里耶夫（Е.П.Савельев）的研究影响比较大。他认为，在俄国史学中，关于哥萨克研究的成果很多，但都没有取得正确的结果。^③他认为，哥萨克的祖先是亚马孙女人。据古代作家记载，生活在顿河地区马背上作战的哥萨克十分勇敢，有魅力。他们的性格特征和生活方式跟亚马孙女人十分相似，哥萨克应该是他们的后代。^④

由于缺乏可靠的文献资料，我们无法断定，卡拉姆津或是萨维里耶夫关于哥萨克起源的观点，谁是谁非。但他们的研究成果为我们提供这样一个信息：哥萨克早于 16 世纪就存在。因此，我们不能片面地肯定，哥萨克形成

① Карамзин Н.М. История государства Российского.книга 3, Т.5. С.206.

② 转引自 Мамонов В.Ф. История казачества России.Т.1. Екатеринбург: Ин-т истории и археологии Уральского отделения РАН, 1995. С.37.

③ Савельев Е. П. Древняя история казачества. Москва: Вече, 2008. С.14.

④ Там же, С.124.

于 16 世纪俄国、立陶宛等国的逃民。1973 年版的《苏联大百科全书》这样解释哥萨克：“由于俄罗斯、波兰—立陶宛公国封建剥削和农奴制的压迫，以及民族宗教的压迫，15—16 世纪大批农民和庄园农奴逃到这些国家未开垦的南部地区。从 15 世纪下半期逃跑的农民和庄园农奴，在俄罗斯、乌克兰南部和东南部边界，主要在第聂伯河、顿河和雅伊克河及其支流地区，开始称自己为‘自由的人’——哥萨克。”^①这种观点影响甚广，至今仍被我国多数学者采纳。而俄罗斯最新版百科全书就哥萨克一词另作解释。《俄罗斯人文百科词典》这样解释：“哥萨克的起源，如哥萨克这个词本身一样，至今无法说明白，并有几个版本，没有一个占主导地位的说法。一些研究者认为，哥萨克产生于 15 世纪金帐汗国灭亡后的罗斯边远地区。而实际上，在罗斯和大草原之间，哥萨克与四邻已有几个世纪的交往。之后，16—17 世纪，由于罗斯公国的农奴、破产的农民和手工业者等逃到这个地方而使哥萨克的数量不断增加。在 15 世纪前哥萨克已经存在几个世纪。”^②

虽然，哥萨克起源之说有多个版本，但在谈到哥萨克的起源时，我们应该考虑哥萨克起源的地理和自然因素。自然、地理因素是在整个哥萨克历史发展中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可以说，哥萨克，这个概念的产生在很大程度上是其所处的地理位置和自然条件决定。顿河、捷列克河、乌拉尔河、第聂伯河流域的哥萨克居住在与俄国、立陶宛、波兰、土耳其相邻的地域，地处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世界的交界处。这些地区，对于这些公国来说，具有军事战略意义，而对于哥萨克来说，这是他们更易于生存的地方。大家都知道，最早、最适宜的人类居住地一般在河、湖、海的岸边，即有水源的地方，古代哥萨克诞生的地方也如此。中世纪时期，位于俄罗斯南部欧亚大陆腹地的顿河和奥卡河上游地区、第聂伯河地区、捷列克河地区、乌拉尔河（雅伊克河）地区、乌克兰草原、北高加索地区曾是荒野的地带，在这些地区和草原地带诞生了最早的哥萨克自由群落。这些群落不断发展壮大，在 15、16 世

① Большая советская энциклопедия. Т.11. третье издание. Москва: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Советская энциклопедия, 1973. С.175.

② Сост.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ский филологический факультет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ского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го университета. Российский гуманитарный энциклопедический словарь(в трёх томах)Т.2.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ского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го университета, 2002. С.127.

纪形成自己独特的生活方式，并建立独特的自治管理体制。15、16 世纪，哥萨克生活的区域位于欧洲和亚洲交界处，广袤无垠、人烟稀少的地带，毫无天然屏障，几乎与世隔绝。早期的哥萨克靠河、海、湖这个水域网生存。他们沿水路走出去，对外出征，与外界联系越来越频繁。在哥萨克早期，其生活方式具有流动性、不稳定性、冒险性的特点。

自然、气候条件不但使哥萨克成为哥萨克战士，而且也使其成为哥萨克庄稼汉。南方肥沃的土地成为哥萨克生活的主要来源，在他们的耕作下，成为俄国重要的粮仓。地理、自然条件促进了哥萨克社会和文化的形成。首先，在这些条件下，形成哥萨克独特的社会组织：民主的管理体制、独特的军事化的哥萨克村社、相应的军职等级、哥萨克人人平等的社会原则等；其次，在这些条件下，形成哥萨克经营方式的独特性，他们享有一定的经济社会条件，税收优惠，拥有巨大的土地资源，即军区的土地，而且其土地份额要比俄国其他族群多几倍，甚至数十倍。因为出征打仗，哥萨克常把土地租给山民和外来人耕种，自己则成为大地主。在 1917 年以前，大多数哥萨克家庭都很富有；三是，在这些条件下，形成哥萨克独特的宗教文化传统。^①

通过研究关于哥萨克的历史文献，我们知道，关于哥萨克起源的“土著理论”和“移民理论”两种解释并不矛盾，而且两者互补。如果完全地赞同某种观点而否定另一种观点，都比较片面。俄罗斯学者关于哥萨克起源的两种观点都有其正确的一面。在俄国时期，曾形成众多分支的哥萨克，而不同分支、不同地区的哥萨克，其起源和历史都不尽相同。但每个分支哥萨克的历史起源都可以用这两种理论来解释。所不同的是，在某种意义上，其中的一种占优势，而另一种则起辅助作用。譬如，第聂伯河地区的哥萨克^②是在自己的基础上，在立陶宛、俄罗斯大公国内自然形成。顿河、捷列克、乌拉尔哥萨克产生之初，在本地发展，并没有加入莫斯科公国，而是依附于金帐汗国。由自由的或从未自由的哥萨克和当地的居民以及东欧迁徙者组成俄国

① Заседателева Л.Б. Восточные славяне на Северном Кавказе в середине 16-начале 20вв. Автореф. дисс... док. ист. наук, Москва, 1996. С.69-70.

② 第聂伯河地区的哥萨克，也就是后来被称之为的乌克兰哥萨克，他们建立了扎波罗热谢奇，又被称为扎波罗热哥萨克。

亚洲部分的哥萨克，这些哥萨克从其产生之时，他们就成为城镇和卫戍村^①服役的哥萨克。在很大程度上，他们主要在国家的作用下形成和发展。因此，哥萨克起源的“土著理论”和“移民理论”都有其合理性。

三、哥萨克的社会属性

20 世纪末，随着苏联的解体，哥萨克复兴运动骤然兴起，哥萨克问题成为俄罗斯社会的一个焦点问题。正如俄罗斯民族学家科索夫（П.С.Косов）指出：哥萨克，“一个特殊的群体，其问题成为俄罗斯当前的热点问题”，“成为最尖锐的政治大灾难，如高加索哥萨克的土地问题、自治问题等”。^②在哥萨克学研究中，哥萨克的社会属性成为俄罗斯学者争论的主要问题，这个问题关系着哥萨克复兴的命运。一些学者认为，哥萨克是历史上形成的民族，但由于俄国政权的强制干预而被迫认定为一个阶层。譬如，俄罗斯现代史学者格鲁先科（В.Б.Глущенко）认为，在彼得一世改革和制定的《官阶表》的基础上，18 世纪下半期已经明确俄国阶层的划分。俄国时期的阶层有贵族、神职人员、市民和农民。但哥萨克不属于其中的任何阶层，却又包含在每个阶层中。19 世纪哥萨克已经有自己的政治、社会经济制度^③。在俄国，哥萨克显得非常独特，至今保留着历史上形成的体制，这一点是一个阶层所不具有的特点。哥萨克在某种程度上存在于所有阶层之中，如哥萨克商人、哥萨克农民等。^④由此，格鲁欣科认为，哥萨克是历史上一个独立的民族。

苏联解体后，一些俄罗斯学者认为，哥萨克在过去已经处于亚民族形成的阶段，在这个基础上完全能够恢复作为民族意义上的哥萨克。^⑤在 20 世纪

① 卫戍村，即哥萨克村。为了保卫边境，俄国政府在新殖民征服而来的亚洲广大区域的边境线上，设立哨卡，由哥萨克守卫。在哨卡的基础上进而形成哥萨克村，即哥萨克卫戍村。

② Косов П.С. Казачий путь, Ростов-на-Дону: ООО «Редакция газеты ДАР», 2001. С.20.

③ 1835 年俄国沙皇签署了专门的《顿河哥萨克军屯管理条例》，确立了顿河哥萨克的社会地位和权力。哥萨克的政治、经济生活由该条例所限定。

④ Глущенко В.Б. Казачество евразии: зарождение, развитие, интеграция в структуру российской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сти. Москва: Вузовская книга, 2006. С.7.

⑤ Карпенко А.Н. К вопросам об идеологии казачьего возрождения// Отечественная история. 2006. №4. С.126.

90 年代哥萨克复兴运动之初，持这种观点的哥萨克要求俄罗斯政府恢复其作为一个民族的政治权利和义务。虽然俄罗斯政府已颁布许多针对哥萨克的法规条文，对哥萨克进行登记注册，但仍没有确认民族概念上的哥萨克。

俄罗斯民族学家卡尔片科（А.Н.Карпенко）认为，革命前的哥萨克是一个复杂的社会现象，亚民族的特点与阶层的特点交织在一起。哥萨克既不是一个阶层，也不是一个民族，而准确地说，是一个具有某些民族色彩的社会文化俄语共同体。^①当代史学家克拉斯诺夫（П.Н.Краснов）认为，自 18 世纪下半期至 20 世纪初，哥萨克可以界定为一个具有民族性的一个群体。哥萨克的民族性是在一个严格的阶层框架下发展而成的。在这个过程中，起主要作用的是独有的属于军事阶层的统一居住地，即哥萨克军所管辖的地域。这个时期，哥萨克的民族性和阶层性交融在一起。而哥萨克的民族独立性在哥萨克民间话语中充分体现出来：“这是哥萨克的，那是俄国的”、“哥萨克人来源于哥萨克”、“我不是俄罗斯人，我是哥萨克人”。^②而顿河罗斯托夫研究者斯科里克（А.П.Скорик）和特鲁特（В.П.Трут）认为，顿河哥萨克的形成具有民族的性质。但是，这种民族性在加入俄罗斯帝国时被人为地终止。就哥萨克而言，形成这样的概念，即“被断裂的民族性”。现在，具有独特组织形式的哥萨克，其社会民族和社会阶层结构已融入俄罗斯社会之中。^③

根据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历史上，一个民族的形成往往要经历约 250–350 年的时间历史演变。虽然，哥萨克经历几百年的历史发展，并形成了自己的生活区域，但其多民族、多信仰、多地区分支的特点使其不可能形成一个稳定的共同体，即独立的民族，而只是成为一个独特的社会群体。在 15、16 世纪哥萨克早期，任何愿意成为哥萨克的人就可以加入哥萨克军事群体，因此，在哥萨克中，有鞑靼人、斯拉夫人、卡尔梅克人等等。而更要一点的是，在几百年的历史发

① Карпенко А.Н. К вопросам об идеологии казачьего возрождения. С.124.

② Краснов П.Н. История донского казачества. очерки истории войска Донского. Москва: ЯУЗА, ЭКСМО, 2007. С.16.

③ Трут В. Дорогой славы и утрат казачьи войска в период войн и революций. Москва: ЯУЗА, 2007. С.425.

展中，哥萨克人也没有形成自己独有的语言。多数哥萨克操俄语。苏联学者切博克萨罗夫（Н.Н.Чебоксаров）认为，“亚民族”或称“民族分支”，即民族地域文化分支。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现成的地域，具有一定的地域乃是任何民族共同体产生的必要条件。^①俄罗斯的民族分支有：白海沿岸地区以捕鱼和航海为业的波莫尔人或顿河、库班河、捷列克河、乌拉尔河、谢米列契地区、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各个哥萨克人群体。^②今天，在现代俄罗斯民族学中，哥萨克被认定为亚民族，一个社会文化的共同体。

结 语

哥萨克是俄罗斯民族中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哥萨克起源、哥萨克社会属性问题是两个复杂的问题，更是两个最能引起争议的问题。这两个问题与哥萨克复兴的基础和前景密切相关。哥萨克的形成与发展是多方面因素作用的结果，受自然地理、内部和外部因素的影响。哥萨克，具有两个含义：作为个体人的哥萨克（казак）和作为集体概念上的哥萨克（казачество）。因此，关于哥萨克的概念应该强调两种含义：一、哥萨克是普通的公民，是国家居民的一部分；二、哥萨克是一个具有社会共性、文化特征、共同历史的特殊性群体。这两层含义并不互相矛盾，二者具有共性的特征，且不互相排斥，因为每一个公民有权利根据自己的民族根基来决定自己属于哪个民族，有权利学习和传播自己的文化。当然，离开时间和地点很难来评论一个人、一个群体、或一个社会发展的过程和现象。

哥萨克学的研究，特别是哥萨克历史和文化方面的研究，可以从新的视角探讨俄罗斯历史、文化、民族、政治等问题，理解当代俄罗斯缘何恢复哥萨克亚民族及其他弱小民族的权利和地位。具有重要的学术和现实意义。今日的哥萨克作为俄罗斯强大的边防储备军仍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Abstract】 With the disintegration of the Soviet Union at the end of the

① [苏]尼·切博克萨罗夫，伊·切博克萨罗娃：《民族·种族·文化》，第9页。

② 同上，第32页。

20th century, Cossack problem has become a focus of social problems in Russia. The studies on the Cossacks also entered a new stage, and formed a new discipline: Cossack studies. Because of a variety of factors, in China research of Cossack is still very much on the lack. Understanding of the Cossacks was quite rough and fuzzy, particularly the problem of the origin and social properties of the Cossacks. This situation restricted the research of Cossack history, culture, literature and the others. The problems of the origin and social properties of the Cossacks are the basic problems to solve at first, and cause scholars more debate. Therefore, systematic study on two problems is necessary. These studies provide the basis academic information for the further study of Cossack. Cossack studies provide a new perspective for the research of Russia.

【Key Words】 Russia Cossacks, Cossack studies, origin, social attribution

【Аннотация】 В конце 20 века с распадом Советского Союза, казачья проблема стала одним из центральных социальных фокусов в России.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по казачеству также вступили в новый этап, и формируется новая дисциплина: казаковедение. Из-за ряда факторов, в Китае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по казачеству очень недостаточны. Понимание казаков китайцев довольно грубое и нечеткое, в частности, проблемы происхождения и социального свойства казаков. Эта ситуация ограничена исследование казачьей истории, культуры, литературы и других. Проблемы происхождения и социального свойства казаков основные проблемы, и вызывают больше дебатов ученых. Таким образом, систематическое исследование на две проблемы необходимо. Это исследование даёт основу академической информации для дальнейшего изучения казаков. Казачье исследование даёт новый аспект для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России.

【 Ключевые слова 】 российский казачество, казаковедение, происхождение, общественное свойство

(责任编辑 封 帅)

新经济政策

新经济政策时期 苏联社会组织管理体制的初创与确立*

黄立蒨**

【内容提要】新经济政策时期是苏俄社会组织发展的“黄金时代”。苏维埃国家在这一时期探索建立社会组织管理体制。1921年3月-1924年5月,社会组织管理体制初创,建立了宪法框架下社会组织部分自治的管理体制。从1924年5月至1928年2月,随着在经济领域运用市场经济机制措施的收缩,开始构建苏共主导型的社会组织管理体制。1930年8月通过了关于社会组织的新的条例,明确地将社会组织的宗旨与苏联社会主义的战略目标联系在一起。该条例的颁布和实行,标志着宪法框架下部分自治的管理体制终结,苏共主导型的社会组织管理体制确立。新经济政策时期社会组织管理体制的初创与确立,是年轻的苏维埃国家摸索和建立治理国家模式,从相对分权到中央集权的一个缩影和组成部分。

【关键词】新经济政策 社会组织 社会组织管理体制 初创 确立

【中图分类号】K512.53**【文章标识】**A**【文章编号】**1009-721X(2012) 03-0103-(23)

新经济政策时期,是苏维埃国家探索治理国家模式的过渡时期。由于诸

*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新经济政策时期的苏联社会》(项目批准号:11FSS001)的阶段性成果。

** 黄立蒨,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俄罗斯东欧史室主任,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多原因，1925年以后新经济政策逐步收缩。1928年底，斯大林结束新经济政策，建立了权力高度集中于中央的体制，奠定了其后半个多世纪苏联经济、政治体制的基础。苏联社会组织管理体制作为政治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该时期经历了重要而巨大的变动，奠定了其后数十年社会组织管理体制的基础。新经济政策时期社会组织管理体制经历了怎样的发展阶段与变化？其主要内容是什么？国内对该问题的探讨迄今尚不充分。^①本文尝试利用苏联解密历史档案和俄罗斯学者的最新研究成果，对这一问题进行探讨。笔者认为，苏联时期社会组织的管理体制主要涉及四个方面：

(1) 是谁制定了社会组织领导方针和制度，这些方针制度是否系统和稳定；

(2) 社会组织准入标准的内容及其变化；

(3) 对社会组织进行注册和对其活动进行监督与调控的主体的变动；

(4) 管理主体塑造的整个社会组织体系面貌的变化。

从这四个方面进行考察，新经济政策时期社会组织管理体制的发展可以分为两个阶段。^②

一、初创：宪法框架下部分自治（1921年-1924年5月）

本文探讨的社会组织亦即国际社会所称的公民社会组织、非政府组织（NGO），是指具有组织性(organized)、私有性(private)、非营利性(not profit-distributing)、自治性(self-governing)和自愿性(voluntary)的组织^③。俄国学者通常使用社会组织(Общественные организации)来称呼这一概念。

① 关于该问题迄今没有专题研究成果发表，只有寥寥数篇著述中有所涉及：1995年马龙闪在其著作《苏联文化体制沿革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中探讨了社会团体在文化体制中的作用；2008年黄立菲与王丹在论文“俄罗斯非商业组织的历史与发展”（《中国民间组织发展报告2008年卷》，北京：社科文献出版社）中首次提出了苏共主导型的概念，但是没有展开阐释。

② 社会组织管理体制发展的两个阶段是有本质区别的，在第一个阶段，虽然国安局决定社会组织命运，但是审查的标准是国家宪法，而不是第二阶段增加的意识形态标准。

③ [美] 莱斯特·M·萨拉蒙等著：《全球公民社会 非营利部门国际指数》，陈一梅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3页。

俄国第一批社会组织诞生于 18 世纪下半叶，至 20 世纪初期，社会组织获得了长足的发展。社会组织活动的领域不断扩展：18 世纪下半期，社会组织主要是在知识分子群体中成立和开展活动；20 世纪初，在工人、农民、职员、知识分子、资产阶级、地主等各个阶层中都成立了社会组织。社会组织的功能不断丰富：18 世纪下半叶，社会组织的活动主要是宣传、出版、慈善活动。20 世纪初，社会组织的活动涉及各个阶层、各个群体的利益保护，学术发展，收藏，慈善。1905 年革命后，涌现出 100 多个政治性的社会组织，其中全俄性的社会组织进行政治宣传和组织，在俄国政治变迁中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十月革命胜利后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为了巩固政权，年轻的苏维埃政府对旧俄国的社会组织采取了一系列强硬的应急管理措施。1917 年 12 月 24 日，俄联邦内务人民委员会颁布了《苏维埃权责法》，赋予地方政权机关解散那些鼓励与新制度敌对或号召推翻新制度的社会团体。1918 年 8 月，司法人民委员会通过关闭宗教团体和慈善团体的决定。1918 年 12 月，全俄中央执委会通过解散全俄中学教师联盟的命令。1919 年青年共产主义联盟第二次代表大会，决定终结过去全部青年组织的活动。1921 年 4 月至 1922 年，又取缔了“莫斯科科学家联盟”（Московский союз научных деятелей）等一批知识分子团体。加上 1917 年 10-11 月，许多革命前的社会团体在政治剧变面前不知所措，自发停止了活动，截至 1920 年代初，大部分旧俄国的社会组织已不复存在。以彼得格勒为例，1918-1920 年，革命前的 500 个社会组织只剩下 50 个。

与此同时，苏维埃政权对旧有的社会组织采取区别对待的管理政策。凡承认苏维埃政权、承认共产党的领导、服从苏维埃法律的社会组织，允许其保留下来和继续活动。这样，那些主要关注行业问题而并非政治取向的社会组织得以存续和活动——1918-1920 年，十月革命前成立的科学、文化教育、艺术、社会互助、工会和合作社等领域的 60 多个著名的社会组织还在继续活动。

在严厉取缔敌对、或不利于新政权的社会组织的同时，苏维埃政权开始尝试建立社会组织管理体制。首先是立法，确认人民有建立社会组织的权利。

1918年7月10日第五次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会议通过的宪法宣布：“为保障劳动者享有真正的结社自由，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在打破有产阶级的经济和政治权力并因而铲除迄今在资产阶级社会内尚在妨害工人与农民享有组织及行动自由的一切障碍之后，尽量在物质和其他方面协助工人与贫农进行结合和组织。”^①这一法令奠定了苏维埃社会组织成立与发展的法律基础。但是，此时已经燃起反对外国武装干涉的战火，苏维埃俄国无暇他顾，中断了构建社会组织管理体制的过程。十月革命后初期对社会组织清理整顿的急风暴雨平息之后，甚至在国内战争时期，已开始有新的社会组织自发出现。但是直至1922年8月之前，国家没有颁布关于社会组织的专门法令，也没有规定对社会组织进行注册管理的专门机构，对社会组织的管理处于自流状态。

该阶段主要的问题，是未设置社会组织登记注册的统一机构。当时，调整社会组织的法令由国家立法机关——苏维埃全俄中央执委会与国家行政机关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人民委员会（СНК РСФСР）颁布，但是负责进行登记和注册的机关，尤其在地方上，却是五花八门。1917-1918年，科学的、慈善的、创作的、运动的和其他社会组织，主要是在教育人民委员部进行登记。在地方上，却有多个部门参与社会组织的登记工作。例如，莫斯科不同类型的社会组织分别到莫斯科苏维埃、莫斯科省警察分部、苏维埃莫斯科省中央执委会、莫斯科大学苏维埃，甚至在莫斯科人民公证员苏维埃（Московский совет народных нотариусов）进行登记。^②在彼得格勒，社会组织登记需到教育人民委员部科学部彼得格勒分部、北方区公社联盟（Союз коммун Северной области）、地方苏维埃等机构进行。国家对社会组织的注册管理处于混乱状态。

在国内战争结束前夕，国家继续草创社会组织管理体制，首先是规范对宗教组织的注册。1920年6月17日，俄联邦内务人民委员部通过决定，在其各省分部登记的所有宗教协会、小组、团体，应将其信息情况转交内务人

① Советские Конституции. Справочник. М.: Госполитиздат. 1963. С.134.

② Коржихина Т.П. Законодательные источники по истории общественных организаций СССР. Вспомогательные исторические дисциплины. Т.ХVIII. Л.: Наука. 1987. С.224.

民委员部。^①随后，开始建立专门的社会组织管理机关：1921年5月14日，内务人民委员部建立了行政监督分部，并赋予其以下权力：批准召开全俄代表大会和对建立“私人的和国家民族的组织与联合团体”进行调控。^②

尽管对宗教组织采取了集中注册的措施，但是，其他类型社会组织多头注册的状况没有根本改观，这就给建立小团体进行反苏活动以可乘之机。1921年春，开始实行新经济政策。由于在经济领域引进相对自由的市场关系，对意识形态的控制从某种意义上说有所放松，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各种思潮自由表达的空间。旧俄国存在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思潮、保守主义思潮、小资产阶级激进主义思潮以及保皇复辟主义思潮趁机活跃起来，表达对社会主义的敌对情绪和观点，致使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尖锐化。

1922年3月至8月是反苏知识分子活动最为激烈的时期。国家政治保卫局机要处直接负责知识分子事务的第四科“系统搜集了教授和作家们的材料”。1922年6月3日，捷尔任斯基向政治局提交了《关于知识分子中反苏维埃集团》(Об антисоветских группировках среди интеллигенции)的报告，详细列举了高校、社会团体、私人出版社、行业代表大会、合作社、托拉斯、商贸机构以及宗教领域知识分子的反苏活动，其中用了显著的篇幅谈到知识分子利用社会组织反对苏维埃政权的问题。

该报告在导言中强调：“新经济政策导致在这一环境下得到充分发展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团体力量的联合和共谋的危险性。反苏维埃知识分子广泛地利用了苏维埃创造的和平环境和惩罚机构活动削弱的机会，公开地组织和积累自己的力量，自然形成了大量的私人社会团体（学术的、经济的和宗教的，等等）及私人出版社，在这些团体周围形成了反苏维埃的成分，它们成为未来联合反革命阵线的可怕的因素。反苏维埃知识分子的联合团体的力量得到了加强。与反苏维埃知识分子斗争的主要场所是……各种学会……”^③

① ГАРФ.Ф.Р-393.Оп.33.Д.152.Л.39.См.Ильина И.Н. Общественные организации России в 1920-е годы. М.: ИРИ РАН. 2000. С.61.

② ГАРФ.Ф.Р-393.Оп.1.Д.46.Л.274.См. Ильина И.Н. Общественные организации России в 1920-е годы. С.61.

③ АПРФ.Ф.3. Оп.58. Д. 175. Л. 8-12. Подлинник. Машинопись.

报告在提到“各种协会中的反苏知识分子活动”时说，近期在“科学协会（научное общество）”、“贸易工业协会（торгово-промышленное общество）”的活动中存在着隐蔽的反革命的、目的在于推翻苏维埃政权的因素。报告特别提到“馅饼协会（Пироговское общество）”以半官方的形式存在，在反苏活动中扮演着特殊作用。报告对于社会组织的发展具有关键意义的是，明确指出了多头注册的管理漏洞被反苏社会组织所利用：“民间社团的注册中存在着明显的漏洞，一个部门不允许成立的某个协会，在另一个部门却注册了”。^①

报告在最后强调反苏团体活动对苏维埃政权的威胁，并确定了防患于未然的应对方针：“伴随着新经济政策的发展，反苏的团体和组织走向联合，在不远的将来，这些团体将成为反对苏维埃政权的危险力量。国家总的形势要求，必须采取决定性的措施预防可能的政治威胁。”^②

1922年6月8日，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对这一报告作出决议，对各个领域的反苏知识分子的活动制定了对策，其中与社会组织发展有关的措施主要包括：取消不服从党领导的大学生组织；任何代表大会或全俄行业会议（医生、农艺师、工程师、律师等）未经国家保卫局的同意不得召开等。同时，政治局提出了堵塞多头注册管理漏洞的重大措施——规范社会组织的注册机关，规定由国家政治保卫局通过内务人民委员部机关，从6月起独家对社会组织进行重新登记。决议的第4条规定：“责成国家政治保卫局通过内务人民委员部机关从6月10日起对所有协会和联盟（学术的、宗教的等等）进行重新注册，没有国家政治保卫局的注册不得成立新的协会和联盟。未注册的协会和联盟将被宣布为非法并立即取缔”。^③

根据政治局决议的精神，国家政治保卫局迅速采取了行动。1922年8

① АПРФ. Ф. 3. Оп. 58. Д. 175. Л. 14–15. Подлинник. Машинопись.

② АПРФ. Ф. 3. Оп. 58. Д. 175. Л. 8–12. Подлинник. Машинопись.

③ Высылка вместо расстрела. Депортация интеллигенции в документах ВЧК-ГПУ. 1921–1923 гг. / Вступ. ст., сост. В. Г. Макарова, В. С. Христофорова. М.: Русский путь. С.82.

月，在发生了驱逐“反苏知识分子”的“哲学船”事件^①和取缔“反苏知识分子团体”事件的同时，对社会组织进行整顿和规范管理的文件出台了。

1922年8月3日，苏维埃全俄中央执委会（ВЦИК）与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人民委员会（СНК РСФСР）通过了《关于不以营利为目的的协会与联盟建立和注册的程序与对其进行监督的程序（О порядке учреждения и регистрации обществ и союзов, не преследующих цели извлечения прибыли, и о порядке надзора над ними）》的法令，赋予内务人民委员部权力，开始对所有现存的协会与联盟进行重新注册。^②

1922年8月3日的《程序》法令，成为新经济政策时期对社会组织进行调控的主要法令。以此为基础，1922年8月10日中央执委会又颁布了《协会、联盟与联合会注册细则》（Декреты Всероссийского Центрального Исполнительного Комитета. Инструкция по регистрации обществ, союзов и объединений）^③，规定了对协会和联盟进行注册以及批准各种组织、联盟、联合会召开代表大会、会议的细则。

该法令和细则是苏维埃政权关于社会组织管理的第一批比较系统的专门文件，标志着对社会组织的管理开始规范。法令的篇幅不长，只有2页，共13条，主要规定如下：

“为了注册，必须提供社会组织的章程，关于其创立的会议的记录，组织创办人的名单，所有的徽章”；

“现存的、该文件公布后2周内未注册的组织，协会，将被取缔”；

“除被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所联合的工会外，任何一个协会、联盟和联合团体，未在内务人民委员部或其地方机关登记的，都不能开始其活动”。^④

① 1922年8月22日，根据列宁签署的命令，将持有反苏和反共观点的161名知识分子逮捕后集中在“普鲁士号”和“哈根市长号”客船上驱逐出境。因两艘船上被驱逐者中有相当多的人是哲学家，或者是有哲学教育背景的学者，因此该事件也被称为“哲学船事件”。参见张建华：“从政治整肃到行政规训：新经济政策时期苏维埃政权的知识分子政策”，《俄罗斯研究》，2009年第4期，第42-46页。

② Собрание узаконений и распоряжений 1922г. 30 августа. №.49.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е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Советское законодательство». 1928г. С.622.

③ Там же, С.623.

④ Инструкция по регистрации обществ, союзов и объединений// Собрание узаконений и распоряжений 1922г. 30 августа. №.49. С.623.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1922年8月3日颁布的法令的第6条，对所有协会活动准入的政治条件进行了规定，“如果被确认协会或联盟的目的或其活动方法与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宪法及其法律相悖，将拒绝对其登记”。^①

尽管此文件是在对反苏知识分子严厉惩治时期制定和颁布的，但是这一法令条款把遵守宪法和法律作为衡量社会组织是否准入的唯一政治标准，而没有附加其他意识形态的条款，表明新经济政策时期苏维埃政权还是给予了社会组织的活动比较宽松的政治环境。

以1922年8月3日法令、1922年8月10日细则为基础，内务人民委员部及其地方部门启动了审批协会与联盟的章程及对其进行登记的工作。1922年8月3日以后，所有先前存在的和新成立的协会与联盟的登记，都集中到内务人民委员部，到中央行政管理局（Центральное Административное управление）和其在各省部门办理。发起建立的团体，其章程提纲、组织成员和领导人情况的表格，都被送到这里。内务人民委员部决定对送达材料的社会组织是批准还是拒绝，并给予最终的正式答复。

然而在实践中，内务部并不是批准社会组织注册与否的最后裁决者。在1922年6月8日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对《关于知识分子中反苏维埃团体》报告作出决议中规定了这样一条：“责成国家政治保卫局通过内务人民委员会机关……对所有协会和联盟（……）进行重新注册，没有国家政治保安局的注册不得成立新的协会和联盟。”这一规定表明，内务部不过是代表国家政治保卫局对业已存在的社会组织进行重新审查注册，而新成立的组织则由国家保卫局直接审查，决定其命运。换言之，国家政治保卫局（ГПУ），后来是国家政治保卫总局（ОГПУ），才是社会组织命运的最后裁决者。

已解密的苏联历史档案证明了这一点。研究20年代社会组织的专家伊利因娜指出，“俄联邦国家档案馆（ГАРФ）中存有20年代在中央行政管理局（Центральное Административное управление）登记的所有社会组织文件中的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卷宗，我们没有发现任何一个案例中的社会组织，未经国家政治保卫总局（ОГПУ）秘密部（Секретный отдел）或监察部（Отдел

^① Собрание узаконений и распоряжений 1922г. 30 августа. №.49. С.622.

контрразведки) 的参与而得到批准。这些部门的简洁文件, 通常不超过 5—8 行, 给予实质性的具体的指示。”^①这一情况充分说明, 国家政治保卫总局是社会组织命运的真正裁决者。

根据本文开头提到的对社会组织管理体制考查的四个方面, 现在可以对这一阶段社会组织管理体制作如下的总结:

第一, 从根据政治局指示制定的 1922 年 8 月 3 日法令的出台和实施可以看出, 当时社会组织法令的颁布者虽然是苏维埃全俄中央执委会与俄联邦人民委员会, 但是方针和制度的实际决定者是苏共, 苏维埃中央执委会与人民委员会只是执行苏共的决定。1922 年 8 月法令的篇幅不大, 只有 13 条, 反映这一时期的管理制度还不系统。由于 1924 年 5 月后管理制度发生了变动, 所以它又是不稳定的。第二, 社会组织准入条件的依据是宪法, 即只要不违反宪法, 社会组织就被准予注册和开展活动。第三, 从审查社会组织的章程、对其进行注册和管理的主体看, 1922 年 8 月条例颁布前后, 从多元变为一元化, 即由国家政治保卫局委托内务部进行。第四, 从管理主体塑造的整个社会组织的面貌来看, 这一时期基本是自主性社会组织占主体(据 1928 年 1 月 1 日内务人民委员部统计部报告的数字, 1924 年 7 月 1 日自愿型组织有 545 个, 帮助政权类的组织数量是 0 个)^②。

总之, 由于这一时期社会组织的准入标准是苏维埃国家宪法和法律的大框架, 党仅决定对社会组织领导的大方针, 对社会组织具体活动没有干预, 因此社会组织尚有部分自治空间。所以, 有理由称这一阶段是在宪法框架下部分自治的社会组织管理体制。

与此同时, 这一时期社会组织管理还存在着另一个方面: 由于 1922 年 8 月的条例赋予国家政治保卫局通过内务部对现存社会组织章程进行初次审查, 给予最后的意见, 由国家政治保卫局裁决新成立的社会组织的命运, 这表明, 党将对社会组织的管理置于国家政治安全的高度之上。正是由于有这

① Ильина И.Н. Общественные организации России в 1920-е годы. С.64.

② Власов Ю. Добровольные общества как форма советской демократии// Советское строительство.1929. №4. С.65.需要说明的是, 由于当时社会组织登记注册的资料不完备, 这一数字只是大致的, 并不完全准确, 因为有些帮助政权类组织在 1924 年以前已经成立了。

一定性，当苏共认为社会组织的发展有碍于国家政治安全以后，便开始调整对社会组织的管理——在宪法框架下部分自治的管理体制从1924年5月以后发生了变化，社会组织管理体制的发展进入第二个阶段。

二、苏共主导型管理体制的构建（1924年5月至1929年底）

1925年12月，在向联共（布）第十四次代表大会所作的政治报告中，斯大林提出了消灭私人资本的目标：“彻底消灭私人资本，并使社会主义在我国取得完全胜利即建成完全的社会主义社会”。^①此后开始商业领域排挤私商，以多种所有制为重要内容的新经济政策开始收缩。与此相对应，实际上在此之前，从1924年5月开始，社会组织管理体制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其发展进入第二个阶段：构建苏共主导型管理体制。^②

当然，构建苏共主导型社会组织管理体制有其特有的内在原因。由于实施新经济政策以后群众参加社会组织的积极性增长，至1920年代中期，社会组织活动已经达到很大的规模。而正是这一点，越来越引起政权机关的担忧——社会组织活动影响辐射的不断增长，使得将其纳入党所指引的政治和意识形态框架内变得越来越困难。

例如，新经济政策时期虽然战斗的无神论者联盟大张旗鼓地宣传无神论，而与此同时，“神智学协会（Теософического общества）”、“救世军（Армии спасения）”、“俄罗斯人智学协会（Русского антропософического общества）”^③以及其他带有唯心主义宗教色彩的联合团体也在活动。在1920年代下半期，在苏联保留的“自治俄罗斯共济会分会（*ложка Автономного Русского масонства.*）”一直在非法从事活动。“纪念Л·Н·托尔斯泰真理自由协会”（*Общества истинной свободы в память Л.Н.Толстого*）也不时发出与官方不和谐的声音^④。上述这些具有唯心主义、神秘色彩的组织与党所主张的唯

① 《斯大林全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年，第246-289页。

② 在该阶段党不直接控制社会组织，不干预社会组织的具体活动，因此，使用苏共“主导”的概念是较为合适的。

③ Чураков Д.О. Политическая жизнь в годы нэпа. <http://www.portal-slovo.ru/history/40843.php>

④ Общественные организации. <http://eng.polymus.ru/rv/100y/index.php?s=1>

物主义和革命的意识形态发生了矛盾。“农民联盟（крестьянского союза）”是当时引起党的上层更为头痛的社会组织。根据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报告，“与1924年工农业产品剪刀差相联系，农民联盟思想的鼓动强化……农民联盟提出自己的目标，是在无产阶级专政体系内部组织农民的自我管理，或者是在政府内部划分为两个部：城市工人部，农村农民部”。^①1925年初，在国内22个省都建立了农民联盟。对乌克兰地区18个农民联盟的调查表明，这些组织提出了“像工会能够提出工人劳动的价格一样，农民联盟是能够提出农民劳动价格”的机关。这些口号表明，农民联盟虽然是为了捍卫经济利益，但是其目标却带有不自觉的政治性。农民的自主活动，甚至纯粹工联主义（тред-юнионистское）的活动，也引起了党的上层机关的担忧。农民联合为自主组织的思想被解释为右翼社会革命党的行为，农民联盟的拥护者陷入被追捕和被监禁的境地。后来，农民联盟的活动被禁止。^②此外，尽管内务部在1922年8月的重新注册中吊销了“《政治红十字》协会（Общества «Политический Красный крест»）”的活动，但是作为著名社会活动家的原协会领导者还在继续从事援助政治犯的工作，这也令苏维埃政权头痛。笔者在哈佛大学LAMONT图书馆查阅苏联历史解密档案，发现了以“别什科娃：援助政治犯（Е.П.Пешкова. Помощь политическим заключенным）”为题的大量缩微胶卷档案，^③可见当时营救政治犯的活动是相当活跃的。

通过上述实例可以看到，自愿社会组织的活动，无论在思想上还是在具体活动中，都顽强地表达特定群体的意识形态及其对自身利益的诉求，这与苏维埃政权希冀的政治安全产生了矛盾。为了维护国家政治安全，1922-1928年，内务人民委员部禁止了120多个社会组织的活动。与此同时，党开始采用新形式对社会组织进行管理。这种转向是从改变对社会组织的领导方针及以此方针为基础改变社会组织的面貌两个方面展开的。

① Совершенно секретно: Лубянка-Сталину о положении в стране 1922-1934гг. Т.2. М.: Наука. 2003. С.304.

② Чураков Д. О. Политическая жизнь в годы нэпа. <http://www.portal-slovo.ru/history/40843.php>

③ Archives Of The Soviet Communist Party And Soviet State. Ф.Р-8409.Оп.1.д.10 49,1050.1346. Harvard University Library.

(一) 通过颁布党的决议，确立苏共对社会组织的主导^①地位：党对社会组织的领导涵盖了宏观至微观的方方面面，而且日益制度化。

1924年5月23-31日召开了联共（布）第十三次代表大会，大会通过了“关于党的建设的当前任务”的决定，第一次明确提出党组织要成为社会组织思想和政治的领导。这一决议是社会组织管理体制发展的一个转折点。决定指出：

“党应当大力协助这些组织（指社会组织，笔者注）开展工作。

党员应当积极参加这些组织。党组织应当协助这些组织正确地进行组织建设，协助它们有效地吸引党员工人和非党员工人参加它们的工作，并且名副其实地成为它们思想上和政治上的领导。”^②

为了贯彻这一决定的精神，1925年2月16日，联共（布）中央组织局通过了另一个标志性文件——“关于自愿群众性组织（О добровольных массовых организациях.）”的决议，对党领导社会组织的方方面面作出了重要而具体的规定。其主要内容包括：

1、确定了党对社会组织领导的原则：

决议规定：“协会领导机关的工作是党的工作形式之一”；

2、提出了党领导社会组织的一系列措施：

第13条中提出，委托党中央两部门进行考察调研，提出党全面领导社会组织的制度建议，建议的内容涵盖了从党如何进一步领导，到社会组织的结构、活动以及对社会组织注册程序的方方面面：“委托中央宣传鼓动部会同中央组织分配部对个别协会进行考察，向中央书记处提交关于党对协会进一步领导的形式、关于协会组织结构、关于协会工作内容以及产生新的协会的程序的建议”。

第14条提出，派遣领导干部到协会中央和地方机关进行领导工作：“为

① 主导是指主要的并且引导事物向某方向发展的，或者起主导作用的事物。领导一般用于管理学和政治学中，是指率领、指挥、指导下属，为实现组织或政治目标而努力的过程。之所以称之为苏共“主导”型，而不是“领导”型，是因为社会组织是群众性组织，党在形式上并不直接领导社会组织的活动。

② 《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第二分册），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年，第422页。

了与被协会（成员）选举产生的协会相应（管理）机构建立更紧密的联系，并深化对其工作的系统的领导，确认，必须从宣传鼓动部拨出专门的负责人进行这种工作”。

第 15 条确认，“在认为协会领导机关的工作是党的工作形式之一的情况下，必须吸收能有足够的时间和对自己的工作负责的同志到协会的中央和地方机关”。^①

第 11 条规定了党领导基层协会工作的形式与内容：“党对协会的领导工作通过共产党党团进行，党团对协会的工作应该放在最大程度发挥其成员的主动精神和深化工作的思想内容上。”^②

3、提出了削减社会组织数量的方针：

为了解决社会组织发展规模大、党难以控制的问题，决议第 1 条提出：“注意到，某些群众组织的活动被观察到出现平行重复的现象……中央组织局认为，切实地以各种方式削减现存组织的数量，是完全可能的。”^③

4、提出在农村以帮助政权^④类组织挤压自愿型组织空间的方针：

决议第 3 条确定，在农村只允许帮助政权类社会组织进一步发展：“特别谨慎地对待自愿协会在农村的展开，在农村只促进建立利益贴近农村、懂得农民那样的协会。认为，在最近的时期，从党的方面在农村只积极帮助诸如‘扫盲’协会和与国家国防相联系的协会是可能的。”^⑤

5、对社会组织的活动作出了具体的规定，主要有：

第 5 条规定了社会组织的年费：“认为所有协会都应确定一定的最低的年费（例如从 50 戈比到 1 卢布），以个人缴纳的方式，从薪水中扣款缴付”。

① Российская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ая партия. Справочник партийного работника. Вып. Пятый.(1925 г.). М.: Госиздат, 1926. С.292.

② Там же.

③ Там же, С.291.

④ “帮助政权组织”指那些在党的支持下成立和活动，其宗旨是协助执行苏维埃政权方针的组织。因这类组织成员数量众多，有“群众性组织（Моссовые организации）”的称谓。1928 年在工农检查人民委员部（НК РКИ）给内务部的一封信件中，将群众性组织称为“帮助苏维埃政权组织（Общества содействия Советской власти）”（参见 ГАРФ.Ф.Р-393.Оп.81.Д.95.Л.185.）。由于该概念更能反映这类组织的宗旨，俄学者经常使用“帮助政权组织”的概念。

⑤ Российская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ая партия. Справочник партийного работника. Вып. Пятый.(1925 г.). С.291.

第 7 条规定了社会组织活动应该在基层展开，尽量利用现有的场所：“协会工作的主要基础应该在工厂、机关。日常的文化教育协会必须与现存的苏维埃、工会的分组活动相联系。协会自己的工作，主要应该通过现有的俱乐部、农村阅览室进行。一般来说，不应该建立协会自己专门的俱乐部”。^①

该决议发布以后，党中央宣传鼓动部会同中央组织分配部根据决议第 13 条指示，对协会活动进行了调查研究，并将调研结果提交中央委员会。以该调研为基础，1927 年 5 月 27 日，中央委员会通过了“关于自愿协会的工作（О работе добровольных обществ）”的新决议，决议规定委托上述两个部门在一个月期限内制定党领导协会工作的指令：

“Г）委托宣传鼓动部会同中央组织分配部在一个月期限内制定关于党对无论是在企业还是在俱乐部、住房合作社等处的自愿协会基层组织进行领导的指令。”

同时，党中央委员会亦直接颁布了对一些具体问题的指令：

“Б）认为，将扫盲协会、儿童之友协会、无线电之友协会、苏联电影和摄影之友协会、无神论者协会、俄罗斯红十字会的基层组织转交俱乐部、住房合作社、住房公社、农村阅览室，以便更多地吸收劳动者和活跃这些协会的工作。

上述被划拨的协会中那些工作得好，在企业中的工作体系组织得更成熟的支部留在企业里。”^②

这两个决议，表明对社会组织的领导开始向苏共主导型转向。

为什么将转向之后的社会组织管理体制称之为苏共“主导”型呢？

原因有两点：第一、在新的管理体制下，党对社会组织的领导涵盖面广，权力集中的程度高。我们看到，在上述决议中，党对协会的领导既包括大政方针：如 1925 年决议提出的“领导的形式、关于协会组织结构、关于协会工作内容以及产生新的协会的程序”（第 13 条）、支持何种社会组织（第 3

① Российская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ая партия .Справочник партийного работника. Вып. Пятый.(1925 г). С.291-292.

② О работе добровольных обществ. (Постановление ЦК от 27 мая 1927г.) Всесоюзная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ая партия (Большевиков).Справочник партийного работника.Вып. Шестой.Часть 1(1927 год).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е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1928. С.666-667.

条)、削减社会组织数量(第1条)、向社会组织派遣领导干部(第14条)等这样一些根本性、原则性问题,同时也包括社会组织成员缴纳年费数量和缴纳形式(第5条)、活动场所(第7条)等具体活动的指示。总之,从宏观到微观,社会组织的活动都置于党的领导之下,使党对社会组织的领导具有了全面、具体、系统的性质。权力集中程度高,是指这些领导方针制定的全过程:从对社会组织个案进行调研、提出方针建议、到制定方针指令的权力,悉数掌握在苏共手中。

第二、所谓苏共主导“型”,还体现在力求使苏共主导社会组织成为稳定的管理模式。

从1925年2月16日至1927年5月27日这两年间苏共关于社会组织决策的形成过程看,中央组织局先是委托中央两部门对党领导社会组织的工作进行考察调研,提出制度建议,然后以此为基础,中央委员会又提出委托上述两部制定党领导社会组织的指令。从提出建议再到制定指令,说明中央委员会对社会组织实施领导的目标,不是一事一议,发布临时性、涉及局部问题的指令,而是进行具有普遍性的、制度化的管理,换言之,苏共的目标是使党主导社会组织具有稳定和模式化的性质,因此称之为向苏共主导“型”转向。

(二)在实践中贯彻上述决议,开始构建苏共主导型管理体制和帮助政权型组织为主的社会组织体系。

上述决议颁布以后,苏共迅速组织力量实施决议的精神,社会组织管理体制与社会组织的面貌开始发生变化。

首先是党通过向社会组织派遣领导干部,逐渐使社会组织置于党的领导之下。在1925年2月16日中央组织局决议提出向社会组织中央和地方机关派遣领导干部之后,在党的正式干部名册中可以看到,任命了51个人到共青团,43个人到工会中央,426个人到工会中央理事会,100个人到群众性组织担任领导工作。^①

例如,“扫除文盲”协会的主席是全俄中央执委会主席、苏联中央执委会主席М·И·加里宁;“战斗的无神论者联盟”的主席是中央监察委员会

^① РГАСПИ.ф.17.оп.68.д.459.л.6-12.

委员 E·M·雅罗斯拉夫斯基；战斗的唯物主义协会的主席是 H·И·布哈林；对外文化联系全联盟协会的主席是政治局委员 O·Д·加米涅娃；革命剧作家联盟主席是 A·B·卢那察尔斯基等；航空之友协会、苏联航空和化学工业之友协会主席是苏联人民委员会主席 A·И·李可夫；全联盟政治犯和流放者协会的主席是政治局委员 Я·Э·鲁祖塔克等。

由于向社会组织派遣领导干部，1924—1927 年的 3 年间，社会组织理事会中党员比例逐年上升。在执行这一方针之前，党员在社会组织理事会中的比例不足 20%。统计数字显示：在 1924 年 7 月 1 日，党员比例为 19.3%，而到 1927 年 1 月 1 日增加到 33.2%。

通过向社会组织派遣党的领导干部，使社会组织活动逐步置于党的领导之下。

其次，贯彻以帮助政权类组织挤压自愿型组织的方针，帮助政权类组织的数量迅速增长。

这可以从社会组织发展动态上清楚地看出。在颁布党领导社会组织的指令之前，全部社会组织绝大部分都是自愿型组织。根据俄罗斯学者的研究，到 1924 年 7 月 1 日，自愿型组织有 545 个，协助政权机关类组织的数量为 0。^①从 1924 年 5 月联共（布）十三次大会通过党领导社会组织的决议之后，开始出现帮助政权型组织：1925 年 1 月——24 个。这时，自愿型组织也增长到 674 个。1925 年 2 月 16 日联共（布）中央委员会组织局通过支持帮助政权型组织发展的方针以后，这类组织发展的速度加快：从 1924 年到 1928 年，自愿型组织增加了 2067 个，增加了 3 倍，而帮助政权型组织增加了 1836 个，增加了 76 倍。由于帮助政权型组织快速增长，挤压了自愿型组织的空间：1925 年时，帮助政权类组织仅占全部组织的 3.4%，而到 1928 年增长为占 40%；相反，自愿型组织从 1925 年占全部社会组织的 96.6% 下降到 1928 年占 60%。尽管从数量上看，自愿型组织仍然不少，但是由于自愿型组织多数是数十人至数百人、最多是数千人的组织，而帮助政权型组织单个规模大（百万人以上的不在少数），因此，帮助政权类组织数量的迅速增加，使得

^① Власов Ю. Добровольные общества как форма советской демократии// Советское строительство. 1929. №4. С.65.

这类社会组织在社会上影响迅速增长，有力地改变乃至决定了新经济政策下半年度社会组织的整体面貌和作用，体现了社会组织的转型。

再次，贯彻减少社会组织数量的方针，大规模注销自愿型社会组织，重塑社会组织整体面貌，形成了帮助政权机关型为主的社会组织体系。

如上所述，在 1925 年 2 月 16 日中央组织局的决议中首次提出了削减社会组织数量的任务。^①实施这一决议的结果，是 1928 年 2 月通过了重新注册——大规模削减社会组织的条例。

1928 年 2 月 6 日，中央执委会和俄联邦人民委员会通过的《关于批准不以营利为目的的协会与联盟的条例》（Об утверждении Положения об обществах и союзах, не преследующих целей извлечения прибыли）开始生效。这个条例规定：1922 年 8 月 3 日通过的法令与 1922 年 8 月 10 日通过的法令细则被废止。根据 1928 年的这一条例，1922 年合法注册的社会组织章程需进行重新审核，并决定是否准予其重新注册。

1928 年条例的篇幅比 1922 年条例大许多，包括序言 5 条，正文 32 条，条例由 3 个部分组成：总则（1-9 条）；批准协会与联盟的章程程序（10-19 条）；注册的程序（20-32 条）。

就篇幅而言，1928 年条例共计 37 条（32 条条例与 5 条序言），比 1922 年 8 月的法令（13 条）多出了 1.84 倍。1928 年条例数量的增长，是苏维埃政权经过近 6 年的社会组织管理实践，积累了比较丰富的经验的反映。同 1922 年法令相比，1928 年条例对社会组织的概念、准入标准和程序、注册程序、财务管理以及注销程序等，都进行了比较详细的规定，对社会组织方方面面的规定已经完善得多了。

在总则中第一次阐明了协会和联盟的概念与内涵的不同，“不以营利为目的的公民自愿联合——联合参加者不以获得物质利益或满足经济需求为一贯目的共同活动的客体，被称为协会”。“不以营利为目的——其活动与利润无关或其目的、任务与不营利目的相类似的两个或两个以上，被规定程序批准并注册的协会的联合，称为联盟”（第 2、6 条）。

^① Российская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ая партия. Справочник партийного работника. Вып. Пятый. (1925 г.). С.291.

该条例规定了加入社会组织成员的年龄和政治成分的限制：“所有年满 18 岁，但是未被剥夺苏维埃选举权的公民，都可以成为不以营利为目的的协会的创立者，或者被选举成为协会执行机关成员”（第 9 条）。

条例确认了工会、工会全俄中央理事会这些以特别程序登记的组织，宗教组织不包括在条例内（第 4、5 条）。

最值得关注的是，新的社会组织条例对准入条件的规定有了变化。在“批准协会与联盟的章程程序”的第 16 条中规定，“如果协会或联盟章程的目的，或其活动的方式与苏联或俄联邦宪法相悖，章程将被拒绝批准。威胁到社会的稳定和安全，激起民族纠纷和敌对的，查明提出的目的是要进行（通灵术、招魂术和其他）的集会，以及目的不明确或不确定的章程，不能得到批准。当协会或联盟确立的目的与同一地区早期已被批准的联合的目的相类似的话，在这种情况下也可以拒绝批准章程。”

同时规定了所有社会组织的章程必须重新接受审查，在两个月内必须重新注册（第 8 条、第 20 条）。“在两个月期限内未完成注册的协会或联盟，被认为是不能运作的，其创立者必须将章程返还批准它的组织（第 22 条）”。

该条例还规定了对社会组织活动和财务进行监督和决定是否注销社会组织的条款（第 29、30、31、32 条）。

1928 年条例同 1922 年条例相比，似乎有宽有严：

第一、注册时间的规定似乎更为宽松：1922 年条例留给社会组织注册的时间只有两周，而 1928 年条例将注册期限放宽至两个月；

第二、在准入条件的规定上范围明显收缩，旨在削减社会组织数量，将社会组织的发展限定在规定内的类别的目标十分明显。

在 1922 年 8 月的条例中，准予注册的唯一标准是不违反苏维埃国家宪法和法律。而在 1928 年 2 月的条例中，除确认这一条款外，还增加了两类拒绝批准其章程的标准：第一类，威胁到社会的稳定和安全、激起民族纠纷和敌对、进行具有封建迷信色彩的集会、目的不明确或不确定的章程；第二类，与“已被批准的联合的目的相类似”。在增加的这两项标准中，维护社会的稳定安全、民族和谐，大体可以认为能够被遵守宪法涵盖；而其他条款，则具有缩小注册范围的性质：条款中规定，如果申请注册的社会组织与

“已被批准的联合的目的相类似”，则也将被拒绝注册，那就既不是因为违反宪法，也不是威胁到社会的稳定和安全、民族和谐，而只是因为“重复”建立，其目的显然是为了减少同类组织的数量。在社会实践中，同一种类的组织数量越多，说明这类宗旨的社会需求越大，群众参加的积极性越高。1928年条例削减同类组织，说明了当局不希望群众参与社会组织的积极性过高，而希望将这种积极性限制在可控的范围内。后来的社会组织管理实践证明，压缩宗旨相类似的社会组织，目的是便于统一利用行政系统进行管理。另外，“目的不明确或不确定的章程，不能得到批准”。何谓目的不明确或不确定的章程？没有明确的界定，这就给审查机关留下了很大的解释空间。总之，1928年条例的准入条件，一方面比宪法允许的范围缩小，另一方面，留给审查机关很大的解释空间，使其可以以此为理由不批准或关闭不合时宜的组织。无怪乎俄罗斯学者认为，1928年条例的目的，就是给削减社会组织提供根据。俄罗斯学者的观点未必没有道理，因为这次重新登记的实践表明，绝大部分自愿社会组织被注销掉了^①。

为了执行重新注册的法令，1928年2月条例颁布以后，国家政治保卫总局、教育人民委员部、卫生人民委员部、科学机构、博物馆和艺术科学部门管理总局，艺术事业总局、艺术工作者工会中央委员会以及其他国家机关共同行动，调查各种形式的社会组织，制定缩减社会组织数量的建议。

1929年8月-12月，内务人民委员部下达了附有相应的国家机关作出的关于社会组织进一步命运结论（注销、合并，进一步调查）的协会和联盟的名单。这次重新登记的结果，多数在1920年代活跃的自主社会组织被注销，形成了帮助政权型组织为主的社会组织体系。但是，这一进程还在继续。到1930年代初，全俄和全苏的社会组织削减到了120个。

1924年5月以后至1929年底，苏共通过颁布党领导社会组织的决议和条例，向社会组织派遣领导人，壮大帮助政权型组织，挤压、注销自愿型社会组织，减少社会组织数量等实践，大体形成了由四个环节构成的苏共主导

^① 至1930年代初，全俄和全苏社会组织削减到了120个。30年代，这个进程还在继续。其余的社会组织绝大多数在1930年代中期前消失，只有10个以内存在到40年代，1个——全俄剧院协会存在到1986年。

社会组织的管理机制：

制定方针（由党确定社会组织活动的领域、宗旨、管理方针）→准入（通过对社会组织章程进行审查，准予或拒绝其注册）→具体领导（派遣党的领导干部到社会组织理事会进行思想和组织上的具体领导）→重新注册和清洗（通过重新注册，撤销不符合党的要求的组织，形成符合党的要求的社会组织体系）。在这四个环节中，第一个环节，即由苏共制定社会组织活动与发展的方针是苏共主导型管理体制的基础和目标，其他环节都是围绕着这个环节运转，保障实现这一目标的。

从 1922 年 8 月至 1929 年底，本文开头确定的考察社会组织管理体制的四个方面均发生了根本变化：

（1）苏共制定社会组织的领导方针和制度，实现了从不系统、不全面、不稳定到系统全面和制度化的转型；

（2）社会组织准入标准，实现了从遵守国家宪法和法律这一比较宽松的条件，到缩小为融入了其他政策标准的转型；

（3）审查社会组织章程、对其进行注册和对其活动进行监督和调控的主体，确定为国家政治保卫局和内务部，也已定型；

（4）整个社会组织体系，实现了从自愿组织为主到帮助政权型组织为主的转型。

总之，到 1929 年底，苏共主导型社会组织管理体制的构建已大体完成。

三、苏共主导型管理体制的确立（1930 年 8 月）

为什么说 1929 年底社会组织管理体制的构建只是大体完成？因为在 1928 年条例中，党要塑造何种社会组织的取向还是粗线条的：在界定社会组织概念时仅提出了“不营利”这一个条件，只是在“批准协会与联盟的章程程序”的第 16 条中规定了拒绝批准的章程的五个条件，但是“保卫社会稳定和安全”、不“激起民族纠纷和敌对”等条款，意识形态和国家战略的色彩并不十分明显，似乎放到其他制度的国家中大体也是可能适用的。党要塑造何种社会组织的线条的细化，和这一体制转型彻底完成的标志，是 1930

年颁布的新的社会组织条例。

1930年8月30日通过了《关于自愿协会与联盟（联合、俱乐部、协会、联合会）之条例》（Положение о добровольных обществах и союзах (объединениях, клубах, ассоциациях, федерациях)）。这一条例已经非常明确地将社会组织的宗旨规定在了“社会主义建设以及促进巩固国家国防”的框架内。

这首先体现在1930年条例“关于自愿协会与联盟地位”的第1条，在界定协会与联盟概念时提出，“自愿协会与联盟（联合、俱乐部、协会、联合会）是城乡劳动群众在积极参加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以及促进巩固国家国防中提出自己的任务的具有独立性的社会组织”（第1条）。

此外，1930年条例用国家战略和意识形态统一了社会组织活动的各个方面——从政治方向到活动领域。规定“自愿协会与联盟……展开活动应符合整个国家的国民经济和社会文化建设的计划，同时实际参加解决苏维埃政权社会主义建设相应部门的首要任务”（第3条）；规定了社会组织活动的指导思想——“科学研究活动应在保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问题的基础上展开”（第3条）。该条例继续确认由维护国家政治安全的行政机关批准或取缔社会组织的活动“由内务人民委员部批准全联盟团体和联盟的章程”（第16条），对“那些其活动方法和任务与苏联和俄联邦法律或苏维埃政权总的政策相抵触的协会与联盟，其章程不予批准”（第22条）。^①

1930年条例以社会主义建设的政治方向、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巩固国防建设的战略目标，使之具有鲜明的苏联社会主义的特色。该条例的颁布和运行，标志着自愿组织为主的社会组织体系已不复存在，宪法框架下自治活动为主的管理体制终结，社会组织管理体制向苏共主导型转型完成。从此以后，社会组织成为维护国家政治安全和实现国家战略的忠实工具，为苏

^① Собрание узаконений и постановлений рабочего и крестьянского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а РСФСР.1930. №44. С.527; Ирошников М.П., Ваксер А.З. Россия в хх веке. Народ, власть, войны, революции, общество.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ского университета, 2005. С.560.

联时期的政治稳定和国家战略实施作出了积极的贡献^①。由于 1930 年的条例具有如此重要的标志性意义，因而其作为指导苏联时期社会组织活动的原则条款，一直使用到 1990 年 10 月颁布新的社会组织法之前。

【Abstract】 The New Economic Policy period is a “golden era” for the development of Soviet social organizations. During this period, the Soviet Union explored to establish a social organization management system. From March 1921 till May 1924, the social organization management system was created, establishing a partially autonomous social organization management system under the constitutional framework. From May 1924 till February 1928, with the contraction of market economy mechanisms in the economic field, the Soviet Communist Party-led social organization management system began to be constructed. In August 1930, new regulations regarding social organizations was adopted, clearly linking the purpose of social organizations with the Soviet Union’s socialist strategic objectives. The promulgation and implementation of this ordinance marked the end of the partially autonomous management system under the Constitution and the Soviet Communist Party-led social organization management system was established. The creation and establishment of social organization management system during the New Economic Policy period is a epitome and an integral part for the young Soviet to explore and establish a model in governing the country from relative decentralization to centralization.

【Key Words】 New Economic Policy, Social Organization, Social Organization Management System, Creation, Establishment

【Аннотация】 Период новой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й политики --- это «золотой век» развития социальной организации в Советском Союзе. В этот период Советское государство изучало вопрос создания системы управления

^① 例如，1929 年 6 月召开了全苏联反宗教团体大会，大会决定号召和发动盟员捐款，用于制造飞机、大炮、坦克和潜水艇，保卫国家。参见 F·赫克：《俄国革命前后的宗教》，高骅、杨缤译，杨德友、贺照田校，上海：学林出版社，1999 年，第 332 页。

социальной организацией. В период с марта 1921 г. по май 1924 г. была создана система управления социальной организацией, также в конституциональных рамках была создана частично автономная система управления социальной организацией. С мая 1924 г. по февраль 1928 г. вслед за сокращением применения мер механизмов рыночной экономики в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й сфере под руководством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й партии Советского Союза начала строиться система управления социальной организацией. В августе 1930 г. были приняты новые правила социальной организации, отчётливо связавшие цели социальной организации со стратегическими целями социализма Советского Союза. Принятие и реализация данных правил означало завершение частичной автономии системы управления в рамках Конституции, установилась система управления социальной организацией под руководством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й партии Советского Союза. Создание и установление системы управления социальной организацией в период новой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й политики — это попытка и создание молодым советским государством модели управления страной, воплощение и неотъемлемая часть перехода от относительной децентрализации к централизации.

【 Ключевые слова 】 Новая экономическая политика, социальная организация, система управления социальной организацией, создание, установление

(责任编辑 韩冬涛)

苏联新经济政策时期 城市住房管理体制转型初探*

张丹**

【内容提要】战时共产主义时期,受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直接过渡思想的影响,苏维埃政府颁布了集中化的住房管理政策,试图迅速改善劳动群众的居住条件,一举解决住房危机。然而在实践中,因为国家无法独自挑起解决住房危机的重担,以及住房管理的责权关系不明确等原因,集中化住房管理体制既无法有效管理住房,也不能整治战争对住房事业造成的创伤和解决住房危机。到了新经济政策时期,为了继续解决住房短缺问题,苏维埃政府调整了住房管理政策,住房管理体制由国家集中管理向国家、集体和个人分散管理转型。分散化住房管理方式取得了积极成效,城市居民的居住条件得到了初步改善。

【关键词】住房管理体制 集中化 分散化

【中图分类号】K512.53**【文章标识】**A**【文章编号】**1009-721X(2012) 03-0126-(18)

住房是人类生存的基本条件之一,关系到民众身心健康、劳动态度及社会和谐稳定等诸多层面,是各国政府最为关切的一项基本民生问题。解决住

*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新经济政策时期的苏联社会》(项目批准号:11FSS001)的阶段性成果。

** 张丹,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房问题的决定因素是住房管理体制，包括住房所有制、建设、分配和管理等四方面的政策及其运行机制。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在创建伊始，面临着历史遗留和战争创伤造成的严峻住房形势。对此，政府实行了集中式的住房管理体制，也就是将住房所有权、建设权、分配权和管理权全部集中到国家手中，统一管理，试图通过这种方式迅速改善劳动群众的居住条件，一劳永逸地解决住房危机。然而，该管理体制只运行了四年便难以为继，在新经济政策时期向分散化住房管理体制转型。

长期以来，我国史学界较少关注苏联的住房管理体制。俄罗斯史学界关于苏联住房问题的研究成果，多集中于对 1917 年至 1920 年代住房管理体制的深入挖掘，但是，尚缺乏结合时代背景、系统而动态地研究两种住房管理体制的内在逻辑关系的成果。^①由此，他们对于十月革命后实行的集中化住房管理体制为何无法运行下去，换言之，到了新经济政策时期，住房管理体制为何要转型，究竟发生了怎样的转变，其解决住房危机的成效如何等问题，均尚未作出很好的解答。因此，本文拟以苏维埃政府在 1917—1928 年颁布实施的住房政策为依据，吸收俄罗斯学界的最新研究成果，通过考察两种住房管理体制下的住房政策及运行情况，尝试回答上述问题。

一、战时共产主义时期集中化的住房管理体制

新生的苏维埃政权诞生不久，就被迫与国内外干涉力量作殊死的搏斗。

^① 参见 Ярославцева Т.А.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ая политика в жилищно-коммунальной сфере на дальнем востоке в 1920-е—1930-е годы// Отечественная история. 2006. №.5. Орлов И.Б. Жилищная политика советской власти в первое послереволюционное двадцатилетие. <http://orlov-i-b.narod.ru/otechist/Kvartira.doc>. Меерович М.Г. Квадратные метры, формирующие сознание – жилище, как средство управления людьми: жилищная политика в СССР. 1917-1932 ГГ. <http://www.circle.ru/personalia/>. Черных А.И. Жилищный передел---политика 20-х годов в сфере жилья// Социологические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1995. №.10. Смирнова Т.М. Демунципализация домов в годы нэпа: восстановление жилого фонда или обогащение коммунальных служб? (По материалам Москвы и Московской губернии). Российская академия наук институт российской истории. НЭП: экономические, политические и социокультурные аспекты. М.: РОССПЭН, 2006.

在战争年代，受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国家如何解决住房问题^①，以及战时共产主义时期直接过渡思想的影响^②，布尔什维克党制定了将住房公有化并集中管理的住房政策，力求迅速改善劳苦大众由来已久的住房困难，^③一举解决住房短缺危机。

① 在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住宅问题的若干论述里，夺权后的无产阶级要消灭住宅私有制。通过剥夺房主，工人搬进房主的房子里共同居住，来立即解决住房危机。社会主义国家里，住宅具有公共福利性质，无需通过商品货币关系即可获得。参见“共产党宣言”、“共产主义原理”和“论住宅问题”，分别引自《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93-294页；《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239-241页；《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56-157页。这些原则构成了俄共（布）领导人关于无产阶级国家解决住房问题的基本认识。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一书中分析了恩格斯关于住宅问题的论述，提出“无产阶级的国家……也会‘下令’占据住宅和剥夺房屋”。参见《列宁选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12-213页。在“布尔什维克党能保持国家政权吗？”一文中列宁同样指出，在社会主义国家里，将穷人分配到富人的住宅里共同居住，就可以迅速改善穷人的居住条件。参见《列宁选集》第三卷，第303、304页。

② 连年战争，俄国经济千疮百孔。为了赢得内战，布尔什维克党被迫实行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将一切经济命脉集中在国家手中，完全取消商品货币关系。在这种集中化的经济管理方式下，新政权不断赢得战争的胜利，这使布尔什维克党产生了一种错觉，认为可以通过非常政策和措施直接过渡到共产主义。这种经济管理思路对住房事业产生了深刻影响。执政党试图抛开市场机制，采用纯粹的行政手段将住房公有化并由国家集中管理，一举解决住房危机。

③ 十月革命前，俄国城市居民人均居住面积十分狭小。1913年，城市人均居住面积4.4平方米。引自 Аверченко В.А., Царев И. Г. Жилищное строительство---старая песня о главном// Экономика и организация промышленного производства. 2005..№.7. С. 46. 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国内战争又使住房蒙受巨大损失，城市住房总面积的14%报废。引自 Араловец Н.А. Городская семья в России 1897-1926 гг. Историко---демографический аспект. М.: ИРИ РАН, 2003. С.170. 仅1918-1920年，住房总面积的损失就超过20亿金卢布。引自 Аркадьев М. О жилищном строительстве в СССР. М.: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е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1949. С.12. 因此，新政权诞生之初就面临住房短缺的危机。总体紧张的住宅资源危机又因巨大的阶级差别而加剧。十月革命前的俄国，工人普遍栖身于陋室、地下室、工厂的集体宿舍及客栈里。对于他们来说，富人的宫殿、府邸是力量、权力和品味的象征，能够住进资产阶级豪华、讲究的大宅院是工人阶级的最高理想。引自 Составление и редакция: Уильям Брумфилд и Блэр Рубл. Жилище в России: век XX. Архитектура и социальная история. М.: «Три квадрата», 2001. С.53. 这种阶级差别还表现在房租上。列宁曾写道，居民中的底层阶级……住在最窄、最坏的房屋中，但每一平方英尺的房租却最贵。按每一单位面积计算，任何工人宿舍或贫民窟的房租都要比涅瓦大街上任何一所华丽住宅的房租昂贵。引自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史》第二卷，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0年，第576页。

于是，在住房所有制方面，促使住房市有化^①的政策出台。1918年8月20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颁布了《关于废止城市不动产的私有财产权》的法令：在人口超过一万人的城市里，所有建筑物……如果其总价值或租赁收入超过地方政权机关规定的限度，就要废除其私有财产权，交给地方政权机关支配。对于非资本家的房屋……不能收归市有。^②这样，房屋市有化运动在全国展开。人口在一万人以上的大中小城市，超过地方政权机关所规定限度的一切私有房产，都要被收归市有。而国家之所以没有制定将全部私有房屋收归地方苏维埃的政策，主要有两点原因：第一，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房屋市有化的主要对象是资本主义房主的房屋，“绝不触犯非资本家房产的利益”。^③因此，依靠自己辛勤劳动获得住房的劳动者，其房产不应该被收归市有。第二，如果全部房屋市有化，意味着地方政府要承担所有房屋的维修、保养等责任。从当时的历史条件来看，政府实际上是没有资金和能力做到这一点的。从8月法令我们还知道，废除私有财产权的房产要“交给地方政权机关支配”。因此，地方苏维埃也是市有住房的管理机构，但管理的范围、职责和权限等问题在法令中并未提及。作为住房管理的一项常规内容，国家还对房租作出了规定。1917年11月10日，内务人民委员部颁布了《关于延期偿付住房费用》的法令，在战争时期和战争结束后3个月内，完全免除低收入工人和职员、前线战士家属的房租。^④部分工人和职员、前线战士家属的房租得到了免除。1921年1月27日，人民委员会颁布《关于免除房租》的法令：从1921年1月1日起，取消市有住房中工人、职员的房租。^⑤至此，居住在市有住房里的所有工人和职员的房租都被免除了。法令的内容表明，在社会主义国家里，市有住房的使用具有公共福利性质，无需付费。

① 住房市有化，是指将没收的私有房产转交地方苏维埃所有和管理。

② Сборник жилищного законодательства. М.: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Юридическ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1963. С.40-41.

③ 《苏联共产党和苏联政府经济问题决议汇编》第一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4年，第148页。

④ Шипилов М.А. Жилищный вопрос при капитализме и социализме. М.: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1964. С.70-71.

⑤ 法律原文规定从1921年1月1日取消房租。引自 Декреты Советской власти. том XII. М.: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1986. С.228.

在房屋市有化政策出台的同时，苏维埃政府也着手制定对收归市有的住房究竟如何重新分配的政策。政策的核心内容是“紧凑使用住宅”，其标准是遵循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卫生人民委员部在1919年颁布的法令，所有居民不分年龄一律人均8平方米。^①如果一套住宅中的人均面积超标，也就意味着出现了“多余的面积”，就必须允许其他人搬到这套住宅里共同居住，这就是“紧凑使用住宅”。于是，统一分配市有住房的原则确立下来了。从这一原则可以看出，在当时的苏俄，住房无须通过商品货币关系就可获得。

重新分配房屋只能暂时缓解住房短缺危机，若要根本改善劳动群众的居住条件，必须建设住房。为此，俄共（布）在1919年的党纲中规定了住房建设原则：消灭旧街区的人口稠密和不卫生现象，取消不适用的住宅，改善旧住宅，修建适合于工人群众新生活条件的新住宅。^②由此看出，执政党将通过“拆除或改造旧住宅”和“建设新住宅”两条途径，来改善劳动群众的居住条件。但具体如何建房，尚未出台后续政策。

综上所述，战时共产主义时期颁布的住房管理政策体现出国家集中管理住房的思路，是对十月革命前住房私有制和市场化格局的颠覆性变革。此外，这一时期的住房政策还带有明显的倾向性，即重在所有制和分配领域。国家试图通过将住房收归公有并重新分配，一举解决住房危机。因此，对于如何将私有住宅收归市有、如何统一分配市有住宅、分配后如何使用住宅，都作出了具体规定。囿于战时的严酷环境，布尔什维克党只能解决眼前的住房危机，还没有精力审慎、全面地考虑住房事业的问题。因此，究竟如何管理市有住宅、如何统一开展住房建设，还没有完全提上日程，只出台了方向性的、笼统的政策。

各项住房管理政策出台后，中央和地方各级住房管理机构开始贯彻落实，集中化的住房管理体制运转起来了。地方苏维埃下属的地方事业部是将私有住房收归市有这项工作的具体执行部门，在其领导下，房屋市有化工作取得了成功。市有化的房产面积占城市住房总面积的一半左右，价值占沙俄

① Ярославцева Т.А.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ая политика в жилищно---коммунальной сфере на Дальнем востоке в 1920-е—1930-е годы// Отечественная история. 2006. №.5. С.99.

② 《苏联共产党和苏联政府经济问题决议汇编》第一卷，第148-149页。

城市住房总价值的 74.6%。^①地方苏维埃将面积大、价值高的房产集中到了自己手中。房屋市有化工作开展的同时，在地方苏维埃设立的专门委员会和工会组织的领导下，各城市开始按照人均 8 平方米的标准重新分配住宅。一方面，积极组织工人搬迁到收归市有的住宅里；另一方面，区别对待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等非劳动者，或者令其与搬来的新住户共同紧凑使用自己的住宅，或者将其迁出原有住宅，甚至迁出城市。大规模重新分配住房的工作于 1921 年结束。从结果来看，这一工作进行得不彻底，只有部分工人搬迁到大地主资产阶级的住宅里。1917 年莫斯科花园环形路以内居住的工人只占工人总数的 5%，1920 年达到 40-50%。^②1919-1921 年，居住在彼得格勒市中心的工人由近 10% 上升到 20% 以上。^③工人无法全部搬迁的原因，主要是可供居住的市有住宅数量有限。受历史及现实因素的影响，需要改善居住条件的工人数量众多。相对于巨大的需求量，可供分配的市有住宅数量显得非常有限，况且还受到战争的破坏。因此，即使以紧凑使用的方式居住，收归市有的住房仍不能满足需求。此外，由于被机关占用等原因，市有化的住房并未全部分给劳动群众居住。因此，各城市可供工人搬迁的市有住宅数量较为有限，只有少部分工人可实现搬迁。直到 1923 年，彼得格勒仍有 60% 的工人居住在设施非常不完善的市郊住宅里。^④

按照将私有住房收归市有的法令规定，市有住房必须交给地方苏维埃管理。负责这项工作的机构仍是地方事业部，住户全体大会选举产生的房屋委员会则是基层的管理机构。由于政策制定的偏颇，这一时期，无论是地方事业部还是房屋委员会，工作重心都放在将住房收归公有和分配住房方面，很少从事管理住房的工作。况且，管理住房的政策又非常笼统，对于地方苏维埃和房屋委员会之间的责任义务关系、房屋委员会的具体职责等都没有规

① 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史》第三卷，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2 年，第 648 页。

② Орлов И.Б. Жилищная политика советской власти в первое послереволюционное двадцатилетие. <http://orlov-i-b.narod.ru/otechist/Kvartira.doc>

③ Меерович М.Г. Квадратные метры, формирующие сознание – жилище, как средство управления людьми: жилищная политика в СССР. 1917-1932 ГГ. <http://www.circle.ru/personalia/>

④ Там же.

定，职责不明确势必影响管理工作。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免费使用住房政策的实施，将劳动群众从十月革命前昂贵的房租费用中解放出来，显示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但从另一角度看，由于房屋的维修费用无法从房租中补给，国家不啻又给自己添加了一个大包袱。这样看来，战时共产主义时期的管理住房的工作基本流于空泛。

1919年的党纲规定，布尔什维克党将“尽一切力量来改善劳动群众的居住条件”，这项工作是由国家建筑委员会总体负责的。1919-1920年，在苏维埃政权新建的电站附近，诞生了第一批新住房。^①新住房虽数量不多，与庞大的需求量相比可谓杯水车薪，但显示出政府改善群众住房条件的积极姿态。囿于战时的特殊环境，统一规划、大规模建房的工作尚未提上日程。

综观战时共产主义时期集中化住房管理体制的运行情况，我们可以看到，这一体制取得了历史性的功绩：城市住房中面积大、价值高的住房都集中在地方苏维埃手中，公有住房在住房所有制中占据了主导地位。经过对住房的重新分配，部分工人群众从地下室、陋室搬进宽敞的大住宅里，实现了住进昔日资产阶级豪华、讲究的大宅院的“最高理想”，居住场所发生了质变。这种质变彰显了工人阶级的主人翁地位，缩小了沙俄时期居住条件的巨大差异。此外，政府向居住在重新分配住房中的劳动群众收取极其低廉的房租，甚至1921年还彻底免除了工人、职员房租，解除了他们沉重的房租负担。这些努力虽然涉及面十分有限，但却显示了苏维埃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为工人阶级谋利益的无产阶级性质。在肯定成绩的同时，我们也看到，集中化住房管理体制存在两个明显缺陷：其一，国家集各项住房管理权限于一身，却囿于战时环境和财力等因素，实际上不能独自挑起解决住房危机的重担。其二，住户与住房的责权关系不明确，势必影响住房的修缮和保护。总之，集中化住房管理体制虽然能够一举没收和分配住房，迅速解决部分劳动群众的住房困难，但是，对于有效地管理住房、整治战争对住房事业造成的创伤和解决住房短缺危机却不够充分。要想迅速恢复和发展住房事业，必须调整现行政策，改变集中化的住房管理体制。

^① Академия строительства и архитектуры СССР. Строительство в СССР. 1917-1957. М., 1958. С.311.

二、新经济政策时期转向分散化的住房管理体制

国内战争结束后，苏维埃政府继续推行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征集的余粮数额有增无减，引起渴望安定生活的农民群众的强烈不满，农民纷纷起义或暴动，布尔什维克党最可靠的支柱喀琅施塔得水兵也发动了暴动。全国性的经济政治危机迫使布尔什维克党必须改变现行政策，巩固执政地位。以 1921 年 3 月俄共（布）十大为标志，苏维埃俄国进入“新经济政策”时期。国家开始对经济进行分权管理，在一定程度上引入市场机制，刺激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这种分权管理经济的思路也影响到住房管理，为住房管理政策的调整提供了良好的大环境。

以此为契机，国家开始转变集中化的住房管理思路，将自己从住房管理的全权地位上解放出来，发动社会各界力量共同参与住房事业。分散化的住房管理政策陆续出台。

由国家单方管理市有房产转向国家、集体和个人分散化管理，是这一时期住房管理政策的一项重大转变。为了减轻市属公用事业部门的财政压力，在十月革命后收归市有的房产中，国家只保留面积最大、价值最高的少量房产，其余的市有房产小部分发还原主，归个人所有和管理，大部分租赁给住房租赁合作社集体管理。将市有住房发还原主，就是在完成大修住房的前提下，将市有住房中面积不大的房产发还给原业主，变为私有住房。1921 年 8 月 8 日，人民委员会颁布《关于修订收归市有的房产名单》，责成公用事业处在两个月内列出面积不大、不适合公用事业和国家需要的房屋名单，从应该保留和妥善管理的意义出发，转交给个人或者集体。^①12 月 28 日，人民委员会颁布《关于发还原主的条件》，规定只有在一年之内将住房修缮完好后才能将其发还原主。^②以上两个决议标志着将住房发还原主的工作正式启动。从上述内容我们知道，集体或个人在完成大修住房后，可以归还房屋所有权。因此，该决议能有效调动居民修缮住房的积极性。但是，国家并非将

① Систематический сборник декретов и постановлений по жилищному вопросу. М.: издание М.К.Х., 1923.

② Там же.

全部收归市有的房产都发还原主，而是将“面积不大、不适合公用事业和国家需要”的少部分房产发还。这一方面表明，国家试图通过将用途较小的房产交给个人管理的办法，减轻公用事业部门的管理负担，另一方面也表明，国家在有意地限制私有房产的规模。

除将少部分市有房产发还原主归个人管理外，国家将大部分市有住房都租赁给住房租赁合作社集体管理。1921年12月3日，莫斯科市苏维埃主席团制定了《关于住房合作社和建设合作社》的决议，^①市有住房的住户要组建住房合作社，以集体租赁的方式使用并管理房产。这样，在莫斯科，管理市有住房的任务将转交给住房合作社。1922年5月23日，《关于住房合作社》的法令在全国颁布，^②于是，国家的大部分市有住房转交给住房合作社管理。1924年8月19日，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通过了《关于住房合作社》的决议，^③租赁住房的合作社被称为住房租赁合作社。新决议赋予住房租赁合作社较多的自主权，有利于调动其管理住房的积极性。

在发还原主和租赁给集体经营两项政策之外，国家对市有住房的住户本人也提出了修缮、保护住宅的要求。1921年5月23日，人民委员会在《关于改善劳动群众的居住条件和同破坏住房的现象作斗争的措施》中规定^④：居民要积极参与保护和修理住房，合理占据住房面积，在必要的情况下个人承担修理住房的任务。8月8日，人民委员会在《关于住房管理》的决议中再次强调，^⑤居住在市有住房的公民和行政机关要对所居住的住房承担保护和维修的责任。要在住户中选举住房管理员，自己管理市有住房。对于用个人资金修理市有住房的住户，在住房保持完好无损的情况下，自大修完成（恢复自来水、下水道、房屋主体部分的集中供暖）之日起，三年之内不能将该

① Этапы развития жилищных отношений в России и городе Москве в XX веке. <http://hghltd.yandex.net/yandbtm?url=http>

② Система власти и система жилищно-коммунального хозяйства. <http://www.Jilsolidarnost.ru/content/view/382/73/>

③ Советское законодательство о жилище. Систематический сборник важнейших законов и постановлений. М.: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е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Советское законодательство», 1937. С.75.

④ Шипилов М.А. Жилищный вопрос при капитализме и социализме. С.79.

⑤ Советское законодательство о жилище. Систематический сборник важнейших законов и постановлений. С.116.

住户迁出市有住房。对于用集体的力量恢复破损和无法居住的市有住宅的集体住户，如果其占有的面积符合卫生人民委员部规定的人均面积标准，终生不能将其迁出住宅，也不能紧凑使用其住房。从8月决议的内容可以看出，这是一个令市有住房的住户备受鼓舞的决议：在住户中选举住房管理员，将提高管理效率；住宅修缮完好的住户，不会被迁出住宅；不会紧凑使用其住宅，住户会积极踊跃地修缮住宅。这样，新经济政策时期开创了地方苏维埃、住房租赁合作社和住户个人共管市有住宅的模式，而且租赁方与承租方权利义务关系明晰，有助于改变战时共产主义时期疏于管理的局面。

从无偿使用住房到恢复房租征收制，也是住房管理政策的一项转变。为减轻国家的经济负担，使房屋的使用逐步与经营维修费用接轨，从1922年4月至1928年5月，苏联人民委员会相继颁布了五部房租法令，缴费人数逐步覆盖到全体租户，收费标准也不断提高，但始终根据社会地位和工资差异，执行差别房租制。以这一时期颁布的最后一部房租法令为例，1928年5月14日，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通过了《关于在城市和工人村支付房租》的决议，^①规定房租的收取标准为：工人和职员的最大房租为每月每平方米1.32卢布，自由职业者、小商人和手工业者的最大房租为每月每平方米1.98卢布，军人为每月每平方米8戈比。多子女的家庭减免5-15%，领取退休金者减免50%，靠助学金生活的学生也享有减免权。此外，还有一些住户享有房租优惠。从政策内容可以看出，房租的征收标准是由国家硬性规定的，其数额主要取决于住户的工资和社会地位，脱离市场关系。

住房管理政策调整的另一项重要内容是住房建设主体由国家单一渠道向多元化转变。国内战争结束后，贯彻俄共（布）八大提出的住房纲领的工作提上了日程。1922年5月22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了《关于（在领到的地段上）建筑房屋权》的法令，^②规定法人和自然人享有在国家允许的地段上建筑房屋的权利，为个人和集体组织参与建房奠定了法律基础。另一方面，这个法令对土地所有者（国家）和这块土地的经营主体之间的关系

① Сборник жилищного законодательства. С.364-370.

② Черных А.И. Жилищный передел--политика 20-х годов в сфере жилья// Социологические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1995. №.10. С.74.

作出了规定：法人和自然人需要同地方公用事业机构签订建房合同，合同终止时，在给予房主补偿的情况下不动产将归还苏维埃。从这里我们知道，在土地国有的前提下，经营主体只是以租赁的方式获得一块土地，并享有在这块地段上建筑房屋的权力。他们仅在合同期内拥有该住房的所有权、居住权和管理权，合同到期后，土地连同其上的房屋都要归还国家。该政策的内容表明，国家试图通过最终收回经营主体的住房所有权，限制非国有房产的发展，扩大国有房产的规模，最终实现住房的绝对公有制。

除了调动个人建房的积极性外，十月革命前就已存在的住房建设合作社也得以复兴。1921年12月3日，莫斯科市苏维埃主席团公布了《关于住房合作社和建设合作社》的决议，率先成立了住房建设合作社。1924年8月19日，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通过了《关于住房合作社》的决议，^①住房建设合作社被细化为工人住房建设合作社和全民住房建设合作社两种形式，开始向全国推广。^②这样，新经济政策时期形成了国家、住房建设合作社集体和个人多渠道出资建房的景象，有效地缓解了住房短缺问题。

新经济政策时期住房管理政策的调整还表现在打破国家单一渠道分配住房的机制，实现住房分配渠道多元化。通过战时共产主义时期重新分配住房，只有部分工人迁入资产阶级的大住宅里。这表明，通过国家单一渠道分配住房并不能一举解决住房危机。为此，1921年秋，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决议，允许不动产交易。^③国家试图通过市场渠道对房产进行二次分配，以缓解住房压力。此外，在住房建设合作社和住房租赁合作社中，国家规定按照成员交纳入股金的数额，由合作社自己来分配住房。这样，新经济政策时期开辟了国家、市场、合作社三条分配住房的渠道。

综合新经济政策时期出台的各项住房管理政策，我们可以看到，调整后的政策突破了政权建立初期由国家集中管理住房的思路，转向由国家、集体和个人分头管理。此外，新政策还克服了战时共产主义时期只注重住房所有

① Советское законодательство о жилище. Систематический сборник важнейших законов и постановлений. С.75-76.

② Черных А.И. Жилищный передел---политика 20-х годов в сфере жилья. С.74.

③ Измозик В.С., Лебина Н.Б. Жилищный вопрос в быту Ленинградской партийно-советской номенклатуры 1920-1930-х годов// 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 2001. №4. С.101.

制和住房分配的政策偏颇，实现了住房事业的全方位均衡发展。这些调整不但拓宽了建房资金的来源渠道，减轻了国家全权管理住房的财政压力，而且调动了社会各界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但同时，我们也应看到，在调整后的政策中，国家仍有意识地限制非国有制房产的发展规模，还硬性规定了房租征收标准，脱离市场原则。

伴随住房管理政策的调整，各级地方住房管理机构随之调整工作方向，分散化的住房管理体制运行起来了。将市有房产发还原业主的工作基本是在1926年结束的。从结果来看，发还原业主的工作比较顺利，国家成功地将小面积房产发还原业主，管理住房的责任随之转移到业主身上。这一时期，由于加大了对住房的管理力度，开创了国家、住房租赁合作社和个人共同管理市有住房的局面，且责权关系明确，到1927年，恢复破损住房的任务基本完成了。^①住房管理可谓成绩斐然。不足的是，虽然恢复了房租征收制，且房租数额不断提高，但由于实行差别征收制，对于工人阶级而言，房租只占工资中很小的比例，远远不能抵偿房屋的管理成本费用。因此，国家的经济负担依然很沉重。新经济政策时期，在国家、住房建设合作社和个人的共同努力下，住房建设取得了长足进步。从1918—1928年，三方共建住房5120万平方米，年均增长470万平方米。^②多渠道建房，融汇社会各方人力、物力和财力，促进了住房建设的发展，改善了城市居民的居住条件。在住房分配领域，市场渠道分配住房受到城市居民的普遍欢迎。1926年，列宁格勒一半以上的居民参与到房屋的租赁和买卖中去。^③没有单独房间或住宅可供租赁的住户，往往将自己的住处用柜子、窗帘、屏风等隔成一些角落出租，这是新经济政策时期很普遍的现象。^④之所以出现普遍出租住宅的情况，主

① Долгушина О.В. Самоуправление в жилищной сфере. Московский опыт. <http://hghltd.yandex.net/yandbtm?url=http>

② Бронер Д. Л. Жилищное строительство и демографические процессы. М.: Статистика, 1980. С.25, 33.还有一种说法：1918—1928年，在城市和工人村共建设和投入使用4290万平方米住房面积，其中，国家机关和合作社建设2370万平方米，城市居民靠自费和国家贷款建设1920万平方米，住房面积年均增长390万平方米。引自 Харитонова А. Е. Основные этапы жилищного строительства в СССР// 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 1965. №.5. С.53.

③ Герасимова Е. История коммунальной квартиры в Ленинграде. <http://www.Kommunalka.spb.ru/history/history12.htm>

④ Ананьич Б.В. Исторические записки. М.: Наука, 2006. С.378.

要是由于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城市居民的生活非常贫困，出租住房无疑可以增加收入来源；另一方面也表明，当时的住房形势仍然十分紧张，存在着巨大的住房需求。

分散化住房管理体制的运行，基本克服了集中化住房管理体制存在的两个弊端：一是住房事业由国家集中管理转向国家和社会分散管理，与国家势单力孤应对住房挑战相比，“众人拾柴”加快了恢复和发展住房事业的步伐；二是明确住户与住房之间的责权关系，管理有力。由于克服了上述弊端，分散化住房管理体制处于良性运转状态。但另一方面，这种体制在运行的过程中，国家依然采用行政命令方式，限制住房事业可能出现的“非社会主义因素”，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该体制可能发挥的效果。总之，分散化住房管理体制有效调动了居民修缮和保护住房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有利于住房事业的恢复。如果国家能突破传统社会主义观念的禁锢，减少对住房事业的行政干预，进一步加大市场经济的管理力度，住房事业是会获得更好的发展的。

三、新经济政策时期城市住房状况的初步改善

较之战时共产主义时期只是部分劳动群众居住场所的质变，在新经济政策时期，由于实行分散化住房管理体制，住房事业开始回春。

首先，城市住房总面积增加了。1913年俄国城市住房总面积为1.80亿平方米，1926年时达到2.16亿平方米。^①这个总量包括修复战争破坏的住房面积，恢复集中化住房管理方式下因修缮和管理不力遭破坏的面积，也涵盖新建面积。囿于苏维埃政府对住房事业的有限投资以及当时生产技术的落后，13年里住房总面积能超过1913年的水平实属不易。

其次，住宅公用设施得到了改善。十月革命前，俄国住宅公用设施的发展极为落后。自来水管数量少且分布不均。1870-1914年，在俄国的欧洲部分和西伯利亚的城市里共建有135条自来水管，其中86.6%分布在该国欧洲部分。大多数城市居民经常到受到污染的井里和公共水塘里取水，流行

^① Бронер Д.Л. Жилищное строительство и демографические процессы. М.: Статистика, 1980. С.26.

病、传染病和中毒事件频发。^①下水道网也很少。自来水协会常务处在 1909 年进行的调查显示：俄国欧洲部分的 762 个城市中只有 27 个城市有下水道网，高加索地区的 103 个城市中只有 6 个城市有下水道网，西伯利亚和中亚的城市根本就没有下水道网。^②1910 年，全俄城市中有电力照明的房屋仅为 5%。^③从 1914 年起，原本不发达的公用设施又遭到连年战争的破坏，致使 1.7% 的自来水管、15.4% 的净化设备和 20.2% 的电站无法工作。^④被敌人占领的城市，上、下水道彻底遭到破坏，电站停止发电。^⑤到了新经济政策时期，公用设施得到恢复并有较大发展。大城市普遍铺设了上下水道网。1923 年，在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城市里，12.3% 的住房接通了自来水，18.4% 的住房安装了下水道；在莫斯科，相应的数字为 34.4% 和 31.0%；列宁格勒为 51.3% 和 48.4%；省级城市为 12.2% 和 5.7%；其他城市为 8.4% 和 22.6%。^⑥1927-1928 年，在工人家庭的住宅中，接通自来水的家庭从 28.8% 增加到 35.3%，使用电力照明的家庭从 64.8% 增加到 66.9%，到 1929 年达到 71.9%。^⑦上下水道的铺设和照明的普及，为城市居民提供了便利、洁净和明亮的生活环境，保障了居民的健康，提高了生活质量。

最后，设施齐备的新建住宅拔地而起。1920 年代初期建设的住宅，占地面积大，楼层低，建筑材料节约，服务配套设施齐全。新兴的工人村建造了大量的低层建筑。

1923 年，由艺术家、人民委员会的工作人员、经济学家、农学家和少量工人组成的住房建设合作社，开始在莫斯科的克拉斯诺普雷斯涅地区建设雄鹰村。会员可以选择住宅设计方案、结构和建筑材料。基于每户的具体要求、人口及财力状况，住房面积不等，楼层不一。按住房类型可以分为平房，

① Араловец Н.А. Городская семья в России 1897-1926 гг. С.87.

② Там же, С.88.

③ Бронер Д.Л. Жилищное строительство и демографические процессы. С.4.

④ РГАЭ.Ф.1562.Оп.14.Д.19.Л.5.转引自 Араловец Н.А. Городская семья в России 1897-1926 гг. С.170.

⑤ 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史》第二卷，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0 年，第 578 页。

⑥ Араловец Н.А. Городская семья в России 1897-1926 гг. С.170-171.

⑦ Академия Наук СССР институт истории СССР. Рабочий класс-ведущая сила в строительстве социалистического общества 1921-1937гг. том 2. М.: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наука», 1984. С.248.

单层带阁楼的住房，双层住房和宿舍。在建设首次使用纤维板。住宅周围设有消费品商店、幼儿园、图书馆、夏令营、俱乐部和运动场。到1928年，雄鹰村已经有500名居民，共有102所住房，全部采用集中供暖，住宅通水通电，并建有浴室和盥洗室。雄鹰村还建有完整的绿化带，树种经过了精心挑选。在宽阔的波列诺夫大街上，两排美国槭树同两排杨树交叉种植，在微风吹拂下不断变换颜色。在苏里科夫街道上交叉种植着细叶和阔叶两种加拿大椴树。^①此外，在莫斯科的恩图济阿斯特公路上还建设了保温板房街区，莫斯科汽车公司增建了两层住宅。在列宁格勒、顿巴斯、格罗兹尼和巴库油田以及其他工业中心也普遍建设了低层住宅。^②

为了容纳不断增多的城市人口，节约占地面积，从1924-1925年起，苏联开始大规模建造高层住宅，由此而诞生了高层定型单元式住宅和高层住宅建筑群。

1925年，莫斯科建造了第一批一梯四户的定型单元式住宅，每套住宅有2-3个房间，无浴室。由于需要按房间安排住户，房间之间互相隔绝，都通向狭窄的走廊。^③因没有通风设备，第一批定型单元式住宅被勒令改造。1928年，莫斯科开始建造一梯两户、每套3个房间的定型单元式住宅。由于仍要按房间安排住户，房间之间依然是隔绝的。有所改善的是房间安装了通风设备，并且所有的住宅都有浴室。^④在列宁格勒和其他城市也建设了定型单元式住宅。1924-1932年的列宁格勒，一梯两户、每套3个房间的住宅是最普遍的住房类型。住宅的一侧是厨房和一个房间，另一侧有两个房间。直到现在，圣彼得堡还保存着281处这一时期的建筑。^⑤

在定型单元式住宅的基础上开始建造第一批高层住宅建筑群。1925年开始在莫斯科建设的乌萨乔夫卡建筑群，到1929年时总面积近20公顷，约3000套住宅。建筑群专门建造了百货商店、浴池、市场、门诊部、药店、

① Череди́на И.С. Московское жильё конца XIX-сере́дины XX века. М.: «Архите́ктура-С», 2004. С.52-56.

② Акаде́мия строи́тельства и архитекту́ры СССР. Строи́тельство в СССР.1917-1957. С.311.

③ Череди́на И.С. Московское жильё конца XIX-сере́дины XX века. С.77.

④ Там же, С.78.

⑤ Исто́рия разви́тия жилищного фо́нта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а. <http://www.zemso-spb.ru/in dex.php?go=Pages&in=print&id=48>

儿童公园、医院、五所学校和六所幼儿园。住房采用集中供暖，有上下水道和其他便利设施。^①1926年，在乌萨乔夫卡的东北部开始建造四批庭院式住宅楼。^②1927-1931年，莫斯科所建的住房中，70%以上是占地面积至少20公顷的大型建筑群。^③1928年还出台了占地面积高达40-50公顷的建筑群方案，预计可容纳1.5-2万居民。沃洛达尔斯克地区的圣三一田野、列宁格勒的国际大街等，就是依此方案建造的。^④这些新街区的住宅密度非常小，一般不超过25%-30%。而十月革命前的俄国，住宅密度有时甚至达到80%-85%。^⑤

以上史料表明，在新经济政策时期，住宅建设基本上在全国铺开。从建筑类型来看，十月革命以前，俄国城市的住房以平房为主，二层建筑极少。莫斯科91.2%的住房为平房，大部分城市99%都是平房。^⑥在新经济政策时期，从低层住宅到高层住宅、定型单元式住宅，乃至建筑群，其建筑形式不断摸索前进，不拘一格。从建筑材料来看，采用新材料纤维板等，既节约了木材又降低了成本。从配套设施来看，居室内部普遍带有上下水道、浴室和集中供暖。住宅周围绿意盈盈，幼儿园、运动场、医院、学校和商店等文化和日常生活设施齐全。上述成就的取得，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即在土地公有制条件下，国家可以统一规划与同步安排各种基础设施。^⑦住房事业的进步也与实行分散化的住房管理体制密不可分，这是建房渠道多元化结出的硕果。

综上所述，在新经济政策时期，城市居民的住房总面积增加了；住宅公用设施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改善；配套设施齐备的低高层住宅、定型单元式住宅，乃至建筑群拔地而起。城市居民住房状况的初步改善，谱写了苏联住房历史的新篇章。但是，由于分散化住房管理体制在运行过程中受到种种限制，

① Академия строительства и архитектуры СССР. Строительство в СССР. 1917-1957. С.315.

② Там же.

③ Там же, С. 316.

④ Там же, С. 317.

⑤ Там же, С. 316.

⑥ Аверченко В.А., Царев И.Г. Жилищное строительство-старая песня о главном. С.45.

⑦ 李伟伟：《苏联建筑发展概论》，大连：大连理工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34页。

长期存在的住房短缺问题仍未得到根本缓解，有待于工业化时期继续解决。

新经济政策时期结束之后，分散化的住房管理体制也随着市场经济因素的退出和计划经济的确立而再次转型。尽管如此，这一时期的政策实践还是在历史上留下了成功的经验，可供后世借鉴。

【Abstract】 During the period of war communism, influenced by Marxism and concept of direct transition, the Soviet government issued centralized housing management policies, trying to rapidly improve the living conditions of the working masses and solve the housing crisis. In practice, however, because the state alone can not afford the burden to solve the housing crisis and also due to drawbacks such as unclear responsibilities and rights in housing management, centralized housing management system neither can effectively manage housing, nor can remedy the trauma of war to the housing system or even solve the housing crisis. Until the era of new economic policy, in order to continue solving the housing shortage, the Soviet government adjusted its housing policies. The housing management system has transformed from state-centralized management to decentralized management respectively by the nation, the collective and individuals. The decentralized housing management system has achieved positive results and the living conditions of urban residents have been improved preliminarily.

【Key words】 Housing Management System, Centralization, Decentralization

【Аннотация】 В период военного коммунизма, под влиянием теории марксизма и мышления прямого перехода, советское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о приняло политику централизованного управления жилищным фондом, пытаясь быстро улучшить условия жизни трудящихся масс, одним махом разрешить жилищный кризис. Однако на практике, поскольку государство само не могло преодолеть бремя решения жилищного кризиса и неясности отношений прав и обязанностей управления жилищным фондом и иные

недостатки, централизованная система управления жилищным фондом не только не могла эффективно управлять жильём, но и была не в состоянии восстановить пострадавший во время войны жилищный фонд, а также решить жилищный кризис. В период новой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й политики для продолжения разрешения проблемы нехватки жилья Советское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о отрегулировало жилищную политику, произошёл переход от системы централизованного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го управления жилищным фондом к системе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го, коллективного и индивидуального децентрализованного управления. Децентрализация управления жилищным фондом привела к положительным результатам, условия жизни городского населения были улучшены.

【 Ключевые слова 】 Система управления жилищным фондом, централизация, децентрализация

(责任编辑 阎德学)

转型经济研究

后金融危机时代俄罗斯经济转型评估*

余南平 李秋悦**

【内容提要】俄罗斯 20 年的经济转型使该国经济实现了明显的增长。但在金融危机中暴露出的问题,也显示俄罗斯经济存在着内在的结构性问题。这些内在结构性问题将长期影响俄罗斯的经济可持续增长与财政预算的安全,后金融危机时代俄罗斯经济最大的挑战就是结构改革。

【关键词】后金融危机时代 俄罗斯经济转型 评估

【中图分类号】K512.6**【文章标识】**A**【文章编号】**1009-721X(2012)03-0144-(30)

始于 20 世纪 90 年代的大规模新兴经济体转型现象一直是转型理论解释的重点。同时,转型理论自身的构建与完善也源自于转型国家不同的转型路径与模式。俄罗斯作为转型经济体中一个极具特色的转型大国,其经济体系转型不仅反映了其经济内涵,同时也隐含了某些政治结构的特色。而始于 2008 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不仅给俄罗斯带来了经济动荡,而且更直接地反映了俄罗斯经济转型的某些内在缺陷。^①分析、研究俄罗斯后金融危机时代的经济转型特色,对于理解俄罗斯经济转型无疑具有阶段性评价价值。

*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后危机时代俄罗斯与中东欧社会经济的转型问题研究”(项目批准号:11JJDGJW012)的阶段性成果。

** 余南平,国家开发银行—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俄罗斯研究中心,教授;李秋悦,国家开发银行—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硕士研究生。

① 关于金融危机及其对俄罗斯的影响,参见曲文轶:“中俄贸易与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俄罗斯研究》,2010年第1期;格泽戈尔兹·W·科勒德克:“新自由主义与世界经济危机”,《俄罗斯研究》,2010年第2期;斯蒂芬·赫德兰:“金融危机后的俄罗斯”,《俄罗斯研究》,2010年第6期。

一、俄罗斯经济转型成就与金融危机冲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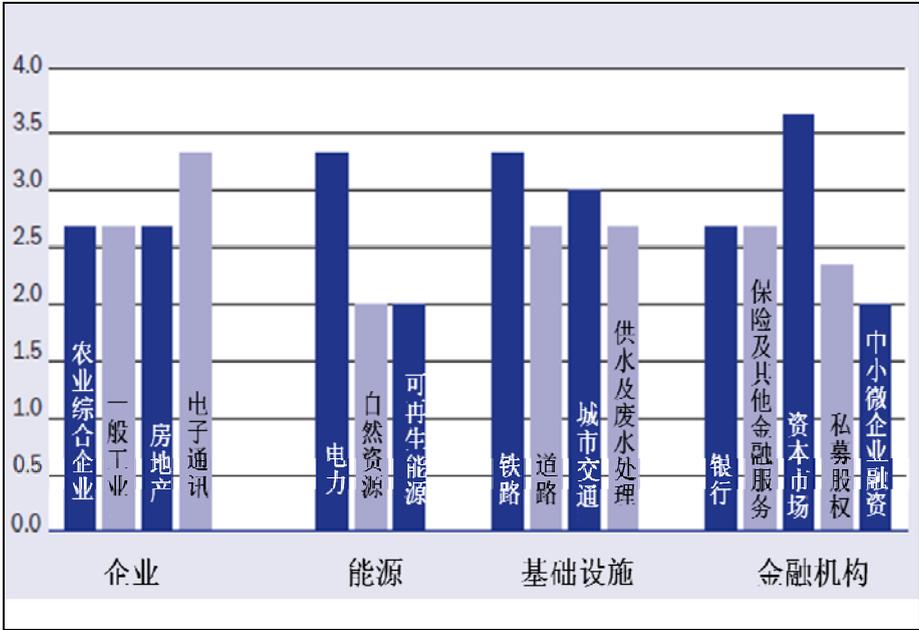
处于转型中的俄罗斯经济，在经历了上世纪 90 年代的衰退后，就开始以飞快的速度持续稳定增长。无论从什么角度去衡量，俄罗斯经济转型的成就都令人印象深刻^①。虽然以转型国家 30 个样本进行整体评估，俄罗斯并没有特别引人注目的进步，但其真实的GDP水平还是稳定在 1989 年转型起始点上（图 1）。引用欧洲复兴开发银行《2011 的转型报告》的评估同样可以看到，俄罗斯的电子通讯业、电力、铁路和资本市场都进行了颇有成效的转型和发展，其综合评分指数超过 3 分（图 2）。



资料来源：“Transition Report 2011: Crisis and Transition”, EBRD, 2011.

图 1 俄罗斯 1989 年至 2011 年实际 GDP 增长

^① 欧洲复兴开发银行（EBRD）采用了私有化、治理能力、竞争政策、银行改革等 9 个领域的指标，对 30 个转型国家进行年度评估，是目前最全面的转型比较研究报告，具体指标设计与比较研究参见 <http://www.ebrd.com/pages/research/economics/data/macro.shtml>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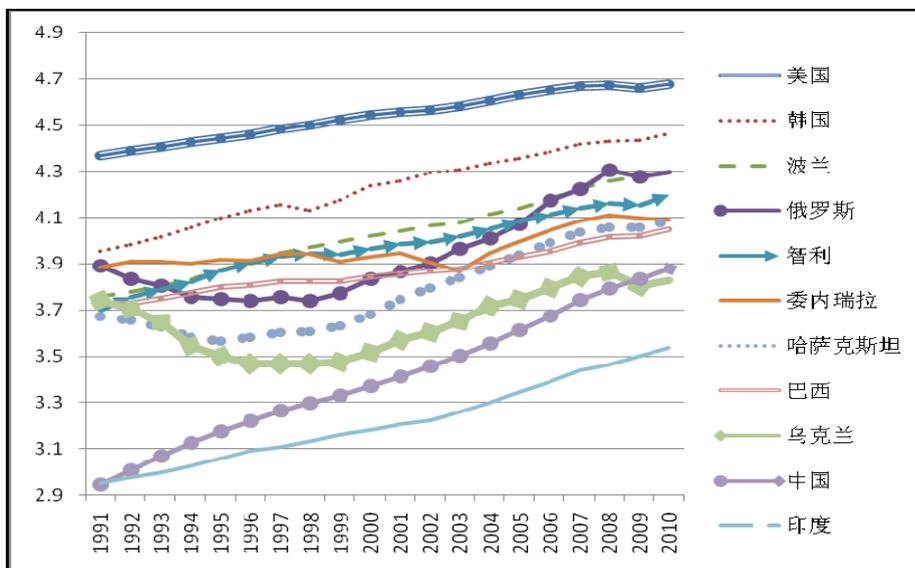


资料来源：“Transition Report 2011: Crisis and Transition”, EBRD, 2011.

图 2 2011 年俄罗斯行业转型指数

金融危机爆发前，1999 年到 2008 年，俄罗斯经济年均增长率超过 7%，股票市场上涨了 20 倍。俄罗斯作为“金砖国家”集团的一个成员，吸引了大量的外国投资者^①。俄罗斯通过努力已经超过智利和石油资源竞争者委内瑞拉，并在不断缩小与发达国家和新兴工业经济体的差距。同时俄罗斯比其他的转型国家如哈萨克斯坦、巴西，以及乌克兰发展得好（图 3）。在“金砖国家”中其经济增长率仅次于中国。在 2008 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前，俄罗斯政府现金充裕；股票市场繁荣，资本化比率较高；企业国际化水平有所提高；居民实际收入比十年前增长 2 倍多；失业率和贫富差距都在一定范围内得到控制。

① 对于金融危机前俄罗斯经济发展成就的研究可参见 Kazuhiro Kumo and Fumikazu Sugiura (eds.), “New Generation of Russian Economic Studies”, *HIER Discussion Paper Series*, Institute of Economic Research Hitotsubashi University, 2006.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数据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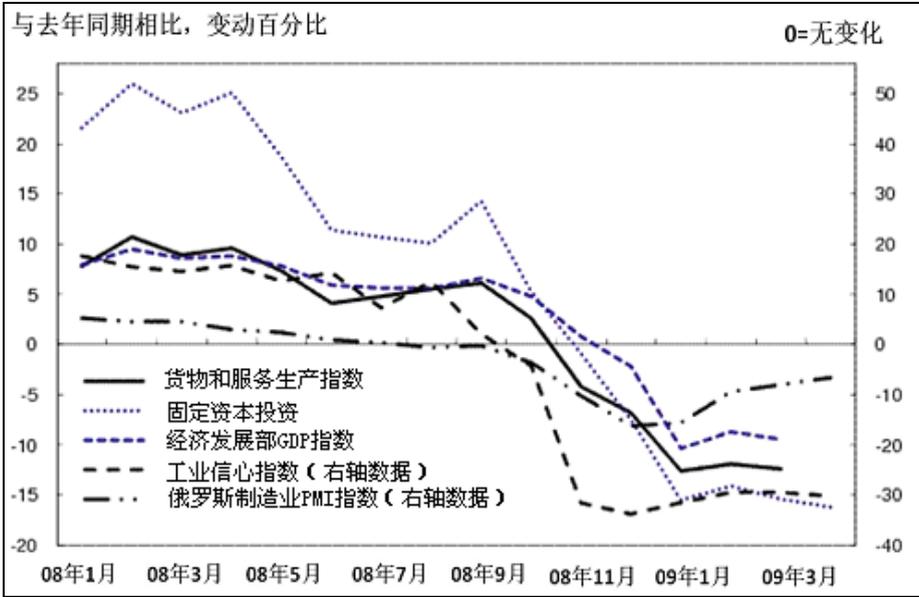
注：此图为人均GDP的对数，按购买力平价计算，单位美元。

图3 1991年至2009年世界部分国家人均GDP

但在宏观经济如此良好的表现下，作为转型经济体的俄罗斯仍然暗藏着一些转型难题尚待解决。遗憾的是，在俄罗斯解决这些问题之前，金融危机使这些问题遗留的弊端瞬间爆发。从宏观经济表现来看，金融危机对俄罗斯经济的影响比 G20 其他任何国家都要严重。不仅其 2009 年的 GDP 收缩了 8%，是 G20 中衰退最严重的，同时以 2008 年和 2009 年的经济增长率差距去衡量金融危机对经济体的冲击，俄罗斯遭受的影响也是最为显著的(图 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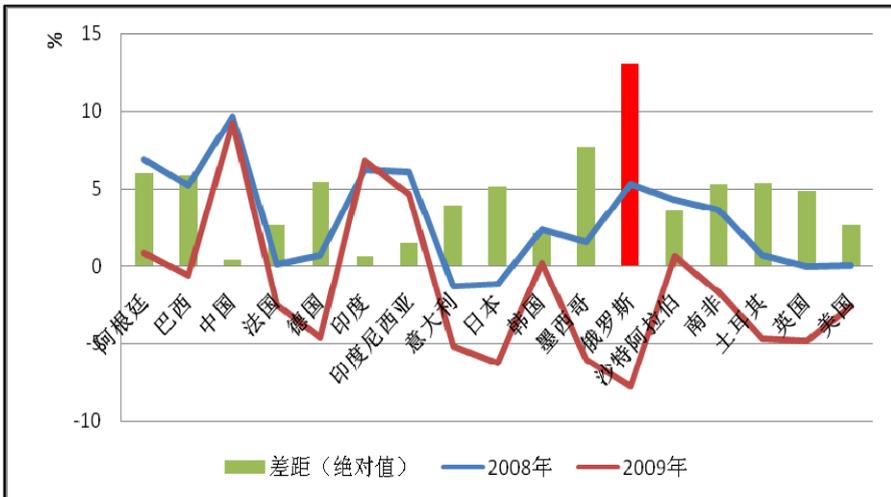
虽然金融危机导致世界范围内所有国家 2009 年的经济表现都比 2008 年差，但差距最大的是俄罗斯，其经济震荡超过了 13 个百分点，而其他国家的平均差距仅为 4 个百分点(图 5)。为什么金融危机前高速发展的“黄金十年”如此不堪一击？俄罗斯经济在转型繁荣发展的同时，其在转型过程中到底还有哪些关键的结构性问题亟待解决^①？

① 对于俄罗斯在金融危机中的表现和结构问题研究可参见 Shinichiro Tabata, “The Impact of Global Financial Crisis on the Mechanism of Economic Growth in Russia”, *Eurasian Geography and Economics*, 2009, Vol.50, No.6, pp.682-698.



资料来源：http://www.oecd.org/document/59/0,3746,en_2649_33733_432780_1,00.html

图 4 金融危机对俄罗斯经济影响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数据库

图 5 金融危机期间不同国家 GDP 增长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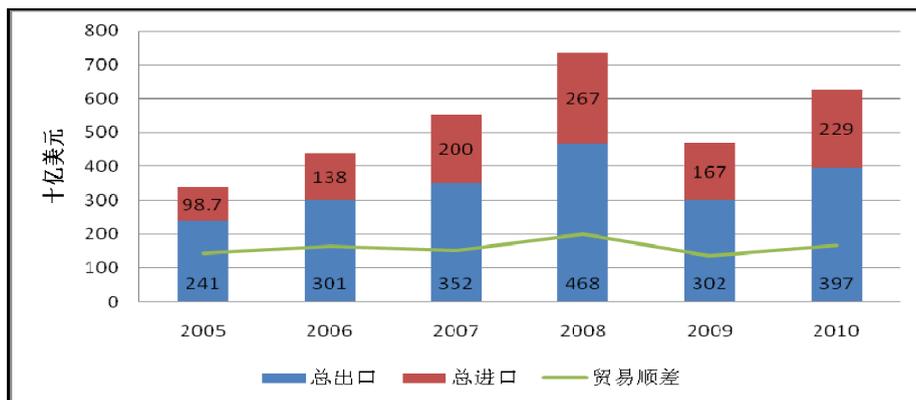
二、后金融危机时代俄罗斯经济转型尚存在问题

可以说，金融危机中俄罗斯急剧衰退的经济表现，仅仅是对俄罗斯经济转型中结构性缺陷的一个检验。在后金融危机时代，俄罗斯经济转型依然存在问题，其主要表现是：

（一）经济增长依赖能源贸易

OECD对于金融危机期波兰和捷克的对比实证研究表明，一个国家的贸易多元化和内生性增长是国家经济稳定的核心要素，而贸易的单一性不仅使国家面临外部市场的风险，而且其结构均衡也是阻碍经济稳定发展的关键要素^①。

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前，俄罗斯进出口连年快速稳定增长，2008年达到进口2670亿美元、出口4680亿美元的最高值（图6）。2009年受金融危机影响，进出口总额均缩减超过三分之一，低于2007年的水平（表1）。到2010年后，情况有所改善，进出口总额达到6260亿美元，但仍然不及2008年的最高水平。尽管俄罗斯的贸易数据看似增长稳定，但考察一下俄罗斯进出口商品的构成（图7），就可看出问题所在。



资料来源：俄罗斯统计署网站，<http://www.gks.ru/wps/wcm/connect/rosstat/ros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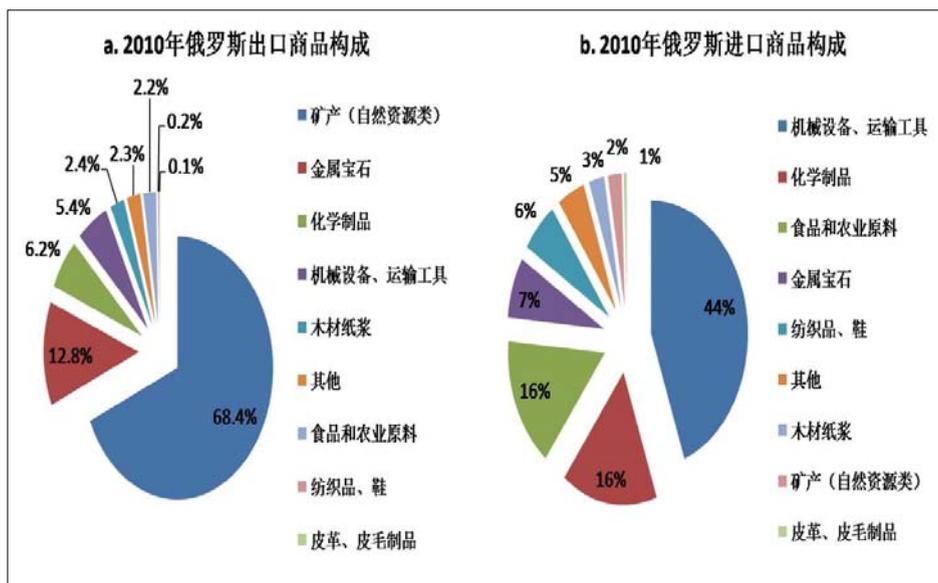
图6 2005年至2010年俄罗斯进出口总额

^① “OECD Economic Surveys: Poland”, OECD, 2010.

表 1 2005 年到 2010 年俄罗斯进出口数额及增长率

单位： 十亿美元	2005 年	2006 年	2007 年	2008 年	2009 年	2010 年
总出口	241	301	352	468	302	397
总进口	98.7	138	200	267	167	229
贸易顺差	142.3	163	152	201	135	168
进出口总额	339.7	439	552	735	469	626
进口增长率		39.8%	44.9%	33.5%	-37.5%	37.1%
出口增长率		24.9%	16.9%	33.0%	-35.5%	31.5%

资料来源：俄罗斯统计署网站，<http://www.gks.ru/wps/wcm/connect/rosstat/ros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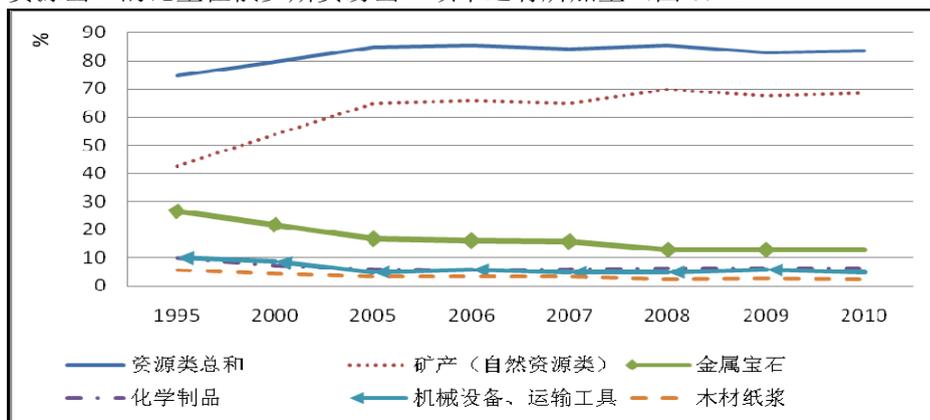
资料来源：俄罗斯统计署网站，<http://www.gks.ru/wps/wcm/connect/rosstat/ross>

图 7 俄罗斯进出口商品构成

俄罗斯自然资源丰富，天然气储量世界第一，煤炭储量世界第二，石油储量世界第八。所有这些资源构成了俄罗斯出口的最主要部分。对比俄罗斯进出口结构可以看到，俄罗斯出口的 80% 由石油、天然气、金属、木材和防务设备 (defense equipment) 构成；但在工业制成品方面，机械、交通设备、化学制品、包括食品却依赖进口。虽然俄罗斯利用资源储备来确保其国内外

的经济和政治利益，但显然俄罗斯的资源优势也造成其贸易均衡发展障碍，出口结构过于集中和单一。资源禀赋使俄罗斯经济坐享其成，国内资源配置不公平——主要集中在资源部门（下文俄罗斯债务结构将有相关说明），这样不仅导致俄罗斯其他关键行业发展缓慢，同时既得利益集团也使国内经济政治改革难以推进，从长期看，这都会损及俄罗斯经济的活跃性和进一步持续发展的潜力。^①

具体考察俄罗斯 1995 年到 2010 年出口商品构成比重的变化，可以看出，俄罗斯石油、天然气等矿产资源出口比例明显增大，金属宝石类出口减少，木材类出口略有减少，但所有资源类商品的总比重自 2000 年起就超过了 80%，并呈现逐步上升的趋势。可以看出，经济转型 15 年来，俄罗斯经济并没有进行比较彻底的结构调整，以摆脱对资源出口的依赖，在某种程度上，资源出口的比重在俄罗斯贸易出口项中还有所加重（图 8）。



资料来源：俄罗斯统计署网站，<http://www.gks.ru/wps/wcm/connect/rosstat/ross>

图 8 1995 年至 2010 年俄罗斯出口产品比重变化

另外，从贸易依存度看，俄罗斯 2010 年的贸易额占 GDP 的比重为 43.3%。虽然俄罗斯并不是转型国家中最高的（中国 50%，印度 19.5%，巴西 23%），但就贸易结构而言，俄罗斯经济的单一行业贸易依存度却是最高。从出口国家结构看，欧盟是俄罗斯最大的贸易伙伴，占俄罗斯 2010 年总贸易额的

^① 关于俄罗斯经济对能源资源依赖的相关讨论可参见田畑伸一郎：“俄罗斯油气资源依附性经济论析”，《俄罗斯研究》，2010 年第 3 期；久保庭真彰：“俄罗斯经济的转折点与‘俄罗斯病’”，《俄罗斯研究》，2012 年第 1 期。

46.8%，欧盟同时也是到目前为止俄罗斯最大的投资方，高达 75% 的外国直接投资都来自欧盟成员国。俄罗斯的主要出口对象为欧盟(44.8%)、美国(6.0%)、中国(5.8%)、土耳其(4.9%)、乌克兰(3.7%)；主要的进口方为欧盟(50.2%)、中国(14.1%)、乌克兰(5.3%)、日本(3.8%)、白俄罗斯(3.4%)^①。虽然金融危机后，俄罗斯意识到外来投资单一化和出口贸易单一化对于俄罗斯经济转型的致命威胁，并进行了对外来投资放松限制的改革。如 2011 年 6 月俄罗斯建立的 100 亿美元的“俄罗斯直接投资基金”就旨在促进外商投资领域多元化。另外，根据 2011 年 4 月的第 846 号总统令提出的立法修正，为俄罗斯加入 WTO 进行了立法准备，而联邦法律 57 号的修正条款也为改善外国投资环境进行了松绑^②。但从相当一个时期的前景预测来看，如果俄罗斯不对其经济进行系统性的改革，当前的经济政策是无法让俄罗斯摆脱严重依赖大宗商品的生产和出口的局面的，因而也无法实现经济的多元化。从这个角度看，出口贸易结构转型是俄罗斯经济转型中首当其冲要解决的问题。

（二）银行业竞争力低下

俄罗斯目前有 1007 家银行，这一数目与其他金砖国家相比非常巨大，主要原因是上世纪 90 年代的私有化浪潮中，俄罗斯中央银行发放了大量的银行许可证，而且俄罗斯银行成立的门槛相对很低。理论上，一个国家的金融企业数量多，会降低金融的集中度，但俄罗斯却不然，其银行业集中度还是非常高，而且主要被国有银行所控制。就金融资产而言，俄罗斯最大的 20 家银行控制了将近 70% 的银行总资产，其中 6 家国有银行占据总资产的 52% 以及存款的 60%。最大的国有银行俄罗斯联邦储蓄银行（Sberbank），也是俄罗斯最大的信贷机构，一家就占了俄罗斯银行总资产的四分之一。外资银行比例相对较低，占有 18% 的总资产和 12% 的信贷。

从变化的角度看，俄罗斯银行业的集中度从 2002 年至 2007 年持续下降。2002 年，前五家银行占有 56% 的资产，到 2007 年，这一比例下降到 44%。然而，2008 年的金融危机使得一部分银行倒闭、收购、兼并，政府接管增

① 俄罗斯统计署网站，<http://www.gks.ru/wps/wcm/connect/rosstat/ross>

② 具体参见 Yana Vaziakova, “Russia: Progress in Structural Reform and Framework Conditions”, 2011, <http://www.oecd-ilibrary.org/docserver/download/fulltext/5kg0k6zsbjv.pdf>

多，因此 2008 年的银行集中度又有所回升。俄罗斯银行业的集中度按比例来看与巴西相近，低于中国，稍高于印度（表 2）。但考虑到俄罗斯银行的绝对数量如此巨大，因此事实上俄罗斯银行业的集中度之高是相当明显的。2009 年 2 月俄罗斯中央银行 CBR 提高了银行资本金，要求俄罗斯注册银行的最低资本金要达到 600 万美元，并要求现存的银行到 2012 年 1 月必须符合标准。虽然这一标准低于巴西的 900 万美元，中国的 5000 万美元和印度的 7250 万美元，但俄罗斯的实际情况是，大量资本金未达标的银行将面临或合并，或转型为其他类别的金融机构，或面临破产（表 3）。

表 2 金砖四国银行业集中度比较

国家	前五家银行所占市场份额 (%) (2008 年)	银行机构数量 (2008 年)
俄罗斯	50	1007
巴西	48	167
中国	77	370
印度	37	169

资料来源：“Banking Sector Competition in Russia”, WB, October, 2010.

表 3 俄罗斯满足 600 万美元资本金要求的银行数量

	资本金大于 600 万美元的银行数量百分比	资本金小于 600 万美元的银行数量百分比
前 20 家	100	0
除前 20 家外其他银行	70	30
政府控制银行	100	0
私人银行	70	30
外资银行	92	8
国内银行	69	31
对私银行	53	47
对公银行	74	26

资料来源：“Banking Sector Competition in Russia”, WB, October 2010.

虽然俄罗斯银行业已经高度集中了，但新标准不仅不能减少大型国有银行的数量，而且还会影响中小型银行的发展。从业务结构来看，俄罗斯银行主要业务集中在企业信贷，三分之二的银行都从企业信贷中获得超过 50% 的收入，而现代银行的中间业务，特别是投资银行功能业务在俄罗斯银行比重非常低，这样不但进一步减少了银行业的同业竞争，而且小企业及个人的融

资途径非常狭窄。

银行业若缺乏竞争，将会对经济体产生持续的负面影响，如金融产品价格垄断，融资门槛高，因而使得中小企业发展异常困难。同样，银行业缺乏竞争也不利于新兴企业发展和老旧企业退出市场。尽管俄罗斯银行业以国际标准来看并非高度集中，但不公平的差异性监管措施以及缺乏完备的退出机制（credible exit process），都阻碍了俄罗斯银行业的竞争力。由于缺乏适宜的统一监管，小型的机构简易的银行相比大型的机构复杂的银行有许多不利。另外由于俄罗斯银行体系的区域化和分散化，导致不同地区的监管标准不同。在金砖国家中，只有俄罗斯的银监部门没有合法的强制的停业禁止令，银监部门不能暂停股息分配，这些都给市场透明和有效处理问题银行带来负面影响。另外，俄罗斯银行业实行预设清偿机制，违反机制将引发银行监管部门的自动干预，但宣布银行破产的权力在法律上属于法院，相反，在巴西，银监部门具有完全法律资格宣布银行破产，因此，俄罗斯银监部门在处理问题银行时受到限制。

就业务性质而言，俄罗斯银行业的竞争现状与中国和印度相似，但相比巴西银行，差距就大了，尽管巴西和俄罗斯有着相近的银行集中度。在俄罗斯，前二十家银行和国有银行，相比小银行和私有银行，起到更为重要的作用。金融危机过程中，由莫斯科市政府控制的莫斯科银行累积大量坏账引发的救援（2011年被国有银行VTB收购），显然提醒俄罗斯需要注意，金融体系安全性对于一个国家经济稳定的作用。因此，俄罗斯在2009年开始推出银行业的一系列改革，如根据俄罗斯《银行发展战略规划》，俄罗斯将进一步推动国有银行的私有化；俄罗斯中央银行与监管部门对俄罗斯注册银行进行了全方位的“体检性核查”；为了保证储户的安全，俄罗斯中央银行还推动了金融安全培训，并与欧洲央行进行了审计合作；为了保证银行的质量，在资本金方面，俄罗斯央行打算到2015年将银行资本金提高到3亿卢布。以上举措表明，俄罗斯通过金融危机看到了俄罗斯银行的流动性缺陷，希望加强俄罗斯银行的安全性。另外还有一些改革举措，如增加银行监管的质量，培训人员，包括与国际金融机构的交流等。但在大规模竞争开始之前，俄罗斯银

行业的业务结构决定了其银行竞争力不会有特别明显的改善^①。

银行业的效率与风险控制能力是衡量一个国家经济体系是否健康的重要指标，同时也是衡量经济转型的关键指标。尽管有许多研究已经提示了俄罗斯银行业转型以来的进步^②，但是俄罗斯银行业的效率、竞争能力和服务体系缺陷，与国际同行比较依然是非常明显的。这不仅隐含着市场集中的结构性风险，会阻碍俄罗斯中小企业的发展，同时对经济转型也会带来障碍。

（三）奇特的半主权债务结构^③

仅从国际标准看，俄罗斯公共债务占 GDP 的比重在过去十年中已经减少了很多，几乎到达了可以忽略不计的程度（大概在 12%左右）。在“金砖国家”中，中国为 40%，而巴西、印度均超过 60%。俄罗斯的公共债务与其他新兴市场以及发达国家的状况都截然相反。大多数国家近年来公共财政都在恶化，特别是在全球金融危机引发大规模财政刺激以及采取各种措施救助银行部门后，主要经济体的政府举债能力已经达到极限。

但是非常特别的是，金融危机过程中，俄罗斯的公司和银行债务却有所增长。由于俄罗斯特殊的产权结构，政府拥有很大一部分公司和银行的资产，这些半国有性质的公司和银行部门受到国家的支持，因此他们的债务构成中有一部分应属于政府负债，在理论上可以被称为“半主权债务”。由于俄罗斯半主权债务和银团贷款占整个政府债务的比重不断增加，因此如果将半主权债务和银团贷款计入政府公共负债，那么俄公共债务占 GDP 的比重将提高一倍之多。由于公司的不稳定性，半主权债务可能会对或有负债造成冲击，这将使公共债务占 GDP 的比重在 2020 年时高达 40%以上^④。但俄政府目前的私有化计划将会减少或有负债，并使公共债务带来的风险下降。

在俄罗斯，企业贷款的分配高度集中，12%的企业占总债务的 80%。前

① 有关后金融危机时代俄罗斯银行业的政策调整研究参见 Dmitry Ivanov, “Banking in Russia: Adjusting to Post-Crisis World”, *World Finance Review*, December, 2011.

② William E. Alexander, “Banking System Restructuring in Russia”, <http://www.imf.org/external/pubs/ft/seminar/2000/invest/pdf/alexander.pdf>

③ 半主权债务是德国银行研究所针对俄罗斯国有公司与国有银行负债的一个准确定义，具体研究参见 Maria Arakelyan, “Russia’s Quasi-sovereign Debt”, DB, 201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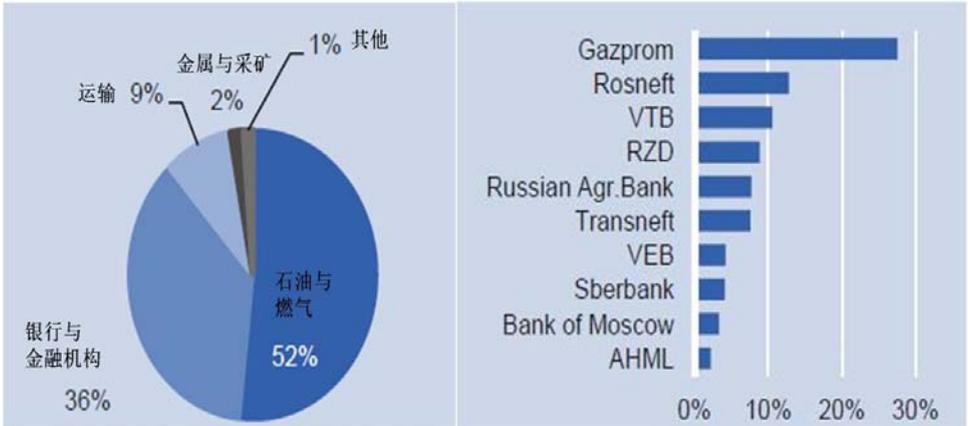
④ 与俄罗斯比较相似的是，中国按国际标准公共债务水平也非常健康，但中国的特点是 10.8 万亿的“地方债”，如果加入地方债，将使中国的债务占 GDP 的比重上升 20%以上。

15 家公司占总债务的 50%。其中石油和燃气部门是最主要的贷款方，接下来是国有银行和交通运输公司。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Gazprom）一家公司就占了企业总债务的 10%（图 9）。而在企业债务中，41%属于半主权债务，约 1140 亿美元。这个保守估计相当于 2010 年 7 月俄罗斯 GDP 总额的 8%。半主权债务分配也同样高度集中，十大国有公司占据了 89%的半主权债务，包括两个石油和燃气公司（Gazprom, Rosneft），两家银行（VTB, Russian Agricultural Bank）和 Russian Railways（RZD）（图 10）。



资料来源：“Russia’s Quasi-sovereign Debt”, DB, 2011.

图9 俄罗斯企业债务分布



资料来源：“Russia’s Quasi-sovereign Debt”, DB, 201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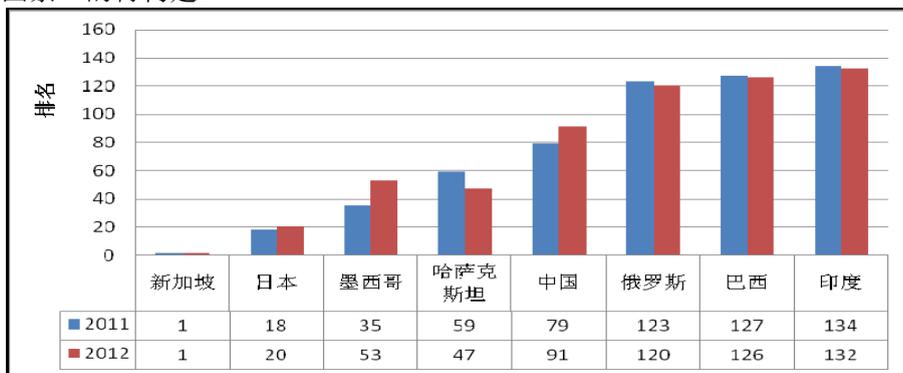
图 10 俄罗斯半主权债务分布

从债务结构可以看到，俄罗斯企业的国有化特征明显，加之重视能源类企业的发展，这将令其债务结构不均衡，从而导致资本的分配也过度集中，不能流向其他行业和小型企业，这样不仅不利于经济多样化发展和减少对资源类经济的依赖，同时金融资源的错配也会影响经济的结构转型均衡化。

（四）商业环境亟需改善

俄罗斯经济中一项留存已久且影响颇深的转型障碍就是俄罗斯恶劣的商业环境。这个问题带来的负面影响范围广泛，程度严重。从关键的问题看，俄罗斯市场进入壁垒高，因而削弱了企业竞争力；同时俄罗斯管制过度，抑制创新，使得经济对能源采掘更加依赖。

从广义上讲，商业环境包含的范围很大：从资源禀赋、人力资源、基础设施、税务负担、公务行政系统的有效性到腐败、法律执行情况等等。影响商业环境的各项因素可以从整体上分为“软因素”和“硬因素”两类。“硬因素”通常指外生条件，比如市场规模，资源禀赋，人力资源和基础设施建设。“软因素”则指机制上对商业活动的阻碍，如管制、腐败，以及公共行政等。对于俄罗斯来讲，它的“硬因素”条件较好：资源丰富，受教育人口比例高，本国市场规模大。但“软因素”情况则较为恶劣。而且，“硬因素”的提高通常需要长期的努力，而“软因素”的改善则可以在短期或中期来完成，而所谓的转型，从通常意义上来说，在很大程度上是指可以通过制度调整的“软因素”的再构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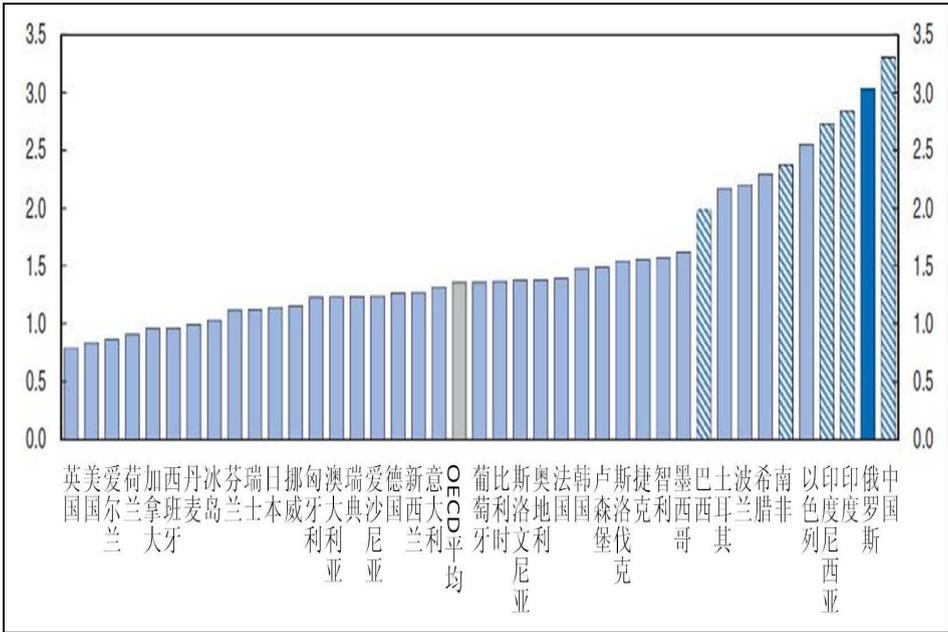


数据来源：Doing Business 2011, Doing Business 2012, WB, IFC.

图 11 2011、2012 年做生意难易度世界排名

俄罗斯整体商业环境在世界排名中处于靠后位置，在 183 个排名国家中排在第 120 位左右，属于做生意最难的三分之一部分。落后于中国，但稍好于巴西和印度（图 11）。

商业环境在很大程度上依靠市场管制。从市场管制的角度看，如果拿俄罗斯与中国进行比较，可以看到，中国在垄断利润行业进行了严格管制如资源采掘、银行、电信、烟草等，而在充分竞争领域则是“管制无为”和“管制被俘获”，造成了产业链下游端的充分的、无规则的竞争，其好处是活跃了内部市场，扩大了内部贸易流通量，其坏处是虚假销售、产品安全、盗用知识产权等现象屡禁不绝。但俄罗斯与中国不同的是，其不仅严格管制了“战略敏感”产业，而且对下游端管制也十分严格，呈现“管制过度”的特征。虽然引用 OECD 管制评分并不完全能够体现俄罗斯的实际情况，但对照 OECD 给出的平均水平，俄罗斯市场管制还是相当严格的（图 12）。



资料来源：“Russia Economic Survey 2011”，OECD。
注：指数范围 0-6，从管制最放松到管制最严格。

图 12 产品市场管制总体指数

由于俄政府对于商业发展管制多，阻碍了经济体自我净化和自我淘汰的能力。以商业零售业为例，俄目前有370个规模化的批发商，服务于80万家中小规模企业和4000万个家庭。这样的结构显示，一定会出现区域垄断和削弱竞争。而在价格管制方面，无论是机票还是烟酒，俄罗斯依然实行着严格的管制定价，这使得俄罗斯价格管制成为世界经济体中最严格的国家。

俄罗斯出于对国有企业的盲目支持和保护，引导了大量资源流入低效益企业，造成无效和浪费。同时，经济过分管制会减缓被熊彼特所说的“市场创造性破坏”过程，不利于创新型企业和落后企业的衰亡。

据世界银行2010的“企业调查”（Enterprise Surveys）称，俄罗斯的管理者平均花费22%的时间来处理与政府管理相关的工作，几乎高于所有OECD国家。在世界经济论坛的“全球竞争力”（Global Competitiveness）排行榜中，俄罗斯在政府管制一项中排在倒数几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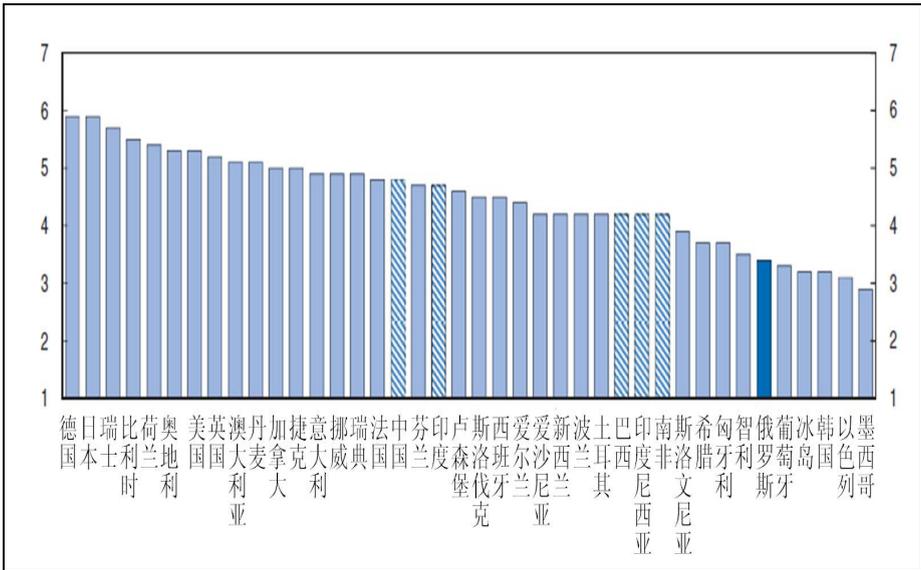
在世界银行的“做生意”（Doing Business）指标排名中，同样可以看到俄罗斯企业承受着非常繁重的来自行政程序的负担。在俄罗斯开展商业活动，主要的困难是，要想获得电力支持，难度很大。按照这一项指标，俄罗斯在世界183个国家中排名最后。另外，难以获得施工许可，难以从事跨境贸易，开办企业困难，国家政策对于投资者保护不够，商业投资等也没有吸引人的税务优惠等，也恶化了俄罗斯的商业环境。俄罗斯商业环境比较好的方面是合同执行和财产登记（表4）。

表4 俄罗斯商业环境各项指标世界排名

	2011年排名	2012年排名
开办企业	108	111
施工许可	182	178
财产登记	51	45
获得信贷	89	98
保护投资者	93	111
税务	105	105
跨境贸易	162	160
合同执行	18	13
解决破产	103	60
获得电力	无数据	183

数据来源：Doing Business 2011, Doing Business 2012, WB, IFC.

恶劣的商业环境带来的最直接影响是俄罗斯经济体系缺乏竞争力。OECD报告曾指出，俄罗斯市场份额集中度从2001年的43%上升到2007年的47%，市场垄断程度较高（图13）。另外，俄罗斯的中小企业（SME）在经济中非常不活跃。中小型企业只占有20%的雇佣率和比例更小的产出份额。而在大多数OECD国家，这两个数额都超过50%，对于俄罗斯中小企业发展环境和制度限制的担忧，引发学者对于俄罗斯经济结构真正转型的困惑^①。同样地，俄罗斯市场的企业进出率很低，世界经济论坛的《俄罗斯竞争力报告》（*Russia Competitiveness Report*）指出，在俄罗斯每年只有5%的公司开始或停止运营，这说明俄罗斯市场非常不活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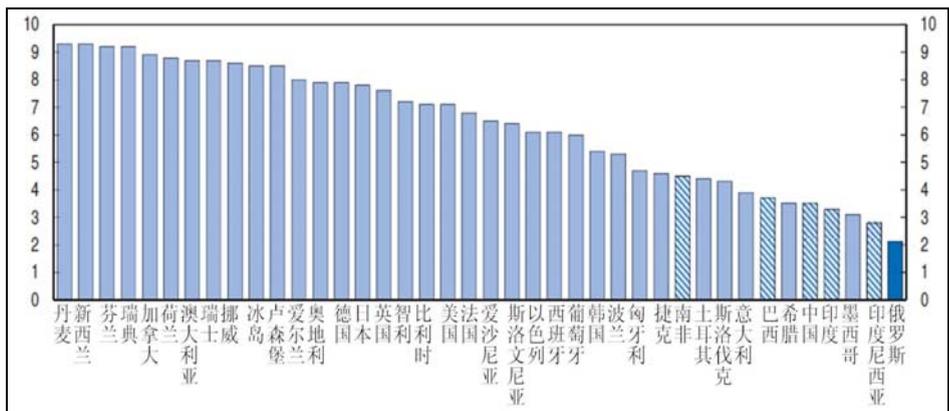
资料来源：“Russia Economic Survey 2011”，OECD。注：回应问题“你的国家的商业活动具有什么特征？”1表示被少数企业垄断，7表示在众多企业中分布。

图13 市场垄断程度

① 有学者选择对俄罗斯圣彼得堡的中小企业进行经典式的调查研究后得出结论：用市场能力、研发、管理、金融资源获得、融入全球产业链等多项指标进行测评，俄罗斯中小企业发展的制度基础依然非常薄弱，具体研究参见Rick Molz, “Institutional Realities and Constraints on Change: The Case of SME in Russia”, *Journal of East-West Business*, 2009,15, pp141-156.

（五）腐败盛行，治理有待提高

腐败也是俄罗斯长期以来一直面对和备受困扰的问题之一，从国家、社会到个人都在试图努力解决腐败和不公平问题，但一直鲜有成效^①。在俄罗斯，人们普遍认为社会不公平程度高。这一观念损害了公民对市场经济和私有财产权力的信任和支持，严重阻碍了经济和社会的健康发展。在俄罗斯，由于大多数人都认为获取财富需要涉及犯罪或依赖政治关系，只有极少部分人相信凭借天赋和努力可以获取成功，因此人们不愿意冒险创业，也不喜欢经济和政治自由化，认为自己不会从中受益。调查显示，只有36%的人支持民主，28%支持市场改革，是所有转型国家中最低的。俄罗斯有40%的公司经常支付不符合官方规定的费用，贿赂行为盛行，这使得俄罗斯在腐败指数的国际比较中显得非常突出^②（图14）。



资料来源：“Russia Economic Survey 2011”，OECD。

注：指数范围 0-10，0 代表非常腐败，10 代表非常清廉。

图 14 国际透明清廉指数

① 2009 年，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在《前进，俄罗斯！》的报告中再次指出腐败对于俄罗斯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影响，认为是腐败损害了俄罗斯的天才发明与市场的结合，参见 <http://eng.kremlin.ru/transcripts/298>。另可参见程伟、殷红：“梅德韦杰夫‘去斯大林的现代化’评析”，《俄罗斯研究》，2010 年第 3 期，第 8-13 页；庞大鹏：“俄罗斯政治思想的新变化——2009 年俄罗斯政治形势分析”，2010 年第 3 期，第 22-27 页。

② 有学者在俄罗斯 8 个地区对 500 个企业家进行调查发现，腐败确实困扰着俄罗斯的经济健康发展。Frye T., “Corruption and Rule of Law”, in A. Aslund, A. Kuchins (eds.), *Russia After the Global Economic Crisis*, 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Washington, D.C., 2010.

但也有学者认为,这个现象是前苏联时代遗留的一个遗产,只不过在今天的俄罗斯表现得“货币化”而已^①。当然俄罗斯并不是没有注意到腐败对于国家稳定 and 经济发展带来的不良影响。自 2000 年开始,俄罗斯就加快了司法体系的改进,如 2001 年立法,约束了官员随意检查企业的寻租行为;2005 年《公共采购法》的出台,限制了政府的浪费和企业的贿赂行为。最重要的是 2008 年 12 月俄罗斯联邦法律第 273 号《反腐败法》的公布与执行,该法律给腐败以很宽泛的定义,包括了行贿、滥用职权等内容。同时,俄罗斯《刑法》2011 年 5 月的修正案,也将行贿罪入刑,其中包括 10—100 倍的罚款,最低金额 25000 卢布至最高 5 亿卢布,来打击商业贿赂和其它形式的行贿。俄罗斯还在争取反腐败的国际合作,2006 年俄罗斯批准了《联合国反腐公约》,并在 2011 年 5 月被邀请加入《OECD 反腐公约》。这些进步表明,俄罗斯认识到腐败给俄罗斯治理带来的巨大影响,并希望通过改革使市场环境净化。

三、俄罗斯经济转型未来发展方向与挑战

(一) 创新与高科技能力培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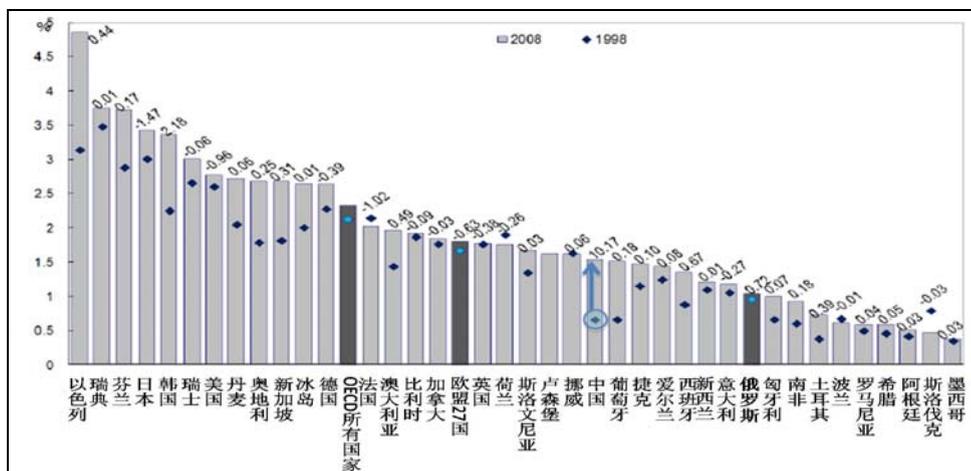
许多经典性实证学术研究已经证明,从长期角度看,科技创新的不仅可以加速一国的经济发展,也有利于军事等能力的增强,对于提高国家的整体竞争力具有重要意义^②。理论上,俄罗斯继承了前苏联的科技储备遗产,而其全球最高水平的科学和工程学位教育应该使俄罗斯在科技创新上有所成就^③。但遗憾的是,由于体制和政策的原因,俄罗斯丰厚的教育资源储备并未有效地转化为创新,以 R&D 占国内 GDP 支出来看,俄罗斯在可比较范围内,

^① Ledeneva, A. and S. Shekshnia, “Doing Business in Russian Regions: Informal Practices and Anti-Corruption Strategies”, *Ifri Russie.Nei.Visions*, No.58, March, 2011.

^② 具体文献参见 Donselaar P., H.P.G. Erken, L. Klomp, “R&D and Innovation: Drivers of Productivity Growth”, in G.M.Gelauff, L. Klomp, S.E.P. Raes, T.J.A. Roelandt (eds), *Fostering Productivity. Patterns, Determinants and Policy Implications*, Elsevier, Boston, 2004; 另可参见 Keller W., “International Technology Diffusion”,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42:3, September, 200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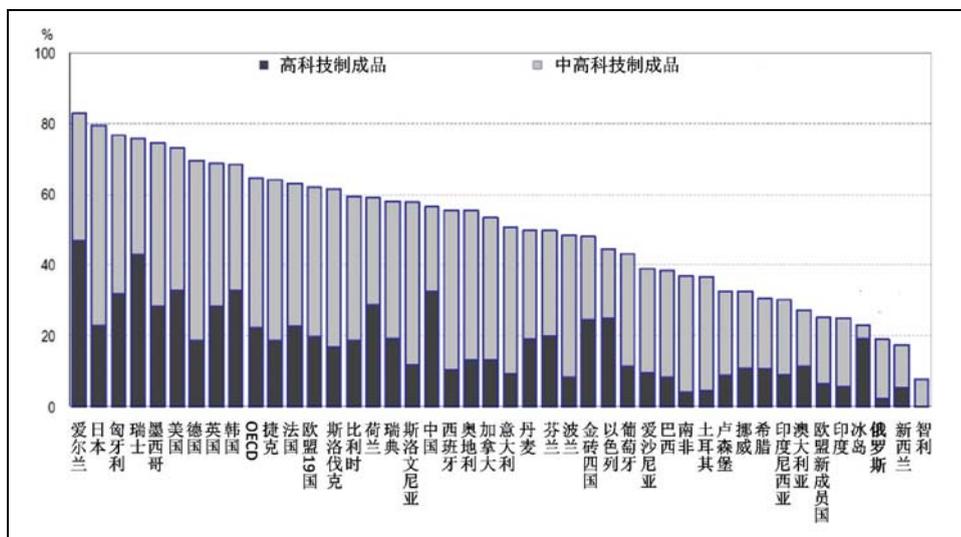
^③ 2003 年以来,俄罗斯科学与工程学位在全部新学位的总比例为 40%,远高于欧盟 13 国 10%,高于美国 20% 以上,具体参见 Gianella 等人的研究报告 <http://eprints.bbk.ac.uk/506/2/506.pdf>

排名较后，甚至落后于发展中国家中国（图 15）



资料来源：“Reviews of Innovation Policy Russian Federation 2011”，OECD，
http://www.imemo.ru/ru/conf/2011/06062011/06062011_IG.pdf

图 15 R&D 支出占国内 GDP 比例



资料来源：“Reviews of Innovation Policy Russian Federation 2011”，OECD，
http://www.imemo.ru/ru/conf/2011/06062011/06062011_IG.pdf

图 16 2007 年高科技及中高科技产品占总制成品出口比重

而在高科技产品进出口方面，2010年俄罗斯不仅有15亿美元的逆差，而且其高科技产品的出口份额，在总的出口份额中占比几乎可以忽略（图16）。

由于巨大的科研基础没有有效地转化为创新，从1998年到2008年期间，高科技行业对推动俄罗斯的GDP增长所发挥的作用很小，2008年高科技行业占GDP比重仅为3%。比重过小难以带动整体经济增长，并且延误了俄罗斯经济的结构调整。按照国际水平横向比较来看，目前俄罗斯有五个主要的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高科技产业。首先是计算机软件和办公设备，从90年代到现在，该行业收入呈现两位数增长，2008年收入总额55亿美元，但比印度仍然小很多，印度同年软件业收入600亿美元。该行业在俄罗斯产业发展中属于新兴行业，入行门槛低，是俄罗斯最开放的行业之一。另一个俄罗斯优先发展、大力扶持的技术行业是专业材料，包括纳米技术。虽然该技术在俄罗斯的理论研究水平高，但商业化程度低，难以将高水平的研发融入民用经济体系。这不仅制约了俄罗斯的技术进步和经济活力，同时反映出俄罗斯特有的旧时代研发制度并未随市场化而转型。另外，核技术、航空以及军备武器也是俄罗斯高科技产业发展的优势领域^①。事实上，由于其战略思维考量和研发路径依赖仍然以军事工业研发为核心和先导，因此，使用公共研究资源自上而下开展科研的模式在今天的俄罗斯并没有改变。2011年10月，俄罗斯总理普京就要求在未来10年投资3万亿卢布用于国防工业，并强调对国防工业进行大规模投资将带动俄罗斯经济发展。俄罗斯政府常务委员会已经于2012年2月22日批准了到2020年全面改进俄罗斯国防工业综合体的计划，预计将投资3万亿卢布（约合1008亿美元）。该项目将主要致力于加强科学技术和制造能力，建立先进的国防基础设施，同时人才教育和培养也是其中的重要目标之一^②。

创新是经济现代化的重要因素之一。俄罗斯目前的创新机制存在一些明

① A.Aslund, A.Kuchins (eds.), *Russia after the Global Economic Crisis*, 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Washington, D.C., 2010.

② 对比冷战时期美国与前苏联的军事竞争，一个比较奇怪的问题是，为什么美国“星球大战”计划中的投入最终转化为科技的民用溢出，而前苏联的投入成为军事体系沉淀成本？对此，笔者的解释是，由于前苏联体系缺乏市场渗透，所以研发投入没有带来横向产出，而美国自下而上的公司主导研发，为军事技术民用提供了制度保障。

显问题，比如企业的研发水平较低，创新活动少，并且缺乏创新条件和制度框架，特别是研发竞争强度低，管制过渡和腐败等问题导致难以形成创新的自主机制。俄罗斯从前苏联继承了优越的科研基础，而且除了上世纪 90 年代的短期削减外，俄罗斯一直比其他新兴经济体投入更多的研发力量，但与 OECD 的平均水平比较还是低很多。俄罗斯的创新表现整体上处于中等水平，但却没有能够实现更多的技术成就，并且没有很好地利用创新来刺激经济发展。许多文献研究注意到了俄罗斯创新既有的制度性和体制性缺陷，如公共研发而不是企业研发，供应驱动而不是需求驱动主导研发，税收政策与非银行金融支持（VC）欠缺，研发能力区域分配不合理等，种种因素在阻碍着俄罗斯创新能力的发挥^①。

当然，俄罗斯并不是没有注意到科技创新对于国家今天乃至未来的重要意义。俄罗斯当局近年来为促进科技创新已做出许多努力，如 2005 年俄罗斯颁布了《经济特区法》，该法律规定了两类经济特区（SEZs）：“工业产品区”与“技术创新区”。其中高附加值产品的“工业产品区”最大占地面积可达 20 平方公里，在该区域内的公司将被免除第一个五年的地区财产税、土地税，并拥有免除海关关税和进口增值税的特权；而“技术创新区”作为国家创新战略（俄罗斯创新 2020 战略）的组成部分，除了“工业产品区”的一些优惠政策外，技术创新区还将享受社会税从 26% 下调到 14% 的税收优惠，并且可以将研发成本直接抵扣税收。在这些激励政策的支持下，一些经济特区、科学基地、技术园区，以及风险资本基金相继诞生^②。最为著名的是“斯科尔科沃”创新园区，该技术园区具有研究集群的性质，集聚了生物医学、IT、动力效能、核技术和空间技术、电讯等众多领域。各单元之间既不相互干扰，必要时还能相互协作。这些举措都表明了俄罗斯政府克服创新不足的决心。当然在肯定俄罗斯对创新的积极努力时，一些潜在未来风险也

① 对于俄罗斯研发目前存在的问题研究参见“Reviews of Innovation Policy Russian Federation 2011”, OECD, http://www.imemo.ru/ru/conf/2011/06062011/06062011_IG.pdf

② 仅在 2006 年俄罗斯就有四个技术创新区建立，分别是泽勒诺格勒（Zelenograd）的微电子区，杜布纳（Dubna）的核物理区，托木斯克（Tomsk）的新材料区和圣彼得堡（St Petersburg）的信息技术区，并在经济发展与贸易部等三个部的分别操作下，掌管了近 50 亿卢布的风险投资基金。

存在，比如斯科尔科沃计划已经成功地吸引了海外技术型企业，并且会作为政策试验基地，但同时，这个计划耗费大，公共财政支持成本较高，并没有完全体现企业主导的特征。

尽管俄罗斯的研发体系和创新体系已改变和进步很多，但仍存在一些前苏联时代遗留的问题。比如，当前创新体系的核心仍是国有研发和设计机构，而非私有企业。这种制度安排会弱化知识体系流动，并且缺乏技术开发和技术应用之间的互动。而在OECD国家，运作于市场竞争中的企业才是创新活动的核心，公共研发只起辅助作用。因此俄罗斯创新政策实现的难题是，如何把创新体制从国有的研发机制转型为市场企业为主导的研发机制，并且有效地利用国际研发能力^①。当然，依据国际经验来看，在国际研发合作上，如果没有足够的外国企业的“绿地投资”是很难持续提高的^②，所以如何促进国外多产业化投资也是俄罗斯改进创新的一个考验。

（二） 财政结构有待优化

在经历了持续的高增长和金融危机影响下2009年的严重衰退后，俄罗斯正在经历着缓慢的危机后增长时代。与金融危机前7%的年均增长率相比，俄罗斯现在的增长率非常平缓，在3.5%到4%之间。而在后金融危机时代，油价更加走低、人力成本不断升高，以及资本流入减少等，都是俄罗斯当前新的外部环境。在此情况下，俄罗斯财政预算在各个方面都受到限制，将产生两个主要的财政支出政策问题：第一，如何提高财政支出的效率，在减少的财政资源背景下提高公共服务？第二，如何确保关键的基础设施投资建设来保证长期的增长和经济多样化？

在过去十年间，俄罗斯创建了先进的税收体系，设计了两个石油基金来管理财政储备，并将公共债务减少到GDP的10%以下。尽管石油价格上涨，大量资金流入，但由于石油基金的出现，改革在一定程度上帮助俄罗斯减少了“荷兰病”症状的恶化，并让俄罗斯在2008年金融危机完全爆发前一直处

① 虽然中国目前的创新体系与俄罗斯有很大的相似性，如公共研发、国有研发占相当比例，但中国有一个特点是俄罗斯不具备的，就是外资企业研发的溢出和推动效应，使中国企业缩短了研发路径。

② 有关俄罗斯创新体系缺乏国际研发合作的研究参见Leonid Gokhberg, Tatiana Kuznetsova, “S&T and Innovation in Russia: Key Challenges of the Post-Crisis Period”, *Journal of East-West Business*, Volume 17, Issue 2-3, 2011.

于财政盈余状态。但除了这些有效的改革之外，近几年来俄罗斯非石油税收基础并没有扩大，而且公共支出并不稳定。并且，政府在2005年将统一社会税（Unified Social Tax）减低至26%，在2004年将增值税从20%减低至18%，以及其他的税收减免，将导致俄政府损失了相当于近4%GDP的税收（表5）。

表 5 税法变化引起的财政收入差额

	立法日期	长期财政影响， 占GDP比重
总计		4.32
增值税从20%减少到18%	2004年1月1日	0.55
废除营业税	2004年1月1日	0.35
统一社会税从35.6%减少到26%	2005年1月1日	1.40
确立10%溢价摊销	2006年1月1日	0.11
减少石油开采税	2007年1月1日	0.10
企业收入所得税从24%减少到20%	2009年1月1日	0.60
改变用于计算矿物开采税的石油价格起征点	2009年1月1日	0.20
确立东西伯利亚油田的石油开采税减免	2010年1月1日	0.29
减少出口至乌克兰的天然气的出口税	2010年4月1日	0.13

资料来源：“Russia Public Expenditure Review”，WB, 2011。

金融危机前俄罗斯的巨额财政储备（2008年底约为GDP的16%），为政府提供了救助俄罗斯金融危机的资金保障，俄罗斯在2008年和2009年各实施了总额为6.7%GDP的救助政策计划以缓冲金融危机造成的影响。但是金融危机后，俄罗斯现在面临的问题是要均衡地控制公共财政支出，在减少经济刺激的同时，熨平经济波动。由于公共财政刺激计划的推出，俄罗斯2009年财政赤字超过了GDP的6%，目前俄罗斯政府计划逐步缓慢地调整预算，到2015年消除赤字。短期来看，俄罗斯政府的2011-2013预算强调六个关键的经济政策目标：利用预算作为关键政策工具以保持宏观经济稳定；提高公共支出的有效性；提升结果导向型公共部门的绩效；发展支持创新的工具；提高人力资源质量；确保养老金系统的长期可持续性。实现这些目标不仅需要结构改革，同时还需要巨大的财政资源，如表6所显示的，根据俄罗斯新的预算规划，俄罗斯在基础设施建设、军事现代化和经济现代化以及创新方

面，均将有规模更大的支出^①。

表 6 初步估计与前一年份相比，2011-2013 年新增资金需求

资金需求（占 GDP 比重）	联邦预算法			2013 年总需求（与 2010 年相比）
	2011	2012	2013	
1.新增支出压力	0.5	0.0	0.4	3.3
道路设施现代化	0.1	0.1	0.1	2.2
军事现代化	0.2	-0.1	0.4	0.6
支持经济现代化与创新	0.2	-0.1	-0.2	0.5
2.石油与燃气收入的逐渐减少	0.5	0.3	0.3	2.5
3.非石油税收的减少	1.2	0.3	0.1	1.6
4.债务融资	0.2	0.1	0.0	0.3
总计（1+2+3+4）	2.4	0.7	0.8	7.7

资料来源：“Russia Public Expenditure Review”，WB, 2011。



资料来源：“Russia Economic Survey 2011”，OECD。

图 17 油价、股票市场状况及非石油财政预算平衡

① 所给出的预测仅是世界银行研究者根据俄罗斯预算法的一个估算，俄罗斯的预算弹性很大，常常根据总统的意见进行修订，普京新当选后又提出一系列稳定民生和加强现代化的举措，而这将为预算波动带来不确定性。参见 S·赫德兰：“普京重返克里姆林宫——是时候忘记俄罗斯现代化了吗？”，《俄罗斯研究》，2012 年第 2 期，第 156-159 页。

仔细分析俄罗斯的财政结构可以看到,在俄罗斯联邦预算平衡中一直有一个隐含的问题(图17),即非石油收入预算。如果扣除非石油收益预算,那么俄罗斯预算缺口是很大的,约为GDP的10%。虽然2011年国际石油价格高企,使俄罗斯保持了外部经常账户盈余,但俄罗斯的资本流出却一直持续。从长期预算平衡角度看,俄罗斯目前最大的问题是保持预算的稳定性。由于石油价格波动而带来的阶段性收益,可能使俄罗斯放松对非石油预算缺口的警惕,所以,尽管俄罗斯2007年的《预算法》中已经强调了预算的平衡性问题,并且已经设立了稳定基金来补充与预防石油非稳定收益,但是预算平衡一直是俄罗斯的弱项。从公共财政的可持续性能力以及稳定支付能力的角度看,一个长期的隐患是,俄罗斯养老金支出的压力在逐渐显现。目前俄罗斯退休年龄(男性60岁,女性55岁)是低于许多国家平均水平的,根据人口统计,到2030年,俄罗斯的赡养率将从目前的33%上升到52%,不仅显著高于OECD国家的平均水平,而且还将增加占GDP8%的公共支出^①。

金融危机前,特别是在欧洲发生主权债务危机之前,国际社会对于财政预算平衡和赤字抱着漠然的态度。随着债务危机的持续,使得研究者越来越关心一个国家长期的财政预算平衡。人们发现,在这方面表现比较好的国家如荷兰、瑞典等,均从制度角度约束了财政平衡^②。俄罗斯虽然在2007年开始执行《预算法》后也强调了议会对于政府预算的约束性作用,但是,由于政府管理经济的惯性和石油价格高企的外部环境,使得俄罗斯的非石油预算不平衡还是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对于建立财政预算上限的概念还是没有紧迫感^③。因此,从短期来看俄罗斯的财政情况良好,债务负担也不大,但大量的非石油赤字仍需要中期的财政调整才能得到平衡,而长期可持续财政对于俄罗斯更是一个巨大的考验。

① Bogetic, Z. et al., "Long-Term Fiscal Risks and Sustainability in an Oil-Rich Country: The Case of Russia", *World Bank 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s*, No.5240, World Bank, Washington, D.C., 2010.

② “预算理事会”的制度设计对约束政府预算作用比较明显,有学者对此进行了比较研究,具体参见R.Hagemann, "Improving Fiscal Performance Through Fiscal Councils", *Economics Department Working Papers*, OECD, Paris, 2010, No.829.

③ 有学者在金融危机爆发时就提出“预算上限”的概念,并对不同国家预算持续能力进行了比较研究,具体参见G.Ljungman, "Expenditure Ceilings—a Survey", *IMF Working Papers*, IMF, Washington, D.C., 2008, No.08-282.

四、结论

从苏联瓦解算起，俄罗斯踏上经济转型之路已经 20 年了。金融危机前经济增长的辉煌成就，包括金融危机中的严重衰退，都值得人们去反思。对于俄罗斯而言，其经济转型的结构性难题似乎明显，而后金融危机时代俄罗斯的经济转型还将面临着哪些挑战？

从外部环境看，首先，来自外部的世界范围的各大经济体的增长减速，必然引发资源价格的波动，特别是中国经济减速和结构调整已经抵消了地缘政治不稳定带来的油价投机^①。其次，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延续，使得欧洲主要国家收缩财政开支，其带来“挤出效应”威胁到俄罗斯对欧洲的出口。而最重要的是，全球金融市场的管制加强，特别是主权债务危机持续发酵的效应将增强投资者的风险厌恶，导致资金流出包括俄罗斯在内的新兴国家。有数据显示，在 2011 年，已有 840 亿美元净资本流出俄罗斯，而 2012 年 1 月还有 170 亿美元流出俄罗斯^②。无论这些资本是考虑到金融风险偏好，还是政治风险偏好，大量净资本流出将严重影响俄罗斯的经济多元化和其需要的结构调整。另外，一个来自新技术革命的变革也可能正在给俄罗斯经济增长和财政稳定带来致命的威胁。源自美国 2010 年开始的“页岩气”革命，虽然其示范效应还没有在全球范围内扩散，但美国能够通过新能源达到能源进出口平衡，对俄罗斯来说，确实不是一个好消息^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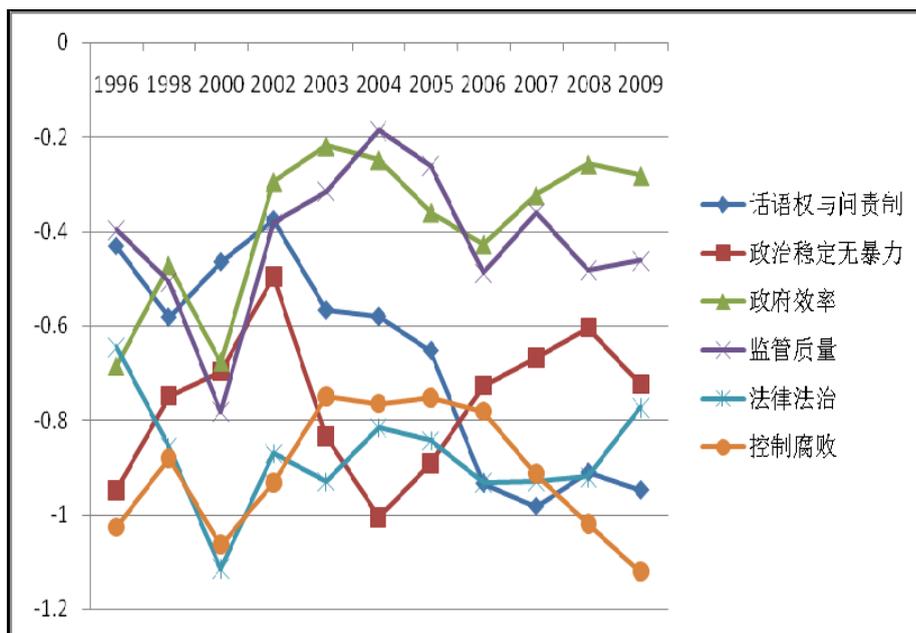
就内部环境而言，同样还有很多挑战性问题尚待解决。除了普京再次当选引发明显的政治与社会反抗，包括情绪对峙外，仅就经济转型而言，“资源诅咒”可能继续阻碍俄罗斯的制度健康化和经济改革，而这与俄罗斯国内腐败盛行交错形成恶性循环。世界银行评估数据显示（图 18），在 2004 年到 2008 年石油价格处于历史高位时，俄罗斯政府机构不仅没有提升治理能力，相反其总体治理水平甚至还有明显的下降。虽然，我们不能武断地认为，

① 2012 年中国经济调整对于世界大宗产品价格影响是明显的，即使在利比亚战争和伊朗危机持续的情况下，石油价格并没有创出新高，与农产品价格相比，中国经济结构调整对于油价影响效应明显。

② http://en.ce.cn/World/biz/201202/21/t20120221_23089119.shtml

③ *Annual Energy Outlook 2012*, EIA, June 25, 2012.

俄罗斯错过了结构转型的最佳机遇期，但至少可以说明，在外部环境良好的情况下，俄罗斯解决治理能力和改善商业环境的转型并没有明显的进步。



资料来源：“Governance Indicators Project”,WB.
注：6个指数值域为-2.5至2.5，-2.5表示极差，+2.5表示极好。

图 18 1996 年至 2009 年俄罗斯政府治理指数

按照俄罗斯领导人的规划，俄罗斯如果想迈入当今世界最发达的、以市场经济为导向的国家行列，那么，其首要的任务是完成经济的现代化，而长期依赖贸易条件优势和运用资源禀赋来维持快速经济发展，是难以实现这个目标的。因此，可持续地提高经济产出的途径应当是有效地利用生产要素，采取新型的生产和服务模式，提高全要素劳动生产率（TFP）^①。这不仅意

① 俄罗斯的全要素劳动生产率（TFP）虽然比中国高，但仅相当于美国的 1/3，因此，具有巨大的赶超空间，具体比较研究参见<http://www.imemo.ru/ru/conf/2011/06062011/06062011IG.pdf>

味着俄罗斯要营造鼓励创新、改革投资路径和创造人力资源发展的新的政治、经济环境，同时，提升政府治理经济的执行能力更是至关重要^①。

后金融危机时代，对于俄罗斯经济而言，最大的难题就是“结构改革”。今天几乎所有研究俄罗斯经济的文献均注意到“结构改革”的重要性^②，但在一个转型历史继承非常复杂的国家，在上层建筑影响和控制经济基础的俄罗斯，进行大规模的“结构改革”无疑是一场新的“革命”。这场“革命”不仅是对普京新执政期经济能力的一个检验，同时也关乎俄罗斯发展的未来，对于这一点，俄罗斯做好准备了吗？

【Abstract】 Russia has accomplished remarkable economic increase in the 20-year transition, but the problem exposed in the financial crisis indicates that internal structural problems remain serious, which will influence the sustainable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budget security of Russia in the long term. The biggest challenge in Russian economy after the financial crisis is the structural reform.

【Key Words】 Post-Financial-Crisis Era, Russian Economic Transition, Assessment

【Аннотация】 20 лет экономических трансформаций в России привели к значительному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му росту, но проблемы, проявившиеся в условиях финансового кризиса, также указали на основные структурные проблемы экономики России, эти основные структурные проблемы экономики России будут влиять на долгосрочный устойчивый рост и

① 根据笔者的不完全统计，在过去的 2004 到 2009 年间俄罗斯在产品市场、贸易投资、金融体系、商业管制、能源效率等领域启动的结构改革措施有 70 余项，其中包含了许多新的立法，但以 OECD 评估结果而言，其中绝大部分改革措施并未得到有效的执行或者根本未实施，文献参见 *OECD Economic Surveys: Russian Federation 2011*, OECD, December, 2011.

② 有关研究参见 Clifford G. Gaddy, Barry W. Ickes, “Russia after the Global Financial Crisis”, *Eurasian Geography and Economics*, Vol.51, No.3, 2010, pp.281–311. 可以对比的是，在同为转型国家的中国，在 2012 年也出现的继续和深化改革的讨论，其中经济领域的核心也在破除垄断和金融开放，包括为民营经济松绑。

бюджетную безопасность, самым большим вызовом для экономики России после финансового кризиса являются структурные реформы.

【Ключевые слова】 эпоха после финансового кризиса, экономические трансформации в России, оценка

(责任编辑 姜睿)

分权体制下中俄地方官员激励机制及其经济行为 选择比较——2000年以来的相似性和差异性*

徐坡岭 郑燕霞**

【内容提要】中俄两国经济增长差异与地方官员行为的关系问题，是一个备受关注的话题。通过观察分析两国政治架构和具有分权性质的财政激励机制的异同，探索两国转型现阶段不同激励机制下地方官员在经济高速增长过程中的行为选择差异，有助于找出两者之间的联系。转型过程中垂直政治领导和财政分权体系对地方官员的经济行为选择有着重要影响。其中，2000年以来俄罗斯中央政府对地方官员任免与升迁的控制，有效地缓解了财政分权激励下地方官员发展经济的积极性动力不足的问题，从而解决了转型早期产权保护缺失下市场混乱和经济衰退的问题。这也印证了中国长期坚持的地方官员增长锦标赛与财政分权相结合的有效性。但与此同时，中国部分地方官员中出现了只追求发展的高指标，而对辖区内居民生活福利的问题有所忽视的问题，对教育、医疗卫生、环境等非经济性公共物品的供给远低于俄罗斯。这一问题仍需要探讨。

【关键词】分权 中俄 地方官员 激励

【中图分类号】K512.6**【文章标识】**A**【文章编号】**1009-721X(2012) 03-0174-(23)

* 本文是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辽宁大学转型国家经济政治研究中心年度重大课题“转型政治经济学导论”(项目批准号: 10JJDGJW009)的阶段性成果。在成稿过程中, 匿名审稿人提出了许多有益的建议和观点, 在此深表感谢。对于其中可能出现的问题和不足, 作者文责自负。

** 徐坡岭, 辽宁大学转型国家经济政治研究中心副主任, 教授、博士生导师; 郑燕霞, 辽宁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硕士研究生。

一、问题的提出

中俄作为转型国家中两个最大的经济体，经济增长路径明显不同。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持续的经济增长成为世界经济史上的一个奇特案例。同时，俄罗斯经历了 20 世纪 90 年代的转型性经济衰退后，2000 年以来实现了经济的持续增长，甚至 2008 年的世界金融危机，也只是在 2009 年才造成俄经济的明显衰退。之后的 2010 年和 2011 年，俄罗斯的 GDP 增长率分别恢复到了 4.0% 和 4.3%。值得注意的是，2000 年以来中俄两国经济增长（中国年均 GDP 增长率超过 10%，俄罗斯超过 6%）远高于发达国家 2.6% 的平均增长率及 4.1%^① 左右的全球平均增长率。对于中国经济的长期持续增长，大量文献从财政分权的角度在理论和实证两个方面进行了解释。而如何理解俄罗斯 2000 年以后的经济成就？或者说，俄罗斯在 1999 年以后经济由衰退转为持续增长，仅仅是普京时代稳定的社会政治形势所带来的积极效应吗？

对于中俄两国 2000 年以来经济增长的强劲势头，经济学家倾向于用传统的经济理论来解释，认为自然资源、技术进步、自由贸易、人力资本等要素是经济发展的关键。但也有学者从制度安排的角度来诠释经济增长奇迹，而分权制度作为两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典型事实，是理解两国经济增长的重要视角。在有关中俄经济增长的财政分权解释中，金和辉、钱颖一^②，温加斯特（Barry R. Weingast）^③ 和奥利弗（Jean C. Oliver）^④ 等认为，分权下的激励制度是中国经济取得迅速发展的重要因素。布兰查德（Olivier Blanchard）、施莱弗（Andrew Shleifer）^⑤ 在解释中俄两国在转型过程中经济增长的不同

① 数据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国际统计年鉴 2010》，http://www.stats.gov.cn/tjsj/qtsj/gjsj/2010/t20110629_402735516.htm

② Hehui Jin, Yingyi Qian and Barry R. Weingast, “Regional Decentralization and Fiscal Incentives: Federalism, Chinese Style”,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2005, No.4, pp. 1719-1742.

③ Barry R. Weingast, “The Economic Role of Political Institutions: Market-Preserving Federalism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Journal of Law, Economics and Organization*, 1995, No.11, pp.1-31.

④ Jean C. Oliver, “Fiscal Reform and the Economic Foundations of Local State Corporatism in China”, *World Politics*, 1992, No.1, pp.99-126.

⑤ Olivier Blanchard, Andrew Shleifer, “Federalism with and without Political Centralization: China vs. Russia”, *IMF Staff Paper*, Vol.48, Special Issue, 2001.

表现时，提出这与财政分权下中央政府的集权程度与地方政府的激励机制的有效性息息相关。

学者们对该问题的研究是不断发展的。早期研究更加重视转型时期产权制度缺失条件下对官员行为性质的刻画和区分。比如，市场保护型财政联邦主义和市场阻碍型财政联邦主义的划分，是对 2000 年前中俄经济增长差异的一个经常被引用的观点。其中，温加斯特（Barry R. Weingast）等人^①在研究不同的联邦国家的财政分权经济增长效应时，提出市场保护型的联邦主义能很好地激励地方官员致力于经济增长。钱颖一等人^②在这一基础上提出中国特色市场保护型的财政联邦理论。认为分权以来，地方之间的竞争硬化了地方政府的预算约束，改变了地方官员的激励，从而使得地方政府更有积极性致力于促进辖区内经济的发展。施莱弗（Andrew Shleifer）^③认为，俄罗斯转型初期经济增速的大幅下滑，在很大程度上是源于俄罗斯财政分权激励制度的失效。斯莱德（Darrell Slider）^④将这定义为市场阻碍型联邦主义。这种划分的理论预设是，处于转型中的国家，其政府往往拥有非常大的权力，而又在产权保护、公司治理和契约执行等方面处于相对落后状态，这些不足很容易成为阻碍经济增长的实际因素。要克服这种来自官员的阻碍，必须具备适当的激励。官员只有在面对适当激励的情况下，才有动机积极作为，降低这些因素的不利影响，或者努力改进这些不足，通过各种手段促进经济增长和财富积累。

中俄两国财政分权制度对市场的影响所形成的市场保护与市场阻碍型的联邦主义，促使学者进一步研究两国分权制度激励机制的差异。朱拉夫斯卡娅（Ekaterina V. Zhuravskaya）^⑤认为，中俄两国的财政分权制度具有很大的相似性，但两国中央和地方收入共享机制的设计存在巨大的差异，使得地

① Montinola G, Qian, Y, Weingast B.R, “Federalism Chinese style: the political basis for economic success in China”, *World Politics*, 1995, No.1, pp.50-81.

② 钱颖一：“中国特色的维护市场的经济联邦制”，《经济学消息报》，1995 年第 14 期。

③ Andrew Shleifer, “Government in transition”, *European Economic Review*, 1997, No.3, pp.385-410.

④ Darrell Slider, “Russia’s Market-Distorting Federalism”, *Post-Soviet Geography and Economics*, 1997, No.3, pp.489-504.

⑤ Ekaterina V. Zhuravskaya, “Incentives to provide local public goods: fiscal federalism, Russian style”,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2000, No.6, pp.337-368.

方的收入与其辖区内经济发展水平的联系紧密程度不同,进而影响两国地方官员致力于经济发展的动力。而随着两国实行分税制改革以来,中央收入的大规模上升,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规模的扩大,地方官员所面临的激励机制也发生了变化。傅勇^①在实证研究中指出,中国1994年分税制改革虽然降低了地方财政收入,但中央政府通过税收返还等转移支付的形式保证地方政府对经济增长收入的分享,这使得分税制并没有削弱而是进一步加强了地方财政激励。陈抗、顾清扬等^②从理论和实证上对地方政府竞争所产生的经济行为进行独特的分析,认为随着1994年后财政向中央政府的集中,地方政府的经济行为有从“援助之手”转向“攫取之手”^③的趋势。张晏和龚六堂^④采用全国面板数据对1978-2002年的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关系进行实证检验。他们的研究表明,分税制改革前财政分权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负的,而分税制改革后财政分权对经济增长具有正相关的效果。同时,经济发展程度较高的东部地区财政分权的积极作用要高于经济发展程度较低的中西部地区。这说明,财政分权的激励作用与税制设计和经济发达程度存在某种关联。弗雷克曼(Lev M. Freinkman)、高德博格(Itzhak Goldberg)、德赛(Raj M. Desai)^⑤指出,随着普京上台以来俄罗斯中央和地方之间财权和事权分配在法律上的规范化^⑥,地方官员发展经济的积极性得到了提高。

① 傅勇:“中国的分权为何不同?——一个考虑政治激励与财政激励的分析框架”,《世界经济》,2008年第11期,第16-25页。

② 陈抗、Arye L Hillman、顾清扬:“财政集权与地方政府行为变化:从援助之手到攫取之手”,《经济学季刊》,2002年第1期,第111-128页。

③ “援助之手”是指地方政府积极致力于提供公共物品,进行基础设施的建设以及维持社会秩序和法治等经济行为。“攫取之手”指地方政府利用各种各样的名目来征收预算外收入和体制外收入,通过权力将额外负担强加于企业和个人,从而挫伤企业和个人发展经济的积极性,不利于其辖区内经济发展。

④ 张晏、龚六堂:“分税制改革、财政分权与中国经济增长”,《经济学》(季刊),2005年第1期,第75-108页。

⑤ Raj M. Desai, Lev M. Freinkman, Itzhak Goldberg, “Fiscal Federalism and Regional Growth Evidence from the Russian Federation in the 1990s”, *World Bank 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 3138*, September, 2003.

⑥ 规范化指以法律的形式确定中央和联邦之间财权和事权的分配,如1999年《俄罗斯联邦税法典》的颁布。关于俄罗斯中央与地方分权问题,可参见弗拉基米尔·格尔曼:“中央—地区—地方自治:当代俄罗斯的中央再集权政策”,《俄罗斯研究》,2009年第4期,第79-87页。

实际上,中央向地方进行财政分权,目的是要发挥地方政府的信息优势,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使其致力于投资环境的建设,从而促进经济增长。但这是有条件的。其中,关于政治体制安排、政府治理与财政联邦主义的关系,是财政分权发挥作用的重要约束条件。这些问题已经在 2000 年以来的文献中得到重视。这些文献开始尝试从中俄政治体制安排的有效性角度,来解释两国经济增长与地方官员激励机制的问题。朱拉夫斯卡娅 (Ekaterina V. Zhuravskaya)^①、巴德汉 (Pranab Bardhan)^②指出,从国际比较的视角看,俄罗斯、印度与中国在 20 世纪 90 年代之后出现的经济表现上的不同,主要不是源于财政分权上的差异,而是政府治理上的差异所造成的。周黎安^③认为,行政和财政分权确实构成了地方政府激励的重要来源,但这一激励是否为最为基本和长期的源泉,还值得进一步研究和探讨。周黎安进而提出,地方官员之间围绕经济增长而展开的“政治晋升锦标赛”,是理解中国经济增长的关键线索。李宏彬、周黎安等^④使用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省级数据,对地方官员晋升与地方经济绩效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检验,得出省级官员升迁概率与省区经济增长率具有正相关关系。弗雷克曼 (Lev M. Freinkman)、高德博格 (Itzhak Goldberg)、德赛 (Raj M. Desai)^⑤在比较中俄分权制度下地方官员的激励机制时,认为提高俄罗斯地方的收入共享比例,并不能完全解决其地方官员的激励问题,而两国中央对地方的政治控制程度的差异,才是影响地方官员选择发展经济或进行寻租而阻碍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

以上对文献的梳理表明,2000 年之前中俄两国经济增长差异与官员行为的关系得到了较好的解释。2000 年之后,中国政治结构变化与财政分权

① Zhuravskaya E.V, “Incentives to Provide Local Public Goods: Fiscal Federalism Russian Style”,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2000, No.6, pp.337-368.

② Pranab Bardhan “Awakening Giants. Feet of Clay: a Comparative Assessment of the Rise of China and India”, Paper Presented at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the Dragon and the Elephant: China and India’s Economic Reforms, 2006.

③ 周黎安:“中国地方官员的晋升锦标赛模式研究”,《经济研究》,2007 年第 7 期,第 36-50 页。

④ 周黎安、李宏彬、陈烨:“相对绩效考核:中国地方官员晋升机制的一项经验研究”,《经济学报》,2005 第 1 期。

⑤ Raj M. Desai, Lev M. Freinkman, Itzhak Goldberg, “Fiscal Federalism and Regional Growth Evidence from the Russian Federation in the 1990s”.

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也已经有了许多专门的研究，但俄罗斯的政治结构变化和财政分权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如何，目前还很少见到专门的研究。正是基于这一点，本文借鉴已有文献的研究思路和方法，利用已有的中央和地方之间分权理论分析框架，在总结概括中俄两国地方官员政治和财政激励机制差异的基础上，重点分析 2000 年以来两国地方官员行为选择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为理解政治体制架构、财政分权、地方官员经济行为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提供新的案例解释。

二、分权体制下中俄地方官员政治和财政激励机制的异同

地方官员在中俄两国转型和经济增长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其面临的主要激励和约束是政治与财政激励。而在两国分权这一制度框架内，中央对地方官员的产生与升迁的影响，以及中央和地方之间的财权分配，是两国地方官员激励形成的重要机制。在这方面，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官员升迁和财政分权体制具有一定的稳定性和持续性，其中 1994 年的分税制改革是一次较大的变化。俄罗斯则不然，官员升迁制度的变化是 2000 年之后俄罗斯政治架构的最突出特点。普京 2000 年出任总统以后实行地方行政长官总统提名制，实际上改变了叶利钦时期地方行政长官的产生方式。

（一）中俄地方官员的产生与升迁

1、任命制与“选举制”

地方官员产生的渠道有两种，一种是典型的由下而上的金字塔结构，即由下而上的选举。另一种是自上而下的中央政府任命制。中国是由中国共产党执政的中央集权国家，中央具有集中的人事权，即中央或上级政府有权决定下级政府官员的任命，具体表现为地方官员的来源、任期长短、离任去向等都由中央决定。选举制是 1992 年俄罗斯政治经济转型之后叶利钦时期地方官员的基本产生机制。2000 年普京出任总统后，俄罗斯试图改变中央对地方控制弱的形势，逐步改变了地方官员选举产生的做法，建立起了垂直的政治体制，使得俄罗斯地方官员的产生方式变成了名义上的民主选举、实质上的政治任命制。2000 年 5 月 12 日，普京宣布按地域原则建立由共和国、

边疆区和州组成的联邦区，并批准了 7 个联邦区的成立，同时把国家元首在地区的全权代表制，改为国家元首在联邦区的全权代表制，加强总统对地方的控制。2005 年 12 月 19 日，俄罗斯国家杜马又通过了对联邦主体行政长官产生办法的修正案，事实上确立了 7 个联邦区的行政长官由总统任命的制度。普京实行了一系列政治改革措施，转变了俄罗斯转型以来在叶利钦时期实行的地方官员由辖区内居民选举产生、从而形成地方变相“割据”、中央讨好地方的局面，大大加强了中央对地方的人事控制权，尤其是加强了总统对各联邦区主要行政长官的控制权。但随着俄罗斯人民民主呼声的提高，俄罗斯又开始适度调整中央和地方之间的关系。2012 年 5 月 2 日总统梅德韦杰夫卸任前，签署了恢复直选州长的法令。

2、晋升制

中国对地方官员实行晋升制度，各级官员都必须逐级晋升，尤其是近年来，中央更加重视从基层中提拔领导干部。同时，中央对省部级干部的退休年龄规定为 65 岁，若其正常任期时间为 5 年，则一个普通从政者在最顺利的情况下也需要 20 年甚至更长的时间，才能逐级提升为省部级干部。加上中国对干部任职年龄要求越来越年轻化，使得地方官员在一轮竞争中错过提拔机会就可能永远失去晋升机会，这扩大了地方官员的晋升成本。此外，中国改革开放前形成的“U”型层级制^①下的“块块”经济，为各地方政府官员发展经济提供了客观的可比基础。这使得在中国的制度环境下，各级地方政府官员为在任期内获得晋升而围绕经济增长展开激烈的竞争。张军、傅勇等学者把这一现象概括为“为增长而竞争”、“政治锦标赛”。

而俄罗斯自普京执政以来，逐步建立起行之有效的垂直政治体系，取消了叶利钦实行的地方杜马主席和联邦主体最高行政长官兼任联邦委员会成员的惯例，规定联邦主体最高行政长官和立法会议最高领导人任命自己的代表担任议会两院议员，他们自己则不再进入联邦委员会。同时，联邦中央有权解除联邦主体行政长官的职务，而联邦主体领导人可以解除地方自治机构

^① M 型和 U 型层级制结构是钱颖一和许成钢在解释中国的经济改革为什么与众不同提出的。该文收录于张军、周立安编：《为增长而竞争：中国增长的政治经济学》，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年。

领导人的职务。联邦中央政府对地方领导人事权控制的加强，改变了地方官员需要获得辖区内大多数选民的支持才能连任或在更高级别的政府选举中胜出的政治激励。相反，地方官员对联邦中央政府经济政策是否认真贯彻执行及其所产生的政策效果如何，以及其辖区内地方经济发展的速度快慢等，成为地方官员在任期内向联邦中央政府显示其执政能力强弱的信号，成为其能否顺利进入晋升通道获得提拔的依据。此外，与中国相同，俄罗斯地方官员的任职人员也逐步走向年轻化（2008年5月俄罗斯地方行政长官的年龄为54.4岁），加上地方官员最多只能连任两届（2008年5月地方行政长官的平均任期为7.2年），这使得地方官员具有很强的政治约束即在有限的任期内争取晋升的机会以延长其政治生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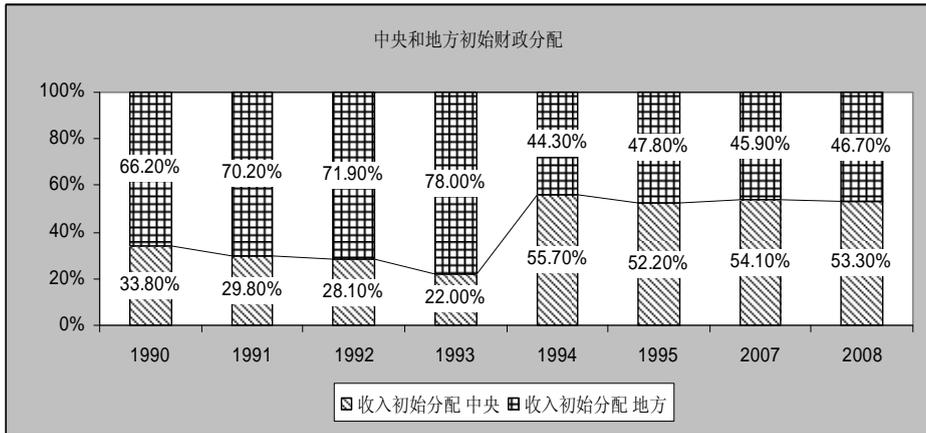
（二）中央和地方之间的财政分权

1、收入共享制

中国在1994年分税制改革前实行的是“财政包干制”。地方拥有剩余收入的索取权，这调动了地方政府官员致力于发展地方经济和建设地方税基的积极性。其中突出表现为各地方乡镇企业的蓬勃发展，到1992年底，乡村企业的产值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1/4。而在1994年实行分税制改革后，地方流向中央的财政收入不仅包括76%的增值税、100%的消费税，还包括100%关税、证券交易印花税等^①。中央政府在新收入分享制度的设计上，将收入中贡献大且稳定的部分化为中央所有，这大大提高了中央财政收入，财政具有明显的集权趋势。如图1所示，1994年中央政府的初始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的比例高达55.7%，远高于1993年的22%。分税制的实行降低了地方政府财政收入的初始分配，地方政府官员致力于地方税基建设的积极性受到不同程度的削弱。再加上收入分权调整后，中央和地方之间的事权并没有得到相应的调整，而地方政府负担着众多事权，这使得地方政府支出与收入存在很大缺口。地方政府官员为缓解财政收支压力，具有通过各种渠道获取预算外收入的激励，甚至增加辖区内的体制外收入。如图2所示，地方政府预算外的收入和支出规模占全国预算外收入和支出的规模在1994年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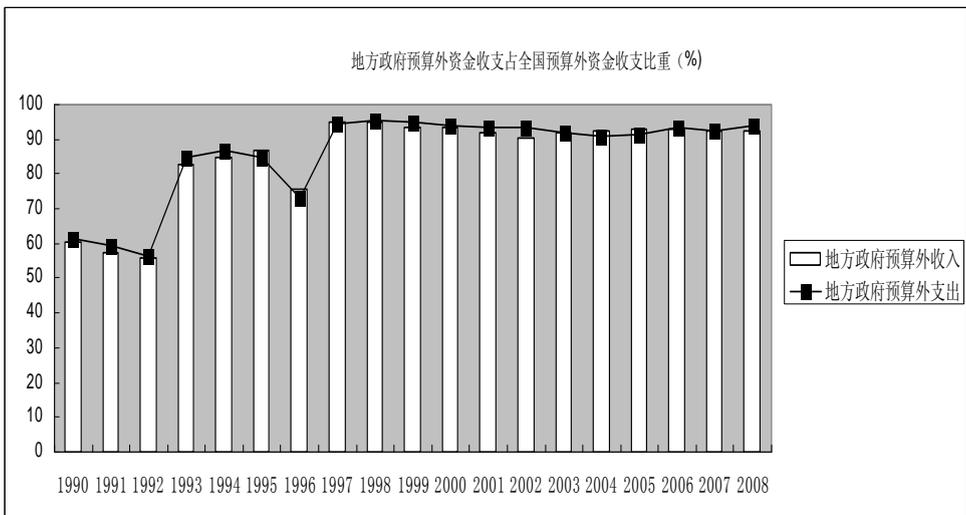
^① 资料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http://www.mof.gov.cn/zhuantihuigu/czjbqk/cztz/201011/t20101101_345459.html

后出现显著的变化,由1994年前占比约为60%到1994年后高达90%,且呈现稳定的趋势。全国预算外资金收支规模也不断扩大,如图3所示,在2008年全国预算外收入和支出的规模高达6617.25亿元和6346.36亿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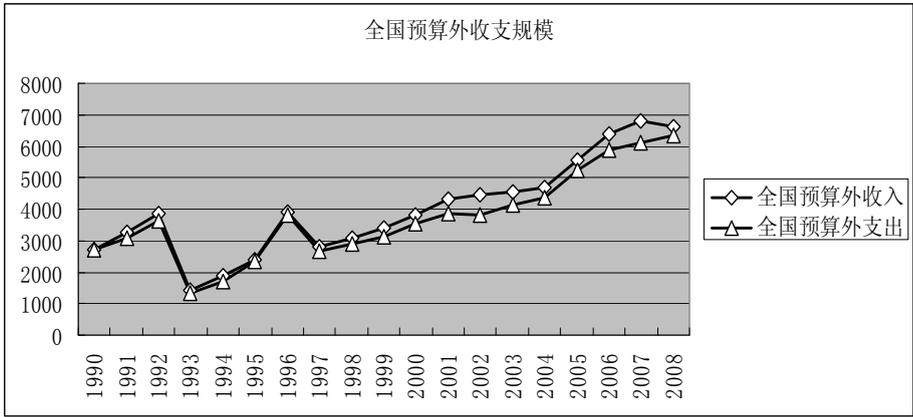
数据来源: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09》。<http://www.stats.gov.cn/tjsj/ndsj/2009/indexch.htm>

图1 中央和地方初始财政分配



数据来源: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09》。

图2 地方政府预算外资金收支占全国预算外资金收支的比重



数据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09》。

图3 全国预算外收支规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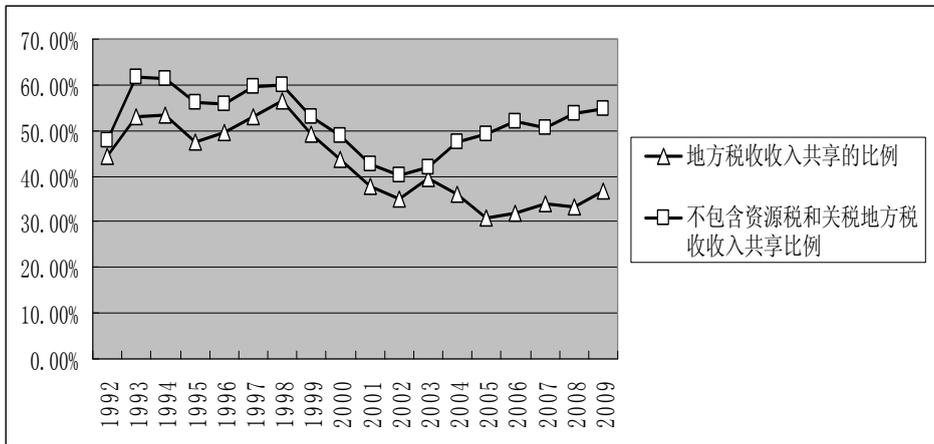
与中国相同，俄罗斯在 1994 年以来也对税收体制进行了改革，实行分税制，对联邦政府和地方政府在税收权限上进行进一步的划分。如表 1 所示，地方分享较大的收入是个人所得税和消费税，而税基宽的增值税主要集中在联邦。但与中国不同的是，虽然俄罗斯税收立法权集中在中央，但地方政府拥有一定的税收自主权，其中联邦主体的执法机关和代表机关有权规定纳入地方财政的那部分税收的税率，有权新增税种。地方政府在财政和税收领域所具有的独立性，使俄罗斯的财政收入分配向着有利于地方财政的方向发展。如图 4 所示，俄罗斯地方财政税收收入占国家财政总税收收入的比重从 1995 年的 47.6% 上升到 1998 年的 56.6%。但 1999 年 1 月 1 日《俄罗斯联邦税法典》生效后，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首先，税法典的规定进一步强化了联邦中央政府的税收立法权，强调税法典所列税种清单是详尽无遗和不可增补的。其次，除税法典规定的税种外，不允许各级地方政府自行新增地区税或地方税，这大大减少了地方政府的税收权限。最后，取消 13 种地方税费，缩小了地方政府的税收收入，使得地方税收收入占国家财政总税收收入的比重从 1998 年的 56.6% 下降到 2005 年 30.9%，而从 2006 年起收入分享比例又有所提高，2009 年达到了 36.6%。但大部分的税收收入还是主要集中在

联邦中央政府，尤其是资源税和关税收入主要由联邦中央政府取得。如图 4 所示，不包括资源税和关税的地方税收收入分享比例与地方税收收入分享比例存在较大的差异。其中，2003 年以来两者的差距呈扩大的趋势，在 2008 年差距高达 20.5%。

表 1 1994 年俄罗斯联邦分税制

税种	地方政府分享比例
个人所得税	100%
酒类消费税	50%
其他消费税	100%
增值税	25%
公司所得税	87%

资料来源：摘自郭连成、车丽娟：“俄罗斯预算联邦制的改革与发展”，《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2009 年第 3 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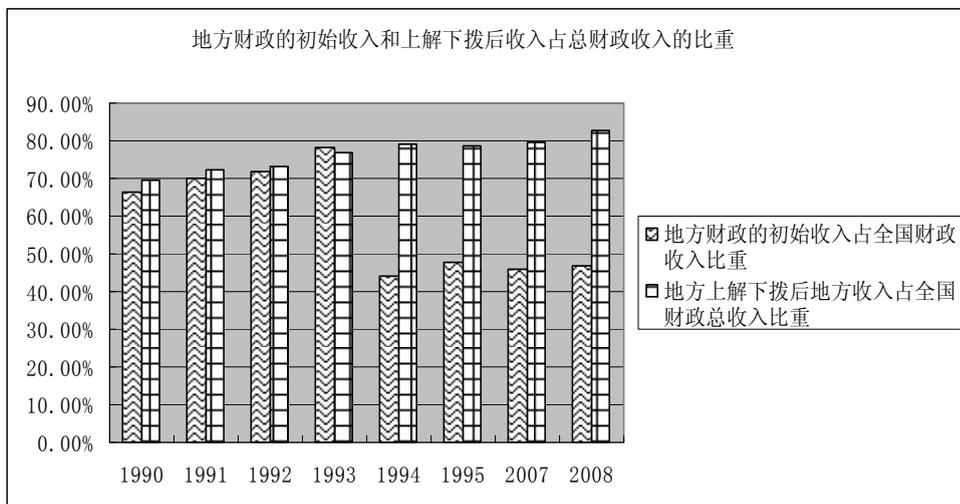
数据来源：Yegor Gaidar, *Russian Economy in 2009. Trends and Outlooks*, Institute for the Economy in Transition, 2010.

图 4 俄罗斯地方收入共享规模

2、转移支付制度

1994 年分税制改革后，中国中央政府加大了对财力的控制力度，大大降低了地方政府的初始收入。由此，中央政府产生了大规模的转移支付。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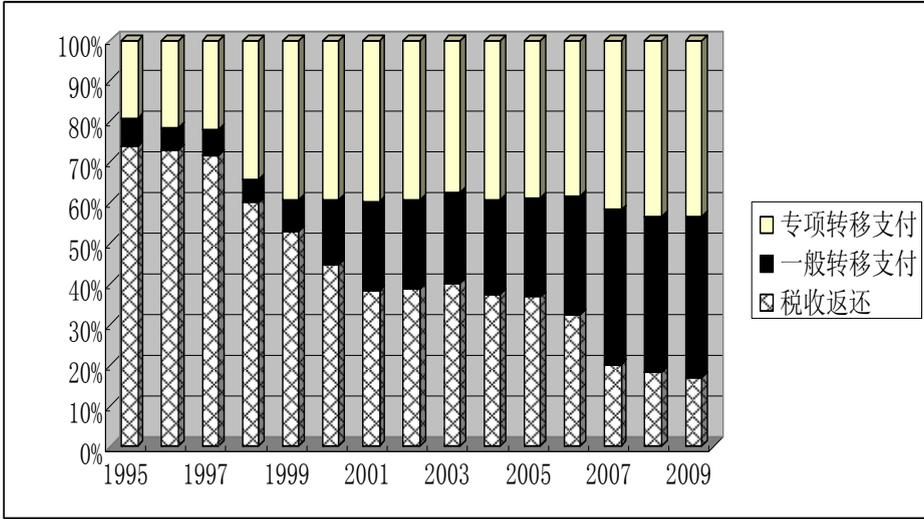
图 5 所示，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在 1994 年后，其初始财政收入与上解下拨后的财政收入存在巨大的差距，地方政府约 40% 的收入来源于中央政府的转移支付。中央政府如此大规模的转移支付，使得各地区地方政府具有积极实行“跑部进京”^①的激励。中国转移支付主要包括税收返还、一般性转移支付以及专项转移支付，其中税收返还是保证地方政府的既得利益，相对于其他类型的转移支付类型，税收返还占转移支付规模比重呈快速下降趋势。如图 6 所示，从 1995 年的 73.7% 下降到了 2009 年的 17.1%。但这种对所有地区无差别的基数税收返还不仅没有缩小地区间财政能力的差距，反而在实行分税制以来肯定了这一差距。同时，具有缩小地区财政能力差距效应的一般性转移支付和专项转移支付，从 1995 年以来虽然总体上呈现上升的趋势，但总体规模较小。这使得各地方争取转移支付资金规模大小，依赖于各地区地方政府官员与中央政府讨价还价的能力。由此可知，我国中央对地方收入转移支付制度的设计与运行并不能很好地均衡地区的财政能力，这使得地方官员具有很强的激励同中央政府进行周旋。



数据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0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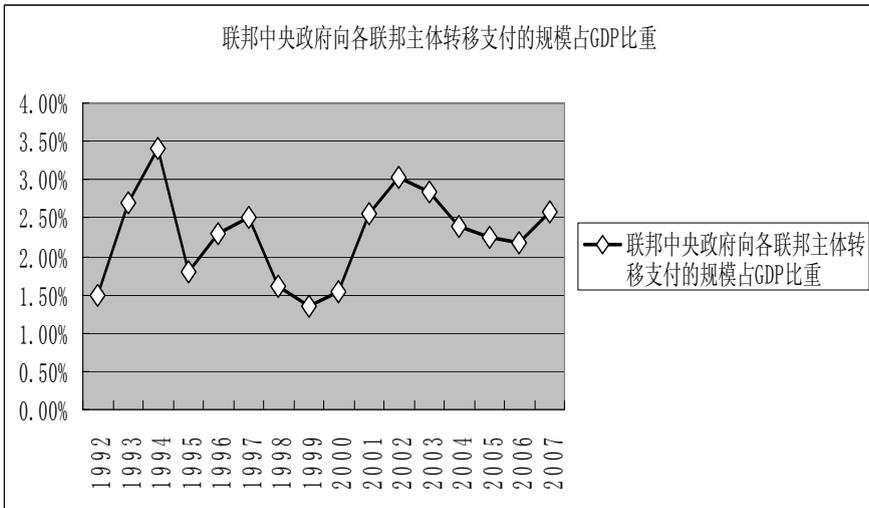
图5 地方政府的初始收入和上解下拨后收入占总财政收入的比重

① “跑部进京”，包括地方政府在北京设立办事处或派代表前往北京等形式。



数据来源：中国年鉴网络出版总库。根据1996-2010年《中国财政年鉴》数据整理得出。

图6 各项转移支付占中央转移支付总额的比重



数据来源：Yegor Gaidar, *Russian Economy in 2007 Trends and Outlooks*, Institute for the Economy in Transition, 2008.

图7 俄罗斯财政援助资金规模

表2 俄罗斯援助基金的基本特征

基金类型	分配原则	提供条件
地区财政	拉平各个联邦主体间的预算保障水平	对特殊补助地区由联邦国库现金供应
补贴基金	分配公式以确定具有社会援助（优惠）权力的个人为依据	有目的的资金使用
社会支出共同拨款基金	根据改革进程确定支出标准和对支出实行部分补偿	最低支出标准和社会领域改革纲要的执行水平
地区发展基金	以投资计划的选择为基础	一次性拨款
地区改革基金	选择性（视改革纲要及执行情况而定）	纲要改革情况

资料来源：摘自郭连成、车丽娟：“俄罗斯预算联邦制的改革与发展”。

与中国相同，俄罗斯由于地区经济发展差距大，税收资源极其不均等，约40%的税收收入集中在10%的俄罗斯联邦主体的区域内^①。因此，联邦政府向地区提供财政援助资金的问题显得尤为重要。但是，其转移支付的援助基金规模较小，如图7所示，俄罗斯联邦中央政府向各联邦主体转移支付的规模占GDP的比重，最高为1994年的3.4%，而进入2000年以来，其比重仅在2.5%左右。此外，俄罗斯联邦援助的形式多样，目前已扩大为五种基金，如表2所示，包括地区财政基金、补贴基金、社会支出共同拨款基金、地区发展基金和地区改革基金。俄罗斯援助渠道的多样性进一步分散了转移支付的资金，这使得各地区地方政府官员具有很强的激励与联邦政府进行周旋，以期获得更多的资金援助。

三、不同激励机制下中俄地方政府官员经济行为选择

综合以上的分析，中俄两国转型现阶段地方官员的政治和财政激励约束，具有很大的相似性。两国地方官员的政治激励表现为中央对地方官员的选拔与升迁具有重要的影响，其中中国中央政府对地方官员的人事安排具有绝对的控制权，俄罗斯则通过普京建立的总统提名制事实上形成了中央对地方官员的人事控制权。如果说有一些差别的话，那就是俄罗斯 2000 年以来

^① 郭连成、车丽娟：“俄罗斯预算联邦制的改革与发展”。

虽然实现了联邦中央政府对地方官员的实际人事控制，但其控制程度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俄罗斯民主政治形式的约束，名义上的选举制对通过提名实现的实际人事控制形成了某种程度的制约。

从两国转型现阶段中央对地方财政分权的制度安排中可以看出，两国中央政府都集中了全国绝大部分的财政收入，都将收入中贡献大且稳定的部分化为中央所有，其中中国中央政府主要集中在税基宽的增值税、关税收入等，而俄罗斯则将对其经济贡献程度最大的资源所征收的资源税和关税集中在联邦中央政府。这使得地方政府的收入来源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中央政府的转移支付，从而降低了地方官员发展辖区内经济的努力与增加其收入之间的联系。加上两国转移支付在设计 and 实际发挥作用的过程中存在着机制设计不合理、缺少透明性等问题，使得地方取得中央转移支付的规模实际上取决于地方对中央的谈判能力。而中俄两国在分权这一框架内所形成的中央对地方政治和财政激励机制，对两国地方官员在其经济高速增长过程中的行为选择具有重要的影响，其中突出表现为两国地方官员选择提供经济性和非经济性公共物品^①的数量和质量，具体表现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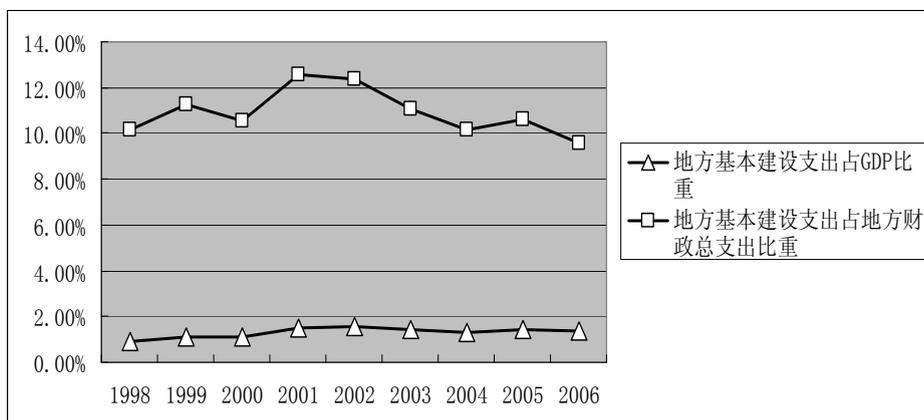
1、经济性公共物品的投资

地方官员对辖区内能源、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的投资规模大小，直接影响着地区投资环境的建设及其经济增长。随着中国财政分权体制的形成，中央把越来越多的基础设施投资决策权下放到地方。魏新亚^②研究发现，中央项目的比例从1991年的50%以上下降到1999年的32.5%。而地方财政支出结构中基本建设支出，占地方财政总支出的比重也高达10%左右。如图8所示，从2000年到2006年，地方基本建设支出占地方财政总支出的比重最高为2001年的12.5%，最低为2006年的9.6%。其中，地方在交通运输方面的支出占地方财政总支出的规模为2%左右。而2009年为应对金融危机的冲击，地方加强对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仅交通运输的支出增长就为地方财政总支出的5.8%，其投资规模从2007年的1133.13亿元增长到2009年的

① 经济性公共物品包括交通、能源、通讯等基础设施方面。非经济性公共物品包括教育、环境保护设施、医疗卫生等方面。

② 魏新亚：“中国基础设施建设投资构成的地区差异”，《上海经济研究》，2002年第2期，第20-25页。

3578.37 亿元。同时，地方基本建设规模支出占全国的GDP比重波动很小，稳定在 1%左右。地方官员对交通等经济性公共物品的投资热情有增无减，与经济性公共物品的数量和质量直接影响地区经济增长息息相关。由于交通等基本建设的投资有利于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以利于各地区地方官员在“招商引资”的激烈竞争中胜出；同时还可为辖区内的经济发展吸收更多的资金，吸引更多优秀企业进入，促进经济的增长，从而提高地方官员任期内的政绩，向中央政府显示其执政能力强，进而在地方官员的晋升竞争中胜出，顺利获得晋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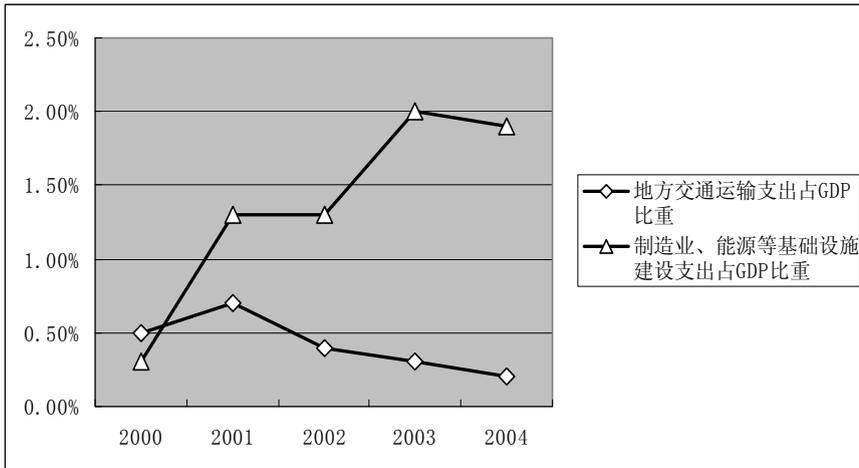
数据来源：中国年鉴网络出版总库。根据 1996-2010 年《中国财政年鉴》数据整理得出。

图 8 中国地方基本建设支出规模

转轨之前，俄罗斯的工业和交通基础设施等比中国更为发达和完善。这与俄罗斯的工业化程度密切相关，也与计划经济时期经济政策对基础设施的重视密切相关。经济转型开始后，俄罗斯经历了较长时期的转型性经济衰退，保证基本民生成为政府支出的重点，导致 20 世纪 90 年代对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急剧下降。到 2000 年，俄罗斯工业基础设施的损坏程度已经严重影响到经济的正常运行。

与中国相同，进行基础设施等经济性公共物品的建设，也是俄罗斯各联邦主体地方官员预算支出的重要选择，但支出重点与政策导向和激励方向密切相关。如图 9 所示，2000 年以后，各联邦主体的预算支出中，制造业、能源等基础设施的建设支出规模占 GDP 的比重呈上升的趋势，从 2000 年的

0.3%上升到2003年的2%。但各地方对交通运输业的预算支出占GDP比重规模较小且呈下降的趋势，从2001年的0.7%下降到2004年的0.2%。这与经济恢复初期的启动领域和重点密切相关。相较于交通基础设施，制造业和能源基础设施的更新和改造更为迫切。同时，苏联时期建造的较为齐全的交通基础设施仍可以勉强使用，这使得各地方在制造业、能源基础设施投资领域和交通运输基础设施投资领域的预算支出，表现出上述差异。但随着经济的恢复，交通基础设施对经济的制约逐步显现。于是，2008年11月22日，俄总理普京签署命令，批准了《俄罗斯联邦至2030年交通发展战略》^①，以改善较为陈旧的交通基础设施。联邦各主体投资总额占投资总额的14%，其中公路投资所占比重高达26%。^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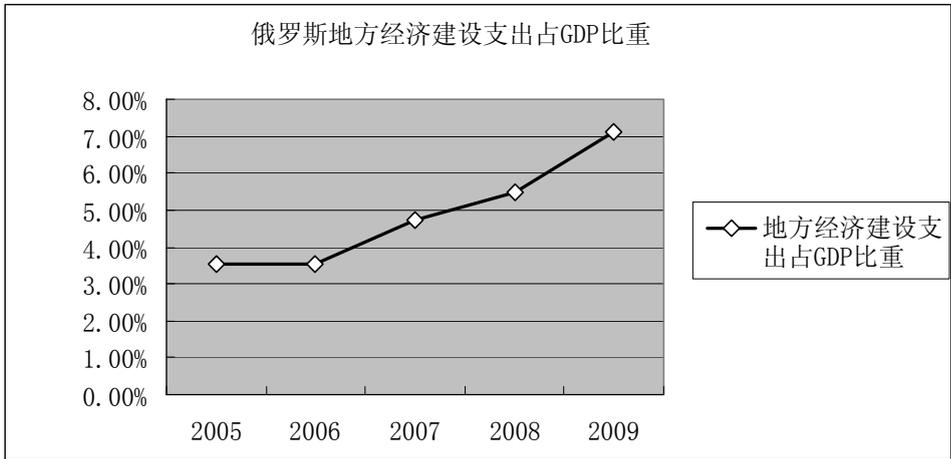


数据来源：Yegor Gaidar, *Russian Economy in 2005 Trends and Outlooks*, Institute for the Economy in Transition, 2006.

图9 俄罗斯地方基本建设支出占GDP比重

① 《俄罗斯联邦至2030年交通发展战略》：该战略的实施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到2015年，通过专项投资完成交通系统的现代化，对关键领域进行系统的优化配置；第二阶段从2016年至2030年，强化所有重点交通领域的创新发展，以保证实现俄罗斯创新社会的发展道路。实施这一交通战略的总投资额为170.58万亿卢布（约合6.38万亿美元），其中，联邦财政投资39.13万亿卢布（约合1.40万亿美元），各联邦主体投资23.91万亿卢布（0.85万亿美元），预算外投资107.55万亿卢布（约合3.84万亿美元）。

② 数据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驻俄罗斯联邦大使馆经济商务参赞处，“俄罗斯交通运输业现状和发展规划”，<http://sousuo.mofcom.gov.cn/query/canchuQuerySearch.jsp>



数据来源: Yegor Gaidar, *Russian Economy in 2009 Trends and Outlooks*, Institute for the Economy in Transition, 20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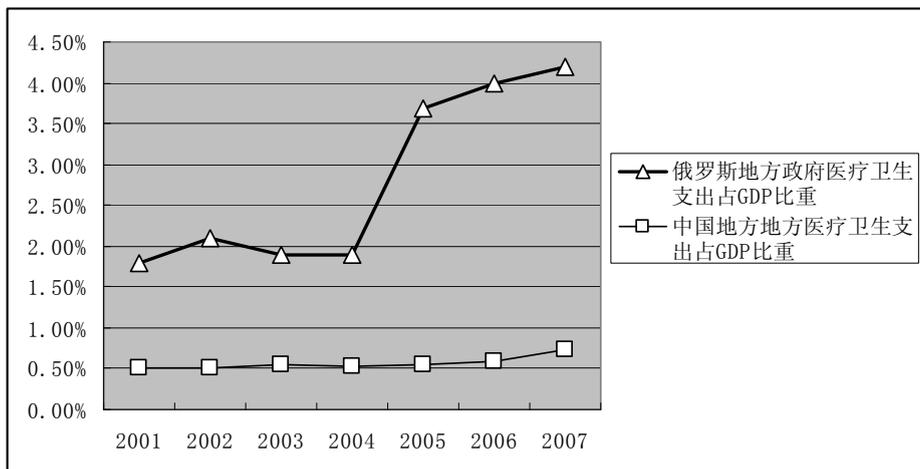
图 10 俄罗斯地方经济建设支出占 GDP 比重

同时,如图 10 所示,自 2005 年以来,俄罗斯各联邦主体支出预算中为支持经济发展的基础设施建设投资规模占 GDP 的比重也不断上升,到 2009 年已高达 7.1%。从 2000 年以来,俄罗斯地方官员致力于辖区内经济性公共物品的提供,与普京执政以来建立起垂直政治体系,加大对地方官员的监督和控制在息息相关。普京通过设置联邦区和任命驻联邦区全权代表对地方当局进行控制,将地方领导人的影响局限于处理地方事务,且查处地方领导人、地方议会违宪行为的权力归联邦中央所有。这进一步加强了联邦中央对地方官员的控制与监督,大大增强了俄罗斯地方官员凭借其政治权力向资源、能源等垄断行业获取权力租金的风险,使得地方官员倾向于贯彻执行联邦中央的经济政策,改善辖区内经济发展环境,促进经济增长,以期获得连任或在更高级别的任命中争取机会。

2、非经济性公共物品的供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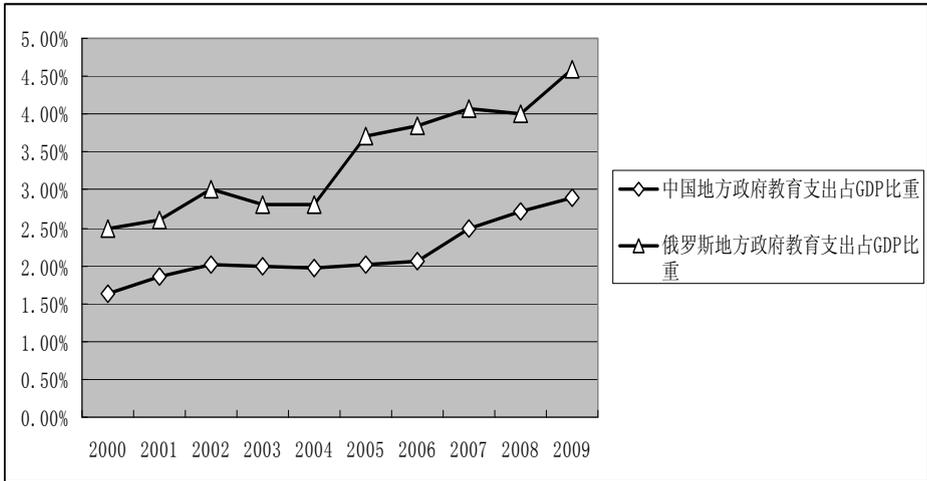
地方官员对教育、环境保护设施、医疗卫生等非经济性公共物品的提供,对辖区内居民的生活福利,以及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影响。但中俄两国转型现阶段分权治理所表现出的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控制强的形势,使得地方官员在很大程度上只向中央政府负责,而忽视其辖区内居民的生活福利

以及经济可持续发展等问题。其中，俄罗斯转型以来所确立的政治民主化，导致其地方官员在一定程度上比中国地方官员更关注其辖区内居民的福利以及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如图 11 所示，中俄两国地方政府医疗卫生支出规模存在显著的差异。中国地方政府医疗卫生支出占 GDP 的比重仅为 0.6% 左右，且增长缓慢，其支出规模从 2001 年的 0.508% 到 2007 年的 0.736%，七年时间仅增长了 0.228%，这一增长速度远远落后于中国各地区经济的增长水平。而俄罗斯地方政府的医疗卫生支出规模，要远远高于中国地方政府支出的规模，且支出规模从 2004 年开始出现迅速增长的局面，到 2007 年支出规模占 GDP 的比重高达 4.2%。同时，教育作为积累人力资本的重要渠道，对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具有基础性的作用。而中俄两国地方政府对教育的支出规模也存在很大的差异。如图 12 所示，中国地方政府的教育支出占 GDP 的比重稳定在 2% 左右，从 2006 年开始出现较大幅度的增长，在 2009 年达到 2.9%。而俄罗斯地方政府对教育的预算支出规模占 GDP 的比重高于我国 2% 的水平，且呈不断上升的趋势，其支出规模占 GDP 的比重从 2000 年的 2.5% 上升到 2009 年的 4.6%。



数据来源：中国年鉴网络出版总库：根据 2002-2008 年《中国财政年鉴》的数据整理得出；Yegor Gaidar, *Russian Economy in 2007 Trends and Outlooks*, Institute for the Economy in Transition, 2008.

图 11 中俄地方政府医疗卫生支出占 GDP 比重



数据来源：中国年鉴网络出版总库：根据 2001-2010 年《中国财政年鉴》的数据整理得出；Yegor Gaidar, *Russian Economy in 2010 Trends and Outlooks*, Institute for the Economy in Transition, 2011.

图 12 中俄地方政府教育支出占 GDP 比重

四、简要的结论

地方官员在中俄两国转型的推进过程中所选择的经济行为，是影响两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如何激励地方官员选择有利于经济发展的经济行为，是两国分权制度需要解决的现实问题。

从两国转型现阶段分权制度的安排中可以看出，两国地方官员的政治和财政激励特征，集中表现为在分权框架内中央政府在政治治理和财政收入分配上占主导地位。地方经济增长所带来的财政收入增长主要为中央政府取得，中央政府通过各种形式的转移支付来解决地方财政支出所需的资金。

其中，中国中央政府在分税制改革初期，通过税收返还的政策，减少收入集中，对地方官员发展经济产生了积极性的影响，而随着税收返还规模的不断缩减，转移支付制度设计不合理等问题逐渐显现。相比较而言，俄罗斯联邦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转移支付种类繁多，资金分散，并不能很好地解决其中央政府集中财政收入以来地方政府的收入来源问题。上述问题使得两

国地方官员致力于地区经济发展的环境建设具有动力不足的倾向。

但中俄两国中央政府对地方官员的任免与升迁的控制，有效地缓解了财政分权激励下地方官员发展经济的积极性问题。两国地方官员都有在任期内促进经济增长，提高其政绩的政治激励和约束，以期在晋升竞争中胜出而获得提拔。而中俄两国中央政府对地方官员的政治激励和约束，在影响地方官员经济行为选择的过程中，也产生了地方官员只向中央政府负责而忽视其辖区内居民生活福利的问题。地方官员在进行财政支出的决策过程中，倾向于选择投资交通、能源等在短期内能够迅速拉动经济发展的经济性公共物品，而对教育、环境、医疗卫生等与辖区内居民生活质量和经济可持续发展息息相关的非经济性公共物品供给则往往有所忽视。其中，中国地方官员对非经济性公共物品投资不足的问题比俄罗斯要严重一些，这与俄罗斯自转型以来形成的地方官员经选举产生，辖区内居民在一定程度上能有效约束地方官员的行为具有相关性。

因此，在中俄两国转型进程的推进过程中形成的中央和地方之间垂直的政治和财政体系，使得中央政府对地方官员的经济行为选择产生重要影响，从而出现了现阶段两国经济迅速增长的局面。但要确保两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则需要进一步理顺中央和地方之间的财权分配，发挥财政分权治理的积极效应，激发中央和地方共同致力于经济发展政策环境的建设，为经济的可持续增长提供稳定的发展环境。同时，要在经济增长的过程中，加大对关系居民福利的非经济公共物品的投资，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为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人力资本等关键要素。

本文上述的一些结论，比如“中俄地方官员更加愿意把财政支出投向基础设施建设等经济性公共物品，而对教育、环境和医疗等费经济性公共物品供给则不太重视，中国地方官员的这种倾向更加明显”等，导致这种激励结果的相似性与差异性的背后原因，还有待进一步探讨。对这些问题的分析，需要在一个更加抽象和具有一般性意义的理论框架中进行。这也是该项研究下一步的一个发展方向。

【Abstrac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differences of economic growth of both China and Russia and local officials' behaviors is a topic that attracts much attention. Through observing and analyzing both differences and similarities between both countries' political structures and fiscal motivation mechanisms, characterized by decentralization, this paper explores different behavioral choices of local officials in both countries during the process of rapid economic growth at this transition stage in order to find out their relationship. The study finds that, during the transition process, the vertical political leadership and the fiscal decentralization system impose a vital effect on local officials' economic behavioral choices. Since 2000, Russia's central government has had control over the appointment and promotion of local officials, which has effectively alleviated local officials' lack in motivation to achieve economic growth under the fiscal decentralization system. Accordingly, the problem of market chaos and economic recession, due to lack of protection of property rights during Russia's early transition, has been solved as well. This has also proved it effective for China to combine its local officials' championship for economy growth and fiscal decentralization. Meanwhile, however, some Chinese local officials are only in pursuit of rapid development while ignoring the welfare of local residents. The supply of such non-economic public goods as education, health care and environment in China is much less than that of Russia. As a result, this issue needs further discussion.

【Key Words】 Decentralization, China and Russia, Local Officials, Incentive

【Аннотация】 Вопрос отношения между различиями китайского и российского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го роста и поведением местных чиновников является важным вопросом. Посредством наблюдения и анализа сходств и различий в политическом устройстве двух стран и децентрализованном характере финансовых стимулов, проводится исследование разницы выбора

поведения местных властей двух государств в условиях различных стимулов данного этапа трансформации в процессе быстрого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го роста, что помогает определить связь между ними. В процессе трансформаций вертикальная система политического руководства и децентрализация налоговой системы оказывает важное влияние на выбор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го поведения местных чиновников. Среди чего, контроль центрального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а России, начиная с 2000 г., над назначением, снятием и продвижением по службе местных чиновников, что эффективно разрешило проблему недостаточного энтузиазма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го развития местных чиновников в условиях децентрализации налоговых льгот, что в свою очередь решило проблемы путаницы на рынке и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й рецессии в условиях отсутствия защиты прав на собственность на начальной стадии переходного периода. Это также подтверждает эффективность комбинации роста длительного чемпионата местных чиновников и фискальной децентрализации в Китае. Однако в то же время в Китае некоторые местные чиновники гонятся лишь за целями высокого развития, но несколько пренебрегают проблемами жизни и благосостояния жителей районов, предоставление услуг в области образования, здравоохранения, экологии и других неэкономических общественных благ намного ниже, чем в России. Эта проблема всё ещё нуждается в изучении.

【 Ключевые слова 】 децентрализация, Китай и Россия, местные чиновники, мотивации

(责任编辑 肖辉忠)

俄罗斯研究 (双月刊)

ИЗУЧЕНИЕ РОССИИ

RUSSIAN STUDIES

2012年第3期

(总第175期)

主管：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主办：华东师范大学

主编：冯绍雷

出版：《俄罗斯研究》编辑部

地址：上海市中山北路3663号

华东师范大学理科大楼A403

邮编：200062

电话：021-62233816；021-62238113

传真：021-62232113

电子信箱：russiastudies@163.net

排版：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电脑室

印刷：华东师范大学印刷厂

发行：本刊编辑部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CN31-1843/D

国际标准连续出版物号：ISSN 1009-721X

网络电子版代理：中国知网

网址：www.cnki.net

· 公开发行 ·

定价：20.00元